

【英】 弗·卡斯滕 著

法西斯主义的 兴起

商务印书馆

75199

D-70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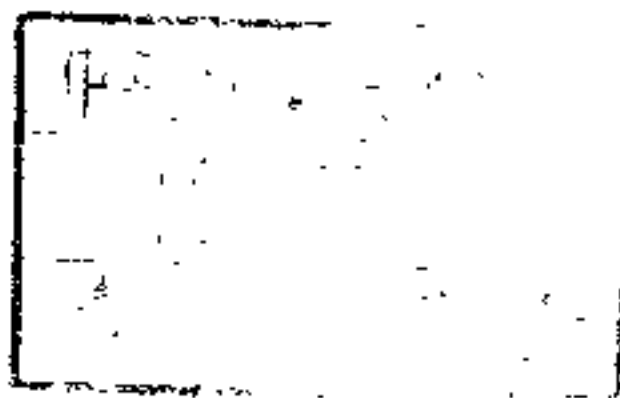
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英] 弗·卡斯頓 著

周颖如 周熙安 译



200046057



商 务 印 书 馆

1989年·北京

THE RISE OF FASCISM

By

F. L. Carste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80

(First Published, 1967, second edition, 1980)

根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0年增订第二版译出

FÄXISIZHÜYI DE XINGQI

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英〕弗·卡斯頓 著

周颖如 周熙安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0423-3/K·53

1989年10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9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232 千

印数 2,200 册

印张 10

定价: 4.10 元

出版说明

本书主要论述法西斯主义在本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在欧洲兴起的过程。作者从历史角度出发,考察了法西斯思想的起源。作者认为法西斯主义是同民族沙文主义有关,它可追溯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初法国的极右翼反共和派法兰西行动党的主张:反对自由和民主制度,反对议会制度,反犹太主义,宣扬极端民族主义,推崇暴力和权力,等等。这些主张同尔后的法西斯运动所表现的特点极其相似。

作者接着以两章的篇幅论述了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和德国的希特勒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组织法西斯党和攫取政权的过程。作者分析了这两个法西斯巨头何以得逞的原因。墨索里尼利用意大利在战后出现的国家危机和经济困难,利用意大利当时泛滥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利用中产阶级对红色革命的普遍恐惧心理,加上议会政府软弱无能,军队警察以及行政当局的帮助,他夺取政权的阴谋遂能得逞。而希特勒的成功也因利用经济困难而使成千上万绝望的德国人加入他的阵营,他的纳粹党巧妙地进行组织宣传工作,使用暴力,不择手段地攻击德国当时的政治体制和煽动暴徒闹事,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和攻击凡尔赛和约从而赢得企图恢复德国国际地位的人的拥护。此外,这两个人都有善于使用阴谋诡计来击败敌手的一套伎俩。

本书还旁及芬兰、匈牙利、罗马尼亚、西班牙、比利时、英国、奥地利等国的法西斯运动的情况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法西斯主义的动向。

本书作者弗朗西斯·卡斯頓是英国伦敦大学历史教授，专攻中欧史和德国史，二十年代在柏林长大，目睹当时纳粹分子在柏林大学和街头闹事，还实地参观过希特勒等纳粹党魁出席的大会。本书叙述纳粹党徒的恶行具有真实性。作者还参考几十种专著写成此书，故史料比较丰富，对研究近现代世界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的“序”及一至四章是周颖如同志翻译的，五至八章是周熙安同志翻译的。

目 录

序	1
一、1914年以前的民族主义与反犹太主义	4
法国	6
意大利	13
德国	18
奥地利与波希米亚	29
俄罗斯	40
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	45
战争及其后果	45
激进主义崛起	49
法西斯分子占上风	56
向罗马进军	64
逐步全面掌权	68
一党专政的国家	75
国际上的反响	82
三、民族社会主义:形成的年代	85
第一个民族社会主义党	85
世界大战后的德国	88
慕尼黑的德国工人党	94
希特勒与民族社会主义党	99
竞争的组织 and 领袖	105
1923年,决定性的一年	113
11月暴动	118

《我的奋斗》	125
四、民族社会主义:通向权力的道路	129
改组的年代	129
山雨欲来	142
危机	149
半独裁政府	156
夺取权力	161
一体化	166
五、东欧的几种法西斯主义	172
芬兰:从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到法西斯主义	173
修正主义和反犹太主义:匈牙利的民族社会主义党人	182
反犹与反共:铁卫军	196
六、西欧的几种法西斯主义	211
西班牙:从民族工团主义到长枪党	211
佛兰德:从民族主义到法西斯主义	223
列克斯运动:从好战的天主教到法西斯主义	231
英国法西斯联盟	239
奥地利的卫国军	245
七、法西斯运动	253
八、新法西斯主义	261
意大利	263
德国	270
英国	278
参考文献	287
索引	293

序

7

本书论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几个主要法西斯运动的发展历史。由于一些明显的理由，本书的注意力首先集中于法西斯运动发端和取得政权的几个国家：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本书虽然对这些国家的法西斯运动历史叙述详细，但未包括法西斯党和民族社会主义党^①执政时期的情况，因这是完全不同的题目，需要另写一本书来阐述；然而，就本书主题而言，有必要简略叙述罗马—柏林—维也纳三角以外的几个欧洲国家的法西斯运动。不过本书不拟谈论每一个欧洲国家的法西斯主义的历史，因为这样会使本书变得相当冗长乏味而且啰嗦重复。第五章和第六章有选择地介绍一些国家的法西斯运动，这是或因该运动本身力量特别强大，或因其呈现的特点不同于意大利和德国制定的模式。

因此，本书对诸如挪威和荷兰等国规模很小而又不重要的法西斯运动有意略去，因为它们只是在德国占领时期靠柏林的扶植才短暂地得势的。同样，书中除了在第一章对法兰西行动党略加叙述外，对法国各个法西斯政党也没有谈及，因为这些政党一直是规模很小并且没有什么势力的。其中最重要的是雅克·多里奥领导的法兰西人民党，该党主要是以其激烈反共著称，这种现象出自一个由前共产党高级领导人领导的党并不奇怪。然而，仅仅激烈反共同法西斯主义并不是一回事（正如激烈反犹太主义同法西斯主义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一样），因为真正的法西斯政党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思想体系，这在它们的历史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我们将

^① 一译作“国家社会主义党”。——译者

8 在本书中讨论。葡萄牙、西班牙以及某些东欧国家（例如波兰或立陶宛）的独裁政权并不是靠法西斯党的崛起和取得最后胜利才建立起来的；它们是代表一种更为老式和保守的独裁类型，类似更早的年代在伊比利亚半岛以及其他地方建立的那些独裁政权。尽管这些独裁政权受到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主义勃兴的影响，并且显示某些“法西斯”的特征，但本书也不去谈它们的历史，因为它们在主要特征上不同于欧洲其他国家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不过本书把西班牙真正的法西斯党长枪党的发展史则包括在内。倘若读者认为这种区分多少有些武断，作者只能申辩说，我必须运用自己的判断，并且希望在叙述过程中提出的论点能说服读者。作者的目的在于包罗万象，而在于举出一些有意义的例子。尤其重要的是，我希望能说明，在一些具有古老文化、高度教育水平和文明行为传统的国家，法西斯运动怎么会不仅得到了发展，而且还形成群众运动并夺取了政权。

作者是在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兴起的年代中在柏林长大的。所以第四章的部分内容是描述作者目睹的一些事件的。作者在写作本书时把这些个人回忆加进去，这样可能使作者的判断更具有特色；我清楚地记得以下情形：这些年代的气氛，同民族社会主义党的大学生进行的讨论，这些学生在各大学的强大势力，我所参加过的有阿道夫·希特勒、奥托·施特拉塞尔以及其他民族社会主义党人发表演讲的集会，在街头和会场发生的冲突，等等。这种政治气氛对于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是十分重要的因素，这一章力求向读者说明这种气氛。

最后，作者希望能对曾经阅读过全部或部分手稿或提出意见的同事们表示感谢。他们是：戈登·A·克雷格教授、哈里·赫尔德博士、伊斯特万·德亚克博士和尤金·韦伯教授。科布伦茨的联邦档案局的工作人员和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的胡佛图书馆的工作

人员都曾为我提供一些十分有价值的文件和小册子，如果没有这些材料，本书就会大为逊色；作者非常感谢他们的帮助。不过，我尤其感谢我的妻子：她曾就本书的主题同我进行过无数次的讨论，她曾详尽地向我提出很多修改的意见。

F. L. 卡斯頓

1966年10月于倫敦

一、1914年以前的民族主义与反犹太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欧洲任何地方都不存在“法西斯主义”。毫无疑问，正是由于大战的大动乱及其造成的破坏和危机，以及对许多欧洲国家出现的“红色”革命的恐惧，才产生了我们称之为“法西斯”的以意大利为榜样的运动。1918年以后的世界是一个被流血冲突、政治仇恨、内战、革命与反革命的大动乱等搞得四分五裂的世界。相形之下，1914年以前的世界是个和平的安乐窝。西欧和中欧任何地方的法律和秩序都没有受到严重的威胁。繁荣和经济进步是那时的常态。1871年的巴黎公社宣言并没有在欧洲肇始革命的新时代，不管马克思及其信徒对这次巴黎无产阶级起义曾作了怎样的解释，这次起义是十九世纪最后一次革命事件。只是沙皇俄国于1905年日俄战争中战败后，国内爆发了一次新的暴力革命，这是即将发生事件的预兆。但它在欧洲其他国家没有引起反响。其他国家的统治秩序、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稳固，中产阶级的兴旺看来都是永远固定不变的了。殖民扩张和瓜分其他大陆促进这种繁荣，尽管也造成了许多冲突。陆、海军军备费用不断地增长——回顾起来这是个不详之兆——也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并带来了巨大利润。即使欧洲天边出现乌云，但看来乌云也不是很吓人的。

这些乌云之一是经济发展本身所造成的一个后果。在多数城镇中构成人口主体的中产阶级下层所处的地位，受到两方面的威胁，一方面是工业和商业的集中过程中建立了越来越大的企业，另

一方面是工人阶级的兴起和他们大声疾呼要平等，要政治权利。至少在某些西欧国家，例如意大利或法国，存在着极左的真正革命运动，而且到处都有强大的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马克思曾预言大多数中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下层将被推到无产阶级的地位；即使这一预言后来证明并不正确，但许多中产阶级分子就是害怕丧失他们的安全和特权地位。中产阶级也可能受到新来者和移民的威胁，而且，在中欧许多地区，还受到某些新民族国家或不大受欢迎的民族兴起的威胁，而这些民族直到最近才拥有自己的中产阶级。在一个竞争性越来越强的世界里，虽然犹太人新近才获得解放，但在许多国家构成了这种威胁；而且其他少数民族或派别——新教徒、捷克人或波兰人，看各国情况而定——的上升，也会在一些人之间引起相似的恐惧，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地位遭到破坏或传统的生活方式受到侵蚀。他们对真正的或想像中的威胁的反应并没有产生“法西斯主义”，但在这个 1914 年以前的世界遭到大动乱的破坏后，这种反应为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发展创造了前提。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们从一开始必须注视这批人在几个欧洲国家的发展情况。在 1914 年以前，他们没有机会掌握政权；他们的影响局限于范围比较小的少数人中，局限于被剥夺了继承权和心怀不满的人中。然而，他们的意识形态却延续到战后时期，那时他们所处的气候很有希望供他们茁壮成长。而他们的成员——在某些重要的情况下，还有他们的领袖——持续活跃，并把战前和战后的世界连贯起来。

虽然这些运动在各国极不相同，但也有些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激烈的民族主义者，一种与十九世纪保守派或自由主义派极不相同的民族主义，人们因而创造了“新右派”这一名词来称呼他们。在多数情况下，他们也是强烈反犹太人的，随便把犹太人当作资本主义社会祸害的替罪羊。最后，他们不仅要在中产阶级和中产

阶级下层引起共鸣,而且还要投合底层阶级的心意,企图使他们放弃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理想,从而为这个新运动提供一个民众基础。这时还不是群众民主的时代,但这些领袖清楚地认识到,要想使反对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反对社会主义与工团主义的思想有任何成功的希望的话,这样一个群众基础是必不可少的。

法 国

法国曾在1870年—1871年的法普战争中战败,并把阿尔萨斯和洛林割让给胜利者。结果是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这决不光是局限于政治上的右翼——并且要求复仇。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常胜将军”布朗热想要率师越过莱茵河去解放失地,他的运动是从右的方面第一次对共和国形成了威胁。保罗·德罗莱德及其“爱国者同盟”成立一个准备发动政变的极右翼组织,煽起不满情绪并且热衷于使这位将军入主爱丽舍宫;但是这一运动不光彩地失败了。布朗热逃到国外,而共和国也就得救。然而没过几年,巴拿马公司的倒闭^①以及由此引起的丑闻又为猛烈攻击共和国,特别是攻击应对这一丑闻负责的一些犹太金融家的人提供了新资料。

这时有人创办了一份新刊物《自由言论》来和“国际犹太人金融”势力作斗争,而这份刊物及其主编也大出风头。主编就是爱德华·德律蒙,他在1886年曾因出版一本书而一举成名;这本书叫《犹太人的法国》,出版后立即销售了几千本。书中描绘古老法国的田园诗般的风景,但这个法国已被犹太人摧毁和征服。此书攻

^①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法国工程师莱塞普等组成的运河工程公司与哥伦比亚订约,取得巴拿马运河修建、租让权,九十年代施工过程中困难重重,同时公司的一些管脑人物多系政治冒险家和犯罪分子,他们侵吞了多次发售的巴拿马运河股票而聚集的大批资金,并向法国一些部长和议员进行巨额贿赂。1889年公司宣告破产,案发后牵连受贿的有一百五十名议员和部长,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巴拿马公司丑闻。——译者

击现代文明，说它使人类在资产阶级的世界上堕落和受屈辱。被小店主、商人和工匠所憎恶的犹太人变成金融势力和资本主义秩序的象征，这引起了中产阶级在经济上的恐惧与愤懑。“唯一从大革命中捞到好处的是犹太人”。犹太移民，诸如罗思柴尔德家族等，在法国积聚了大量的财富，而他们的财富是造成法国遭受一切不幸的原因。犹太人自古以来也曾经犯过其他许多罪行；他们是魔鬼；必须把法国从他们手中解放出来。不过德律蒙还攻击了主要的政客和金融家、教皇、主教、天主教会、大贵族和王室成员，在他
12
看来，所有这些人不是帮助犹太人，便是讨好了犹太人。巴拿马公司丑闻为德律蒙提供了所需要的材料；他是法国反犹太主义组织的创建者，还赋予这个组织以鲜明的反资产阶级色彩。他发现反犹太主义是一个对群众具有吸引力的主题。

十九世纪后期，法国的其他力量也强烈反对共和国本身及其所体现的种种传统，如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的传统，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传统。十九世纪末，就被指控为德国充当间谍的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上尉究竟是否有罪，在亲共和国派和反共和国派两种力量之间发生了公开的冲突，从而动摇了既定秩序的根基。德雷福斯碰巧是个犹太人——这一事实与对他产生怀疑不无关系——再加上他的堕落行为，就被军事法庭判处终身监禁。随后几年间要求重审的呼声逐渐高起来了，埃米尔·左拉在1898年初发表了他的著名的《我控诉》一文，为德雷福斯辩护。不久，得到证实，据以对德雷福斯起诉并定罪的主要文件是一份伪造的文件；对这一伪造事件负有责任的亨利上校被捕并且自杀了。然而这些事件既未能使德雷福斯事件结束，也没有使他的许多敌人就此住口。此事涉及的要人太多，同时也与许多根深蒂固的偏见有关。

1898年春，在左拉发表了《我控诉》和为响应他的呼吁而成立的“人权同盟”后的几个月，有两个对这些事件和法国的困境感到

厌恶的青年人，创立一个“法兰西行动委员会”。这两个人是莫里斯·皮若，二十六岁，是他自己创办的一份文艺评论杂志的主编；亨利·沃热瓦，一位三十四岁的哲学教员。这个委员会的呼吁书提出，为德雷福斯翻案的运动就象是巴拿马公司丑闻的复活，仅仅是为那些腐败的政客和金融家们的利益效劳。在这一年年终，皮若在《法兰西的行动》一文中，猛烈攻击了议会制度和个人主义；他认为法国必须重新恢复它的强大，必须“改造成……国内是有组织的，对外是强大的国家，就象1789年大革命前在旧制度下的那样”。1899年6月，沃热瓦向那些深受德雷福斯事件煽动的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公众宣讲了“法兰西行动”；不久，委员会发表了第一份公报。于是运动就发动起来了。它的领袖是一批知识分子，忙于无止境地讨论，并决心同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及其一切主张作斗争。他们中间的首脑人物是夏尔·莫拉斯，一位作家，这时还不到三十岁。

莫拉斯出生于法国南部一个曾依附于拿破仑第三的保皇党家庭；在他看来，共和国是法国衰败的最后阶段。他坚信对德雷福斯的判决是公正的，不过这不是主要问题，因为即使证明德雷福斯无罪，也不能原谅那分裂法国、削弱军队并危及国家生存的煽动性言论。他认为，亨利上校是在狱中被暗害的，是一位英雄，必须为他的流血报仇；德国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民族的敌人。但莫拉斯的敌人不仅是德国人和英国人——法兰克福和伦敦是国际金融的两个中心，也是那两个敌对国家的化身——而且还有更大的敌人犹太人、共济会会员和新教徒，他们是针对法兰西和天主教而组织穷凶极恶阴谋的主谋者。四种互相联系的社会政治集团构成莫拉斯所谓的“反法兰西”分子：犹太人——在法国的外籍人，新教徒——背离法国思想而去接受德国、瑞士和英国思想的法国人；共济会会员以及其他反教会的人——他们和他们的反法兰西盟友观点一致；

最后还有外国佬——这个词借用于古雅典，意指外侨。所有这些都靠法国的财富养肥自己，都是同一支强大军队、同法国传统及其核心天主教为敌的。^① 根据莫拉斯的看法，这种“反法兰西”的精神渗透到由这敌对的四种社会政治集团把持的法国大中学的历史教学中；因此才有这么多知识分子站到德雷福斯一边。犹太人是造成分裂的因素；他们的传统观念要求他们敌视法国的传统观念，几百年前的胡格诺派教徒就曾使他们自己切断与真正的民族传统的关系；所有这些集团不是忠于法国，而是忠于外国政府的。

在莫拉斯看来，法兰西是一位女神，是“奇迹中的奇迹”，特别美丽，她要求人们绝对的忠诚。莫拉斯尊崇旧制度，憎恨法国大革命和曾给法国带来混乱和衰落的启蒙运动。¹⁴ “革命的根子在日内瓦、在维滕堡、在古代的耶路撒冷；它们起源于犹太精神，起源于在东方荒野和德意志原始森林等各野蛮中心风行的一种独立基督教派的变种。”^② 民主等于无政府状态；它缺乏一种行动和首创精神的果断原则；使国家成为贪婪和集团利益的牺牲品；民主是软弱无力和有害的。法国如要恢复它曾有过的强大，就必须重建君主政体；因为只有世袭的君主制度能给国家带来统一、稳定和权威，如没有这些因素，国家就会土崩瓦解。法兰西行动党最初的领袖只有莫拉斯是君主主义者，但保皇主义在法国日趋衰落的时代，他却成功地使其他人都改变了信仰。君主政体必须靠武力来恢复，否则，政府将是软弱无力的，不能够组织起拥护自己的力量；因而会被一

① 引自 Maurras' *La Démocratie religieuse*, p. 90, by D.W. Brogan, 'Nationalist Doctrine of Charles Maurras', *French Personalities and Problems*, London, 1946, p. 69; 还引自 *L'Enquête sur la monarchie*, pp. 535—6, by E. R. Tannenbaum, *The Action Française*, New York, 1962, p.73.

② 引自 *Romantism et Revolution* 序, *Œuvres Capitales, II*, p. 33, by Ernst Nolte, *Der Faschismus in Seiner Epoche*, Munich, 1963, p. 170.

种“保守的革命”所推翻。

法兰西行动党的任务就是组成这个将成为新法兰西统治集团的杰出人物的少数派，“这个党将创造历史并将获得群众的拥护。”^① 根据莫拉斯的意见，这个杰出人物集团将由各行各业的“优秀分子”组成，如优秀的军官、优秀的作家和哲学家、优秀的公务员；它将是一个知识界的杰出人物集团。是莫拉斯使法兰西行动党有一套理论，而这是其他法国右翼集团所缺少的。有了这套理论，它才能够发展和生存下去。然而同时它也过于保守和因循守旧，过于唯我独尊和书生之见，还有它那过时的保皇主义，因而对群众，特别是产业工人不能起号召作用。它的领袖们出身于中产阶级，从事脑力劳动，这也使他们不能成为领导一场革命运动的领袖。

1906年初，“法兰西行动”学院创立。莫拉斯在那里主讲政治学，学院还设有政治、历史、对外关系、民族主义和社会科学等课程，后来还编印出书。几个月之后，最高法院撤消了对德雷福斯的
15 判决并宣布他无罪；但法兰西行动党拒不承认宣判他无罪并重新掀起反对“德雷福斯派”的宣传鼓动，青年保皇党人攻击并毁坏那些曾经支持争取复审运动的人的塑像。1908年《法兰西行动》（最初是双周刊）改为日报，靠作家莱昂·都德资助和向公众募捐维持。然而印行的报纸很多都无法销售，亏损严重；此外还得经常支付巨额法院诉讼费以及对报纸的重罚款。法兰西行动党的势力日增，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和大学中。1908年5月，这个组织煽起一次反对巴黎大学的一位教授的骚乱，因为他为了增进法德两国的相互了解，曾在假日里率领一群学生到德国去，结果他的讲座被迫中止。1909年初骚乱分子迫使另一位教授中止讲课，因为他在圣

^① 引自 *L'Enquête sur la Monarchie*, 第 469、500、509 页，转引自前引书第 179 页。

女贞德^①的题目上发表了“反民族的”意见；巴黎大学校外内外都发生殴斗。青年民族主义分子开始控制大学区。犹太教师成了这次殴斗的牺牲品。

1908年为销售这份新的日报而成立的一个组织：“保王党报纸经销商贩”，在这些冲突和骚乱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是法兰西行动党的好战派，好斗成性，要打一场反对旧秩序、犹太人及其他敌人的“圣战”。这是准军事性的分等级的组织。它的成员据说是“不属于任何阶级的”，但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工人加入这个组织。在十二个月的时间内，仅巴黎一地就有六百个“保王党报纸经销商贩”组织，首都以外有六十五个分销处，但只有少数是活跃的成员组织。1910年，“报纸经销商贩”内组成一个精干人员编制，叫做“特派员”，他们以棍棒及其他类似的武器武装起来，保卫党的办公处和领导人，保卫它举行的示威游行，破坏公共集会，并且象“报贩”组织一样，经常进行骚动和暴力行为。这些行为多到使王位继承人奥尔良公爵都公开否认他与“报贩”组织的暴力行为有关。法兰西行动党的领袖们不得不答应放弃“路障策略”和街头暴力行为，然而他们的报纸却猛烈地抨击公爵的“坏顾问们”，说他们正在他的支持者中间散布不和的种子并分裂他们的队伍。

1910年12月举行的法兰西行动党第三届大会上，所有报告都必须事先交给莫拉斯审阅，无需讨论就可以被批准，他已日益成 16
为运动的公认领袖。会上热情高涨，但这股热情所向的真正中心不是保王主义思想，而是莫拉斯及其亲密伙伴。出席大会的三百名代表，代表了二百多个地区，但只有六十到六十五名是来自外省。党的支持者主要来自军官，各种从业人员，特别是律师、教师和教士，但也有很多白领工作者，推销员和保险公司代理人等，这

^① 圣女贞德（1412—1431年），在英国侵略法国的战争中的抗英女英雄，后被俘焚烧死。——译者

十分显然是代表中产阶级下层的。他们憎恶共和政权，因为它既没有给法国带来光荣，也没有帮助他们克服经济困难，而很多教士和僧侣则憎恶这个“可恶的犹太—共济会政权”，因为它使教会与国家分离，并大大削弱了教会教育的影响。法兰西行动党在这一斗争中强烈支持教会和天主教僧侣统治集团，因该党从教会和天主教统治集团得到很多宝贵的支持，不仅是金钱上的支持。为对它的中产阶级下层的追随者的要求作出响应，法兰西行动党建议采用法人团体制度取代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制度，劳动人民在这种制度中按行会组织起来。

然而他们坚持争取产业工人的努力没有取得什么成功。反犹宣传、大声疾呼地斥责“犹太—共济会阴谋”，把银行家、贪得无厌的雇主和工会领袖都和犹太人等同起来，这一切并不能吸引工人。他们想和某些工团主义领袖，特别是和乔治·索雷尔这成谅解的努力也同样遭到失败。极左派的好战分子也憎恨现政权，但是他们和法兰西行动党毫无共同之处，最多只可能调调情而已。法兰西行动党尽管口头上也攻击资本主义的某些方面，但它仍和资本家和产业界保持密切的联系，而且莫拉斯还公然对大企业表示敬意：他的运动就是依靠这些集团和教会的支持的，而这些集团在激进左派眼里却是诅咒的对象。在战时，莫拉斯曾以一个天主教的真正卫士的面目出现，他在许多文章中为教皇及教士辩护并攻击批评他们的人，这些文章在1917年汇编成册出版。正是这些特点清楚地表明法兰西行动党是一个右派的运动，和左派革命分子截然不同。

- 17 早在1914年以前，法兰西行动党就显出后来法西斯运动所表现的许多特点；它憎恨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和议会制度，推崇权力和暴力，并毫不犹豫地用暴力来对付它的敌人，拥护强硬的领导，明显地反犹太主义和反共济会主义；所有这些特点我们以后都将

在战后的法西斯主义组织中再次看到。然而莫拉斯在法国之外暂时还不起什么作用，甚至在国内，他和他的追随者所擅长的恶毒攻击对第三共和国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莫拉斯既非墨索里尼，也并非希特勒。法兰西行动党过去是，这时仍然是一个少数党的运动，它的思想意识是面向过去而不是针对今天。

意大利

象德国一样，意大利只是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初，即在1860年至1870年间才统一起来的，关于这种统一没有多少“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因素可说。德国是靠三次胜利战争统一起来的，它发展迅速，繁荣兴旺，并上升到大国的地位；而意大利则仍然极端贫困，就是在军事方面也不行，只是依靠法国人和德国人的大力帮助，它才得以完全统一。在加富尔于1861年过早逝世之后，意大利政府显得软弱无能。不过，折磨这个新国家生存的仍是经济问题，正是在这方面最清楚表明了政府的失败。人们明明对这个王国的经济问题缺乏了解，但却对本国资源普遍抱有过于乐观的看法；据说意大利这个“欧洲花园”充满了财富。实际上，山区和丘陵地带贫瘠，平原往往又多沼泽，瘴气弥漫；土壤地力枯竭；耕作方法原始；河流把表土冲入大海。土壤侵蚀问题还没有一个人能够解决。德国有大量的煤和矿藏，而这些在意大利是缺乏的，一切主要原料都必须进口。工业化刚刚开始，没有资本可供投资。

在南方，这些问题更严重。由于全国统一，南北之间贸易壁垒的消除使它的经济生活瓦解了；它的保护工业和贸易体系遭到破坏。许多农民实际上是农奴，深受瘴气、高利贷和盘剥性地租之害，同时又受当地盗匪的掠夺。一位意大利南方人辛酸地把南方描写成“一片与世隔绝的国土，支离破碎，曲折中断的山脉纵横交错，只

要有河流的地方就有洪水，没有灌溉过也不可能灌溉的荒地十分辽阔，而且瘴气肆虐……。”^①统一的结果，北方繁重的捐税制度和一个新的官僚政治机构引入这片贫瘠的地区，那里既没有工业，也没有中产阶级，但文盲却占人口90%以上。

在这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议会政府和制度的基础是很脆弱的，群众对政治漠不关心。直到1882年，在总数二千五百万人口中，只有六十万人有选举权，其中大多数人还常不参加选举，所以代表是由极少数的人选出的。当时取代财产资格的是识字测验或缴付一定数目的直接税的证书；此外，军官和那些曾获勋章的人也有选举权，使选民增加到二百多万，约占人口8%。只是到了1912年，年龄在三十岁以上的人才具有选举权。政府变更频繁；统治集团腐败成风，并不能使人民增加对新制度的爱戴，而新制度没有什么传统的根基并且普遍不受信任。

然而这个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结构都很虚弱的王国，却野心勃勃地沉迷于大国政治的美梦。在国内，有上阿尔迪（南蒂罗尔）和的里雅斯特这两个“未收回的”地区，这两个地区仍在奥地利统治下，但大多数意大利人认为是意大利的国土，虽然只有部分居民讲意大利语。意大利下院议长公开谈到“我们的特兰托”，而且还用政府经费来帮助的里雅斯特的意大利人进行市政选举。然而意大利在政治上由于三国同盟条约仍和德意志和奥地利连在一起。三国同盟条约是1882年订立的，并一直按期续订。实际上，意大利即使不是对德国，至少也是对奥地利怀有强烈的敌意。意大利的
19 征服和扩张梦想愈益发展，特别是渡过地中海针对北非海岸地区。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意大利人在红海边上的阿萨布和马萨瓦站住脚跟。1887年弗朗切斯科·克里斯庇任首相，他把意大利在非洲东

^① Margot Hentze, *Pre-Fascist Italy —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arliamentary Régime*, (London, 1939) 书中摘引, p.225.

北部的势力范围扩大为厄立特里亚殖民地；但他的目的在于要把整个埃塞俄比亚建成保护国，在那里已立一个意大利傀儡为皇帝。1896年，克里斯庇命令意大利军队占领厄立特里亚以南的提格雷，并进军埃塞俄比亚高地。但在阿多瓦被埃塞俄比亚军队打得惨败。克里斯庇下了台；然而有少数人热情地为“这位英雄，这位唯一真正的意大利人”辩护，其中之一便是青年作家和教师恩里科·科拉迪尼（生于1865年）。

七年之后，于1903年，科拉迪尼创办了一份民族主义的刊物《王国》，这份刊物是反议会制度、反民主、反社会主义的，它抨击“资产阶级”社会谨小慎微、没有英雄气概、和平主义。科拉迪尼同时还高谈战争和帝国主义扩张有道德价值。意大利民族主义分子深受某些外国榜样、特别是德国和日本的榜样的迷惑；他们认为这两个新兴民族国家是意大利必须效法的；他们把英国和法国都看成保守的强国，只知保住自己的属地。德国和日本以其半专制制度证明，它们奉行的是新制度，完全不同于那种曾经唤起1789年革命思想的自由民主制度。在科拉迪尼看来，民族主义是民主制度的对立面；自由和平等应为服从和纪律所取代。1910年末，意大利民族党在佛罗伦萨成立。科拉迪尼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演讲，他强调意大利的贫穷和缺乏自然资源，只有作更大的努力才能克服这种穷困的情况。

然而他讲话的主题却是：恰似有奉行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所以也就有必须采纳民族主义的无产者民族：“这就是说，这类民族的生活条件比起其他民族低得多，处于不利地位……。正如社会主义教导无产阶级懂得阶级斗争的价值一样，我们也必须教育意大利懂得国际斗争的价值……。要是国际斗争意味着战争，那么就让战争来吧！”^①因此，这个新政党的政纲主张增强军队的实力和进

^① Hentze 摘引，前引书，第286页。

20 行殖民地征服；意大利人应该重温古罗马和罗马帝国的光荣伟大的意识。议会制度、民主制度、共济会主义和国际社会主义都被斥之为民族的敌人。尤其是1912年举行的党的第二届大会的决议认为，共济会与和平主义、国际主义、人类平等主义等一切世界性观念都是与民族主义不相容的。

柳吉·费德尔宗尼（1922年任墨索里尼的殖民大臣）也在党的第一次会议上号召入侵当时仍在土耳其宗主国统治下的利比亚。科拉迪尼断定不放一枪就能攻陷利比亚，这样非洲沙漠就会繁荣起来。在他看来，阿拉伯人只不过是些牲口，他们要是敢于反抗就鞭鞑和绞死。这一次的宣传很成功。几个月以后意大利军队入侵利比亚，但远不是轻易取胜的，而是打了一场持久的而且付出巨大代价的战争。最后需要一支十万人的军队，而塞奴西人部落连续多年进行猛烈抵抗。意大利的统治只限于沿海地区，在那里定居的意大利人也很少。帝国主义征服并没有证明给国家带来什么好处；然而，科拉迪尼继续高谈利比亚战争和巴尔干战争是无产者民族反对“欧洲财政寡头”的斗争。他认为最大的财政寡头国家是由民主党人和共济会会员控制的法国，那些人曾阻挠意大利夺取突尼斯。象法兰西行动党一样，意大利民族党的影响一直很小，主要限于知识界。1913年选举中，只有三名民族党人被选入下议院。为征服和扩张辩护的宣传并没有激起任何群众的热情。

最激烈反对利比亚战争的是极左派社会党人，而某些温和的社会党人，如博诺米和毕索拉蒂却支持这场战争，因而被开除出党。党内反对毕索拉蒂以及任何这类改良主义者倾向的人是年青的贝尼托·墨索里尼，他当时是弗利地区的地方领袖，喊得最为响亮。他1883年出生于弗利，是一个乡村铁匠兼乡村教师的儿子。他声称：“一旦发生战争，我们不是急忙奔赴前线，而是要在国内鼓动造反。”战争爆发后又说：“阿拉伯和土耳其的无产阶级是我

们的兄弟，而土耳其和意大利的资产阶级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① 墨索里尼是个信仰坚定的国际主义者和革命者，他激烈反对议会活动和社会党接受议会的议事程序。由于激烈煽动反对1911年的利比亚战争，他被判处五年徒刑，但实际上只服了五个月的刑。

1912年，在勒佐艾米利亚党的大会上，根据墨索里尼的建议，右翼领袖被开除出党；墨索里尼自己则被任命为党的报纸《前进》报的主编。他的革命狂热并没有由于这一晋升而有所减弱，而且他依旧看不起领导党的那些知识分子。他主张在反对地主和教会的阶级斗争中使用武力，而对本党的改良主义领袖们也抱有同样的仇恨。安杰利卡·巴拉班诺夫记得，在勒佐艾米利亚大会后不久，墨索里尼在回家途中在几棵树旁边停下来高喊：“总有一天我们要把图拉蒂以及其他改良主义者吊死在这里的树上。”^② 菲利波·图拉蒂曾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创建了意大利社会党。墨索里尼崇拜的英雄是法国革命领袖布朗基，一位“街垒好汉”、革命暴力的组织者。墨索里尼还从另一位法国革命者居斯塔夫·埃尔韦那里接过一个口号：“对我们来说，民族的旗帜是一块应当埋在粪堆中的破布。”由于言论行动都表明爱好暴力，使得他在社会党人中出了名。他相信“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持久战中”，“将产生新的活力、新的道德价值，以及接近古代英雄的新人。”^③

如果说，按照墨索里尼所宣传的那种形式的意大利社会主义比法国的、当然还有德国的社会主义更激进和暴烈，那么意大利民

^① Nolte 引自 Mussolini's *Opera Omnia*, III, p. 137 and IV, p. 130, 前引书, 第 215 页。

^② Angelica Balabanoff, *Erinnerungen und Erlebnisse*, Berlin, 1927, p. 84, 那时她是一位首要的意大利社会党人, 并且个人与墨索里尼很接近。

^③ 根据 Sorel 对墨索里尼在《人民报》上写的文章 *Reflexions sur la violence* 的评论, Laura Fermi, *Mussolini* (Chicago, 1961, p. 77) 所摘引。1909年墨索里尼在特兰托主编《人民报》。

族主义却和法兰西行动党有很多相同之处。它也是同样反对自由、反对民主的，它的目标也是夺取政权和行使政权，它也梦想采取“行动”，靠一支精锐队伍采取行动。科拉迪尼宣称，他要是拥有一百个敢死的好汉，就能给予意大利以新的生命。但是比起法国的那个党来，它更强调战争，美化战争和殖民地征服；法国是个庞大的殖民帝国，而且在科拉迪尼眼中，还是最富有“财政寡头政治”²²的”国家。他把意大利说成无产者民族，它从事一场反对欧洲“财政寡头”国家的斗争，这一思想和社会党人的思想有明显的近似之处。这是把阶级斗争提高到国际水平。所有这些思想都将对后来的法西斯分子产生深刻的影响。

但在上文中的法国以及下文中的德国、奥地利都可以见到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反犹太主义”，在意大利却不存在，而且，在后来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运动中也不存在，直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才从德国输入这一思想。或许可以用这样的事实来解释：犹太人在意大利较之在北边的几个国家中很少有富裕的，在意大利经济和文化生活方面也不那么居于显赫地位。在意大利，犹太人几乎不超过人口的0.1%，总共约五万人，而且也不显眼。因此，在一个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看上去很难区别的国家，种族主义思想不大有进展。迟至1943年，墨索里尼还亲自向匈牙利首相卡洛伊承认，在意大利实际上没有反犹太主义，同时意大利犹太人的数量和地位都微不足道。

德 国

和贫困的意大利，甚至和战败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相比，俾斯麦所创建的德意志帝国是一个实力强大和生气勃勃的国家。它的经济发展迅速，特别是在重工业、铁路建筑和银行业方面。十九世

纪七十年代是一段极其繁荣的时期，中间出现过两次由于发展过于迅速而造成的短暂萧条。从1870年到1900年，许多城市人口增加了一倍多；柏林从一个拥有七十七万五千人口的城市发展成一个拥有一百八十八万八千居民的城市。在1870年，德国人只有36%的人居住在城镇，而到1900年，这个百分比却增加到54.4%，在工业和商业中受雇的人数也相应地增加了。由于在鲁尔、萨尔和上西里西亚拥有丰富的煤和金属矿藏，德国正在变成一个到处是工厂烟囱、矿山和大城市密集的国家。柏林和许多其他城市工人区许多凄凉的街区被称作“雇工营”（把这些街区比作兵营）。尽管到处一片繁荣，但许多工人阶级家庭却过着贫困而肮脏的生活。工业和其他行业的工人开始组织工会，有一个社会民主党成为左派反对党。1875年几个对立的派别合并成这个党，以后就迅速发展起来；但在1877年大选中，该党只获得不到五十万张的选票，在德国国会中只取得十二个席位。

德意志帝国是既不民主，也不特别自由，而毋宁说是保守的，在这个国家中，王公贵族、军队、官吏等旧有的权贵仍然拥有大权；因此象法兰西行动党那样，带有反对共和制度的极右色彩的政党，在那里无法存在，而“新右派”的政党也几乎没有任何地位。1878年在这方面作了第一次尝试，当时宫廷牧师阿道夫·施特克打算在柏林建立一个“基督教社会工人党”。这不是一个激进的政党，因为它强调“爱君主和爱祖国”，而且它的主要努力方向首先是要战胜社会民主党人，它还要诱导工人阶级同教会和现存的国家和解。然而，当施特克努力向柏林工人发表讲话时，大会以彻底失败和社会民主党人的胜利告终。不过，施特克在翌年发现反犹太主义是一件具有强烈号召力的新武器，它不是对工人，而是对首都的中产阶级下层具有号召力，他们在政治上完全是忠诚的，而且十分接近于他自己想象的世界。

德国犹太人在十九世纪初期就已获得解放，在贸易和金融方面常常很活跃；而且他们也已进入各种专门职业，并且在政治上崭露头角，特别是在各个不同的自由主义政党和新闻界，在首都尤为突出。施特克在1879年宣称，证券交易所是犹太人的庙堂，他们不是接过先知的衣钵，而是穿戴着罪恶财富的华服；他们是一股轻视宗教的力量，正在利用他们的财富把柏林变成一个犹太人城市，而他们自己则成为新贵族。蒙受“自由时代”的放任政策的损害的小商人、工匠、店主以及其他的人，感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威胁，于是他们就为施特克提供大批信徒。不过，根据警察的报告，此外还有很多官吏和受过教育的人参加他的集会。施特克决心“向人民揭示其不幸的根源，即金融权力，贪财的欲望和证券交易所”，使人们了解“在犹太人手下挣扎着的农民和工匠的悲叹”。1883年，他在一次群众集会上宣称：“我们向犹太人宣战，直至取得最后胜利，而且只有把他们从高高在上的地位打翻在地（这才是他们应待的地方），我们才能在柏林安居乐业。”^①他的讲话博得了激动人心的喝采声。他要求政府采取行政措施来限制犹太人在教育和法律方面处于占先的地位，并且要通过社会立法以保障工人和中产阶级。他立即大得人望。

施特克的宣传种子正好落在肥沃的土壤上，这很快就发芽滋长。1881年4月，有一份由二十二万五千人签名的“反犹太人请愿书”呈交俾斯麦。请愿书要求禁止任何犹太人从东欧移民入境，不许犹太人从事教学和就任某些高级职位，限制他们在中学和法律界的人数；这份请愿书称犹太人为“种族”，那是不祥的朕兆；而且施特克还想使他们受到洗礼和同化。同年在波美拉尼亚发生

^① Walter Frank, *Hofprediger Adolf Stoecker und die christlichsoziale Bewegung* (2nd ed. Hamburg 1935, p.84)一书所引，其他引文见同书第77—78页。1880年约有五万四千犹太人居住在柏林，不到居民总数百分之五。

反犹太人骚乱；一群群的人发出反犹太人的叫嚣声，袭击犹太人的铺子；试图进行干涉的警察被人扔了石头，因此不得不召来军队恢复秩序。按地方长官的看法，这是由于犹太人放债和削价出售货物，总的来说，这是犹太人的竞争引起的麻烦。在新什切青，犹太人的会堂被焚毁。1811年新年除夕，群众在柏林市中心示威并高呼“犹太人滚蛋！”萨克森的首府德累斯顿变成了另一个反犹太人的宣传中心。

在某些文学作品中早就具有较激烈的种族主义的反犹太主义情绪的例子。1868年，保守的《十字架报》编辑部的一位记者赫尔曼·格德舍出版了一本小说，描写一些犹太阴谋分子在布拉格的古犹太人墓地集会，策划要占领全世界，这是《犹太长老会议记录》^①的早期的翻版，提供了犹太人搞世界性阴谋的证据。1871年，布拉格一个教堂神学校教员奥古斯特·罗林炮制了一本犹太人法典的编译本，来证明他们的教义要求犹太人实行以人为祭献牺牲的宗教仪式中的谋杀。这本书由爱德华·德律蒙编辑了法译本，并且加上他用德文写的序言出版。1873年，记者威廉·马尔²⁵出了一本谈论“从非宗教观点来看犹太人战胜德意志人”的书，这本书在六年內出了十二版。1879年他创立了“反犹太人同盟”。他说这是个“种族问题”，因为“差别就在于‘血统’……”；而且他主张使用“严格的立法手段”来制止“犹太主义进一步取代德意志主义。”^②

这些情绪在很有地位的学术界引起共鸣。1879年，有名的历

① 这是一份关于十九世纪末犹太长老举行会议的记录的伪造文件。文件中说长老们和共济会会员讨论了通过种种破坏手段瓦解基督教并控制全世界的计划。《会议记录》全文于1905年出现于沙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广泛流传各地成为反犹太的重要武器之一。后据查此文件是沙俄秘密警察伪造的。——译者

② 引自 Peter G.J. Pulzer, *The Rise of Political Anti-Semitism in Germany and Austria*, New York and London, 1964, pp. 50—1.

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在著名的《普鲁士年鉴》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其结论是一句话：“犹太人是我们的灾难。”特赖奇克深深影响了整整一代的德国大学生；有大批的学生去听他在柏林大学的讲学。他和施特克都属于非常有声望的人，并不是轻率的煽动分子，而且施特克还和宫廷有联系。由于这样一些人说话了，于是反犹太主义就有了受人尊敬的气氛。在柏林大学的一位教经济和哲学的盲人讲师欧根·杜林认为，从所有政府机关、企业和金融界中把犹太人这一“无比低劣的种族”赶出去乃是一个有关“种族荣誉”的问题。

然而，对未来事件的预言家不是别人，而是保罗·伯蒂歇尔，而且他的《德意志文集》也对后代发生了强烈的影响。他自称为德·拉加尔德，也是一位学者，一位东方研究领域的权威，但他不得不靠当中学教员来维持生计，直到晚年才成为格丁根大学的教授。拉加尔德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写作（他生于1827年）。在那时他已经得出结论，不可能容忍犹太人形成“国中之国”，除非剥夺他们的宗教信仰才能消除他们的民族性；他们必须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否则就必须离开中欧。不过他在这一领域的野心勃勃的方案还包括更广的范围：按他精心制订的战略计划，德国移民必须移入波斯纳尼亚、波希米亚、斯洛伐克、匈牙利、加利西亚和伊斯特里亚，当地居民由于和德意志人混合而必然强化，这样这些德意志的小国家退化的臣民才能变成自由人。^①

26 德·拉加尔德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只是阐明他的纲领。与德意志和奥地利东边的邻国必须加以德意志化。要通过战争打败俄国，然后迫使它把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广阔领土割让给德国，但不

^① Paul de Lagarde, 'Über die gegenwärtigen Aufgaben der deutschen Politik' (著于1853年), *Deutsche Schriften*, 4th ed. Munich, 1940, pp. 30, 33, 42.

要那里的居民。这些土地将由德国农民来定居，同时必须把从波兰到加利西亚的犹太人驱赶到巴勒斯坦去。只有通过德意志向东欧移民，并使俄罗斯和南方的斯拉夫人隔离开，德国的天然盟国奥地利才能得以保持住成为一个有效的国家；但奥地利必须彻底德意志化；而德国的犹太人必须或者移居国外或者成为德国人。“以色列人同盟”只不过是个类似共济会的国际阴谋组织，要推动犹太人统治全世界，它之在闪族就象阴险的耶稣会之于天主教一样……。任何异物存在活的机体内都会使该机体感觉不舒服、生病、长脓疮乃至死亡。即使这异物是一块宝石，它也会象一块朽木那样出现恶果。犹太人就是犹太人，乃是各欧洲国家的异己分子，而作为异己分子，就只不过是腐败的带菌者……。”^①过些年后，甚至说得更离奇：“人们不和旋毛虫和杆菌商量，也不能教育它们，就把它尽可能迅速而干净彻底地消灭掉……。”^②我们毫不奇怪，德·拉加尔德也激烈反对俾斯麦的外交政策，反对国会和政党；他认为应该用咨询会议来取代国会；必须由一个领袖来统一和指挥全国。德·拉加尔德在世时，他的影响主要限于学生范围；但毫无疑问，在他去世（1891年）以后很多年，民族社会主义党人捡起并复活了他的思想。该党的全部纲领几乎都可以从他的著作中找到。

当时一位深受德·拉加尔德影响的青年尤利乌斯·朗贝恩的书受到更广泛地阅读。1890年，当时他差不多有四十岁，出版了一本叫《教育家伦勃朗》的书，立刻获得了盛名。施特克和德·拉加尔德的目的主要是在于同化德国的犹太人，而朗贝恩却不反对

^① 这段引文摘自 ‘Die Stellung der Religionsgesellschaften im Staate’ (著于1881年)，同前引，第295—296页。其他思想摘自德·拉加尔德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写的一些著作，同前引，第98, 332, 354—355, 413—415, 422, 476页。

^② de Lagarde, *Juden und Indogermanen*, Göttingen, 1887, p. 347, In general cp. Fritz Stern,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Despair*,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61, pp. 60 ff.

27 正统的犹太人,但认为“现代的下层阶级的犹太人对于我们是一种毒害,并且必须作为毒害来加以处理……”。他们倾向民主;他们和暴徒关系密切……。”在后来的一个版本中,他还说:“德国是属于德意志人的。一个犹太人不能变成一个德意志人,如同一株李树不能变成苹果树一样……”。^①朗贝恩早在纽伦堡法之先几乎半个世纪就主张要把查清人口的祖宗世系作为授予德国国籍的条件。在他看来,犹太人特别令人生厌,因为他们代表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进步、民主政治、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

当时,所有这一切在实际政治领域只产生颇有限的影响。约在1885年,反犹太主义作为一个政治运动已在柏林和德累斯顿衰落了,但在德国西部却壮大起来,在黑森地区,很多农民都欠了犹太债权人的债。马尔堡大学有一个图书馆员奥托·伯克尔成为一名有很高声望的反犹运动领袖,这个运动的目的在于把犹太人排除出牲畜市场并为农民信贷提供便利条件。1887年,伯克尔靠一个激进的社会纲领被选为马尔堡的议员,这是在一个过去一向被认为保守派稳妥可以当选的选区当选的。同年他宣称:“德国人民通过反犹太主义,将逐渐再次认识自己是一个反对犹太种族的德意志种族。”1890年,他和其他四名反犹太分子被选为国会议员,都是属于黑森地区的。1893年,他们这批议员的人数增加到十六人,这个党获得选票二十六万四千张,约占选民3%。1898年它的选票增至二十八万四千张,但此后运动就开始衰落了。黑森和萨克森则仍然是反犹中心。但保守的反犹分子和激进的反犹分子之间产生深刻的分歧,象伯克尔和赫尔曼·阿尔瓦特这样的人,在波美拉尼亚发动了“反对容克和犹太人!”的运动,并象攻击犹太人那样

^① 引自 *Rembrandt als Erzieher*, 33rd. ed., 1891. p. 284; 38th ed., 1891, p. 292; 49th ed., p. 348, 摘引者 Stern, 前引书, 第141页, 及 Pulzer, 前引书, 第242页。

激烈攻击上层社会。这些内部冲突是使运动衰落的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是十九世纪末急速发展的普遍繁荣，这一繁荣延续到二十世纪，仅在头两年间有过一次较小的萧条。

这种衰落情况也影响了施特克的向来同保守党有密切联系的党。向 1892 年在柏林召开的保守党会议提交的纲领草案建议：在“我们要同犹太人对我国人民生活经常咄咄逼人的分裂影响作斗争”²⁸，但又补充一句：“我们拒绝反犹太主义的过火行为。”但这句话补充的话遭到代表们的激烈反对；当施特克建议去掉这句话后，代表们就对他报以热烈鼓掌，只有七票赞成这句话。但四年后，施特克被迫辞去党的执行委员职务；这时支配着这个党的土地利益集团害怕他对社会改革的倾向会侵犯容克地主的地产。阿尔瓦特的宣传鼓动把激进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揉合在一起肯定不是好兆头。和奥地利正相反，在德国没有希望建立一个基督教社会党。

然而反犹太主义作为一小股政治势力保存下来了，它和后来的民族社会主义党甚至还有个人方面的联系。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一位莱比锡工程师特奥多尔·弗里奇出版了一本《反犹太主义通信集》，他写道，真正的德意志人必须拒绝《旧约》，因为《旧约》是“歌颂犹太人的故事”，基督是雅利安人，并且是反犹分子，遭到犹太人的仇恨和排斥；犹太教是德国生活的敌人。接着又出了一本《犹太人问题手册》和一本《反犹太人问答》，这两本书都多次再版。弗里奇热切地和朗贝恩通信，朗贝恩对这个小组产生强烈的影响。从 1902 年起，弗里奇出版了一份刊物《铁锤》，他在这份刊物上倍加赞美种族纯洁。刊物的读者很快就组成一些地方组织“铁锤社”，但他们的人数一直很少。1912 年，在莱比锡的一次会议上，组成了“铁锤联盟”和一个“德意志骑士团”，成员必须保证他们属于纯“雅利安”血统。正是在这些团体里，很快采用卐字作为被雅利安人带到南方去的太阳轮的象征，而这就是要宣告“升起的

太阳灿烂照耀着德意志的土地”。这一主题是从1903年一张明信片上取得的，明信片白底上画有一个黑卐字，周围有一个红圈，后来这成为希特勒的党的标志。^① 这些团体的人也宣传复活德意志人的风俗、姓名和月份，来代替基督教的风俗、姓名和月份。

弗里奇的“铁锤”联盟是另一个大得多的组织的团体成员，这个组织致力于保持“德意志人精神”，促进“各地区的德意志人一种种族的和文化的亲缘关系的意识”。这个组织就是“泛德意志人同盟”，它成立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并且很快就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加入，特别是教师和白领工作者。在1901年它有二万二千名积极分子。另一个团体成员是德国全国店员联盟，这是个职员的民族主义工会组织。“泛德意志人同盟”大力宣传要采取更富有战斗性的外交政策，主张德国向外扩张，或是向东欧扩张或是取得新的殖民地。德国在十九世纪最后十年确也已成为一个殖民帝国；但是殖民地很小，而且分散于西非到太平洋群岛各地，从这些地方没有获取多少好处。泛德意志人同盟没有正式反犹，但是它的许多成员是反犹的，而且它在国会的代表也同反犹分子合作。同盟的领导人海因里希·克拉斯后来承认他的老师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曾说服他相信，犹太人对德国是有害的。1907年他发动一个反犹太人的运动，认为犹太人带来了现代实利主义，应该把犹太人当作外国人对待，并课以重税，禁止他们参加教育界、银行业和行政机构，禁止他们拥有土地，限制他们的移民入境和活动。克拉斯认为俾斯麦采用的普遍选举权对德国是有害的，应该用一个阶级的和双重投票选举权来代替，如果国会拒绝接受这个方案，就应从上面强加一个新宪法。他赞成德皇独裁以便使德国摆脱自由主义。克拉斯及其同盟与诸如农业同盟这样一些有势力的组织以

^① 非常有趣的是，不只是在希特勒手下那个折磨犹太人的头子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一个人的文件中有画着卐的明信片。

及保守的和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集团中的重要政客都保持密切的联系。

民族社会主义党正是从象铁锤联盟、泛德意志人同盟和德国全国店员联盟这些组织中吸收它的最初一批党员的。这些组织散播的民族主义、反自由主义，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宣传，为民族社会主义党的发展准备了土壤。它的思想意识是成千上万的德国人早已熟悉的。特奥多尔·弗里奇在晚年成了民社党的一名国会议员。他的《犹太问题手册》及其他出版物都是希特勒很熟悉的。“铁锤”出版社后来还出版了一本《犹太长老会谈记录》普及版，这是一本对希特勒及其党羽产生强烈影响的著作。

这种情况也同样适用于一位在德国定居的英国人写的一本奇妙的半哲理性的著作，作者叫豪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是一位英国海军上将的儿子。他在十九世纪末出版了一本用德文写的书《十九世纪的基础》，其内容是纯粹用种族主义观点来解释历史。“很清楚，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从条顿族进入欧洲的时刻起直至今天的欧洲思想和道德的历史看作是条顿族和非条顿族之间，日耳曼感情与反日耳曼倾向之间的斗争……。”在创造文化方面，“正是条顿血统，而且仅仅是条顿血统（我取这个词的广义，即是说，包括凯尔特、条顿和斯拉夫血统在内，亦即北欧诸种族）形成推动力和提供力量……。”但是在张伯伦看来，只有北欧属于“最狭义的纯粹条顿血统”，而在德国“三个分支——凯尔特人、条顿人和斯拉夫人——的融合的事实说明了这个民族的独特民族色彩和人民的丰富天赋才能”，法国在大革命前，也具有“显著的条顿性格”。在这方面，张伯伦和后来的民族社会主义党的理论家有所不同，那些理论家是强烈反斯拉夫人的，并且深信德意志种族的纯粹性。

张伯伦是强烈反犹太人的，但又同纳粹种族主义正相反，在他看来，“犹太人这个名词不如说是指一种以特殊的方式来思考和感

觉的。如果不是以色列人，也可以很快变成犹太人……。另一方面，把一个以色列人叫作犹太人也是没有意义的，虽然他的血统是毫无疑问的，要是他能成功地摆脱以斯拉和尼希米^①的束缚，要是摩西的法^②在他头脑中并不占有地位，而且他心中也不轻视别人的话……。一个具有纯粹人性的犹太人就不再是个犹太人，由于抛弃了犹太主义的思想，他事实上已背离了那个民族……。”张伯伦甚至谈及“把犹太人当作我们时代一切罪恶的总替罪羊是十分荒谬和令人生厌的倾向”，他写道：“犹太人并不是条顿文明和文化的敌人。”他对东欧〔原文如此〕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犹太人的“种族的高尚品质，漂亮的形态，高尚的思想，庄重的言行举止”表示赞美。然而在德国，“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法律、我们的科学、我们的商业、我们的文学、我们的艺术多少都成为犹太人的心甘情愿的奴隶，”印—欧人已经染有犹太人的血统；假如这一过程继续下去不加阻止的话，“欧洲将只剩下一个纯种的种族，即犹太种族，其余的人就会成为一群假希伯来人混血儿，不容置疑，是一种在体格上、智力上和道德上都退化了的人……。”^③成千上万的具有种族思想的德国人信服这种意见，信服这种充满伪学术的夸张废话。和其他书比起来，《十九世纪的基础》一书更成为德国种族主义分子的一种圣经，甚至在1914年以前，就已销售了十万册。张伯伦在

① 据圣经记载，以斯拉（Ezra）系公元前五世纪的一位犹太律法师和祭司，曾制定律令，严禁犹太人与异族通婚，以免被同化。尼希米（Nehemiah）系公元前五世纪的一位犹太总督，曾重建耶路撒冷城墙，恢复民族宗教生活，也禁止犹太人与异族通婚。旧约中有《以斯拉与尼希米书》。——译者

② 摩西为《圣经》故事中犹太人的古代领袖，曾率领在埃及当奴隶的希伯来人走出埃及。据《圣经·出埃及记》载，上帝在西奈山上亲自授予摩西十诫，命令希伯来人遵守。犹太教以此为最高立法。——译者

③ 引文摘自 *The Foundation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英译本(2 vols, London, 1911), I. pp. lxxviii, 273, 330—1, 491—2, 563, II, pp. 187, 231。很难说张伯伦对希特勒产生了什么影响，看来希特勒也许从未读过这些半哲理性的巨著。

1927年去世之前，坚信他已在希特勒身上找到德国的救星；在192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里，他欢呼希特勒是上帝指定的将成为德国领袖的人。

正是这种种族主义，这种对于所谓日耳曼种族的天生优越及其人民的伟大命运坚信不移，使德国右翼极端主义有别于拉丁国家的右翼极端主义。德国右翼极端主义还往往伴以对“血统和国土”的崇拜，带有雅利安神秘主义、新异教色彩和弃绝基督教。思想比较有理性的法国人或意大利人认为这是很荒谬的。当然，直到1933年以后的年代这类轻率的意见变成可怕的现实以前，许多德国人也是这么看的。根据种族主义者的意见，德意志人不等同于德意志民族；它包括西到巴西，东到伏尔加河，北到斯堪的那维亚，南到蒂罗尔，一切具有德意志人的血统的人，不论他们住在哪里，都是没有地理界限的。认为德意志人优于其他民族的信念在文学界特别强烈。早在1861年，诗人盖贝尔就曾在下列诗句中表达了这一思想：

世界可能由于德意志精神
而再次得救。

（大意是说，“德意志人有朝一日会医治好全世界的病。”）。犹太人和其他“劣等”民族不包括在德意志人范围之内。1896年，一个由所有大学生协会的代表参加的会议宣称：“大学生协会是建立在德意志人的基础上的……。不应该把帝国的犹太公民看作德国人。”这个民族概念一直是识别德国新右派的标志。这个概念并没有因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而有所动摇，反而更大大加强了。

奥地利与波希米亚

32

奥匈帝国比起德意志帝国来可是软弱得多了。它没有什么军

事优势可以依赖，经济发展也比德意志帝国缓慢得多，而且不平衡，大部分地区都很贫穷落后。尤其是，1867年协议只满足了匈牙利人的政治愿望，而没有满足许多斯拉夫民族的愿望。在十九世纪期间，捷克人、波兰人、斯洛文尼亚人有了自己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因此他们要求政治上让步的呼声也更高了。但是这种让步会危及这个双重君主国中奥地利那一半的主要民族德意志人的地位，特别是在象波希米亚这样民族混杂的地区更是如此。维也纳、布拉格以及其他城镇人口迅速增长——1910年维也纳已有二百多万居民——然而中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下层却远没有感到稳妥。除了正在兴起的各非德意志民族的政治要求之外，日益发展的经济集中使许多小雇员失去了生计。在三十年代，仅在维也纳一地，继1859年废除行会特权而来的是三万五千工匠经营的铺子因不履行此规定而被查封。

奥匈帝国还存在另一种威胁，比德国更具有现实性。在十九世纪中期以前，维也纳的犹太人人口很少，但在1910年，首都有十七万五千居民属于犹太人，占人口的8%以上。犹太人不仅在银行业方面十分出色，而且在经济生活的其他行业中也很突出。“不妨说，到1914年，维也纳的工业和贸易绝大多数掌握在犹太人手中。”^①许多犹太人进入各种专门职业，进入新闻界或担任文官职务。1880年，维也纳大学学医的学生，犹太人占38.6%，学法律的学生，犹太人占22.3%；而在这时，犹太人约占总人口的5%。1890年，整个大学中犹太学生人数占33.6%。在文学、戏剧和一般文化工作中，犹太人很快都居于领先地位。如果说有的犹太人在政治上很活跃，他们是自由主义分子，因此，任何反对自由主义倾向
33 会很容易地转成反犹太主义。此外，再加上许多住在维也纳以及

^① Arthur J. May, *The Hapsburg Monarchy 1867—1914*, Cambridge, Mass., 1960, p.177.

其他城镇的犹太人是刚刚从加利西亚或帝国的其他东部地区迁来的。他们在语言、服饰及整个生活方式方面都同其他居民极不相同，因而引起了广泛的反犹情绪。犹太商人和工匠日益发展的竞争也产生了同样的后果。在学生中和一些有很多犹太人进入的专门职业的人员中，反犹太主义也引起共鸣。1873年的金融崩溃曾使很多维也纳人受影响，结果引起了公开的有组织的反犹宣传。这一宣传激起了民间愤怒情绪并且此后一直很强烈。很多人认为犹太人应对这次金融崩溃负责，崩溃是由一家主要银行倒闭引起的，紧接着又引起许多公司倒闭。

在学生中，反犹主义情绪变得特别强烈。1878年，维也纳大学生协会“自由人”组织开除了它的犹太会员；之后不久，又禁止它的会员接受犹太人作为决斗对手。1879年布拉格的“条顿尼亚”大学生协会又排除了犹太会员；十年之后，奥地利所有的大学生协会决定只接受雅利安人作为会员。这种倾向也蔓延到一些体育协会中；奥地利南部体操协会的八个支会拒绝接受犹太会员。在大学生协会中，产生这种情绪的同时，还产生了大德意志情绪，这在奥地利就意味着要参加新的德意志帝国的愿望，要霍亨佐伦帝国，不要哈布斯堡帝国。1875年在格拉茨大学，官方不得不禁止一次学生集会，因为有许多学生用吹口哨来打断唱奥地利国歌，而且感情洋溢地唱德国国歌。《德意志至上》。同年，在同一城市的一次科学家大会上，奥地利国旗和国歌遭到公开侮辱。1878年，议员舍纳勒在议会辩论预算时大声说：“在整个奥地利的德意志人地区到处可以听到人们的呼声‘我们要是属于德意志帝国该多好’。”之后，数百名大学生和其他学术界的人士在当天晚上都向他送了名片，表示他们赞同这个意见。同年，有几个大学生协会把他选为名誉会员，并邀请他参加他们的酒会。从此以后他拥有一批热情的追随者。

格奥尔格·里特尔·冯·舍纳勒生于1842年，他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富有的铁路营建者和官员，为帝国服务有功而受封爵。舍纳勒继承了父亲的爵位和在下奥地利的罗森瑙的庄园，并在那里过着地主绅士的日子。1873年他代表他的乡村选区被选入奥地利议会；他在议会中最初参加了进步的俱乐部。他在早期主张采取一个明显的激进纲领，例如，要求铁路国有化，采取普遍和直接的选举；而且也主张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同德国联合。他也不是特别反犹的，两位著名的犹太人——后来的社会党领导人维克托·阿德勒和著名的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弗里德容——最初曾是他的至交。正是舍纳勒的强烈的民族主义、他的大德意志人的态度，使他愈来愈遵循一条极端主义路线；而也正是因为他和维也纳大学的民族主义大学生协会关系密切才产生了这条路线。

舍纳勒的反犹主义似乎也是得自学生界。反犹主义开头是因经济原因激发的，憎恶犹太人的资本主义、犹太人的报刊和犹太人的自由主义宣传等造成的影响。1882年，在一次工匠的集会上他大声疾呼反对“犹太人普遍兴旺发达的惊人情况”，他们已“几乎爬上经济领域的霸主的地位，……这是普遍的经济弊病的症状……。”^①而且这很快就发展成种族的反犹主义。1883年，在他的刊物《纯粹德语》上写道：“我们永远不愿意因为一个犹太人说德语或按德意志民族方式处事为人、或力争使德意志人同犹太人混合或赞成这种混合，就承认他是个德意志人。我们可以采用‘野蛮的种族观点’，并相反地必须宣布，我们认为同斯拉夫人和拉丁人混合或在某种情况下建立联盟倒是可以通融的，但不能同犹太人有任何密切的联系。因为前者是雅利安人，同我们有关系，而后者按血统来说同我们格格不入……。如果有某个犹太人志愿参加我们的德意志人军队，他可以以上帝的名义同我们在一起工作，但

^① Pulzer 书所引，同前引，第146页。

只能当一名普通士兵，不能居于领导地位……。”^①

1883年，舍纳勒在议会里要求解雇全部犹太人教师；一切真正的德意志人必须“反对这些没有祖国的国际投机分子，他们的目的是早从小学阶段起就腐蚀德意志种族。“四年以后，他要求特别立法，反对国外犹太人移人”，因为“这些外国寄生虫的习俗和生活方式是同雅利安血统和德意志民族的基督教文化格格不入的。”^②但是，当时由民族主义分子在议会中成立的“德意志人俱乐部”只有不到半数的会员投票赞成他的动议，所以俱乐部分裂了。但另一方面，在维也纳的小商贩、工匠和店主中，舍纳勒却很得人心，因为在这些人看来，犹太人的竞争是一个实际的问题。然而他的刊物《纯粹德语》在1885年只销一千七百份，而他在1882年建立的“德意志民族协会”也从来没拥有过大量会员，当这个协会在1889年解散时，它只拥有一千二百名会员。追随舍纳勒的大学生人数，大大超过追随他的维也纳居民，虽然他在一些大的群众集会上竭力要把暴民煽动起来。

舍纳勒的声望很快就被另一个人盖过了。这个人就是卡尔·卢埃格尔博士，他是一个机敏过人的政客，一位富有天才的演说家和组织者，仅比舍纳勒小两岁。卢埃格尔具有低层阶级的社会背景，比起舍纳勒来，他非常懂得如何去引起小人物的共鸣，投合他们没有明讲出来的目的和愿望。象舍纳勒一样，他是以一个自由主义分子开始他的政治活动的。1875年他以一个激进的纲领初次被选入市议会，十年后进入帝国议会，在议会中支持舍纳勒的反犹建议并和他合作。他从一开始也同当时由奥地利教士和贵族组织的天主教改革运动保持密切的关系。而尤其重要的是，卢埃格

^① *Unverfälschte Deutsche Worte*, I July 1883.

^② 引文摘自一份很重要的未经发表的哲学博士学位论文‘The Political Career and Influence of Georg Ritter’ by John Christopher Peter Warren (June 1963).

尔正是作为一位基督教社会党领袖而出名，并且获得的群众拥护远比舍纳勒所曾获得的多得多，成为一位从未有过的深孚众望的维也纳市长。

当卢埃格尔注意到反犹口号对群众的吸引力是那么强烈时，他也接过了反犹口号。1887年，在一次集会上，他要在匈牙利反犹领袖科姆洛谢之后发表讲话。听众热烈欢迎并且常常以表示赞同的欢呼声打断科姆洛谢的讲话。卢埃格尔转身问主席，他该讲些什么才能胜过科姆洛谢，主席建议他以反犹主义取胜前者。卢埃格尔照办，果然获得暴风雨般的掌声。但是卢埃格尔从来没有鼓动他的党的狂热分子所表现的仇恨犹太人的情绪，而且他的反犹主义也总是有限制的，在这方面他也很象柏林的施特克。他告知一位维也纳的犹太人领袖：“我厌恶匈牙利犹太人更甚于厌恶匈牙利人，但我不是我们维也纳犹太人的敌人，他们不那么坏，而且我们没有他们就不行……。”^①他也说出一句名言：“由我来判断谁是犹太人。”

对于卢埃格尔来说，反犹主义是件方便的武器，这武器特别在同犹太人占优势的资产阶级自由党争夺维也纳时非常有用。1895年他的党控制了维也纳市议会：它获得平民院，即第三元老院的全部席位，总起来比自由党的席位多一倍。到1900年，基督教社会党已实际上独占了所有席位，在一百五十四席中占一百三十一席。1895年卢埃格尔第一次当选为市长，但皇帝弗兰西斯·约瑟夫没有批准他上任。由此而引起的市议会的重新选举只有增加卢埃格尔多得的票数。1897年他第四次当选，于是获得批准上任。到1910年去世为止，他一直任首都的市长，为维也纳做了很多事。社会党的《工人报》在其讣告中承认卢埃格尔是“第一位考虑到群众、鼓动群众并使他的权力深深扎根于群众土壤中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卢

^① Pulzer 书所引，前引书，第204页。

埃格尔不是种族主义分子，这一点也从他对待这个君主国的斯拉夫民族的态度表现出来。1891年，他在议会宣称：“在奥地利，我只知道各民族具有平等权利；我把每一个捷克人，每一个斯洛文尼亚人都看作是我的奥地利同胞。”^①在奥地利这样一个天主教占优势的国家，卢埃格尔从来不反对教会和已确立的君主政体，并从天主教方面获得了很多宝贵的支持。在这两方面他都和较极端的舍纳勒极不相同。

但是在这些年间，最主要的是舍纳勒的德意志主义发展到了极端；他对德意志的或普鲁士的事物的崇拜，他对哈布斯堡君主国和天主教的信条的憎恨，这种种情绪在德意志种族主义者中都引起了共鸣。他写信最后都署上“致以德意志的敬礼”，就象民族社会党后来要做的那样。他的报纸建议父母们给孩子起个真正德意志的名字，这是后来成千上万人沿用的另一种风尚。他试图恢复夏至和冬至的节日活动、日耳曼人的礼拜和日耳曼人的月份名称，这也是德国的民族主义团体仿效的做法。人们举行庆祝会来纪念诺雷亚战役，公元前113年，辛布里人在那里打败了罗马军团，还有托伊托堡森林战役，公元9年，日耳曼部落克鲁西人曾在那里歼灭罗马瓦路斯的军团。人们采用了公元前113年开始的日耳曼历法来代替基督教历法，1888年，有人对从诺雷亚战役算起的2001年举行庆祝活动。赞美普鲁士和霍亨佐伦王室之声不绝于耳。几年以后，舍纳勒发动了“与罗马教会决裂的运动”，“反对罗马教会的反德意志人势力，以取得德意志社会对好争吵的、非德意志的罗马教会的最后胜利”，罗马教会曾和“骄横的斯拉夫人结成联盟……以便在这个以德意志人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帝国内灭绝德意志社会

^① Kurt Skalnik, *Dr. Karl Lueger* (Vienna and Munich, 1954, p. 73) 一书所引。

的一切。”^①他命令他的信徒脱离天主教会并改宗新教，但很少有人这么做。另一些人为了表明他们的反犹信念，在表链上系着一个刻成吊死的犹太人的垂饰。

在帝国议会中，舍纳勒及其追随者一再演出喧嚣的闹剧和实行妨碍议事的战术，使得议会工作陷于停顿：在1897年尤其是这样，那时巴德尼政府试图提出一项新的语言法令来满足捷克人以及其他斯拉夫人的合法愿望。议员卡尔·赫尔曼·沃尔夫把捷克语和斯拉夫语说成“只不过是些斯拉夫人的方言”，并说议会主席是个“波兰恶棍”。泛德意志组织的一些代表不断地击鼓和吹口哨、敲打桌面，接着是一场混战。最后沃尔夫和舍纳勒被警察强令离开。在议会外面则有许多异乎寻常的大规模示威，布拉格不得不颁布戒严令。巴德尼政府被迫辞职，国会则休会。在这个君主国内解决民族问题的最后机会已错过了。在1901年的选举中，二十一名泛德意志人组织的代表被选入帝国议会，其中十九人来自波希米亚德意志人地区，在那里有这个党的主要力量。然而到次年，这个党分裂了。沃尔夫对舍纳勒控制党的专制方法日益愤懑，乃建立了他自己的较温和的“自由泛德意志人”组织，这个组织由于更具有机会主义色彩，很快就超过它的母体，成为强大得多的组织。在1907年举行的第一次男性普选权的选举中，“自由泛德意志人”获十五个席位，舍纳勒的组织只获三个席位。舍纳勒本人在波希米亚埃格尔（赫布）地区同一名社会民主党人竞选时遭到惨败，那个社会民主党人获得了比他多五倍的选票。下奥地利和维也纳的舍纳勒信徒转向卢埃格尔的基督教社会党。他逐渐被所有的人抛弃。“新异教”对广大民众没有吸引力；“与罗马决裂”的口号和拥护霍亨佐伦王室的宣传也没有使他深得人心。基督教社会党是主要获胜者。

^① *Unverfälschte Deutsche Worte*, 16 November 1898.

在波希米亚北部德意志人地区，舍纳勒播下的种子却在发芽成长，因为在这里，德意志人的地位真正受到威胁。在这个地区的工业化过程中，许多捷克工人迁入城镇，在那里形成了非德意志人集团。不论在褐煤煤田或在工厂里，他们较之德意志工人更习惯于较低的生活水平并且接受了较低的工资。1888年，在赖兴贝格（利贝雷茨）举行的德意志工人协会的一次集会上，一个纺织工人抱怨说，捷克工人正在破坏德意志工匠的合法要求，并且接受德意志人绝不能忍受的生活条件。十年以后，布吕赫（莫斯特）的一个装钉工人和霍恩斯塔特的一个排字工人召集了几千德意志工人的代表；成立了“奥地利德意志人职工联合会”，来保卫德意志工人的利益；这个新联合会接受舍纳勒作为第一任主席。巴德尼政府危机——因拟议在波希米亚地区特别实施法令——和舍纳勒的反政府的宣传运动，在德裔波希米亚人中造成巨大的骚动。1899年，代表四千多名工人的几百名代表在埃格尔（赫布）集会；大多数人来自波希米亚北部的工业区，其他的人来自维也纳、格拉茨、慕尼黑和柏林。有一个纺织工人建议给“东部边区德意志人民的领袖”舍纳勒发出致敬信，建议得到一致通过。

德意志工人党就从这类平稳的开端中发展起来，它是在1904年由一些德意志工人在特劳滕瑙（特鲁特诺夫）建立的，这些工人有来自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还有来自象林茨这样一些奥地利市镇的，这些地方新近都出现一股强大的捷克移民的潮流。这个新政党的纲领与其说是右翼的不如说是激进的，^①它要求实行普遍而平等的选举权，要求言论和出版自由、集会和结社自由，扩大政治上自治的范围。这个党自称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政 39 党”，“它正全力以赴地与各种反动倾向，如封建的、教会的和资本

^① 1904年8月15日发表的纲领载于 A Ciller, *Vorläufer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Vienna, 1932年,第135—136页。

主义的特权以及一切外来的民族势力作斗争”，以便克服“当今社会无法维持的状况”，并保障“工人社会地位上升”。这是政治、社会和民族等方面的要求的混合物，源自因存在社会和民族纠葛的边疆地区出现的激烈斗争。

1913年，这个党通过了一个更坦率的新党纲，特别反对“圣马克思的社会民主党的教导”。该党宣称马克思的国际主义学说是“错误的，对中欧的德意志社会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害”。“社会民主党是靠这些可怜的讲德语的工人的大力帮助才强大起来的，可是在很多地区，这些可怜的说德语的工人却被他们曾热烈欢迎的斯拉夫同志挤掉了工作。德意志雇主雇佣了廉价的斯拉夫工人；但这个红色组织却拒绝给予这些德意志老党员以应有的保护……”因此，德意志人开始认识到“国际主义学说的毒害”和“由犹太人领导的、并且同反复无常的大资本家们密切勾结的社会民主党是伪善的”。^①这个纲领使人感兴趣的倒不是关于那些正在威胁着德意志工人的危险的描述——这是根据现实情况写的——而是关于犹太人、社会民主党人和大资本家之间的密切勾结的提法；这在《我的奋斗》和民族社会主义党的宣传中都居于突出地位。同时，党的头三名代表被选入帝国议会，都是代表波希米亚北部工业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民族主义的德意志工会拥有六百十一个地方分会和四万五千名会员。在他们的领袖中后来有好几个成了著名的民族社会主义党人。他们拒绝承认，在波希米亚的德意志人的生存有赖于同捷克人达成协议，有赖于这两个民族之间的妥协。正相反，他们确信德意志的势力范围必须扩大，并且要从这些地方消除捷克人的竞争。

^① 9月纲领载于 Andrew G. Whiteside, 'Nationaler Sozialismus in Österreich vor 1918'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ix, 1961, pp. 344-5.

这些政治上的影响使青年阿道夫·希特勒的思想定形；他于1889年出生于来因河畔的布劳瑙，父亲是一个奥地利关税官吏。⁴⁰当他还是个十八岁的青年人时，来到维也纳；在政治上是赞同舍纳勒和泛德意志组织的。舍纳勒对霍亨佐伦王室所怀抱的热情和加入德意志帝国的主张深深打动了。但他也批评舍纳勒对社会问题和下层阶级的重要性缺乏理解，他的要求是过于专门针对资产阶级集团。另一方面，年轻的希特勒从卢埃格尔博士身上看到他是个懂得社会问题的重要性并认识大规模宣传运动价值的人，也是个能发挥群众本能的能手，由于他既避免对教会作任何攻击，因而也获得了教会的支持。多年以后，希特勒还对他表示钦佩。最后，虽然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是，希特勒在维也纳遇到两党的领导人在那里进行激烈的反犹宣讲。但他在维也纳初次见到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其他民族，而他对这些民族也同样抱反感：“令我感到厌恶的是形成这个帝国首都特色的各民族集团：捷克人、波兰人、匈牙利人、鲁特尼亚人^①、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等等，这整个民族混杂是令人厌恶的，但其中尤其令人厌恶的是人类永存的病原体（细菌）——犹太人——的生长，越来越多的犹太人……。”^② 往后几年，人们发现希特勒的床头上面挂有舍纳勒的标语：“让我们建立日耳曼尼亚的大教堂，没有犹太人，也没有罗马。”

这个青年人无疑是在二十世纪初期的维也纳获得了对他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政治影响的，这些影响得自他贪婪地阅读的一些报纸，得自他与同伍的伙伴和偶然相识的人进行的热烈讨论。^③ 他所

① 即乌克兰人。——译者

② *Mein Kampf*, 9th ed. Munich, 1934, pp. 59, 106, 108, 110, 133—5.

③ 同前书，p.137。August Kubizek 在 *Adolf Hitler, Mein Jugendfreund* (Graz, 1953) 一书中曾试图证明希特勒在来到维也纳之前已是一个有明确信念的泛德意志人组织成员和舍纳勒的信徒；但这一观点已遭到下书的反驳，见 Franz Jetzinger 的 *Hitler Jugend — Phantasien, Lügen — und die Wahrheit* (Vienna, 1956)，特别是该书的第 212—13, 236 页。总之，没有理由怀疑希特勒在这方面有他自己的看法。

热切吸取的是一种社会的和民族的思想的混合物，而尤其重要的是，他所进入的是一个具有极端主义色彩的泛德意志人和反犹太人的社会。然而这个社会是注定要失败的。即使在1914年没有爆发战争，在这个君主国的奥地利这半边占35%的少数德意志人，不能够抵挡住斯拉夫民族主义日益兴起的浪潮。尤其是，自1880年以来，这一百分比不但没有增加，反而略有减少。任何旨在对非德意志人实行德意志化，削弱非德意志人的势力或权利，要使德意志人成为统治集团的企图都必定以失败告终。稍微现实的想法是指望哈布斯堡君主国分裂，使它的德意志人部分可以参加德意志帝国，这是舍纳勒高声宣扬的目标。但是这一目标意味着德意志帝国将失去它唯一可靠的盟国，这对于泛德意志人集团所怀抱的扩张和世界权力的梦想是严重的挫折。这是没有什么出路的，舍纳勒的政治影响在1914年以前的十年间急剧衰落看来证明了这一点。

俄罗斯

在俄罗斯，一个较自由的时代的曙光和1905年革命的爆发也导致一个“新右翼”政党的成立。这个党也反对自由主义、议会制度、社会主义和犹太人。俄国陆军和海军被日本人打败，引起了遍及全俄国的大罢工和革命骚动，政府被迫作出一些让步。1905年6月，尼古拉二世答应要召开国民议会，沙皇专制政府将由新政体取代。8月，颁布一道御诏宣布成立国家杜马，在很严格的阶级选举资格的基础上选举产生。不过，到了10月，沙皇又颁布一道御诏，许诺大大扩大杜马选举资格，杜马也将拥有广泛的权力；还要确立人身不可侵犯，信仰、言论、结社自由。看来专制政体好象将很快转变成立宪君主制，虽然诏书中没有提到“宪法”这个词。

有意思的是，正是同一个月，即1905年10月22日，一个新政

党成立了，它自称“俄罗斯人民联盟”。这个党不认为它自己是个政党，而是一个为了保卫沙皇、教会和祖国，保卫专制政体不受任何侵犯的自发人民运动，代表俄罗斯人民自己。然而它承认政府的各种会议应该听取人民的声音，也还承认农民和工人的不满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理由的。这样它就能从底层阶级，特别是中产阶级下层，从商贩和职员以及比无产阶级还要低下的社会最底层获取 42 真诚的支持。不过这个党的领导人却来自社会地位高得多的阶层：地主、律师、大商人、工程师、卸任的官员等等。它的第一位领导人是 A. I. 杜布罗文博士，他是一个医生，放弃了在圣彼得堡的规模很大的收入颇丰的业务而投身于政治。他是在党的成立大会上被选为领导人的，并一直担任到 1909 年。

这个新政党的政策和策略较之传统的右翼政党要灵活得多，它很快就成为右翼方面最强大和组织得最好的力量，拥有二百多个分支和二万多党员。虽然它的代表也占了杜马的席位，它仍然敌视杜马并致力于维护沙皇专制制度。在 1907 年 3 月召开的第二届杜马中，它的代表千方百计地散布流言蜚语来破坏杜马的声誉，并且力图阻挠杜马做任何有益的工作。在第三届杜马（1907 年 11 月根据限制严格的选举资格选出的）中，约有五十名属极右翼的代表，占代表总人数十分之一还多。他们气势汹汹地对以下情况提出责难：“自由主义的”或“立宪的”大臣们所采取的措施，犹太人渗透报刊和学校，有人毁谤君主政体和军队，关于少数民族及其愿望的问题，此外，旨在把杜马变成真正议会的一切人。杜布罗文医生断言，只有犹太人和共济会会员愿意看到俄罗斯村社毁灭，而他认为村社是社会正义的化身。按照这个党的看法，这个国家最坏的敌人是自由主义者及其政党立宪民主党，而社会党人只不过是按照在其背后隐蔽的势力——犹太人和自由党人的命令行事的，他们彼此有点相似。应通过立法、抵制和驱逐出境的办法，把犹太

人排除出经济生活；商业和金融企业只对犹太人和外国人有利，因而被划归本质上是非俄罗斯的活动。

这个党在同这些敌对力量作斗争中，常常使用暴力、破坏罢工及抵制等手段。为加强它在活动中的残暴性，这个党在莫斯科、圣彼得堡以及其他城镇组织了秘密的战斗组，又成立了半军事性的队伍，例如，敖得萨的“黄衫队”，去杀害政敌和犹太人，这是后来的“黑衫队”、“蓝衫队”和“褐衫队”的先驱。俄罗斯人民联盟中有⁴³部分人非常认真地对待领导人的政治激进主义，即使政府因此撤消对他们的津贴，这只会增加他们的极端主义。1907年4月举行的党的第四次代表会议，要求杜马转变成一种纯粹的咨询机构，而其成员应从信奉正教的俄罗斯人的各阶层中选举。然而，尽管它有种种极端主义观点，这个党从不曾和政府完全决裂；它仍然忠于它赖以得到支持的君主政体。它的残暴手段吓坏很多保守党人，但是仍保持着和政府的联系。它不是一个真正革命的政党，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纲领。

1909年，这个党分裂了。该党参加第三届杜马的领导人马尔科夫保留了党的名称、机构和大多数的党员，这时向保守党人靠拢。杜布罗文医生变成一个规模仍然很小但更激进的派别的领导人。接着该党又发生进一步的分裂，而这个运动也逐渐丧失了很多的支持者。然而，由于当局继续不断的帮助，这个党在1912年第四届杜马选举中还能得到一些选票。在民族杂居的地区，它仍保持一定的重要性，因为在那里，民族和宗教分歧及冲突对它有利。它的最后“胜利”是在1911年出现的。在基辅附近的一个岩洞中，发现一个十三岁小学生的尸体，这个小学生的尸体看来是被一伙窃贼杀害的，他们怕他泄露秘密。俄罗斯人民联盟立即发动一场反对一个犹太教会文书贝利斯的运动，指控他杀人祭神，接着逮捕他并控以杀害罪。这个党的领导人和代表有几年都在宣扬他的罪行，

并试图把人们承认这一罪行作为政治上是否可靠的试金石。他们甚至使这个案件在1913年受审，然而贝利斯却得到陪审团的开释。1899年在波希米亚曾发生过一个类似的案件，当时一个犹太流浪汉希尔斯纳曾因被控杀害一个女孩祭神而受审，托马斯·马萨里克曾为他进行了有力的辩护；于是布拉格大学的反犹学生就猛烈扰乱他的课堂并迫使他中断了讲课。这类宣传是超越国界的，而反犹主义总是一种得人心的政党战斗口号。

从十九世纪后期起，极右翼运动就这样影响着欧洲大陆所有的大国。这些集团和政党有很多共同的特点。他们不仅是民族主义分子和扩张主义分子，而且同时是反对自由、反对议会制度、反对民主和反对共济会的，更不用说是反犹太主义的了（意大利除外）。⁴⁴他们使用暴力的方法，其中有几个组织还组成了他们自己的半军事性的突击队。他们盼望有坚强的独裁主义或专制君主的政府。他们向广大群众特别是产业工人发出号召，企图使他们脱离社会主义运动。然而这种向群众发出的号召总的说来并不成功；只是在短时间内和特殊情况下才能局部地把群众动员起来，例如，1897年维也纳的巴德尼危机就是这种情况。况且，不仅在奥地利，而且在法国、德国和俄国，这些运动在二十世纪初期已开始衰落，而自相残杀的内部冲突又进一步削弱这些运动。另一方面，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运动是多么强烈地吸引受过教育的人们，特别是几个国家的大学生。人们容易说年轻人往往爱走极端；但是人们也容易低估发源于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及民族主义的混合因素和这些政党宣扬的光荣过去使人们向往等的吸引力。

此外，这些政党的领导人往往是些可尊敬的学者、作家、专业人士或知识分子，常常是有家产的人，并不属于我们将在战后期间遇到的那种出身于社会底层并专事教唆暴民和煽动民众的政客那

种类型的人。或许这些老一辈的领导人还不是粗鲁狂妄到足以扮演一个墨索里尼或一个希特勒的角色，因此他们的成就是有限的。然而他们的确认识和利用了中产阶级下层，那些因经济变革和资本主义集中化而成为牺牲品的小人物对现实的不满；而且他们深深打动了一部分青年大学生，这些人注定要在战后年代领导他们的国家。正是战争本身把群众赶出家园，也使得有组织和获得支持的暴行规模之大远远超过民族主义的和反犹的领导人所曾梦想的。紧接着战争而来的危机不仅影响了某些社会集团，而且影响了整个社会。曾这么久地统治着欧洲这么多地方的一些大帝国垮台了；帝国所具有的稳定性和安全也消失了。战后紧接着到来的是革命和公开或隐蔽的内战。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旧秩序崩溃了，而新的暴力时代也开始了。

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

45

战争及其后果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几个月，意大利很多城镇发生了罢工和骚动。1914年6月，在无政府主义者和共和党人组织示威游行的时候，亚得里亚海沿岸的港口安科纳发生了暴动。接着社会党人和劳工联合总会宣布举行总罢工，骚乱全面爆发。在意大利中部的罗马尼阿和马尔凯地区爆发了暴力革命。在许多较小的城镇成立了当地的共和国，红旗在波洛尼亚市政厅升起。军官被缴械，许多地方的兵营遭到围攻。后备役军人被征召去制止一起铁路罢工，许多市政当局威信下降了。当议会一筹莫展时，在罗马却出现了另一种反应。被民族党人所动员起来的成千上万人上街游行，准备以武力对付武力。在波洛尼亚，民族党人组织志愿巡逻队来维持治安，他们要求店铺开门营业，家家户户挂出国旗。这样，当政府仍然处于被动状态时，民族党人是唯一挺身而出的一派人，敢于顶住红色浪潮。群众往往并不了解他们自己游行的目的，但似乎准备接受任何一种领导，并且要求采取“行动”以示抗议。

大战爆发后几个星期，英国、法国、德国、奥国甚至俄国所有交战国的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都决定支持本国政府作战，并决定“保卫”他们遭到别国攻击的祖国。爱国主义热情的浪潮遍及全欧，席卷一切国家，并淹没了社会党国际，这个国际曾宣传国际团结，并号召一旦宣战就举行总罢工。只有一些小的极左少数派——令人瞩目的有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德国的罗莎·卢森堡小组以及其他

45

国家类似的小组——仍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采取革命行动来反对战争的思想。他们的呼声不过是荒野呼唤，无人理睬。他们的领导人不是被流放，便是很快就被关进牢中；民族主义则处处取胜。

然而，意大利虽然是 1882 年与德国和奥国组成三国同盟的伙伴，这时却仍保持中立；而意大利社会党在战争爆发时就重申反对战争和任何帝国主义的冒险行动。墨索里尼在最初走得很远，竟在一些文章和在米兰举行的一次集会上宣称，德国胜利将比协约国胜利会给无产者带来更多的好处。但如参加德国和奥国一方作战，在意大利可能是非常不得人心的。1914 年 9 月 22 日，他在党的机关报《前进》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宣称：“社会党重申它对于工人国际的前途的永恒的信念，它定将从各国人民的流血牺牲和战火中再度发展起来，变得更伟大、更强有力。我们正是以国际和社会主义的名义请求你们，意大利的无产者，毫不动摇地坚持反对战争。”^①直到这个月底他还坚持这一态度；然而 10 月初就开始有谣传说，墨索里尼正在发生动摇，说他支持协约国一方，说他对奥国的宿怨情绪——这是许多意大利人都怀有的——正越来越占上风。

这时在意大利开始了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宣传鼓动，要求本国应放弃中立政策，参加协约国一方作战，攻克“未收回的”上阿迪杰的领土，去援助受到入侵的法国和比利时。许多意大利人的态度逐渐从“绝对中立”转变到“观望中立”，倾向于西欧各国。在墨索里尼看来，不采取行动是不得人心的，在这个人们激烈反对政府采取中立主义和消极态度并且要求参战的国家里，同民族主义者结成联盟似乎并不奇怪。10 月 18 日，墨索里尼没有通知他的任何同事，就在《前进》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从绝对中立到积极起作

^① 转引自 Laura Fermi, *Mussolini*, Chicago, 1961, p. 104.

用的中立》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宣称，从战争一开始，社会党的中立就有一种反德和反奥的味道；绝对中立是一个丧失灵活性的危险口号；一场反对德奥的战争可使意大利在今后免遭报复；面对眼前上演的这出戏，难道社会党人仍然只充当观众吗？社会党执行委员会当天举行会议，以撤掉墨索里尼的《前进》报主编作为答复。

只过了四个星期，墨索里尼就宣布他将出版自己的报纸，来支持意大利站到协约国一方参战。在11月15日出版的第一期《意大利人民报》的社论上，他攻击反战宣传是怯懦表现：“我的呼声就是一个词——这是我平时从来不会说出来的——但是今天，我不想装模作样，而是以坚定的信念，要提高嗓门，用洪亮的声音高呼这个可怕而又令人神往的词：战争！”^①不久墨索里尼就被社会党视作叛徒开除出党；这个多年来他曾倾注以生命和革命干劲的党，从今以后他将怀着永世的仇恨施加迫害。那时有谣言说，右翼集团曾提供资金使他能够出版自己的报纸；然而钱大概是法国社会党人给的。在前几个月中，成立了第一个法西斯组织（“法西斯”源出拉丁文 *fascis*，词的本义是“一束棒子”，棒束中有一柄突出的斧头，是古罗马高级执法官的标志），来推动意大利介入战争。12月，墨索里尼及其追随者组成了一个法西斯组织，即“革命行动小组”，目的在于“摧毁霍亨佐伦王朝和谢德曼的德国”，谢德曼是一位温和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他曾出面坚决支持德国的战争活动。显然是把这两者等同起来。

墨索里尼一下子从极左跳向极端民族主义一边的彻底大转变，很难作出解释。但是极可能是他意识到笼罩全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再则由于渴望采取行动和仇恨奥地利，以及相信战争是一种达到革命目标的手段，所以他失去了自制力。最初他可能没有认

^① 引文同前书，第107页。Balabanoff，前引书，第89—95页对于墨索里尼被社会党开除的经过情况有详细的描述。

识到这一行动的后果，并且没有勇气把他的思想变化告诉他的同志们。然而在社会主义阵地以外却有很多人同意他的意见。1915年5月，诗人加布里埃勒·邓南遮欢呼：“一个意大利将藉征服而更伟大；获取领土不可耻，但需以流血和光荣为代价……。经受多年的民族屈辱后，承蒙上帝赐予我们特殊血液的证据……。”^①就在同一个月份，意大利向奥地利宣战。诗人立即志愿参军，并干下传奇式的英勇事迹，其中如驾飞机大胆飞越未收回的城市的里雅斯特和特兰托上空，投下了鼓舞人心的文件，这是宣传战中头一批用传单袭击；而墨索里尼却在等待，直到他被征召入伍，在前线服役仅几个月；那时他腿部受伤，不得不在医院住了相当一段时间。这次受伤使他能恢复他的办报活动，他不再返回前线。1917年10月，意大利军队在卡普雷托被奥军和德军击得惨败；这一败仗使人们惊慌失措，并且几乎也无法阻止敌军向威尼斯以北的皮亚韦河推进。这时墨索里尼在他的报纸上主张查禁社会党的报纸，迫害任何没有为战争尽最大努力或暗中破坏抵抗精神的人，并且要求建立一个非议会政府来领导全国，这是他第一次提出这样的要求。几个月后，在1918年5月，他高呼说：“我们这些幸存者、生还者，要求统治意大利的权利……。”

1918年秋，首先是奥地利，接着是德意志崩溃了，意大利终于获得了最后胜利。根据1919年和约，意大利得到了上阿迪杰（包括有一个很大的讲德语的少数民族，因而又造成了一个新的被他国统治的领地）和包括的里雅斯特在内的伊斯特拉，但是它想占有更大的领土愿望仍然没有得到满足。特别是，意大利的非洲殖民帝国并没有扩大，而亚得里亚海东岸从阜姆往南的一片地方却划归新建立的南斯拉夫王国了。达尔马提亚北部曾一度属于威尼斯

^① 转引自 Dennis Mack Smith, *Italy — A Modern History*, London, 1959, p. 300.

共和国,意大利人根据 1915 年 4 月为劝诱他们参战的伦敦秘密条约的条款,对这块地方提出领土要求,但是徒劳无益。亚得里亚海不能变成“我们的海洋”。伊斯特拉以东的阜姆港口也划归南斯拉夫,这个地方的人主要是讲意大利语的。

战胜国如此对待意大利,这在意大利引起了强烈愤慨,并导致意大利代表团一度退出和会。全意大利很快就在流传,战争是打赢了,但是和平却消失了;意大利人觉得在分配胜利果实时受骗了。当意大利政府最后接受这个和平条款时,它激起了民族主义者的愤怒,其中墨索里尼的表现尤为突出。1919 年 1 月,他在米兰把部队和突击队(战时为袭击敌人阵地而组成的,穿特殊制服,并以匕首武装)的力量联合起来,冲散了毕索拉蒂主持的一次集会,毕索拉蒂赞成用上阿迪杰和达尔马提亚交换阜姆。邓南遮却宣称:“不论是根据神圣权利还是根据人类法律,达尔马提亚都是属于意大利的,蒙上帝恩典,上帝是这样来指定给人们土地的,他使每个民族能认识到它命中注定应在那里开拓……。达尔马提亚过去是我们的,今后也将仍属于我们……。”^①被战争激发起来的民族主义激情这时达到了狂热的程度。

激进主义崛起

在冲散了毕索拉蒂的集会后,仅仅过了几个星期,墨索里尼就在米兰建立了“战斗的法西斯”组织,和战时建立的那个推动意大利参战或保卫国家的法西斯组织类似。1919 年 3 月 23 日的集会约有一百人参加,一半来自米兰,另一半来自意大利北部其他城镇。主席是突击队的队长,其他突击队员出席会议,并负责保卫集会不受外部干扰。同这个军队中的精锐部队的联盟牢固地确

^① 同前书,第 318 页。

立起来了。墨索里尼宣称：“因为政权的接替是没有限制的，我们别再踌躇了。必须赶紧行动。如果政府被推翻，接替它的必然是我们。因此我们创立法西斯组织这一富有创造性的宣传鼓动机构，它可以走上街头高呼：“我们，唯有我们有权接替现政权，因为是我们，我们迫使本国参战，并取得胜利。”^①这是他头一次这么公开而明确地规定他的目标，要接过继任权，推翻现存政权，取得政权。

这次会议上一致通过的纲领反映了从战争中产生的民族主义的和社会的要求，并坚决反对一切不曾支持这一纲领的人。它支持一些复员军人组织的权利和要求，并要求有“一个从阿尔卑斯山到亚得里亚海滨的意大利……合并阜姆和达尔马提亚”；其他国家的帝国主义伤害意大利，或任何意大利帝国主义伤害其他国家均应受到谴责；在竞选运动中，任何候选人如在战时曾是个中立主义者就遭到激烈反对。墨索里尼在战时曾经打过的政治战要继续下去。几个月后，在6月份，一份更详细的纲领公布了。它包含几项显然很激进的要求：对资本征收累进税，对发战争财的征收百分之八十五的税额，给予男女普遍选举权，建立全国民兵组织，订出最低工资额，军火工业国有化，工人参加工业企业管理，没收所有的教会财产——意大利在十九世纪有许多教会财产已经非教会所有了。

这些要求绝大多数是左翼的，而不是右翼的。只有要求工人参加工业管理一项与民族主义党人的一项要求相符，这一要求是1919年3月提出，另外要求建立以工人和雇主联合管理为基础的行业协作组织，但是也同样可以被人们理解为具有更激进的意义。罗马的一份报纸的评论倒说得很正确，它说新成立的法西斯组织目的不在于保卫统治阶级或是现存国家，而是要把革命力量引进

^① 转引自 Hermann Finer, *Mussolini's Italy*, 2nd ed., London, 1964, p. 116.

民族主义营垒以便阻止布尔什维主义取得胜利。法西斯组织很快公布已拥有一万五千名成员，编在八十二个小组中。4月15日，他们在米兰取得第一次“胜利”。他们袭击一个社会党组织的群众集会，接着又放火焚烧《前进》报大厦，并捣毁了报社的办公室和印刷机器。墨索里尼对那份他曾一度任主编的报纸进行报复，这是许多类似的报复行为中的头一桩。然而墨索里尼却宣称，他是在和社会党作斗争，不是由于他们的社会主义，而是因为他们反民族和反动的。这次行动是和突击队密切配合的有组织的行动，突击队的军事经验证明是很宝贵的。象以后几年一再发生的情况那样，警察并未进行干涉。正是政府机关的软弱表现，它们愿意宽恕不法行为，才大大助长了法西斯运动的发展。

在阜姆事件中也表现出这种软弱态度。当这个城市发生骚动事件后，协约国军司令部坚持意大利卫戍部队必须撤出；可是卫戍部队的一个军官却要他的士兵发誓，说他们要回去并夺取阜姆，而且他还请诗人邓南遮来领导这支远征军。1919年9月12日，他领着约有几千人的纵队进入阜姆，队伍中有复员兵、突击队员以及其他人员，但也有部队，这些部队是开小差的并向他提供必要的武器和供应。每天都有更多的志愿者到达，并给他们带来枪枝、飞机、汽艇等武器。他们强行登上一些船，装上给养和武器开往阜姆。邓南遮宣称，阜姆已归并意大利并批准了这个城市在各个团体合作基础上制定的一部宪法，这是后来的总体国家的雏型。他的队员穿黑色衬衫并佩有骷髅徽章，高举手臂行“罗马式”的敬礼。他们宣誓忠于司令；这位司令常常向大群情绪热烈的听众发表讲话。听众则报以唱歌或是后来为法西斯分子所采用的有节奏的叫喊，并高呼“意大利或毋宁死！”邓南遮一再强调他的行动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他的动机的纯洁和敌人的卑鄙：“今天阜姆为意大利提供了榜样；这是我们良心的荣誉，是伟大的拉丁良心的荣誉，多少世

纪来，只有它曾创造真正的自由人，到今天也仍然在创造……。我们正单独坚持反抗一个咄咄逼人和贪得无厌的妖魔。我们正单独坚持‘反对这个愚蠢而卑鄙的世界’……。我们正单独坚持反对由盗贼、高利贷者和伪造者创立和支持的巨大的权力……。”^① 邓南遮确信他正在保卫意大利，抵挡住一股既没有什么历史记录也没有什么文化的斯拉夫野蛮部落的浪潮。他鼓吹要建立一支“贫穷和被剥削的國家的新十字军，为反对某些强夺所有财富的國家的一切贫苦自由人的新十字军”，^② 这是模仿科拉迪尼在利比亚战争时期的思想。然而他的情绪高涨的追随者希望阜姆事件将是对政府进行总攻击的开端，希望邓南遮会领导他们去夺取罗马。一位退伍军人协会领导人给的里雅斯特的法西斯组织写信说：“阜姆的业绩必须在罗马最后完成。”

一支私设军队已经产生了；军队的高级军官怂恿并帮助了邓南遮。没有军界的共谋，这整个冒险事业绝不会成功。政府放弃了权力。民族党人也组织他们自己的穿蓝衬衫的突击队，来和社会党人、民主派和共济会会员斗争。社会党的议员在罗马大街上遭到袭击。邓南遮正在计划要向首都进军。10月30日，墨索里尼从米兰给他写信说：“我们正在把每二十人编成一组，穿某种制服并携带武器”，这些队伍“正在等待您的命令”。^③ 他们要废黜国王，并宣布成立共和国。邓南遮在阜姆呆了十五个月，但到那时冒险事业也垮台了。1920年11月，意大利和南斯拉夫签订了一项条约，把达尔马提亚划归南斯拉夫，并使阜姆成为自由市。6月，担任首相的乔利蒂的政府命令邓南遮撤出阜姆，邓南遮拒绝撤出。于是乔利蒂对这个城市实行封锁，而邓南遮却发布了一项战争宣言。

^① Eugenio Coselschi, 'La Marcia di Ronchi' in *Il Decennale*, ed. by Oddone Fantini, Florence, 1929, p. 226.

^② D'Annunzio, *Italia e Vita*, Rome, 1920, pp. 32, 42.

^③ 转引自 Fermi 前引书, 第 177 页。

但是从一艘战舰上发出的一发炮弹使邓南遮受了轻伤，因而也使他改变了思想：他悄悄地离开阜姆隐居去了。政府的第一个有力的行动就足以结束一场曾大大损害了意大利和政府权力的运动。但最重要的是，这整个事件是向罗马进军的一次预演。

就在这时，经济形势恶化，里拉迅速贬值。政治不稳和社会骚乱在意大利很多地区出现了。1919年夏，由于物价飞涨而感到愤怒的群众，冲进商店，抢劫商品，并坚持要求降低物价。墨索里尼和他的法西斯组织宣称他们和骚乱者团结一致。《意大利人民报》暗示说，如果把一些投机倒把的商人成串吊在路灯杆上，把一些囤积居奇者埋在他们囤积的土豆下面和咸肉旁边窒息死，那就会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法西斯的口号是“压榨富人！”骚乱从城镇扩展到乡村。那里许多肥沃的土地只属于少数几个大地主所有。新近从军队退伍的农民，佩带着战争勋章，占领了大庄园，并在那里住下来。他们不属于哪个党派或工会，有时就扛着意大利三色旗，由乐队奏乐，教堂鸣钟伴奏来夺取土地。这个运动在罗马地区、波河流域和意大利南部蔓延开，然而社会党人却不理睬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在战争期间，社会党对北部许多城镇的控制已加强了。在罗马尼亚和艾米利亚，社会党的一些市政当局组成“红色联盟”。

忿懣的士兵从前线带回来的俄国革命的思想被传播开来。 53
8月，社会党的一份宣言宣称：“必须激励无产阶级以暴力夺取政治经济权力，而且这一权力必须完全交给工农委员会独掌。”10月，社会党在波洛尼亚召开代表大会。大会决议赞成加入新成立的由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共产国际；并且赞成成立工人委员会，有朝一日就会发展成苏维埃。这个党的右翼领袖图拉蒂得票锐减，但是他也没有按左翼的要求被开除出党。

1919年11月举行大选。社会党提出“一切权力归于团结在各代表会议中的无产阶级！”的口号进行竞选。他们获得全部选票

的三分之一，并取得议会中五百零八个席位中的一百五十六个席位(1913年则是五十二个席位)。对比之下，墨索里尼在米兰作为独立的候选人，在二十六万八千选票中只获得不到五千张选票，而他的社会党对手则获得全部选票一半还多。看来，从左边来的危险比从右边来的大得多。

这个情况在第二年发生的事件中显而易见地得到证实。农民的骚动规模越来越大，许多庄园都被占领了。尼蒂政府在夺地成为事实后，也不得不予以认可。强夺行动蔓延到工业领域。早在1919年秋，比内罗洛的马佐尼工厂的工人因厂主拒绝答应增加工资的要求，就已占领了工厂，政府于是指派一名军官作为该厂的临时负责人。1920年8月，由于物价高涨，工人的新的工资要求也提高了，然而雇主拒绝，并决定关厂歇业。工人采取阻挠战术并在8月底占领了工厂。仅在米兰，有二百八十家工厂日夜遭到占领。工人成立了红色卫队来保护这些工厂。这个运动遍及全意大利。都灵有二百家工厂被占领。工人委员会管制被占领的工厂并维持生产，但是很快就因原料短缺而不能继续生产，而且也没有钱支付工资。许多工人对于老呆在工厂里已感到厌倦，而红色卫队这时阻止大批人离厂。政府很明智，没有进行干预。乔利蒂认为这个运动不是一个革命动荡浪潮的开始，而是结束；如果运动失败是由于本身的原因，而不是由于政府干预，则那些领导者的威信就会受到损害。二十二天后，工人撤出工厂，而工厂也被庄重归还原主。这一行动的结果是大失败。

然而在1920年11月举行的地方选举中，社会党又进一步获胜。他们这时控制了八千零五十九个市镇中的二千一百六十二个，六十九个省中的二十五个，而且在北部的工业区力量特别强大。在艾米利亚二百八十个市镇中，他们在二百二十三个市镇中居支配地位。到年底，这个党已有党员二十多万，大约是在战争结

束时它拥有的党员人数的十倍，而社会党的总工会会员已超过二百万。由于物价高涨和不断增长的通货膨胀，经济灾难很严重。1920年底，一个里拉仅值美金三分半，而战前值十九美分；政府债务高达九百五十亿零一千七百万里拉，比战前增加了六倍。

这些情况的发展引起了中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下层的恐惧和仇恨。他们认为意大利已到了红色革命的边缘。他们恨那些占领工厂的工人、工会、农业劳工的强大组织、夺地的农民。他们没有认识到最危险的时刻已过了，工人在1920年9月大失败后感到受骗和极大的挫折。中产阶级也深深怨恨工人合作社的竞争，强大的劳工协会对整个地区经济生活实施控制，这些情况使店主、承包商和经纪人地位受到威胁。工人阶级的运动在它的敌人们看来远比实际上强大。1921年初，当时社会党在里窝那举行的代表大会拒绝全盘接受共产国际强加的条件，^①一些共产党人退出社会党而组成自己的政党，于是工人阶级运动进一步遭到削弱，这一分裂从未愈合，而且左派在同法西斯分子斗争的重要年代失去战斗力。不断变动的政府软弱和消极被动，不能采取什么措施来消除中产阶级的恐惧。中产阶级因而也认为政府软弱无能，无法对付骚乱；因此，只差一步他们就要要求建立一个将能保护他们并镇压一切骚乱的强有力的政府。

意大利社会党，在战时曾采取中立主义和反战态度，战后年代对俄国革命表示强烈的同情并且几乎要参加共产国际，比西欧的 55 社会民主党和工党要左得多。这个党再加上它的附属组织工会、合作社、劳工协会以及其他组织，看来似乎也很强大有力。有五十万工人参加的占领工厂的运动，显示出促进工人运动的发展的力量和精神。意大利北部有些省份实际上是在左派控制下。因此，

^① 在里窝那代表大会上，只有五万九千票赞成无条件接受共产国际的条件，九万八千票赞成有条件地接受，而一万五千票反对接受，这表明党内力量分野的情况。

如果认为中产阶级的恐惧是毫无根据和言过其实，这个看法多少是肤浅的。事后回顾起来，危险确实是存在的，不过此时似乎是危及中产阶级的生存，但布尔什维主义的危险显然是很真实的。

法西斯分子占上风

在 1919—1920 年间，法西斯分子仍然人数很少，其影响尚不足以扭转大局，然而在 1920 年后，主动权就越来越落入他们之手了，而工人阶级运动却忙于自相残杀，并因占领工厂失败而深受挫折。开始，法西斯组织纯是都市组织，集中在象米兰、波洛尼亚和佛罗伦萨等一些北方城市。1920 年秋，当工人占领工厂失败后，法西斯组织开始向乡村和小城镇发展，特别是在托斯卡纳、艾米利亚和波河流域一带，但这些组织往往是完全独立于墨索里尼及其在米兰的中央委员会之外的。法西斯组织受到大地主及工业家的支持，因为后者害怕他们的地产和工厂被强占。法西斯组织也得到军队的援助，这在使它们取得胜利方面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因素。在某些意大利城镇的街道上，一些军官当众受到侮辱，被群众唾沫或被打。这些事件在他们的军官同僚中深深引起愤恨并渴望报复，而法西斯组织答应满足他们的愿望。法西斯组织多次从军队仓库中取得武器和弹药。

1920 年 10 月 20 日，国防部长博诺米起草一份通知：凡是退伍而又参加了“战斗的法西斯”的军官，并控制和领导该组织的，将支付他们原薪的五分之四。许多退伍军人，特别是来自突击队的，
56 都参加了法西斯小队。他们为过去取得的军事胜利而自豪，但却因为没有获得他们认为政府“应付的”报酬而感到委屈。他们认为有权为自己在战争中的贡献而得到丰厚的报酬，但却什么也没有得到。他们变成无业游民，并且不再能适应资产阶级社会了。大批

渴望冒险和采取行动的学生和青年，因工人的不断增加工资而感到愤懑，也为他们自己的不幸而感到难过，憎恶那令人厌烦的老一套日常生活，于是，也参加了法西斯小队。最后，还有米兰以及其他城镇从来不干好事的恶棍和半犯罪分子也加入了。

这些小队不久就在意大利整个北部干下无数暴力事件。工人俱乐部被烧毁和抢劫；劳工协会和“红色”市政当局的机关被捣毁。警察几乎袖手旁观，从来不干涉；地主则常提供卡车，以便利他们在全国的交通往来，而政府当局则不闻不问。很有趣的是，这类行动最初是1920年春在东北部的的里雅斯特和威尼西亚朱利亚发生的，还不是针对意大利人，而是针对斯洛文尼亚社会党人的，而且他们是和警察配合进行的。11月，社会党在地方选举中获胜后，法西斯党人来到波洛尼亚和艾米利亚。他们到处挑动暴力行动，以便可以用更大的暴力进行报复；这往往是为使用武力而使用武力，并从非社会党人方面获得广泛的赞赏。社会党人的抵抗仍然是无组织和分散的。那时，地方法西斯组织猛增，1920年7月只有一百零八个组织“已成立或正在组成中”，到10月已有一百九十个，到年底达到八百个，而1921年已有一千个。当然，米兰的法西斯组织仍然是最最重要的一个。

墨索里尼在米兰仍然执行一条显著的激进路线。他声称他的纲领与社会党人的纲领类似，法西斯主义正在帮助他们的事业；他还说法西斯主义要实行土地革命，这是意大利唯一可能做的事。他甚至欢迎工人占领工厂，并宣称：“凡属必要的社会改造事业我都不反对。因此，我理解著名的工人管理工厂的行动，同样也认为他们的合作社会管理是好的；我只要求应该有清白的良心和技术能力，只要求生产必须增加。如果不是由雇主，而是由工会保证做到这一点，我就毫不犹豫地说，工会有权取代雇主的地位。”^① 墨索

^① 转引自 Finer 前引书，第128页。

里尼不顾所有的反社会党的暴行，这时和以后仍在考虑和社会党合作的可能，也考虑和另一个在1919年成立的人民党，即受到教会强烈影响的天主教社会党合作的可能。1921年5月，墨索里尼把社会党、人民党和法西斯党称作国家领导力量。

然而，他的这种意见并没有同在这个月举行的大选完全一致。自由党首相乔利蒂，为此目的，与法西斯党和民族党成立一个“全国临时性联合集团”；他希望这样来增加他们的份量，融合他们，以削弱他的主要敌人社会党和人民党。政府的帮助使法西斯组织得以获得三十五个席位，民族党获得十一个席位。尽管社会党因共产党人退出以及他们在头年秋天的失败事件，但它的力量亦只稍微削弱一点；连同社会党右翼，他们仍获得二百万选票和一百四十七个席位，仍然是最强大的政党；人民党居第二，获得一百四十万选票和一百零六个席位。而临时性的“政党联合集团”获得约二百二十五万张票。^①国会拒绝授予乔利蒂所要求的全权，政府不得不辞职。自由党人与临时性的“政党联合集团”在失望之余分裂成几个敌对的党派，不可能建立稳定的多数。继任的政府，首先以博诺米为首脑，接着又换成法克塔为首脑，但都比乔利蒂政府更为软弱。

法西斯暴行继续发生，没有受到制止。乔利蒂政府曾补助法西斯党人金钱和武器，并告诫警察不要干涉。下列情况是从官方关于1921年最初几个月的“法西斯革命”的历史中的一点摘录：“1月20日晚，经过同卫戍部队的协议，对伊斯特拉的迪尼亚诺的

① 各主要政党所获选票数如下：

临时性“政党联合集团” 2,245,723 票

社会党	1,644,443	共产党	308,142
人民党	1,407,723	共和党	118,853
民主党	703,132	少数民族党	90,649
右翼社会党	382,458		

劳工协会发动攻击。”当一个法西斯小队从这个城市抓走一个斯洛文尼亚旅店主时，邻近的村子都响起了警钟，法西斯党人被迫向卡尔尼扎撤退，在那里受到围攻，但他们予以反击，“反叛的居民被赶出村子，村子付诸一炬，而西戈蒂、瓦雷什基、祖埃基和摩尔摩兰诺等58等地区都遭到破坏。”4月10日，约有四百名来自维琴察、蒙特加尔德拉、波亚纳、诺文塔等地的法西斯分子在威尼斯的莫萨诺集结：“他们从四面八方同时攻入这个地区，予以焚烧杀戮。有七幢房屋受到袭击，全部家当被毁坏或烧毁。还烧了另一些房屋；很多人被处以用棍子打脚掌的笞刑。”两个星期后在波亚纳，“法西斯分子乘六辆卡车到达，攻入这个地方，占据了红色合作社和剧院，把社会党议员和陪审推事从他们家里诱出来并加以严厉惩罚。”五天以后，法西斯分子又回转来殴打了共产党员市长。5月10日，在也是位于威尼斯的波德诺内，法西斯分子“从邻近地区得到了很多增援，并迫使革命派退到附近的托雷地区，在那里遭到围攻。他们竟交起火来，把机关枪甚至野战炮都用上了。乌迪内卫戍部队也介入，援助法西斯分子，布尔什维克的堡垒遭到猛攻。”在这次胜利之后，他们“摧毁了红色的和黑色的大本营，逮捕了很多人，并在威尼斯地方进行了搜索。”①

仅在1921年头六个月，法西斯分子就摧毁了八十五个农业合作社、五十九个劳工协会、四十三个农业工人工会、二十五个人民中心，以及许多左翼的出版社和报纸。然而他们也是代表当地居民的利益或为维护他们的利益而采取行动的。在的里雅斯特，他们强行登上一些已驶到那里的载满水果和蔬菜的小船，强迫农民以极低的价格出售他们的产品；在那不勒斯，他们强制咖啡馆和

① 这些引文摘自 Giorgio Alberto Chiurco's *Storia della Rivoluzione Fascista* (Florence, 1929) 第3卷，第272、413—15页。基乌尔科本人就是锡耶纳法西斯组织的书记。

饭馆降半价。在很多地方,当地法西斯的“拉斯”(这是一个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词,指的是部落首领)完全是独立行动的。如果把那时的法西斯党看作是严格的等级制结构,一切命令发自中央,那就完全错了。因而,伊塔洛·巴尔博在费拉拉建立他的统治,而罗贝托·法里纳奇则在克雷莫纳实行统治,这两人后来都成为法西斯政府的大臣。这些地方领袖,以施加严厉惩罚来进行威胁,迫使左翼市长或议员辞职。法里纳奇因而吹嘘说,在几天之内,他就使六
59 十四个地方议会自行解散。有时,由于法西斯党人制造混乱并阻挠会议进行,省长乃不得不进行干预并解散了这样的议会。

在锡耶纳附近的罗卡斯特拉达镇,市长拒绝辞职,于是法西斯分子就乘几辆卡车来到镇上,放火烧了几所房屋,农民就都逃到田野里去。等法西斯党人离开了才回家;可是法西斯党人很快又回来了,因为他们中有一人不知被谁的枪击中了。他们进行报复,烧毁更多的房屋并胡乱枪杀几个人。社会党人无法对付这种成群结伙的猛然武力袭击的战术。他们的领袖被赶出“解放了的”地区,左翼议员被逐出他们的选区,所有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人都受到各种各样的侮辱。许多人被强迫服下了大剂量的蓖麻油,然后被绑在一棵树上或路灯杆上;更多的人只是挨了揍。一位著名的地方法西斯领导人桑德罗·卡罗西走进一家工人阶级咖啡馆,举枪逼迫一个在场的人靠墙立着,头顶一个杯子,这位法西斯分子要看能否打落杯子来试他的枪法。可是结果打死了人,卡罗西叹息他的枪法退步了。报纸在《一位不幸的威廉·退尔^①》的标题下报导了这一事件,然而杀人者什么事也没有。

在 1921 年选举之后,当时墨索里尼成为一个议会集团的领

^① 威廉·退尔是欧洲中世纪传说中的瑞士爱国英雄。当时瑞士在奥地利帝国统治下,有一次威廉·退尔不服从屈辱的命令而被强令射击放在他儿子头上的苹果,结果苹果被射中了,儿子平安无事。德国诗人席勒写有同名剧本,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也写有同名歌剧。——译者

袖，他打算转向一条较温和的路线。法西斯党人与萨兰德拉的自由党一起组成了“全国右翼”，而墨索里尼在他的第一次议会演说中发表了强烈攻击社会党人和民主党人的讲话。布尔什维主义已被打败，采取武力已达到它的目标；现在法西斯主义将在和平竞赛中证明它具有关系到国家前途的重要因素。看来墨索里尼那时确实还没有设想一党制国家和夺取权力。1921年夏，他反而打算要实现同社会党人和解，终止反社会党的暴力，而且在8月2日就签订了含有这个意思的协议。墨索里尼没有考虑到法西斯普通党员和地方领导人的反应。艾米利亚首先反对；墨索里尼于是立即宣布，如果他们要和他分手，他也不在乎，因为法西斯主义的目的大部分已达到。可是大多数法西斯势力的老中心，如波洛尼亚、克雷莫纳、费拉拉、弗尔利、莫德纳、皮亚琴察和威尼斯都表示和艾米利亚同样的反对意见。墨索里尼必须辞去党的职务，“谁败北就得走开”。^①1921年11月在罗马召开党代表大会，而墨索里尼是愿意在米兰召开的，因在米兰他的地位较强。

在罗马，墨索里尼不得不向巴尔博和迪诺·格朗迪所领导的极端分子的要求让步。同社会党和解的协议被埋葬掉了，因为极端分子要完全摧毁工会并继续进行惩罚性的讨伐。法西斯运动已转变成一个政党，那时已有党员三十二万人和二千三百个地方小组。墨索里尼和格朗迪握手言欢，分裂弥合了。然而，这也意味着背离了这个运动的激进主义。到这时为止，墨索里尼虽然不再是个社会党员，却仍然忠于他青年时代的一些理想，正如在法西斯组织早期的口号和纲领中所反映的那样。如今他向民族党靠拢，它们的这个联盟是后来在进军罗马后才完全建立起来的。这时法西斯党的主流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这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思想；强烈地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工会，这特别是中产阶级党员、地主等有

^① Mussolini's *Opera Omnia*, xvii, p. 105, 转引自 Nolte, 前引书, p.266.

此思想；还有强烈地厌恶议会体制，认为议会一事无成，只能助长派系利益。

1922年间，法西斯暴力行动继续蔓延无阻，扩展到意大利前此比较平静的地区。这年年初，巴尔博在日记中写到费拉拉：“我们控制了局势，不仅粉碎了敌人的反抗，而且也控制了政府机关。市长不得不在我以法西斯党名义发布的命令下屈服。”^①4月，巴尔博命令由他的部队来占领这个城市，四万五千名失业者在城里扎营两天，直到市长答应通过兴办公共工程来帮助他们解脱困难，并释放巴尔博的一个朋友，他因连续犯下暴行而被捕。2月，在托斯卡纳的普拉托，法西斯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游行施威，队伍在行进中遭到王家卫队的阻止。第二天，法西斯党命令所有的企业闭门停业，直至这位“犯下过失”的警方专员被撤职为止。市长答应了这一要求，并且还答应要惩办王家卫队。当这些要求得到满足时，企业就接到复业的命令。墨索里尼在《意大利人民报》上威胁那些
61 敢于攻击他的运动的报纸：“先生们，你们印的尽是无用的侮辱的话。我们的报复……是要打断你们的骨头；无情地使用外科手术。”^②

7月底，法西斯党人在巴尔博率领下袭击拉文纳，因为有一个法西斯党人在这里的街头战斗中被打死：“我们在战时摧毁敌人的仓库，现在以同样的精神来执行这一任务。焚烧着的大厦的可怕火焰升上夜空，全城都被火光照亮。我们必须使敌人胆战心惊……。我通知他〔警察局长〕，如果他不在半小时内向我提供交通工具运送法西斯党人；我就要焚烧并摧毁拉文纳所有社会党人的房子。这真是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我要求完整的一个卡车队。警官们惊慌失措；过了半个钟头，他们通知我到可以得到灌满汽油的

^① Italo Balbo, *Diaria* 1922, Milan, 1932, p.20 (1922年1月1日)。

^② 1922年7月15日的 *Popolo d'Italia*。

或任何为捍卫这个国家而显示某些能力的人担任首相。不过这时乔利蒂已八十岁，萨兰德拉将近七十岁，而且意大利也没有出现任何更年轻的能保卫议会制度的人。

向罗马进军

1922年10月3日，《意大利人民报》公布了法西斯民兵的军事规则和誓言，全国分为若干军区；一支完全由法西斯的领导人任意调遣的私设部队建立起来了。政府并未加干预。首相路易吉·法克塔是一位又老实又心地慈善的老人，他无能而且不善于采取任何有力措施。这最后一点也适用于军队，军队本会反对侵犯它的军事垄断权的，但军官中却有许多同情黑衫队的人。这个月的下旬，有六位名列现役名册的将军参加了向罗马的进军，他们是，切凯里尼、德博诺、法拉、诺威利、蒂尔比和扎姆本尼。

10月24日，在那不勒斯举行了一次规模巨大的群众集会。墨索里尼在会上宣布，他的党“要变成政府”，而且也明确地说，他不要废除君主制或是让王室的其他成员来取代国王。下午，他检阅了身穿制服按军队队形列队游行的六千名法西斯党人；他宣称，
63 “要不是把政府交给我们就是我们将到罗马接管政府。如今这是指日可待的问题，甚或是按小时计算的问题。”他的部队吼叫着呼应：“去罗马！去罗马！”同日，在那不勒斯的一家旅馆里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参加的有墨索里尼和法西斯“四巨头”：埃米利奥·德博诺将军、切萨雷·马丽亚·德韦基、伊塔洛·巴尔博和米凯莱·比安基。墨索里尼宣布，运动的目标是夺取政权，建立一个新政府，最少要有六名法西斯党员占据最重要的职位。应该在10月27日动员法西斯民兵；要占领一些市府、警察局、邮政局、无线电台、反法西斯的报纸和劳工协会。当牢固控制一些城市后，部队就

在三处向进军罗马的启程地点集结，并在第二天早晨向首都进军。同日，集合在佩鲁贾的四巨头将发表一项宣言，声明法西斯的进军既不是反对军队，也不是反对警察，而是反对那些笨拙荒诞的政界人物，他们在长达四年内未能为我们国家提供一个正确的政府……。”^①

墨索里尼在10月26日上午回到米兰，继续就组成联合政府问题进行协商，一直商谈到29日。显然，他还未肯定应采取什么方针，究竟要不要执行向罗马进军。工业联合总会、农业联合总会和银行家协会的领导人都致电罗马，要求任命墨索里尼为首相。电气工业巨头孔蒂和很有影响的报纸《晚邮报》的主编阿尔贝蒂尼这两位参议员给法克塔首相发了一份电报，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自由党的卡米洛·科拉迪尼从罗马给正在皮埃蒙特的乔利蒂写信说，法西斯党“意欲施加强大压力以达到组织一个法西斯政府的目的。看来墨索里尼实际上已表明向极端分子让步。”^② 米兰市长卢西尼约利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墨索里尼和他讨论各种计划，然后他又把计划转告乔利蒂。

同时“四巨头”在戒备森严下住进佩鲁贾市政府对面的旅馆里。他们从这里指挥黑衫队的调动。约在10月27日半夜，他们要求市长放弃权力，市长乖乖地照办。法西斯党人接着占领邮政局、警察局和市政府大厦，没有遭到任何抵抗。在意大利整个北部，发生的情况都一样。在某些地方，兵营也被占领了。几乎没有任何反抗。在锡耶纳及其他地方，士兵和法西斯党徒和睦相处，法西斯党徒往往由复员军官指挥。民族党的蓝衫队与黑衫队采取协力一致的行动。全部行动是在“意大利万岁！国王万岁！军队万岁！”的口号下进行的。

^① Fermi 前引书第190页引用了全文；前一段引文同前引，第189页。

^② 同前引，第198页。

国王维克多·埃曼努埃尔三世于10月27日晚回到罗马，法克塔向他呈交政府辞呈；这是说明他处于完全无能为力的另一个迹象，这种局面需要得到最高层的坚决领导。可是几小时之后，28日清晨，在新政府组成之前继续看守的政府决定宣布处于被围攻的状态，揭示这种状态的布告张贴在罗马各处墙上。可是当法克塔把这个公告呈请维克托·埃曼努埃尔签署时，他拒不批准。这或许是为他的王位担心，或许是要避免内战，或许是怕同法西斯党破裂的结果会引起左翼革命。于是，被围攻的公告不得不撤消。没有发生抵抗行动。

军队将领说服国王相信，有十万法西斯党徒正在向罗马进军，卫戍部队无法阻挡他们；但这个消息是不确实的。实际上只有二万人左右的黑衫队，分成四支独立纵队从西北部、北部和东部向罗马进军。他们的武装很差，只有来福枪、滑膛枪和左轮手枪，几乎没有什么机关枪，根本没有大炮；他们还苦于缺乏食品和其他军需品。这种情况以及绵绵苦雨很快使许多党徒离队回家了。纵队在离罗马二、三十英里的地方等待攻击的命令，但命令从没有下达。如果他们企图以武力夺取首都，他们必然会被罗马的装备完善的卫戍部队轻易击退。

然而根本不需要动武。10月28日，国王要求前首相萨兰德拉组织一届有法西斯党人参加的政府。当德·韦基从罗马打电话通知墨索里尼并劝他接受这一建议时，墨索里尼却拒绝了。国王的副官通知墨索里尼，国王希望同他见面；他又拒绝来罗马，除非国王任命他为首相。29日上午，德·韦基再次打电话告诉墨索里尼，萨兰德拉已放弃组阁的打算，而他的要求将得到满足。墨索里尼要求发一电报证实这一邀请。他接到电报后，就坐夜车来罗马，
65 于30日上午到达。他身穿黑衬衫、黑裤，头戴圆顶硬礼帽。在他离开米兰之前，他命令他的党徒摧毁《前进》报的新办公处，这是

1919年4月以来的第四次摧毁。他宿怨之强烈一如既往。因此，这份报纸不得不迁往都灵出版。

这位新首相当时三十九岁。在1922年10月底组成的政府是联合政府，不是一党政府，十年后希特勒所组成的政府也完全一样。果然，墨索里尼自己不但担任首相，而且还掌管内政和外交两个关键部门。但是，另外只有三个部的大臣是法西斯党人，即司法大臣、财政大臣和解放地区部大臣。劳动部和国库部两个部的大臣由人民党担任；另外两个部，即教育部和农业部归左翼自由党人，教育大臣是著名的哲学家焦万尼·詹蒂莱。另一个温和的右翼政党民主党得到贸易与工业、公共工程和邮电三个部的大臣职位。一位民族党人柳吉·费德尔宗尼任殖民地部大臣。一些高级军官被任命负责陆军部和海军部。还有更多的法西斯党人，一共九人担任副大臣的职务，但是同样多的副大臣职务也分给人民党四名，民主党两名，右翼自由党一名，民族党两名。在任命新政府时，保留了所有的宪法仪式。由前首相法克塔在国王面前向墨索里尼宣读宪法基本原则条文，墨索里尼则向宪法宣誓。但这一切是否意味着要恢复按宪法程序行事呢？

11月16日，新政府出席议会。墨索里尼宣读的宣言获得压倒多数的信任票，三百零六票赞成，只有一百一十六票反对。唯有墨索里尼的宿敌，社会党的发言人图拉蒂抵制这届政府及其执政方式，但是社会党的代表们倒不是全部都投票反对新政府。而墨索里尼也没有象希特勒在1933年3月那样，要求议会授予全权。向议会提出的授权法只要求在几个严格限定的方面授予发布命令的权力，这几个方面是：税收制度、预算、国家机构采取的改组和节约措施。这些权力明确限定使用到1923年底为止，而在1924年3月，政府应向议会就行使这些权力的情况提出报告。然而，这些权力并非独裁权力。议会制度和一些非法西斯政党和报纸继续存在好

几年。

向罗马进军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主要是因为没有任何阻挡。军队、警察、行政部门、司法部门等，国家所有的暴力机构，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给予支持，但千真万确的是前几年间它们都曾谴责法西斯党的暴行和非法行为。如果没有这种勾结，这一冒险是绝对不能取得成功的。虽然许多军官无疑是同情法西斯主义的，然而这并不是说明法西斯党徒在1922年10月以前已成功地渗透到国家机构中去，但倒是可以说法律的捍卫者十分消极被动。旧政权已声誉扫地，太软弱了，简直找不到一个挺身而出的捍卫者。无疑许多人希望法西斯党正是另一种政党，一旦执政后，他们的暴行和激进主义就会减退，成为令人尊敬的政党；但这都是幻想。几乎无人认识法西斯党代表一种全新的政治革命力量，犷悍难驯，不受控制，而且将继续发展它的势头，最后要把旧秩序一扫而光。法西斯党残酷无情，其他政党无可与之匹敌，但它的手段是任何党都不愿意采用的。如果社会党以自己的暴力来对付法西斯党的暴力，那就会发生内战。如发生那种情况，谁将获胜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军队和警察都明显地站在法西斯党人方面。为了政治上的理由，宁可一战，而不是不抵抗就接受失败，这也许是更可取的；但是后来在1934年奥地利社会党的情况表明，在实践中没有什么差别。军队本来是唯一能有效对付法西斯党暴行的，然而同情法西斯党的军队将领人数太多了。

逐步全面掌权

向罗马进军已使墨索里尼获得权力，但还不是全部权力，问题67 是他是否能把他获得的政治权力转变成对国家及其机构的全面控制。墨索里尼似乎从一开始就决心要掌握大权；但是他还没有决

定对付其他政党及其领袖、报纸、议会的手段。此后他花了四五年才完成全面控制，其间还出现过一次一切成就有毁于一旦的危险的严重危机从而打断进程；而十年后，希特勒在排除政敌并建立一党制国家时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月数多少同墨索里尼所需的年数多少相同。

1923年初，就法西斯主义者同国家之间的联结采取了第一个步骤。1月12日，法西斯最高委员会撤消了所有的准军事性组织及部队，建立了一支“保卫国家安全志愿民兵”来取代之。黑衫队和法西斯党的武装小队都编进这支新部队内，从而取得合法地位。不过他们仍然是属政党的军队，受他们自己的首领指挥，服从墨索里尼的命令，按他们的说法是，“服从政府首脑的命令，为上帝和国家效劳。”他们不是向国王，而是向墨索里尼宣誓效忠；但是，国家必须负担民兵的费用，一般人也认为它是国家的一个机构。只是在两年后，在发生马泰奥蒂危机期间，民兵才向国王宣誓效忠。

几个星期之后，法西斯党至少成功地合并了参加政府的另一个党民族党。民族党一个时期以来曾和法西斯党关系密切，而且他们的蓝衫队也参加了向罗马的进军。但是他们比起法西斯党来，毕竟更具有资产阶级性质，具有较多的传统性，不那么残酷；因此，无法与法西斯党匹敌。2月底，达成一项协议，民族党人转入法西斯党内；两个议会集团在法西斯党领导下联合起来。费德尔宗尼和马拉维利亚这两位民族党人成为法西斯党最高委员会的委员，而法西斯党则接过了他们在外交政策方面影响深远的民族主义抱负。同一个月间，民族党领袖恩里科·科拉迪尼声称，“法西斯主义不是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或许多人的专政，而是全国最需要的专政”。^①然而在这一阶段就连墨索里尼也不能确信他的政

^① 转引自 Salvatore Saladino, 'Italy' in *The European Right*, ed. by H. Rogger and E. Weber,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65, p. 254.

权能否持续下去。在向罗马进军周年纪念日，他在米兰向一大群
68 群众发表了即席演说，开始谈论政权的可能持续时间时提到“五年”作为可能的目标。可是接着他停顿一下，显然他突然感到这个数字太低了，于是立即纠正自己的说法，提出的新的年数是六十年，^①这比他自己实际执政的时间长得多。

法西斯党为了牢固掌握政权的最重要步骤是在这年年底采取的。1923年11月18日通过一项新的选举法。根据这项选举法，在选举中得票最多的政党，如果获得的选票占全部投票25%以上，就可获得议会中三分之二的席位。讨论这一提案的委员会主席乔利蒂原则赞成，其他著名的自由党领袖如萨兰德拉和奥尔兰多也表示同意。早在1921年，乔利蒂就同法西斯党和民族党组成一个选举集团，并利用政府经费支持过他们；他认为继续使用他的合作策略是对的，指望靠这一招来压制法西斯浪潮。萨兰德拉实际上表示，新法律由于给墨索里尼提供一个可靠的多数，将会防止他废除议会和破坏宪法，他们也希望有一个可靠的多数席位会加强墨索里尼的地位，以反对他的党的过激分子。这些过激分子渴望使用更大的暴力并在私下谈论发动第二次革命；他们要“把墨索里尼从罗马这个藏污纳垢之地，这个妓院中解放出来”，因为按他们的看法，墨索里尼担任首相后就变成了君主政体和反动派的俘虏。

反对这一议案的意见分歧很大。人民党实际上建议为取得三分之二的多数席位最少应获得40%而不是25%的选票。民主党和右翼社会党人同样拿不定主意，但最后他们和人民党都弃权。不过这只是在唐·斯图尔索(他反对这个议案)突然辞去了人民党主席职务之后才这么做的。这事可能是由于来自梵蒂冈的干预才

^① Giuseppe Bottai, *Vent'anni e un giorno*, (Garzanti, 1949, p.33) 书中谈到这件事，他是目击者。

发生的。社会党全力反对这一提案，但经过更详细讨论，最后以二百三十五票赞成，一百三十九票反对而获得通过；而人民党以及其他党派弃权，大多数自由党人投票赞成。接着以三百零三票赞成，一百四十票反对，通过对政府的信任投票，而参议院以一百六十五票对四十一票赞成这一新法律。自由党人已签署了他们自己的死亡保证书。

1924年4月的选举结果乃是一场预料中的结局。由于同自由党在一个政党联合集团(象在1921年那样)中结成同盟，由于战后危机和那些曾破坏经济的罢工得到结束，墨索里尼的地位加强了。中产阶级感到很放心了。尽管有这一情况，他们仍然对秘密投票和反对党的宣传加以恐吓和干预。政党联合集团所得的选票远比它们控制议会所需的25%的选票多得多，几乎达到全部选票的百分之六十五。在法西斯力量迄今很薄弱的南部，选票百分比出人意外地高：阿布鲁齐85.9%，阿普利亚83.7%，卡拉布里亚和卢卡尼亚76.5%，坎帕尼亚76.3%。上面开列的几乎是整个南部的百分比，远超过全国的平均数，这应归功于自由党领袖的威望和影响，也由于这些贫困地区抱着今后能得到改善的希望所致。各反对党则惨败，人民党减少到三十九个席位，右翼社会党二十五个席位，社会党二十二个席位，共产党十九个席位，而政府的政党集团得四百零三个席位。即使把各反对党获得的选票加在一起，也只得有一百七十四万五千张，而政府方面则得到四百五十万张。这一胜利不能仅以靠贿赂和恐吓而取得来解释。如果说大部分工人阶级仍然仇视法西斯主义，而其他的社会阶级则同它握手言欢。

当议会开会时，社会党代表吉亚科莫·马泰奥蒂于5月30日猛烈攻击政府，特别是攻击在选举期间发生的不法行为。他的发言不断被占多数的法西斯党人所打断，他同墨索里尼本人进行了激烈的辩论。马泰奥蒂要求宣布选举无效，并在意大利恢复自

由权利。在他发言后，墨索里尼说：“那个人，在发表那样的讲话之后，就不应让他四下活动。”两天以后，他在《意大利人民报》上写道，多数党对马泰奥蒂太宽容了，“他应该得到点实质性的东西。”^①6月10日马泰奥蒂失踪了。他在罗马的街上被绑架并被装进一辆汽车中。几天之后，警察发现了这辆车，座垫上血迹斑斑，车窗被打破。同日，警察逮捕了一个人，他以参加讨伐队和法西斯小队的行动而闻名；在他的旅行袋里找到马泰奥蒂的血迹斑斑的裤子。直到8月16日，在罗马以北的一个荒凉地区才发现他的裸露的尸体。五个劫持和谋杀的嫌疑分子是以前的突击队队员，据说属于一个帮，这个帮在法西斯党内称作“契卡”（源于苏联政治警察），受内政部操纵。在过去几年间，这个组织专门袭击与政权为敌的人，把他们打一顿或灌蓖麻油。它从墨索里尼，或从警察头子德·博诺将军，或从墨索里尼的亲信那里接受命令。这时对他们当中的一人，切萨雷·罗西发出逮捕令加以逮捕，他被怀疑是这次谋杀的组织者。

马泰奥蒂被害的消息引起了一场政治爆炸。6月13日，一些反对党议员退出议会，并决定除非法律、秩序和宪法得到恢复，否则就不回议会。他们的领袖是一个自由党的议员焦万尼·阿门多拉，他本人就曾遭到“契卡”的袭击。但是自由党和民主党的多数人，在前首相乔利蒂、萨兰德拉和奥尔兰多的领导下，并不参加反对党行动。他们劝国王留墨索里尼任首相，并继续出席议会。同时，退出议会的一派也发生深刻分裂，自由党人畏惧社会党人和人民党人，而社会党人与民主党人也互相猜忌。人们仿照一个古代罗马分离派的名称，称他们为“阿文丁”派^②，然而这个“阿文丁”派

① 转引自 Fermi, 前引书, 第 229—30 页。

② 阿文丁是古罗马最南端七山之一，传说古罗马平民起义反对贵族时曾退居此山。——译者

没有采取行动。墨索里尼自然宣称自己是完全无辜的，但是群众在他的窗下高喊：“把马泰奥蒂的尸体还给我们！”“我们要马泰奥蒂的尸体！”看来如果反对派团结一致并且得到强有力的领导，本来是可能成功的。但事实上墨索里尼得以把他的让步仅限于对政府作某些变动。他自己放弃了内政大臣的职务；副大臣阿尔多·芬齐^①和德·博诺将军则被劝告辞职。墨索里尼答应使政治生活和宪法原则“正常化”，并消除一切非法手段。一位著名的法律教授阿尔弗雷多·罗科被任命为司法大臣，而前民族党人费德尔宗尼则转任内政大臣。教会、国王、工业家和参议院由于非常害怕社会主义运动复活，都继续支持墨索里尼。

马泰奥蒂危机也在法西斯党内引起一次危机。随着反对派的复活以及越来越多的法西斯普通党员退党，地方领导人感到处境孤立，并且不再相信墨索里尼能够克服危机。他们不喜欢他显得很愿意作出让步的态度。法西斯党11月30日发出一份通告，对潜在的同盟者表示了更为和解的态度，谴责一切非法活动和继续发生的暴行；这份通告声明，党必须摆脱“那些专事暴力的人”；于是，地方领导人更加怀疑。有些军队将领正在要求清洗法西斯民兵的上层军官，其中有一位宣称，在国内现存一切武装力量中，军队必须经常保持最强大的力量。于是，一个不满墨索里尼“软弱”领导的运动出现了，这叫“执政官”运动。12月31日，三十多名“民兵执政官”拜访墨索里尼，表面上的借口是祝贺新年，实际上是反对对民兵指挥部再作任何变动（伊塔洛·巴尔博最近被迫辞去领导职务），并且通报领袖，如果不更坚决地镇压反对派，暴力的“第二个浪潮”就将开始。同日，从托斯卡纳全境集结了几千名法西斯党徒，在佛罗伦萨大街上游行示威，并通过一个动议：“佛罗伦 71

^① 十分有意思的是，芬齐是个犹太人，1944年，他作为一支意大利游击队的领导人而被德军枪杀了。

萨法西斯党人……宣布效忠于领袖……但他们的服从和纪律是有条件的，政府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必要时实施专政措施。”^①示威游行之后，两个反对党的报纸印刷厂被捣毁，共济会分会会所和属于反对派的律师们的事务所都遭到破坏。在比萨、波洛尼亚以及其他地方也发生了类似的暴力示威。这些示威的意义很清楚，不仅是对国王和保守势力的警告，而且也是对墨索里尼本人的警告。

在马泰奥蒂危机期间，墨索里尼的政策曾摇摆于让步与加紧控制之间。他命令“民兵”组织向国王宣誓效忠，而他自己则继续说服右翼自由党人，他们需要他们的支持。然而早在7月份，报纸就受到地方行政长官的管制，地方行政长官受权随意查封报纸。当反对党报纸继续抨击法西斯暴行的事实时，就受到更严厉的限制。1925年底，新闻出版自由被明令取消了；报社老板必须对由于他们的报纸造成的一切损失负责，只有属于一个记者公会的会员才能从事记者职业。这些措施使得连乔利蒂也变成反对派了，不久奥兰多和萨兰德拉也跟着他变成反对派。

在这些示威游行和在佛罗伦萨以及其他地方恢复暴力行动之后，墨索里尼屈从于党内的极端分子，并于1925年1月3日在议会宣布：“如果两类无法和解的分子相互斗争，解决的办法就是使用武力。历史上从未有过任何别的解决办法，今后也不会有。”在这次受到代表们热烈喝彩的讲话中，他对造成暴力行为的情况承担了个人责任，“因为从参加世界大战到今天，我通过展开宣传造成了这种政治上的、历史上的和精神上的气候。”^②墨索里尼就这样接受了法西斯极权主义统治。几天之后改组了内阁，最后两名右翼自由党人大臣离开了内阁，属于人民党的大臣已在1923年4

^① 转引自 Adrian Lyttelton 'Fascism in Italy: The Second Wav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i no.i, January 1966, pp. 87, 93.

^② Mussolini's *Discorsi del 1925*, pp. 14, 16; 转引自 Erwin von Beckerath, *Wesen und Werden des fascistischen Staates*, Berlin, 1927, p.83.

月辞职。政府原先曾是个联合政府，这时变成了统治党的政府。3月，克雷莫纳的党魁，一位过激的法西斯分子罗贝托·法里纳奇被任命为法西斯党的书记。

墨索里尼在1月3日的演说中曾答应在以后四十八小时中澄清局势，这一点也做到了。民兵动员了起来，进行了大量的逮捕，许多房屋和办公处遭到搜查，敌对的团体和组织被解散，政治上可疑的场所被封闭。地方当局受权镇压一切反法西斯的活动和政党。反对党的报纸到处遭到查封。“阿文丁”派抗议也没用。他们已错过了机会。马泰奥蒂危机本来已动摇了法西斯政权的基础，结果却加强了法西斯的权力。这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历史的真正的转折点。在这个国家中剩下的唯一仍然独立的政治力量是教会。墨索里尼终于牢牢掌握了政权。在危机期间，他的策略多少是不太明朗和谨慎的，在他认为必要时就作出一些让步。说他有一套对付危机的计划，我们还得出不出这个印象。肯定他不是从中已看出夺取全面控制政权的机会已到，而是觉得他只是在等待时机，等待风暴过去。从1925年以后，不再需要谨慎的态度了，因为敌人已被击败。 73

一党专政的国家

到1925年初，所有的反对党实际上都被镇压下去了，而报纸则事实上已受政府控制。正如墨索里尼于将近二十年后写的，通过这些措施，“已为极权主义国家奠定了基础”。在随后的数月和数年间，一些进一步的立法措施就建成这座大厦。1925年12月的一项法律规定政府首脑的权力是：他只对国王个人负责，因为只有国王一人能解除他的职务；凡在议会展开辩论的任何事情，必须经他批准；其余的大臣既对他负责也对国王负责。议会政府完结

了。不久议会中一切反对党也都被排除出去。1926年1月，一些曾退出议会参加阿文丁派的议员参加了议会举行的一次悼念刚去世的王太后的仪式，这就给墨索里尼提供一个机会，对反对党回来提出条件：他们必须承认法西斯革命并且同阿文丁反对派断绝关系；然而除了三个人外，反对党全都拒绝这么做。于是墨索里尼就宣布他们的退出议会和抗议是不符合宪法的，并撤消他们的席位，这些措施未遭任何反对就通过了。

在1926年结束之前，对反对党又采取了更严峻的措施。在几次企图刺杀墨索里尼未遂之后，所有反对政府的党派和组织在11月都被解散了。一项“保卫国家法”禁止曾被警察解散的任何社团或组织重新成立并散布其理论和纲领。一切反对派的报纸终于都被禁止出版了。成立了一个“特别法庭”来处理反对国家的罪犯和任何违反这项新法律的人。法庭的庭长和副庭长由首相从武装部队和民兵组织的军官中委派；法官也是由军官担任，无需合法的资格，但必须宣誓服从墨索里尼。无需证人就可以对人起诉，也不要陪审团，也没有申诉的权利。可以把政治犯流放或指定送往一个74 强迫居留的地方。由出事的省的省长，宪兵队的地方长官、即民兵的一位高级军官，以及检察官组成的委员会可以作出流放的判决。为跟踪反对派并逮捕其成员组织了秘密警察。秘密警察和“特别法庭”的生杀大权在现政权的所有敌对分子心中播下了恐怖的种子。

反对派的领导人和凡是不愿同法西斯党妥协的人都被迫移居国外或被放逐到一些遥远的海岛上。1927年至1934年间，约有三千人未经审讯就被放逐。“特别法庭”在1927至1932年间共判决九个人死刑、一个人无期徒刑，判决一千九百零二人徒刑，刑期总共一万零一百五十七年。墨索里尼就这样想把全国变成一块“花岗岩”，变成一块“顽石”。那些在国外的意大利人散布流言

反对国家或积极反对“国家利益”者如被抓获，就会被判处长达十五年的徒刑。如果没有捕获，则可以剥夺他们的国籍并没收其财产。然而，尽管有种种残酷的惩罚，有无数秘密特务的活动，一些知名的反法西斯人士被劫持，等等，反对派仍在国内外继续活动。但是必须承认，在意大利国内，反对派已大大减少，而且他们的活动也被削弱，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才得以恢复。

与这些政治范围内的措施同时并举的是力图改造经济结构，象民族党曾在1919年所要求的，把一切从事生产的人都组织在行业协作组织即“行业合作协会”中。法西斯工会或行业协作组织早在1921年就已建立，会员人数也在缓慢地增加。1922年初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宣称：“国家的含义就是种族的一切物质价值及精神价值的最高综合，超乎个人、行业和阶级之上，个人、行业和阶级……除非纳入国家最高利益范围之内，否则是不合法的……。”^①从雇主的角度来看，这些法西斯的行业协作组织对他们好处很大，因为这些组织反对罢工和工人阶级其他任何战斗性行动。1925年10月，工业联合总会承认法西斯的行业协作组织是工人阶级的唯一代表，无视经选举产生的工会的工厂代表，答应不与任何其他组织签订任何集体协定，只与行业协作组织签订。⁷⁵

几个月以前，司法大臣阿尔弗雷多·罗科在一次讲话中就以下面一段话说明国家对经济争端的干预和禁止罢工及工厂主停工的理由：“无限制的和不受约束的阶级自卫……必然导致无政府状态。法西斯主义……废除这种阶级自卫，因为这种阶级自卫就象野蛮时代的个人自卫一样，是混乱和内战的根源。我们把这个问题概括为几句话：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是，由国家或通过国家来实现各阶级间的公道……。”1926年春季，政府提出一个提案交议会讨论通过，使一切罢工和厂主关厂停工都是非法的，并且应受

^① 转引自 Finer, 前引书第495—6页。

到惩罚。在这次讨论中，罗科重申：“如果国家在各社会阶级和行业之间的冲突中不能够判断公正，不能够象禁止个人和家庭那样，禁止这些阶级和行业各自为政，追求自认为的公正，则国家就不再成为国家，不再是至高无上的了。……”^① 为雇主和雇员成立了各自的行业协作组织，每一个行业或工业部门成立一个。这些协作组织的任务是根据经政府宣布为主要的生产需要，来协调雇主和雇员的利益。只有它们才有权缔结对受雇于那个工业部门的所有雇员有约束力的任何协议。劳资争端则由劳资争议法庭来裁决。会费由工资中扣除，也从非会员工资中扣除。政府要控制行业协作组织的所有高级官员的任命。墨索里尼自己担任行业合作大臣，这个部是在1926年7月新成立的。经济集团的政治势力和权力就这样受到限制和约束。而且，被取缔的不仅是雇主的组织，事实上也包括工会。

1926年6月，在那些由于外国竞争而受到损害的工业中，雇主授权把工作日延长到九小时而无需增加工资，而在较繁荣的部门，加班费须经有关的行业协作组织批准。当莱切省三个农民散发传单抗议加班时，他们被分别判处了从四年半到五年七个月的徒刑。当热那亚附近的卡罗西亚的妇女罢工反对大幅度削减她们的工资时，她们的领导人在1926年7月被判处监禁六个月。1927年1月，劳工联合总会（社会党工会组织）决定自行解散。联合总会全国委员会通过的决议指出：“接连不断地野蛮破坏的非法行动，因政治原因而非法律原因解散一些工会组织，……法西斯工会组织不断施加压力迫使工人参加官方工会，……这一切都表明在意大利，未得到承认的工会运动是没有活动的余地的。”因此，它宣布“联合会的工作结束了，而且它的事务也料理清楚了。”^②

^① 转引自 Gaetano Salvemini, *Under the Axe of Fascism*, London, 1936, pp. 85—6.

^② 同前引，第43—44页及注1。

同年4月，法西斯最高委员会颁布了一项“劳动宪章”。这一宪章明确地承认了雇主的权利和地位，并把国家对工业的干预减少到最低限度：“只有当私人企业的主动精神欠缺或不够时，或是国家政治利益受到影响时，才会发生国家对经济生产的干预。”在生产领域里，私人企业的主动精神是“符合国家利益的”，而私人生产组织“起着国营企业的作用”；经济企业的管理权属于“代表企业向政府负责的雇主”。^①雇主摆脱了工会、工厂委员会和工会的工厂代表的干涉，成了本厂的主人。而工人最宝贵的武器——集体行动和罢工则被宣布为非法。总体国家，在建立时曾被人欢呼为一项社会成就，现在却严酷地剥夺了工人的权利，而着重于保护雇主的权利。

法西斯最高委员会成为国家最强有力的机构。1926年后，它不再由党的代表大会选出，而由上面指定人选。它选定的党的书记也是最高委员会的书记，并有权指派省的书记，后者又指派党的较低级的官员。根据1928年12月通过的一项法律，最高委员会成了宪法的一部分，它是“协调和统一由1922年10月的革命所产生的政权一切活动的最高机关”。它的主席就是政府首脑，只有政府首脑才有权召集最高委员会并决定会议讨论事项。最高委员会约有二十至二十八名成员，有党的最高官员，即党的书记和副书77记、较重要的大臣和前任大臣、民兵司令、参议院议长和特别法庭庭长等等。就这样最高度地象征“党和国家的一体化”。它甚至有权决定议会的构成。最高委员会从一些指定的机构准备的名单中挑选出四百名候选人，然后把候选人的名字开列成唯一的名单提交选举人认可。它也可以草拟出一个从中选择墨索里尼的继承人的名单。最后，党的书记得到部长级待遇并有权参加政府的会议。

所有这些规定清楚地表明，法西斯党是凌驾于国家之上的；那

^① 转引自 Finer, 前引书, 第503—504页。

条规定一切属于“宪法”性质的问题都必须商诸最高委员会的条款也同样表达了这个意思。最为奇妙的是，到头来，在1943年7月，也正是最高委员会转过来反对它的首脑，以十九票对七票^①的多数通过一项动议，实际上剥夺了他的权力并表示对他的政策缺乏信任。在一个彻底的独裁主义的国家，它还保留有可能进行某些讨论和提出意见的机会，这种可能性在希特勒德国是根本不存在的。1929年在新制度下举行的根据单一名单进行投票的选举中，根据官方数字，八百万票是赞成票，只有十三万六千票是反对票。即使这些数字并非确实的数字，但也很肯定地说明，那时大多数意大利人是赞成新政权的，而反对党则被遏制发表自己的主张。党和国家越来越纠缠在一起，党的标志棒束变成了国徽，党歌变成国歌，法西斯民兵变成国家武装力量。

然而，在意大利还有一股强有力的力量是不受法西斯党及其机构的控制的，这就是教会。的确，自1870年意大利军队占据罗马并把它作为新王国的首都以来，教皇一直拒绝承认其存在，并把他自己视为被囚于梵蒂冈的囚犯，从未离开那里。由于教皇辖地的存在，整个民族运动，整个统一意大利的运动曾是具有反教会的深刻性质的，反对教皇所不愿放弃的世俗权力。1919年头一个法西斯纲领要求把全部教会财产改作俗用，而墨索里尼在其早期也曾发表过激烈反对教会权力的声明。但是在他担任首相后，这种态度改变了；最后，在前几届意大利政府失败的问题上他却取得了成功。1929年2月，罗马教廷与意大利王国签订了拉特兰条约，根据这一条约，双方同意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在罗马之内建立一个小的教皇辖地，王国对它没有管辖权。教皇在这个辖地内有权维持自己的军队、警察、法庭和监狱。教会所丧失的领地得

^① 按夏伊勒著《第三帝国的兴亡》称，以十九票对八票的多数。见该书第997页。——译者

到补偿；教会办的公司免税，教会的学校受到优待；宗教课扩展到中学，因而教会对教育的影响加强了。国家与教会的和解使墨索里尼赢得了天主教徒的心和教会的支持，这是他的最大成就之一。再也没有和他自己的权力敌对的权力了。他一身兼任全国两个最重要的职务：首相和法西斯党的领袖，更不必说他还担任几个部的大臣职务和法西斯民兵总司令了。这时他在名望和权力方面已达到顶峰。

他的成功是由于几个因素促成的：战后危机和经济困难，对红色革命的普遍恐惧心理，因战争及其令人失望的结果而在意大利引起泛滥全国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绪，议会政府的软弱无能，政府、军队、警察和行政当局所给予的帮助，等等。然而我们回顾起来，墨索里尼尽管举动笨拙和犹豫不决，却这么容易地夺取了政权，这似乎使人感到很惊讶。这不是因为他被一个势不可挡的运动，被那任何防波堤也挡不住的浪潮推向权力位置，而是由于他的敌人被吓晕了，不能看清这个危险威胁要吞没他们，而且不仅是他们，还要吞没全国。1922年4月，墨索里尼曾写道：“已在我们党的权力中萌芽的新国家，必将逐步地或靠暴力取代自由国家。”^①五年以后，它就取代了自由国家，这是逐步实现的，但也在相当规模上使用暴力来加速这一改变。法西斯主义运动最初是力量很微弱的，只存在于某些地区，但很快就产生出一股它的敌人难以抗衡的势头，这是其他政党不能够或不愿意施展的残酷无情手段。尽管战后的客观条件有利于它的迅速发展，如果没有这股势头和这 79 种残酷无情的手段，它本来是不能取得成功的。

^① 载于《意大利人民报》，1922年4月30日，即进军罗马的六个月以前。

国际上的反响

意大利法西斯党的罗马进军和轻易取得胜利在几个欧洲国家中立即引起反响，特别是在那些靠近意大利的国家，它们在战后时期所经历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动乱和意大利发生的情况很相似。法国、德国和奥地利尤其是这样，在这三个国家中，早在1914年以前，激烈的民族主义运动和反犹运动就已发展起来了。

在法国，法兰西行动党甚至在意大利法西斯党向罗马进军以前就公开表明赞美法西斯主义了。1921年3月，著名的历史学家雅克·班维尔欢呼关于法西斯分子暴行的头一批报道，认为这是意大利恢复力量的可喜预兆。1922年8月，作家莱昂·都德宣称，法西斯主义是对共产主义的非人道行为、愚蠢和邪恶的一种民族反应：如今具有真正的意大利精神的人正在击退那些宣传征用土地和国际主义的人。在进军罗马后，都德大声疾呼说，法兰西行动党不久将通过暴力夺取权力，到那时，法西斯党进行的清洗同法国进行的将相形见绌。当时他博得一批大学生听众的热烈鼓掌。人们希望都德将很快超过墨索里尼的榜样的气氛越来越高涨。

头一本用法文写的论述《法西斯主义》的书是由法兰西行动党出版社出版的。1923年6月，它的报纸以明显的赞许态度援引了一位反对派的话，说法兰西行动党实际上是法国牌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运动。法国总理彭加勒执行使法军开进鲁尔的政策，有三位左翼政治家要到一个群众集会上讲演，号召反对彭加勒的这种对德国的政策，出售保王党报纸的报贩组织又一次仿效法西斯分子的榜样，在路上殴打这三个人，并把沥青泼在他们身上。1924年，法兰西行动党的另一个领袖乔治·瓦卢瓦，由于着迷于墨索里尼的运动及其积极采取行动的主义，企图在法国步他的后尘，建立

一个同样有力的退伍军人运动。起初，这个组织同法兰西行动党关系友好，甚至当他创办自己的报纸时，还得到香料厂商弗朗索瓦·科蒂的资助。1925年10月，他建立了一个公开的法西斯政党，就叫“法西斯”，连名字也是照抄意大利的。这两个集团不久开始发生纠纷，因而莫拉斯宣布不允许党员同时参加另一个党。 80

在德国，立场靠近法西斯党的运动是慕尼黑的希特勒民族社会主义党，它从进军罗马事件中也受到类似的激励。不仅是民族社会主义党人，而且巴伐利亚所有的极右翼力量在1923年都忙于策划“向柏林进军”，准备要推翻可恨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府并把民族主义运动引向胜利。因为意大利法西斯党人是向南进军，所以他们要向北进军，并沿途推翻统治萨克森和图林根这两个德国中部重要州的红色政权。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伟大军事将领鲁登道夫将军将领导这次进军；复员军人和民族主义分子从全德意志麇集慕尼黑，准备参加这次行动。

进军罗马事件刚过了几天，希特勒的一个亲密伙伴赫尔曼·埃塞尔在慕尼黑一群人的喧闹喝采声中宣称：“少数勇敢分子在意大利所做的事并非不可能。在巴伐利亚，我们也有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原文如此〕。他就是阿道夫·希特勒……。”^①根据1922年12月的一份警察报告说，慕尼黑的民族社会主义党人从墨索里尼的成功中得到“一种特殊的重力”。据地方报纸报道，民族社会主义党的宣传建议采取类似墨索里尼在意大利所采取的行动。他们企图在1923年11月采取行动，但后来失败了。^②

十年以后，出任宣传部长的约瑟夫·戈培尔仍然这么写道：“进军罗马事件是个信号，是冲击自由民主制度的风暴的征兆。这

^① *Völkischer Beobachter*, 8 November 1922, 转引自 W.W. Pese, 'Hitler und Italien 1920—1926'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iii, 1955, p.120.

^② 详见本书下文，第118页以下。——译者

是第一次企图摧毁具有自由民主精神的世界……”，“那个世界，始于 1789 年，以革命风暴冲击巴士底狱，并在暴力的革命动乱中征服一个又一个国家，要使各国都受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无政府状态和阶级斗争的影响……。”他并且向墨索里尼写下如下颂词：“墨索里尼是一位普鲁士式的罗马人，一位具有普鲁士纪律、普鲁士人对工作的热爱精神和普鲁士英雄主义的罗马人，这样一种非凡类型的人只能产自罗马土壤……。”^①

- 81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也表达了他“对阿尔卑斯山以南的这位伟人的深切敬仰之意，这位伟人……并没有和意大利国内的敌人订立条约，而是千方百计地通过种种途径置他们于死地……。”^② 然而，墨索里尼对于这种令人作呕的赞颂置之不理。甚至在 1923 年希特勒的慕尼黑暴动失败之前，墨索里尼在同意大利驻慕尼黑总领事杜里尼·第·蒙札伯爵的一次谈话中，把民族社会主义党人说成是些“小丑”。他对仿效者毫不动心。然而，这些小丑不仅将在德国夺取权力，并且对德国国外的法西斯运动产生的影响将远比墨索里尼的影响深远得多。在三十年代，是希特勒及其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受到全欧洲各个法西斯党的崇拜和仿效，而不是墨索里尼的意大利。

① Joseph Goebbels, *Der Faschismus*, Berlin, 1934, pp. 8, 10, 18.

② Adolf Hitler, *Mein Kampf*, 97th ed., Munich, 1934 p. 774.

三、民族社会主义：形成的年代

82

第一个民族社会主义党

德国工人党创建于1904年，它的主要力量是在波希米亚北部，德国工人的地位在那里受到最直接的威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很多党员和领导人应征入伍，它的活动也减少了。不过工人党开始讨论改变党的名称问题，以便强调它的社会主义性质。在1918年4月于奥西格(乌斯蒂)召开的党的会议上，有人提议把党的名称改为“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党”或“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可是大多数代表投票赞成保留原名称。然而在下一个月间，党的领导人推翻了这一决议，并选用了新的名称，他们希望新的名称会吸引更多人人党。1918年8月，在维也纳举行的党的会议上，这一变更得到代表们的赞成，同时还通过了一个新的纲领：

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宗旨是提高德国劳动人民的地位，使他们摆脱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所受的压迫，并为他们在人民的和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争取完全平等的权利……。因此，它反对由几个国家组成的基础上非自然的联合。反之，经济和社会条件的改善只有靠团结在个别民族基础上从事工作的人才能做到……。

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不是一个狭隘的阶级政党，它是要保卫一切正直地从事生产的劳动者的利益的。党是自由意志论者，并且完全是人民的，它反对一切反动倾向，反对教会、贵族和资本家的特权，反对一切外国势力，尤其是在公共生活各领域反对犹太人做买卖精神的压倒一切的力量……。”^①

^① 转引自 Rudolf Jung, *Der Nationale Socialismus*, 2nd ed., Munich,

这个纲领同党的 1904 年的纲领比较起来，具有更明确的社会主义性质。一切有损公共福利的资本主义大企业将由国家、省或基层行政区接管；这一政策尤其适用于运输业、矿业、水力发电、保险和广告业；公用事业中的雇员将分享利润；必须消除犹太人银行对经济生活的箝制作用并建立人民的国家银行。这个党的领袖之一鲁道夫·容在同年写的一本论《民族社会主义》的书中，又重复了这些要求；他是一个铁路员工，确信捷克人的移人只不过是会把德意志人从他们的故乡波希米亚逐出的大阴谋的一部分。他的书中包含有很多口号，例如“公共福利在先，个人利益在后”，两年以后，这些口号被吸收进慕尼黑民族社会主义党的纲领中。该书也把“起瓦解作用的金融资本”与“生产性的民族资本”区别开来。收入应该公平分配；垄断公司、百货商店和大庄园必须国有化，但靠“诚实的生产性工作”得来的财富则不收归国有。德国工人经受的困难应归咎于捷克人、犹太人以及其他外国人。1918 年 5 月的纲领因此规定，欧洲德意志人定居的整个地区都应并入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德意志帝国”。

所有这些思想再现在 1920 年的慕尼黑纲领中，特别是把过激的社会要求与极端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要求相混合，极易引起争论。这些思想是哈布斯堡君主政体时代各民族激烈冲突的产物，并在 1918 年君主政体国家崩溃以前就提出来了。然而在这当中，有一个重要不同点：波希米亚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工会和从工会中发

84 展起来的民族社会主义党的组织是民主的；他们选举领导人和参加党的会议的代表，投票通过决议。甚至党纲中提出的大德意志帝国也设想是“民主的”。这个党不承认“领袖”，也不是独裁主义

1922, p.65, Andrew G. Whiteside, 'Nationaler Sozialismus in Österreich vor 1918',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ix, 1961, p. 349; and Alois Ciller, *Vorläufer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Vienna, 1932, pp. 140—1.

的。

哈布斯堡帝国的崩溃似乎说明在德国以外的一些德意志民族团体的顾虑是有理由的。奥地利和波希米亚的德意志人被禁止加入新成立的德意志共和国。在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波兰以及其他地方的德意志人少数民族的地位由于这些新成立的斯拉夫人国家的咄咄逼人的民族政策而岌岌可危。他们在哈布斯堡帝国时期所享受的特权和受保护的地位一夜之间便消失殆尽。这时他们成为比主要民族的权利更少的少数民族。对于这种威胁，他们大多数人的反应不是寻求一种同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斯拉夫人妥协的方案，而是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而斯拉夫人也以牙还牙。

就民族社会主义党的党员来说，1918年以后，他们发现自己分布在几个国家中了。他们在奥地利的党魁是瓦尔特·里尔博士；但这个党开始时规模非常小，根本没有参加任何选举。在捷克斯洛伐克，汉斯·克尼尔施和鲁道夫·容出任党的领袖。在老据点苏台德地区，这个党1925年获十六万八千张选票，在1929年获二十万四千张选票，比战前增加了很多。这时已属于波兰的上西里西亚还有一个小的分支，总部设在别尔斯克。1920年，在慕尼黑成立不久的民族社会主义党和奥地利、捷克、波兰等的党结成联盟。奥地利和波希米亚的党的发言人经常支持德国的党的事业，而希特勒也在他的故乡奥地利的民族社会主义党的一些集会上发表讲话。然而奥地利和波希米亚的党并不是附属于慕尼黑的党的，而且他们也不承认希特勒的领导地位，只不过希望所有这些党结成联盟。更其重要的是，奥地利有很多民族主义的运动俱乐部和其他俱乐部，赞同民族主义和泛德意志观念的半军事性秘密组织，坚持他们陈旧的种族反犹太主义的学生团体，以及许多类似的右翼组织。在波希米亚也是一样，这些思想在德意志人的体育运动

俱乐部中很流行，俱乐部一直同德国的相应团体保持着密切联系。尤其重要的是许多青年人深受这种恶毒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迷惑，而且许多人都出身于具有这种世代相传的思想的家庭。^①

世界大战后的德国

1918年11月，德意志帝国崩溃了，威廉二世退位并逃亡荷兰，从基尔和威廉港的水兵兵变开始，德国全境都爆发了革命动乱。在城镇和军队里成立了工人和士兵委员会，他们的纲领显然是受到1917年成立的俄罗斯苏维埃的榜样的启发。红旗升起了，代替原来的帝国黑、白、红三色旗。原有的政府辞职，工人和士兵委员会掌权。德国似乎即将仿效俄国的榜样。1918年底，一些小的革命组织联合起来组成德国共产党，然而这个新成立的政党比俄国的党软弱得多，而且由于内部意见分歧而发生分裂。首先，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之所以能取得政权是因为临时政府继续同德国打仗，从而使布尔什维克能以和平保卫者的姿态出现；还因为农民要求分得大庄园主的土地，临时政府对这一要求迟迟未予满足。这两种情况在德国都不存在。当新政府成立时，战争已结束，而且在农民中也没有发生革命运动，甚至对农民有影响的委员会运动也只在某些地区才存在，如巴伐利亚，而德国南部的大庄园也不多。要是没有大庄园，这个运动就不会蔓延到乡村中去。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在1918年12月举行的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以压倒多数的票决定，要在1919年1月举行国民议会选举；这是将要决定德国政治前途的选举。然而，不会出现苏维埃德国了，因为举行选

^① 可参阅载于 Hauptarchiv der NSDAP, NS. 26, no. 530, Bundesarchiv Koblenz 中的瓦尔特·克林哥尔的回忆，他在少年时于克雷姆斯参加了德意志民族体操俱乐部，后来参加了奥地利纳粹党。

举时，两个社会主义政党共获得百分之四十五的选票；大多数的票投给了资产阶级政党，共产党也没有提出任何候选人。

然而，仍然存在共产主义的危险，虽然当时也可能过于夸大。⁸⁶ 当时在德国存在俄国的宣传和俄国代理人在积极进行活动的威胁。有一些工人与士兵委员会拒绝放弃他们已在行使的权力。发生了一些激进的左派动乱，例如1919年1月柏林的“斯巴达克派起义”。有一些红色卫队和部队拒绝解散并撤出他们已占领的大厦。在巴伐利亚左派总理于1919年2月被暗杀后，慕尼黑宣布成立一个真正的苏维埃共和国。整个德国都发生大规模的罢工，正危及主要的生产。

另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危险威胁着德国东部地区。同新成立的波兰共和国边界尚未划定，有不少地方德国人与波兰人杂居。德国与波兰的志愿部队不久就在当地交火，企图占领有争议的地区。由温和的社会民主党人组成的德国的新政府很软弱，感到它的整个地位受到接连不断的骚动和叛乱的威胁。为提防这些叛乱，政府号召成立志愿部队，即所谓自由军团来保卫政府，对付左翼叛乱和保卫东部边界，抵抗波兰人。志愿部队也开进俄国以前的波罗的海省份，白军和红军在那里打内战，而那里的波罗的海德意志志愿人员积极参加白军一边作战。不久，德国部队不仅在和红军作战，而且也在和新成立的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政府作战，因为他们拒绝对其提出的范围广泛的要求作出让步。

大多数自由军团的政治情绪都是极端一边倒的。这些部队的成员包括不可能恢复平民生活的帝国军队内的职业军官和军士、冒险家、大学生和渴望表明他们具有英勇作战气质的青少年。军官们的世界已被革命所摧毁，他们把这种革命说成是左派的阴谋诡计。他们的肩章和肩带被革命暴民扯掉；军旗遭到侮辱。新共和国的秩序对他们没有吸引力，而议会政体对他们来说也没有什

么意义。他们对新领导人及其动机深为不满，把他们叫作“11月党人”、革命的“暴发户”。尽管是这些新领导人命令成立自由军团的，尽管连兴登堡元帅也认为，新总理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是一个“热爱祖国甚于一切的忠诚的德国人”，但这一切都没有打动自由军团的军官和士兵的心。即使在官方正式废除了黑、白、红三色旗，并代以黑、红、黄三色旗后，他们仍然忠于黑、白、红三色旗。他们个人不是对任何政府或宪法效忠，而是效忠于有关的自由军团长的。许多部队都是以军团的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如奥洛克、埃尔哈特、勒文费尔德、吕措、罗斯巴赫等。士兵们被战争搞得无家可归，感到周围都是他们无法理解的敌对世界，他们被孤立、被出卖了。他们渴望采取行动，采取不惜任何代价的行动，来反对布尔什维克党人、波兰人、赤色分子、战争暴发户、犹太人或那个使自由军团建立起来的政府。埃尔哈特旅的军歌自豪地宣称：

我们自豪地佩带着星章，
还有骷髅标志，
袖子绣上海盗船，
扣子饰以皇冠，
钢盔标着卐字，
还有黑、白、红三色绶带，
埃尔哈特旅，
这就是我们的名称。

自由军团经常随意处置人。他们在开进柏林镇压斯巴达克派起义时，借机杀害了共产党领袖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当慕尼黑的苏维埃共和国短暂统治时期，许多人质也被自由军团杀死；当他们攻克慕尼黑并镇压“苏维埃共和国”之后，又枪决了很多人，其中有“红军”的指挥官和无政府主义作家古斯塔夫·兰道尔；还杀害了被误认为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个天主教团体的二十

一名会员。还有许多人遭到殴打或处决；许多人在“企图逃跑时被枪杀了”——这句话成为政治谋杀的同义语。许多士兵夸耀他们为祖国完成的功绩。当政府下令解散自由军团时，有些军队就报以公然的叛变。1920年3月，钢盔上绘有骷髅标志的埃尔哈特旅开进柏林并宣布推翻政府；一个由沃尔夫冈·卡普博士领导的新政府宣布成立（“卡普暴动”的名称由此而来）；但是，几天之后由于工会宣布举行反对卡普“政府”的总罢工，使它陷于瘫痪，因而不得不辞职。

然而自由军团的军官和士兵对政治并不真正感到兴趣；他们只是一种分裂性和破坏性的因素，没有什么纲领。就是在卡普暴动时期，埃尔哈特旅及其士兵对于政治权利的要求也没有显示什么兴趣。据一位以前属于吕措自由军团的成员说，也有人曾经试图从政治上对他们进行训导，例如，通过反犹太主义的讲课，大意讲德国工人是受到犹太领袖别有用心地欺骗。或者，如另一自由军团的士兵骄傲地谈到：“当我在1919年底离开我的部队时，兵营里谁也没有不正视犹太人的问题。”当这个人调到波罗的海沿岸的瓦尔内明德——当时犹太人常去的休养胜地——时，他继续进行反犹的宣讲，结果是“队伍中卐字标志很快就处处可见了；每天都有他们的伙伴同犹太人发生冲突打斗的事。”^①自由军团的政治性暴行累累，虽然不完全是针对犹太人的。在自由军团被解散后，埃尔哈特旅变成地下组织，继续存在下去，这个地下组织的名称是“执政官组织”（“执政官”是埃尔哈特在警察设法要逮捕他时采用的名称）。“执政官组织”在慕尼黑及其他大学的大学生中拥有广大的追随者，很快又干出很多暴行。1921年8月，它的人员暗杀了前部长埃茨贝格尔，此人是天主教徒，1922年6月又暗杀了德国外

^① 奥托·施罗德的自传关于1937年2月15日就是这样记述的，载 Hauptarchiv der NSDAP, NS. 26 no. 528, Bundesarchiv Koblenz。

交部长拉特瑙，他是犹太人；他们还企图暗杀社会党领袖谢德曼未遂。被选去执行暗杀任务的“执政官组织”人员必须发誓要执行上级军官交待的任何命令而不得提任何问题；任何背叛者必定丧命；命令看到后立即烧毁。他们暗杀的目标是“犹太人、共济会会员、耶稣会士”。^①

- 8) 在 1919—1920 年的德国，比起 1914 年以前稳定而安全的德国来，反犹口号更容易得到响应。1914 年以前，只有某些社会集团感到受犹太企业主或放债者的威胁或剥削。而在革命后，中产阶级社会的基础本身就受到威胁了。战败使成千上万的人丧失生计；很多难民从割让出去的领土涌入德国，其中有不少是犹太人；凡尔赛条约又使德国受到沉重打击。尤其是，马克通货膨胀使中产阶级破产，并使他们最后的安全稳定感毁灭了。因为通货膨胀夺走了他们的积蓄、年金，并在很多情况下也剥夺了他们的财产。把德国的一切灾难都归罪于犹太人，还有比这更易办到的事吗？当人民大众受苦受难时，他们中有些人难道不是发了财吗？难道外来人最终不会以几个英镑或美元就买下整整一条街道吗？决不是所有的外来人都都是犹太人，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早在 1919 年 1 月的竞选运动中，民族党的传单就把犹太人称为“德国的吸血鬼”，在宣传的标语上宣扬“德意志精神——反犹太人，反对宗教，但要种族！”

新刮起来的这股风很快引起一些保守派领袖的注意，这些人本来是不赞成进行过分的反犹宣传的。他们当中有一位叫韦斯塔普伯爵的在过了十年以后谈到：“只要我一谈到犹太人的问题，情

^① 刺杀埃茨贝格尔的囚犯之一海恩里希·蒂勒森在 1921 年 3 月 12 日给他的哥哥维尔纳，一个现役的海军军官的信中就是这样写的。载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x, 1962, no. 6, p. 447, 又说：“今天我们只能够赞成或反对犹太人。”Ernst von Salomon's 自传性著作 *Die Geächteten* (Berlin, 1930) 对埃尔哈特旅及其思想意识有最好的描述。

绪消沉的集会马上就振奋起来，听众热烈鼓掌。我个人常常认为更重要和更合时的讨论题目本应是德国的独立自由或是同共和制度作斗争的问题。但是要使大会取得成功，犹太人问题是不能略去不谈的。我们又必须浪费很多宝贵的讲话时间来杂乱无章地谈一谈这个问题。”^① 早在1919年9月，德国民族党在西里西亚的布雷斯劳举行的会议上就表示它反对“任何非德意志的势力，特别是分裂德国的犹太人势力……。党反对外来分子占居国家领导地位并正在把国家引向灭亡的情况……。”在六个月以后的卡普暴动期间，布雷斯劳的自由军团接连不断干出很多恐怖的反犹过火行动。弗赖伊塔格-洛林霍芬教授在1920年7月也从这里给韦斯塔普伯爵写信说，反犹太人的口号有强烈的号召力，甚至渗透到工人阶级中，种族主义观念有很大的政治潜力，是他们的党可以利用的武器。在慕尼黑，短命的苏维埃共和国的许多领袖都是犹太人这一事实激起了群众空前未有的反犹情绪。匈牙利的情况也完全一样，在那里，苏维埃共和国在1919年夏天很快就垮台了。

然而，如果以为在那些年代，右派宣传中只有反犹主义是盛行的，那也是不正确的。在战败和动乱频繁的德国，还有许多其他的现成宣传武器。凡尔赛条约以及国民议会接受这一条约的耻辱、德国以前的敌国提出的新要求、软弱而又不断变动的政府，很不受爱戴的新成立的共和国、议会代表的愚蠢无能和缺乏经验、德国权力和威望的衰落，尤其是日益恶化的经济状况，都提供了许多可以用来鞭打“这个体制”的有用的鞭子，而这些鞭子也一直被利用着。所有这一切并没有产生一个法西斯运动，然而造成了法西斯运动

^① 摘自韦斯塔普伯爵关于“共和国统治下的保守政策”手稿，转引自 Lewis Hertzman, *DNVP - Right-Wing Opposition in the Weimar Republic, 1918—1924* (Lincoln, Nebraska, 1963), 129页。1919年1月选举传单，同前引，第126页。

得以发展起来的气氛。始终存在的共产主义威胁也属于这类因素。德国共产党虽然起初力量很弱小并在1919年遭到失败,但仍在稳步发展,而且工人阶级变得更激进了。“卡普”暴动过后一年,在1921年3月,共产党企图在德国中部搞一次他们自己的暴动。这一冒险行动以彻底失败告终,不过共产党的力量在以后几年里又得到进一步的增强,这种情况越来越引起中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下层的担心和害怕。

这种局势在很多方面和意大利在同一时期存在的局势十分相似。这两个国家都存在军人的问题,他们从前线返回后,发现遭到社会的冷落和背弃。在战壕里他们曾把自己想象成战后世界的英雄;有很多人无法适应一个简直有天渊之别的现实世界,并深深讨厌周围所看到的一切。他们渴望采取行动和报复。这些人属于反革命的军人,然而也代表社会上一种更为极端的分子。他们盼望着某种新的事物,然而又缺乏明确的目的概念,他们在前进,但朝什么方向前进呢?

慕尼黑的德国工人党

在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间,慕尼黑成立了一个由工厂工人组成的政治团体,其中大多数人都是在一些铁路修理厂工作的。这个团体旨在使工人明白德国的敌国的战争目的,从而抵制社会主义者的和平宣传,并和战争暴发户作斗争。这个小团体的领导人是安东·德雷克斯勒,是一个受雇于铁路修理厂的锁匠,这时三十四岁。德国溃败后,新闻记者卡尔·哈雷尔于1918年12月向这个团体作了一次讲演,题目是“犹太人是德国最大的敌人!”当时新上任的巴伐利亚总理库特·艾斯纳,以及中央政府的几个官员都是犹太人,在这个时候谈这个题目是意味深长的。在这几个月中,德

雷克斯勒在他工作的场所利用工人来领取或调换工具的每一个机会，同他们开始进行政治性讨论，告诉他们，实际上应对军事溃败和革命爆发负责的是犹太人和共济会会员。凡是对他的谈话有响应的人，他就邀请他们到他的寓所去，这个团体每星期在他家聚会一次。那时人数还很少。

12月底，德雷克斯勒向他的朋友们建议应成立一个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大家都同意了，不过哈雷尔反对“社会主义”的字眼。1919年1月5日，慕尼黑铁路修理厂的二十个左右的工人，还有少数其他人在一个酒吧间集会，并成立了德国工人党，由德雷克斯勒担任主席。他一直任慕尼黑组织的主席，哈雷尔则成为不久以后成立的全国性组织的主席，而由德雷克斯勒任他的副手。党员们的注意力仍集中在战败的问题上。1月里举行的几次集会专门讨论的题目是：“为什么我国必须赢得战争？”“我国本来能否赢得战争？”“为什么打了败仗？”讲演者通常是哈雷尔，他是出席集会的唯一的知识分子。他强调说，如果人民团结一致去争取胜利，德国本来根本不会打败仗的，因为它被战败并没有军事上的原因；只有犹太资本家蓄意要使德国战败，因为它的许多代理人都是一些政党的领导人，特别是社会党的领导人，他们曾竭尽全力地煽动革命，这是同托洛茨基的宣传所散布的毒素一样的。在1月30日的集会上最后通过了一项决议说：“犹太人及其帮凶应对战争的失败负责。”^①从这段时期以后，再也没有记载这个新成立的党还有什么活动。正相反，哈雷尔警告党员们不要对党外并不赞同他们的党的人泄露党的纲领。这个新的政党是一种处于半秘密状态的秘密小团体，就像同它有联系的“德意志骑士团”一样。

^① 一切细节都引自1919年1月22和30日的会议记录，载于 Hauptarchiv der NSDAP, NS.26, no. 76, Bundesarchiv Koblenz。同前引，no. 78，一位党的创建成员和书记米夏埃尔·洛特关于这段时期的报告。

1919年2月21日，巴伐利亚总理艾斯纳要去召开议会并打算在会上提出他的政府的辞呈，但在赴会路上被暗杀了。暗杀事件的结果是促成第二次革命的爆发，终于导致在4月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只维持了短短几个星期。4月底，来自德国各地的自由军团，在经过激烈战斗后胜利地占领了慕尼黑；在战斗中，许多战俘和公民被开枪打死。正是这些事件给予小小的德国工人党以及几个类似的组织以新的动力。它们认为正象发生过工人占领工厂以后的意大利一样，刚刚消除的危险继续在引起有地位的人的恐惧情绪。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给人们留下深深的苦痛，造成创伤。显然这不是真正的巴伐利亚人的阴谋，而是外来分子，特别是犹太人的阴谋，他们曾向胜利的德国军队背后捅了一刀，必须从国家中把他们清除出去。这个党这时同具有“民族主义的观点的知识分子建立了联系，特别是同“德意志骑士团”的某些成员有联系，如一位作家迪特里希·埃卡特，还有一位工程师戈特弗里德·费德尔，他们曾鼓动反对犹太金融资本的罪恶，并写过一篇《关于打破权益集团的枷锁的宣言》。德雷克斯勒争取他们入了党并在党的集会上发表讲演；党的这些集会也第一次为这些人提供了一批听众。

最重要的是，这个党得到了有势力的恩斯特·罗姆上尉的大力支持，在占领慕尼黑之后，他被任命为城防司令官的参谋长。据他自己的陈述，他很快就参加党的每一次集会，而且总是带来一个朋友，通常是一个军官同事或士兵同来参加。^① 罗姆是个政治军官，在1923年以前的巴伐利亚起十分重要的作用，以后他就担任93 希特勒的冲锋队的参谋长。他很早就认识到在军队和平民中进行政治教育的重要性。然而他总是坚持把军人放在政治家之上；他

^① 见Ernst Röhm, *Die Geschichte eines Hochverrätters*, Munich, 1928, p. 108.

的注意力集中在巴伐利亚初萌芽的许多半军事性质的秘密组织上，并训练这些组织的成员，旨在有朝一日强制巴伐利亚向右转变。而军队方面的工作可以和政治活动结合起来，这就是罗姆为什么关心德雷克斯勒创立的小党的原因。

新的巴伐利亚国防军本身也表现出对政治的关心，新成立了一个宣传部负责对军官和其他士兵进行政治上的训导。1919年6月至7月，为特别挑选出的士兵开了一些课程，由慕尼黑的一些教授，还有戈特弗里德·费德尔讲课。这样受过训的士兵以后就去启发教育他们的战友并抵制他们中间出现的任何左的倾向。正是这个做法使军队“发现”了阿道夫·希特勒，他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在一个巴伐利亚步兵团服役，曾得过勋章并晋升下士，革命爆发时正住在医院中。作为从事开导返国战俘的小组成员，他的激烈的讲演使听众都入迷了，因此很快就引起上级的注意。他的小组的其他组员报告说，他是个“天生的讲演家，靠他的狂热劲和通俗的讲法……吸引了听众的注意力”，他的“生动活泼的讲演（引用很多现实生活中的实例）……鼓舞着所有的到会的人”，他“现出是一位第一流的生气蓬勃的讲演家”。^①希特勒的政治观点是强烈反犹的；他认为犹太人不是一个宗教集团，而是一个种族，一个千年来靠同种繁殖保存下来的种族，既不愿意也不能够放弃其种族特性；反犹太主义者必须为消灭一切犹太人特权而奋斗；应该把犹太人视同其他外国人一样，最终把他们驱逐出去。所有这一切“靠一个软弱无力的国民政府是根本办不到的，只有一个具有民族强大力量的政府才能做到”，靠“民族的道德和精神力量的复兴”才能做到。^②

^① 载于 Ernst Deuerlein, 'Hitlers Eintritt in die Politik und die Reichswehr' *Vierteljahrshäfte für Zeitgeschichte*, vii, 1959, no. 9, p. 200 (1919年8月23—24日的报告)。

^② 希特勒致格姆利希的信，1919年9月16日，同前引，no. 12, 第203—4页。

希特勒对返国战俘作了几次成功的讲话后，得到巴伐利亚国防军的继续雇用做与此相似的工作。根据国防军的命令，他参加了德国工人党的一些集会，不久就加入该党。他在党内也是以其讲演的天才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并且成为该党主要演说家之一。94 工人党开始吸引更多的听众。11月，希特勒在一家啤酒馆举行的集会上作关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的演说，座无虚席。“不幸”，只有二、三十个工人到会，但有“很多学生、军官、商人和士兵参加”。^①在12月间举行的另一次集会有来自各个社会团体的三百人参加，既有市民也有士兵。除希特勒讲话外，还有奥地利的民族社会主义党的一名党员和白领工作者工会“德国全国店员联盟”右翼的一名成员在会上讲话。希特勒骄傲地指出，这个党已从两个人开始发展到七个人，到九个人，并正在日益发展壮大。他的讲演又是强烈反犹的。有一位听众是一个年轻的大学生，父亲是莱比锡的弗里奇反犹团体的成员，他给父母写信说，在听了希特勒的讲话后，他已参加了德国工人党。在会上有人告诉他，希特勒是一个建筑工人，但他不信这话，因为“只有经过训练的人才能讲得”像他这么好。他想这个党就是这样旨在争取工人。“他们都是一些很好的人，他们的观点合乎道理。他们是强烈反对马克思主义的。……”^②

无疑，有很多大学生和年轻人参加了这个党；参加的还有许多不能够或不愿意恢复平民生活的士兵和军官，还有许多生存受到威胁或已遭破坏的人，诸如复员军人、小店主和工匠；但也有一些有专门职业的人和艺术家人党。一份德国工人党最初的党员名单保存下来，其中开列的一百九十三名党员中，大多数是有职业的。

^① 同前引，no. 14，第206页（1919年11月13日的集会）。

^② 海因茨·蔡恩克致其父母的信，未署日子，载于 Hauptarchiv der NSDAP, NS. 26, no. 107, Bundearchiv Koblenz.

计有十名大学生、二十二名士兵和军官、四名医生、五名工程师、四名新闻记者、三名作家、三名雕塑家、三名导演、四名工厂主、一名教授、一名教师、一名建筑师、一名作曲家、一名出版商。有十九名商人,但很难说这些人是商人还是小商贩、三名店主、十六名白领工作者(主要是银行和邮局雇员)。有五名党员填的职业是一门工艺的“师傅”;有四十六名党员填的职业是油漆工、锁匠、园丁、面包师、小木匠、机匠、铁匠、鞋匠,等等,不是手工业工人就是熟练工人,代表工人阶级成份;相当于上述开列有职业的人中的25%。^① 95

这倒象个大杂烩,但似乎也代表了当时的慕尼黑居民的一个横断面,看来比人们曾想像的较象样,小人物和低层阶级占居明显的优势。真正中产阶级出身的显然人数较少,然而从这一名单的含糊的一般的记述中也很难鉴别他们。

1919年,希特勒在党内所起作用还不大。在党员名单中他被简单填写为一个“漆工”。哈雷尔仍是党的首脑,也出席集会,而德雷克斯勒仍担任主席。然而,无可置疑,希特勒作为一个演说家是很有用的,因而他的野心也发展起来了。迪特里希·埃卡特和罗姆上尉这些社会地位远比他高得多的人,对他很感兴趣;他们把这位年轻得多的人——这时他三十岁——引入资产阶级社会,并为他安排接触重要的政治场合的机会,这是一名只有下士身份的人无法接触到的。1920年3月,他从军队退役并成为职业政客。他飞黄腾达的过程已经开始了。

希特勒与民族社会主义党

在希特勒参加德国工人党时,这个党有一个由党员选举产生

^① 这份党员名单未标明日期,然而很明显是属于这一时期的: Hauptarchiv der NSDAP, NS. 26, no. 111, Bundesarchiv Koblenz.

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就政治问题展开辩论并以多数票作出决议，象其他任何政党或团体的作法一样。1920年至1921年间，希特勒全面控制了这个党，并成为它的无可争议的领袖，而党的创办人则或是离开了党或是失势了。希特勒与维也纳的瓦尔特·里尔博士建立了密切联系，这时就仿照奥地利的样板，在党的名字上增添了“民族社会主义”几个字，从而变成为“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缩写为N. S. D. A. P.。按照一个奥地利人的意见，长期以来卐字在一些民族主义团体中被用作雅利安德意志精神的象征而闻名，因而采用作为党的标志和旗帜。1920年春，第一次挂出红地白圆心黑卐字旗，保留了旧帝国旗帜的黑、白、红三色，又把它改成近似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红旗，同时强调了与埃尔哈特旅以及其他以卐为标志的民族主义团体的联系。毫无疑问，新旗帜具有巨大的宣传效果。希特勒总是对宣传的细节、制服、集会的布置等等非常看重。二十多年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还认为这很重要，告诉他的伙伴们，在慕尼黑时他曾设计了具有最鲜红颜色的政治招贴，作为宣传用途的卡车都裹上红布、插上红旗，而且他还曾通知他的党徒们，参加党的集会不要结领带、戴硬领和穿好衣服，因为他要吓走资产阶级分子，并使参加运动的普通成员中“没有受惊的兔子”。^①

1920年2月24日，希特勒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宣布了党的纲领，即著名的“二十五点”。头几点属于极端民族主义的纲领，即在自决权的基础上，把所有德意志人联合成一个大德意志，要取得国土和殖民地，废除那曾剥夺了德国的殖民地及东西两边的领土，并禁止德奥合并的凡尔赛条约和圣日耳曼条约。接下去几点是针对犹太人的：只有德意志血统的人才能成为国家和民族的成员；只允

^① *Hitlers Tischgespräche im Führerhauptquartier 1941—1942* ed. Percy Ernst Schramm, Stuttgart, 1963, p. 261.

许这样的公民有权决定立法和国家领导人并获得官职；凡在1914年8月2日后移入的人都必须立即从德国驱逐出去。接下去是较具体的“社会主义”的几点：取消不劳而获的收入，打碎权益集团的枷锁（费德尔的要求），把一切已经合并的企业和托拉斯都国有化，把百货商店及其对小商贩的租借权收归地方自治团体所有，进行土地改革，无偿没收土地作公共福利用，禁止一切土地投机。为实施这些要求，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一个对整个德国具有绝对权威的中央国会。正象1919年第一个法西斯纲领和早些时候波希米亚民族社会主义党人容写的书—样，激进的社会要求在纲领中显得很突出。其中有一条使小店主和小商贩感到特别称心，那就是把百货商店收归地方自治团体所有；但另—些纲领，如“为公共用途”而没收土地和对某些类型的企业实行国有化，可就简直不能得到慕尼黑有地位的市民的拥护。和意大利法西斯党的纲领完全—样，其中也突出了在大工业企业中分享利润的要求。这个纲领不是反民主的，相反地还设想出—个提高了权威的德国中央国会。我们可以说纲领给每个人都许诺点什么。无需说，希特勒上台后，这些激进的社会要求并没有实施。

听希特勒讲演的听众越来越多。1920年4月他在霍夫布劳豪斯酒馆向—千二百名听众讲党的纲领：必须把犹太人作为外籍人对待；是犹太人“煽动所有的阶级和各种工人们相互斗争。……这些寄生虫现在把他们的烙印打在我们美丽的德国城镇上。善良的维也纳人的城市已变成什么样子啦？（可耻！）变成了第二个耶路撒冷！（热烈鼓掌）”引起更热烈鼓掌的是希特勒要求从涅曼河到布拉迪斯拉发，从科尼斯堡到斯特拉斯堡应建立—个统一的德意志帝国，而从埃茨贝格尔和谢德曼开始的“1918年11月的罪犯们”应交付审讯。^①两天后，希特勒惊呼说，整个德国都已受到犹太

^① Reginald H. Phelps, 'Hitler als Parteiredner im Jahre 1920', (转下页)

人的统治：他们坐在政府里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当他们口袋里装满钱时，他们就煽动工人们相互攻击，“当然是这样，因为犹太人口袋里有钱。”¹⁰月，在奥地利进行一次竞选活动的旅行后，希特勒写的报告谈到，“德意志—奥地利的事务已完全落入犹太人手中的不可思议的状况。犹太人把什么都出卖了，从博物馆的名画到整个国家和民族，诸如捷克斯洛伐克和卡林西亚的德意志人。”一些政党总是要维持住法律和秩序，但是“我们的党必须具有革命的特性。……我们德意志人要以革命的态度反对那压迫和剥削我们的外来种族，在把这帮人赶出我们的祖国以前，我们既不能安心，也不能住手。”¹¹月，他怒骂那些撕下战后归来的士兵的肩章和帽徽的人，那些曾撕毁了“象征我们民族的骄傲的黑、白、红三色旗”并换上了“犹太旗”的人，现在这同一批人又要剥夺德意志人最后剩下的最美好的东西：他们的荣誉。¹²

然而，他的激烈的反犹宣传似乎在慕尼黑受到大量的批评。因此工人党在1920年8月贴出一张由德雷克斯勒签名的传单，试图答复下述诸论点：“难道犹太人就没有好人，而基督教徒中就没有坏蛋了？”“你难道也没有看到基督教徒的放高利贷者、投机商、剥削者、大资本家及其报纸？”“难道犹太人要对他们不是德意志人而是个犹太人这一事实负责吗？”为答复这些麻烦的质问，德雷克斯勒宣称：“一切资本，不论是犹太人的还是德意志人的，如果不包含生产性劳动，只有唯利是图，不劳而获者，我们都反对。我们反对犹太人，不是因为他是唯一拥有资本的人，而是因为他有意地阻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xi, 1963, no. 4, p. 300 (1920年4月27日的演说)。

① 同前引, no. 16, p. 322 (1920年10月18日演说)；前一个演说是4月29日讲的,同前引, vii, 1959, no. 19, p. 211.

②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vii, 1959, no. 31, p. 226 (1920年11月24日的集会)。

绕反对资本的斗争，并且是最初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者。我们反对犹太人，倒不是说他是唯一的放高利贷者，而是因为他们人口中虽只占百分之一，但在放高利贷者中却占百分之九十；我们把犹太人视作外籍种族来反对，并不是因为他不是德意志人，而是因为他假装成德意志人。……我们反对犹太人的活动，因为这些活动就像侵入各民族的种族结核病，并确信只有把他清除出去才能恢复健康。”德雷克斯勒还宣称他了解德国共产党的经费是由犹太银行家提供的，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都只不过是金融资本的保镖，只有他自己的党是摆脱所有这些势力的。共产国际从来没有帮助过工人，实际存在的只是一个属于财富的和谋取利润的国际。^①

到了1920年底，这个党因发展迅速，需要创办一份自己的报纸了。于是一份慕尼黑种族主义的报纸《民族观察家》应运而生，此后一直是党的中央机关报。这份报纸最初每星期出版两次，1923年改成日报。迪特里希·埃卡特提供了一份必需的保证金六万马克，但是经费是从国防军的基金中拨出的，可能是由罗姆上尉安排的贷款。这份报纸很快就在全德国的极右团体中受到热烈的欢迎，人们如饥似渴般地阅读它。几个月后，计划刺杀埃茨贝格的两名前海军军官、埃尔哈特旅的成员，完全为该报所迷住了。其中99
其中之一断言这是一份“很出色”的报纸，而另一位则敦促他的哥哥订阅该报，因为这是唯一从犹太人问题的角度观察政治事件的德国报纸，并“开始干真正教我从心里高兴的工作。”^②另一个埃尔哈特旅的成员报道说，来自慕尼黑的两位退役的海军军官使法兰克福的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得到强有力的推进，他们组织集会并吸收

^① 1920年8月13日的传单，1920年2月6日和5月19日的讲话：Hauptarchiv der NSDAP, NS. 26, no. 82, Bundesarchiv Koblenz.

^② 1921年3月2日卡尔·蒂勒森致海因里希·蒂勒森的信，以及1921年3月12日海因里希致韦尔纳·蒂勒森的信：Vierteljahrshäfte für Zeitgeschichte, x, 1962, no. 4, p. 442, no. 6, p. 447.

了很多党员，不过不同领袖间的强烈竞争也产生了一些很坏的结果。^①

埃尔哈特旅还在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帮助了民族社会主义党，组织了一个行动效率高的半军事性质的队伍来保卫他们的集会，并冲散对手的集会。当这个党组织的集会不单是在酒店的里屋而是在大会场举行的时候，这些集会就存在被政敌破坏或遭诘难者捣乱的危险。希特勒从一开始就决定不使集会受到任何干扰破坏。他组织了管理集会的干事（主要是退役军人，有时甚至有现役军人）来用武力把诘难者撵出会场，这是其他政党也通用的办法。从这些简单的开端后来就发展成一支新的半军事性的队伍，在1921年11月在霍夫布劳豪斯酒馆中的战斗获得大胜以后，就改名为冲锋队。希特勒要求埃尔哈特上校派他旅中的军官到他这支队伍来暂时帮忙；有几个退役的海军军官成了冲锋队的组织者和训练者。不久，冲锋队就成为一支效率很高的武装力量，按连队组织起来，有自己的骑兵、炮兵和技术兵种分遣队，而它的武器都安全可靠地藏起来。

那时在巴伐利亚还有其他一些半军事性质的秘密团体，诸如奥伯伦德、帝国国旗或巴伐利亚与帝国等前自由军团。都是由一些以前的军官，有的还由国防军现役军官率领。现役军官还为这些私设军队的训练和装备提供经费，还经常提供武器。所有这些队伍都准备有朝一日应召去把祖国从法国或波兰这些外敌，或从马克思主义的政府及一些政党等内部敌人手中拯救出来。但是希特勒从一开始就认为，他的冲锋队不是一支军队，而是一个政治组织，它计划征服街道居民，并且是服从他的命令的；其他半军事性质的组织是没有一个和政党如此密切连结在一起的。到1922年底，

^① 奥托·施罗德的自传式记述：Hauptarchiv der NSDAP, NS. 26, no. 528. Bundesarchiv Koblenz.

慕尼黑的冲锋队大约有七百名队员，慕尼黑以外还有三四百人，主要是在兰茨胡特地区，由前陆军中尉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率领。这支队伍同其他军事性质的秘密组织相比，还不是一支很大的力量，然而在1923年却迅速发展起来。那时它来了一位新指挥员，即世界大战中的空军英雄、退伍的空军上校赫尔曼·戈林。1921年9月，希特勒和他的部下袭击了一个将由巴伐利亚联盟的一位讲演者出席讲话的集会讲坛，把集会冲击得乱成一团。政敌团体企图冲击希特勒的集会，但被冲锋队成功地挡住了。

竞争的组织和领袖

慕尼黑的德国工人党并不是1919年建立的唯一的右翼极端分子的组织。约在同时，迪塞尔多夫的工程师阿尔弗雷德·布龙纳在德国南方和北方几个城镇建立了“德国社会党”的组织。这两个党都赞成民族主义的思想意识；而且都发源于1914年建立的秘密的“德意志骑士团”。不过许多德国社会党人的观点更激进和更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他们的党员彼此以工人运动中的“同志”相称呼——而且他们对土地改革和其他经济问题具有较激进的思想。巴伐利亚、奥格斯堡、慕尼黑和纽伦堡的组织是这个党的一些最重要的组织。纽伦堡组织是在11月建立的，很快就拥有三百名党员；其中包括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他从战争中回来时是个中尉。成立大会是在“日耳曼大厅”饭店中举行的；大会主张“真正的社会主义只能在民族的基础上繁荣昌盛，一切不幸的原因在于我国错误的土地法律，自私的罗马法，错误的财政体制，以及给予与我们种族和人民相异的种族以政治上平等的权利。……”^① 慕尼

^① 笔记，1919年11月24日，载于 Nachlass Streicher, AL. 9. Bundesarchiv Koblenz

黑的组织不久就拥有约四百名党员。

101 1920年复活节，这个新成立的党在汉诺威举行第一次会议，大约有十二个地方组织的代表参加。但是柏林、比勒费尔德、迪塞尔多夫、杜伊斯堡，法兰克福、汉堡、汉诺威、来比锡、基尔等所有德国北部的城市的组织仍然很小，并且几乎没有开展任何公开宣传活动。慕尼黑组织的领导人 S. H. 泽塞尔曼报告说，已与德国工人党达成一项协议，并已在这个城市划分宣传区域。他强调说：“我们是完全的左派，而且我们提出的要求比布尔什维克提出的还要激进。……我们是属于民族的和人民的，虽是民族的但不赞成资本主义。……”^① 5月，就在国会选举前不久，施特赖歇尔在萨克森的蔡茨和莱比锡的竞选大会上发表演说，他强调“我们民族遭到与我们国家和种族不同的外籍人有计划、有目的的诱惑”和由此造成的“道德上和经济上可怕的灾难”；当时这两个城市就各有五十人加入该党。^② 在选举前两天，施特赖歇尔再次向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弟兄们”发出呼吁，可是在6月6日的选举中，他的党在纽伦堡只获得二千选票，该党把这次失败归因于缺乏经费。

在以后几个月中，全党关注着两个问题。一是施特赖歇尔在他的《德意志社会主义》周报上发表的强烈的反犹宣传。比勒费尔德的组织写信告诉他，党员们对于他唯独关注犹太人问题表示不满；为了争取群众，他们并不反对谈论这个问题，然而在德国南部，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显然很不相同；提出把犹太人予以保护性拘留的要求必须取消；他应多写些经济的问题，少写些犹太人问题。^③

^① ‘Bericht über den Parteitag der “Deutschsozialistischen Partei” Erste Tagung am 24, 25. und 26. Ostermond 1920 in Hannover’, Hauptarchiv der NSDAP, NS. 26, no. 109, *ibid.*

^② *Deutscher Sozialist*, no. 1, 4 June 1920: Nachlass Streicher, AL. 8, *ibid.*

^③ Deutschsozialistische Partei Bielefeld to Streicher, 10 July 1920: Nachlass Streicher, AL. 72, *ibid.*

连党的委员会的委员们也把党的停滞不前归罪于施特赖歇尔过分的反犹太主义并劝他要大大改变态度。另一个问题是和慕尼黑民族社会主义党的关系；该党在希特勒有力的领导下，已发展成一个强大的党，然而出了慕尼黑就没有什么影响。德国社会党在慕尼黑的领导人和该党的创办人之一泽塞尔曼试图同希特勒达成一项协议。希特勒拒绝放弃他的党的名称，并宣称德国社会党并没有在¹⁰²哪里的群众中进行什么宣传，而且没有什么成就。^①一份关于柏林的党的活动情况报告似乎证实了他持的否定观点：柏林的党组织第一次集会只有二十五人参加，第二次集会约有四十人参加；尽管这个党把力量集中放在工人当中，而不是在资产阶级圈子里做工作，但柏林工人仍不参加集会。^②

1920年8月，这两个竞争的党在萨尔茨堡讨论它们之间的分歧。奥地利民族社会主义党领袖里尔博士于1919年底曾建立一个“国际书记处”来解决各民族社会主义党之间的分歧。次年8月，德国、奥地利和波希米亚民族社会主义党在萨尔茨堡开第一次国际会议。会议一致通过，德国社会党除了他们力量特别强大的纽伦堡以外，应把它的力量集中在德国美因河以北地方做工作，而慕尼黑民社党则在美因河以南的地区发展。然而这一划分并不能结束两党之间的争论。早在1921年，一位“德意志骑士团”成员写信给基尔的德国社会党领导人说，慕尼黑的民族社会主义党这时已有二千五百个党员和约四万五千个追随者；一年之内他们就举行了四十五次群众大会；德国社会党有哪个地方组织能与他们的工作匹敌呢？写信者曾和不来梅、科隆和威廉港其他的“德意志骑士团”成员接触，他们一致认为希特勒的党是有前途的，并且有权要求其他的党并入他的党；还认为希特勒的党在某些方面比德国

^① 1920年7月13日，泽塞尔曼致施特赖歇尔信，同前引。

^② 阿尔诺·克瓦塔尔的报告，1920年9月29日，同前引。

社会党还要激进。^①

1921年3月在蔡茨举行的德国社会党第三次党代表会议上，对这些问题再次展开辩论。这次会议有更多的地区代表参加，慕尼黑的德雷克斯勒、奥地利的里尔博士，波希米亚民族社会主义党的鲁道夫·容也参加了。会议决定在“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党”的名义下把这些组织统一成一个党，由于希特勒拒绝放弃“工人党”的字眼，只许慕尼黑的组织保留这一名称。会议还规定，这个统一的党应从德国社会党中出一名主席，从慕尼黑民族社会主义党中出一名副主席，并对等地设立两个党的委员会，第一个设在柏林，第二个设在慕尼黑。德雷克斯勒以及其他人为了团结，对这一切决定都同意了。但是没有出席蔡茨会议的希特勒，却气得脸色发青，因为他认为德国社会党的领导人很无能，而且是资产阶级分子。在经过激烈的党内冲突后，他成功地使该党取消了这个协议。由于这个原因，慕尼黑民族社会主义党没有代表出席1921年8月在奥地利举行的第二次“国际会议”。希特勒显然决定领袖非他莫属。

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德雷克斯勒和他的朋友们可能是因为他们不喜欢希特勒的个人野心和他在慕尼黑党内越来越大的势力，乘1921年春他暂时不在慕尼黑的期间，与另一个民族主义团体建立了较密切的联系。这个团体是由一位教师奥托·迪克尔博士在奥格斯堡建立的，称为“西方联盟奥格斯堡社团”。在这个社团与民族社会主义党约在同时建立的地方组织之间似乎存在强烈的竞争。当希特勒于1921年5月向他的奥格斯堡组织讲话时，迪克尔博士在讨论时发言反对他，这是个不可饶恕的罪行。这个社团在以后几个月中发展起来，并在巴伐利亚的其他地方建立组织。组

^① 迪特里希给基尔德国社会党领导人的信，1921年2月8日，转引自 Georg Franz-Willing, *Die Hitlerbewegung*, Hamburg and Berlin, 1962, p. 103.

伦堡的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就是参加者之一。他因为德国社会党反对他只强调反犹太主义而离开了该党。迪克尔曾写过一本书叫《西方的复兴》，但这本书遭到希特勒激烈的批评，希特勒显然既不喜欢这个人，也不喜欢他的观点。然而，迪克尔出席奥格斯堡民族社会主义党的所有的集会，成了党员，甚至被邀请在党的集会上讲话。这事并不稀奇，二十年代初期在全德国兴起的许多民族主义团体，有很多成员同时属于其中几个团体。

当希特勒于1921年6月在柏林同其他民族主义团体领导人会晤时，德雷克斯勒及慕尼黑党的领导人们同奥格斯堡的迪克尔的社团举行协商，这显然并没有通知希特勒，因为他们是知道他不喜欢迪克尔的。他们的目的是在这两个一致的组织间作某些调整，要建立一个委员会，会址设在奥格斯堡。在希特勒眼中，这是另一个不可饶恕的罪行，因为这个委员会将不由他来控制，并且类似3月建议，要把一个民族社会主义党的全国委员会设在柏林。7月，希特勒回到慕尼黑，对此作出强烈反应，并退出该党。他采取这一步骤有一些理由，其中提到，党的领导人在蔡茨和奥格斯堡进行的协商，以及邀请迪克尔在党的集会上讲话，这些行动是违反本运动的原则的。他也提出愿意重新加入的条件：必须抛弃任何要合并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党的企图；不可能和这样一些组织合并，除非是这些组织附属于慕尼黑的党；党的中心所在地永远是在慕尼黑；必须立刻召开党员非常大会，会议议程就是要求现任委员会辞职，并选举希特勒作为党的第一主席；他将拥有指定一个三人的执行委员会的独裁权力，这个委员会将把渗透进党内的异己分子清洗出去。

这一次德雷克斯勒可是不愿毫无反抗地接受希特勒的最后通牒。在希特勒退党后，德雷克斯勒利用这个机会开除了希特勒的一些亲信，特别是赫尔曼·埃塞尔，他以前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

现在却是希特勒的热烈崇拜者。希特勒一派这时继续筹备将在7月29日召开的非常大会。德雷克斯勒在25日采取了一个异常的步骤，通知警察当局说，邀请参加29日大会的请帖不是党的领导人发出的，因为希特勒已退党，而且埃塞尔也已被开除。德雷克斯勒还告诉警察当局，党内存在两种思潮：他自己的思想是赞成合法的和通过议会的方法，而希特勒的思想是主张暴力和革命的途径。据一位警察关于大会的情况汇报，希特勒讲话的内容“除了〔煽动〕一有机会就对犹太人进行暴力斗争外，几乎没有什么其他东西了。据我个人的看法和感觉，希特勒连同上西里西亚出席大会的冒险家们^①，就对犹太人进行一场有组织的大屠杀来说，只会象我国1919年出现的红军领袖那样去剥夺、杀害和抢劫犹太人……”

105 三天以后，29日，党员非常大会召开了。约有一千二百名党员参加，由埃塞尔主持（尽管他已被开除），并由希特勒发表讲话。大会以他的彻底胜利结束，并接受他的条件。他被大会一致选为主席，而德雷克斯勒则被贬为名誉主席。同时通过的新党章建立了第一主席的实际独裁权力。希特勒的目标达到了。德雷克斯勒的势力被排除掉；今后这个党只有一个领袖。建立一个法西斯党的决定性步骤已经采取了。然而民族社会主义党就是在1922年也只是在慕尼黑（在那里有六千党员）以及巴伐利亚的其他少数几个城镇力量强大。在1922年1月31日举行的另一届的党员大会上，有巴伐利亚其他十个城镇的代表参加，但是北德意志只有三个城镇有代表出席，而且没有一个是十分重要的。

迪克尔方面并没有放弃可能同希特勒达成协议的希望。1921年9月他写信告诉施特赖歇尔说，他正在期待那些仍在为统一奔

^① 转引自 Franz-Willing 前引书第116页，同前引，第107—115页。书中有关于7月事态的详细论述。“上西里西亚的冒险家们”是指曾在西里西亚同波兰人打仗的自由军团人员。

走的来访者,不过他认为只有两种情况才可能,一是把迪特里希·埃卡特排除掉,因为他是散布不良影响的中心,并且是希特勒自大狂的支持者,一是希特勒承认这个判断,即他当鼓动员能行,当别的不行。……”按迪克尔的看法,希特勒的动机纯粹是伤害他人的个人虚荣心。甚至在谈判开始以前,他就以非常生硬的方式宣称,他倒想了解希特勒怎么去阻碍任何的统一。^①显然,希特勒在7月里战胜了他的慕尼黑对手后,比以前更不愿意接受任何妥协了。在他们会晤后,希特勒给迪克尔的答复是,因为迪克尔不愿改变主张,而他的观点同党的一些领袖和创建人的观点,按即希特勒的观点,隔着“可怕的深渊”,他被开除出民族社会主义党了。同时,对于埃塞尔以及希特勒其他两名亲信的开除由于事出“无因”,予以撤消。^②希特勒的战略在对付其他敌手如德国社会党方面同样很成功。德国社会党于1922年秋解散,它的党员接着就加入民族社会主义党。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及其纽伦堡小组也照此办理;他同迪克尔的交往只维持了约十二个月,由于他的激烈的反犹主义,106他很快就成为民族社会主义党最有说服力的演说家之一,后来成为希特勒在法兰科尼亚最强有力的党区负责人。

德国民族防卫联盟也是成立于1919年的另一个德国种族主义组织。它的领袖以前是个军官,名叫阿尔弗雷德·罗特,他年轻时曾遇见舍纳勒并成为他的一个追随者;他也参加弗里奇的帝国铁锤联盟,并和弗里奇密切合作。德国民族防卫联盟是早在1914年以前就成立的泛德意志联盟派生的组织,并从泛德意志联盟得到重要的支持。这个组织在成立的时候宣称反对一个异己的少数民族的统治,因为德意志人只能由德意志人来帮助。它很快就在

^① 奥托·迪克尔致施赖特歇尔信,1921年9月3日与5日: Nachlass Streicher, AL. 13, Bundesarchiv Koblenz.

^② Rundschreiben der NSDAP, no. 4, Munich, 10 September 1921; Hauptarchiv der NSDAP, NS. 26, no. 97, ibid.

德国许多城镇，特别是在北方建立了许多小组；而在南方则和民族社会主义党密切合作。早在1919年8月迪特里希·埃卡特就在它的一个集会上作报告，题目是《借贷资本的国际势力和反对它的斗争》。后来，希特勒在作为讲演家的名声迅速传开后，也常在它的一些集会上发表讲演。战后初期，这个联盟及其广大成员就是巴伐利亚以外的反犹宣传的主要煽动者，但它的纲领并不包含民族社会主义党和德国社会党的激进的社会要求。在东普鲁士，它被认为是争取德国复兴运动的先锋。1922年，当这个联盟被当局解散时，它劝告它的成员加入民族社会主义党。由于防卫联盟不是一个政党，并且不和希特勒争取领导权，因此没有发生抗争情况。

在防卫联盟解散以后，一个正式的民族主义政党，德国民族自由党成立了。创建人主要是退出德国民族党的极右翼政客，他们认为民族党在反犹太人的斗争中太软弱了。象阿尔布雷希特·冯·格雷费格和赖恩霍尔德·武尔这些人，希特勒早在1920年就曾和他们谈判过。另一些创建人是具有世界声誉的，如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铁锤联盟的特奥尔多·弗里奇和恩斯特·楚·雷文特洛伯爵；鲁登道夫的名字总和每一个右翼冒险运动连在一起，而且他也同样仇视犹太人和共济会会员，恩斯特·楚·雷文特洛伯爵是泛德意志联盟的一个老盟员和民族主义作家。在民族社会主义党没有势力的德国北方，民族自由党很快就有了许多拥护者；不过这个党和慕尼黑希特勒的党比较起来，资产阶级气味多些，无产阶级气息则更少。这个民族主义政党认为最重要的事是使德国从国内外敌人手中解放出来，是解除凡尔赛条约的束缚，是不让法国人占领莱茵兰并且在那里扶植分离主义运动。希特勒最注重的不是民族主义，而是反对犹太人及其朋友和保护者，也即反对马克思主义者和民主派的斗争。当时，这似乎只不过是很少有人注意到的重

点分歧,但到后来,这个分歧是十分重要的。

希特勒要的是权力,在他的党内的权力,最后是国家的权力,而这个民族主义政党则认为本党力量太弱,除非有象军队或巴伐利亚政府这样的强有力的同盟,否则对任何这类目标都不敢追求。他们的有地位的资产阶级领导人,虽然其中有一些人后来也参加了民族社会主义党,却对这位奥地利鼓动家持轻蔑的态度,认为他出身平民底层,讲着一口让普鲁士人听起来有点滑稽的方言;充其量只是个有用的工具,一个鼓动群众的“吹鼓手”。另一方面,这位奥地利“油漆匠”则对这种轻蔑也强烈地报以轻蔑。他蔑视一切资产阶级政客或知识分子,认为那些人光说不干,没有能力争取群众;得由一个出身平民的人来教会他们这一手。他对自己党内的知识分子,像戈特弗里德·费德尔或是后来成为《民族观察家》的主编的波罗的海德意志人阿弗雷德·罗森贝格这样一些人也持同样的态度。只有他的保护人迪特里希·埃卡特得到他另眼相看,此人曾把他引入上流社会,并在1921年夏季危机期间坚定地保卫了他。希特勒于1920年3月同埃卡特跑到柏林去和一些民族主义团体建立了联系。埃卡特曾把他介绍给慕尼黑的重要人物,象出版商莱曼、钢琴制造商贝希施泰因,即布鲁克曼家族,而且他(最后的但并非最不重要的)给了希特勒钱去买下了《民族观察家》报,这些功劳希特勒永远不会忘记。埃卡特的名字将在《我的奋斗》一书的末尾占有荣誉地位。

1923年,决定性的一年

希特勒既已牢牢控制了他的党,并把党的创建人贬黜成纯粹装璜门面的角色,于是他越发自信了。在墨索里尼于1922年10月成功地进军罗马后,他自信的倾向更加增强。他认为在意大利 108

能办到的事，在德国必定也能办到，必须宣布举行一次“民族起义”，把旗帜一直扛到柏林去。要说他反对“11月罪犯”的调子稍有不同，那只是更为狂暴罢了。他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说：“我们必须和1918年11月的罪犯算帐，不能让二百万德国人就这样白白死去，而我们在以后还得同叛徒们象朋友一样同坐在一张桌子上。不，我们不能宽恕，我们要求复仇！”几个月以后他又说：“不久的将来，在我们取得政权后，我们将更有责任把这些毁灭的制造者、这些小丑、这些叛徒抓起来，……并把他们推到绞刑架上绞死，那是他们该去的地方。”^①这是在1923年1月，由于德国已被断定不能履行某些赔款的支付，法军和比利时军已开进鲁尔之后说的。德国政府宣布一项消极抵抗的政策作为对法、比进军的答复，而全德国的民族主义分子和前自由军团军人却集中到鲁尔，去组织怠工和更积极的抵抗。可是在法军开始行动后的那一天，希特勒在一个慕尼黑啤酒馆却宣称：“我们的口号并不是打倒法国，而是打倒祖国的叛徒，打倒11月罪犯！”^②

希特勒激烈反对他的党徒在鲁尔参加任何对法军的抵抗。他并不要把党的活动中心转移到北方去。民族主义分子正准备靠军队的帮助，以1813年反对拿破仑战争的“解放战争”的名义来反对法军，希特勒并不想利用“解放战争”的名义，因为这样一场战争只能加强他所要推翻的政府的地位。然而那时他的权威还不足以阻止本党党员参加反对法军的战斗。党员之一，前陆军中尉和自由军团军官施拉格特尔被法军捕获并处死了；他立即成为所有民族主义者的英雄。可是1923年被解除武装的德国是无法与法军打仗的，而政府宣布的消极抵抗和筹措赔款的结果，首先是使德国马

^① 1922年9月18日和1923年4月13日的演说，载于 *The Speeches of Adolf Hitler*, ed. Norman H. Baynes, London, 1942, Vol. i pp. 53, 107.

^② Hanns Hubert Hofmann, *Der Hitlerputsch*, Munich, 1961, p. 71.

克失去了它剩下的那点价值。这年秋季四千二百亿马克才能换一美元；而在 1922 年 10 月底还只是四千五百马克换一美元，一年前则是二百马克换一美元。1923 年货币价值的灾难性暴跌意味着 109 投机活动达到令人头晕眼花的程度，使得一切靠工资收入的人受到严重损失，因为这些人总也跟不上马克贬值的步伐，一切靠年金或固定收入的人甚至更苦，不得不卖掉最后那点家当。社会基础遭到破坏。劳动阶级越来越多的人转向共产党。共产党在德国中部变得特别强大，在工人的支持下他们在萨克森和图林根建立了红色政府，遭到剥夺和破产的中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下层则越来越倒向右翼。

在这种形势下，巴伐利亚及其政府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自 1920 年以来，这个政府比之德国其他地方的政府更为右倾，它给予许多本地的半军事性秘密组织和许多右派领袖以及因参加政治犯罪活动而受到德国政府通缉的活动分子以保护。当时象民族社会主义党一类极端主义组织在德国其他地方遭到解散，它们在巴伐利亚却仍然可不受干扰地继续存在下去。这些半军事性秘密组织正在准备向萨克森和图林根进军，然后还可能继续向柏林进军，以成立一个民族主义政府。自 1923 年 8 月以来，中央政府是在温和的保守派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领导下的联合政府，他得到社会民主党的支持。陆军的巴伐利亚师是由冯·洛索将军指挥的，与半军事性秘密部队密切合作，一旦需要军事动员时还可依靠这支兵力。有几个国防军军官同时也是半军事性秘密组织的领导人，罗姆上尉及其他人还以经费和武器积极支持他们。

这些半军事性秘密组织积极干预巴伐利亚境内的政治，并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反对地方当局。当左派政党照例要在慕尼黑大街上举行游行示威以庆祝五一节时，半军事性秘密组织计划用暴力阻挠这一游行。它们根本没有接到巴伐利亚政府的任何通知，就

对它的人员发布动员令以组织一次“紧急警察行动”。慕尼黑警察局长在4月30日召见它们的头头，并告诉他们，没有他的命令，不能组织紧急警察行动。他们回答说，预料第二天会发生严重的骚乱，因此应动员紧急警察行动。他们的头头策勒向各地区的头头讲了话，并通知他们，“爱国的战斗部队”终于已最后决定要“以轻重武器、大炮和掷雷筒”来攻击社会党人的行列，这说明他们的武装实力。他也宣称无论如何要动员紧急警察行动，从而强迫警察局长同意这一措施，“才不会把阵地统统让给政府的敌人”。他们的计划是把整个马路和街区都封锁起来，然后不受外面干涉，来处理被包围在街垒以内的赤色分子。为了这同一目的，慕尼黑冲锋队的新指挥戈林靠罗姆上尉的帮助也为他的部下取得了武器。但是巴伐利亚政府反对动员紧急警察行动，并在五一节前夜取消了这道命令。^①而已领取了武器的冲锋队，不得不受到军队和警察的包围并解除武装。问题在于，巴伐利亚政府对这支由它扶植和支持的力量还能控制多久。

9月26日，施特雷泽曼政府决定中止对法军的消极抵抗，因为这一行动继续下去，威胁到德国本身的经济生活和生存。同日，巴伐利亚政府任命冯·卡尔博士任拥有独裁权力的总监。第二天，这时已成为日报的《民族观察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独裁者施特雷泽曼与泽克特》的文章，内容是猛烈攻击德国总理以及军队的统帅。德国政府因而禁止这份报纸的印刷和发行，并委托巴伐利亚的冯·洛索将军来执行这道命令。但是他把这道命令给冯·卡尔看了，而且，尽管柏林的国防部一再重申命令，他也不愿执行。于是德国政府决定解除冯·洛索的职务，并命令他从军队中退役。卡尔宣称他不能够接受这道命令，并拒绝再接受来自柏林的任何

^① 全部细节摘自慕尼黑警察局长诺尔茨1923年5月23日致检察官德雷斯的信，载于 Hauptarchiv der NSDAP, NS. 26, no. 104, Bundesarchiv Koblenz.

命令。10月22日，巴伐利亚师接到命令，向巴伐利亚政府作新的忠诚宣誓，这是冯·洛索将军同意的一个步骤；他的军官们决定一致支持他。这时，在柏林与慕尼黑之间就出现公开冲突了。

当时巴伐利亚民族主义的和半军事性秘密组织的愿望是进军萨克森和图林根，然后再去柏林，宣布成立一个拥有独裁权力的新的德国政府，一个真正的民族政府以取代施特雷泽曼那个出卖德国利益的政府。为此目的，巴伐利亚师决定从民族主义组织和半军事性秘密组织招募志愿人员，每一个正规营增补两个由他们的人组成的营。冯·洛索将军在对这些民族主义领袖讲话时坚持唯一可能办到的事不是使巴伐利亚脱离德国，而是“进军柏林并宣布成立全国的独裁政权”；“我们大家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在黑、白、红旗帜下把德国从马克思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①“秋季演习”的命令于两天后，即10月26日发布，根据这一命令，巴伐利亚师的部队扩充了两倍。一切似乎都在为这一伟大事件作出安排。

当慕尼黑与柏林之间存在公开冲突的消息传出后，慕尼黑充满了对民族主义事业的巨大热情。为军队训练所有未来的军官的步兵学校的青年军官和学生“表现出一股对巴伐利亚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天真热情，他们一直在唱埃尔哈特旅的歌，帽子上有前帝国旗帜的黑、白、红三色的帽徽。”少数青年军官和学生仍忠于他们的誓言，拒绝服从巴伐利亚政府的命令，于是被他们的伙伴称作是“支持犹太人政府的赤色走狗”和“民族事业的叛徒”。^②

对卐字和黑、白、红三色旗的热情还蔓延到平民百姓的各方面去。10月22日晚，希特勒向各“爱国的”组织召集的群众大会发表

^① Ernst Deuerlein (ed.), *Der Hitler-Putsch*, Stuttgart, 1962, no. 61, p. 258; *ibid.*, no. 68, pp. 277—80, the order of 26 October for the ‘autumn manoeuvres’.

^② 1923年10月22日莱斯特中尉致哈默施泰因中校的信，载于 *Vierteljahrshfte für Zeitgeschichte*, v, 1957, p. 95.

演说。一位参加大会的青年妇女写信告诉她的父母：“你们想像不出当这个人讲话时会场有多么肃静，仿佛上千的听众都屏息住了。当他充满愤怒斥责那些自革命以来就一直统治着我们人民的人所干的事时，斥责那些总是阻挠他和他的追随者同 11 月罪犯算帐的事时，会场上的欢呼声达数分钟之久。……阿道夫·希特勒对他的民族主义信仰的正直性充满了十分坚定的信念，以致不知不觉地把他信念传达给他的听众。但愿他为了好时光作好准备，并把许多同志集合到卅字旗帜下。每个小组都有代表出席。在工人和下级职员之间坐着军官，从参加冲锋队的大学生到领养老金者，大家都拥护希特勒所体现的伟大思想。……每一个人，在当前与经济灾难同时发生的心灵苦难中，都在寻求支持，并且从一个将不会使他失望的人身上找到这种支持，因此，我们能理解为什么他一出现就引起热烈的感情。……”^①约在同时，德国驻布加勒斯特使馆汇报说，从德国回去的特兰西瓦尼亚大学生“都从心里拥护希特勒”。

11 月暴动

10 月，向北方进军的军事准备工作在加速进行。埃尔哈特及其部下都交给巴伐利亚政府指挥。他的部队集结在科堡地区北部边界线，装作是为防卫巴伐利亚边界不受来自图林根的共产党人袭击而采取的一个紧急警察行动。埃尔哈特的部队人数约有一千二百至一千五百人，由巴伐利亚警察局加以武装。其他半军事性秘密组织也同样行动起来，并在他们中间布置好，他们将朝什么方向经什么路线向北方进军。可是几个星期过去了，而巴伐利亚

^① 1923 年 10 月 22 日安娜致其父母信，载于 Hauptarchiv der NSDAP, NS. 26, no. 513, Bundesarchiv Koblenz.

政府并没有发出他们盼望的信号，部队中开始弥漫着不满情绪。士兵们觉得他们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他们力促必须作出决定，并越来越责备他们自己的上司消极被动。埃尔哈特大发牢骚说，很多宝贵的时间都丧失了，而巴伐利亚政府缺乏采取决定性行动的勇气。^①

当巴伐利亚警察部队司令冯·赛塞尔上校去柏林同那里的军队领导人和政界朋友商量时，希特勒曾对他说，他将一直等到上校回来，然后就必须采取行动：“再也没有时间了。经济灾难把我们的人逼到如此地步，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否则，我国人民就会转向共产党。”慕尼黑冲锋队联队这时已是一支拥有一千五百多人的部队，它的指挥员布鲁克纳中尉要求希特勒迅速出击，因为“我们冲锋队中有很多失业的人，这些人曾以他们的最后一套衣服、最后一双鞋、最后一分钱作赌注，接受训练而成为军人”，必须结束他们的不幸处境。^②处在马克已贬得毫无价值、群众大批失业和发生严重经济危机的时刻，这些充斥冲锋队及其他半军事性部队的流离失所的复员军人再也不受控制了。

可是11月初，冯·赛塞尔上校从柏林回来，并没有从德国北方军队或民族主义分子那里得到给予任何帮助的诺言，而情况已越来越明显，要是得不到支持的诺言，或是没受到外界的推动的话，巴伐利亚政府是不会采取任何行动的。而推动正是希特勒决定要干的事，他相信这一推动就会诱使犹豫不决的巴伐利亚政府同柏林决裂并宣布进行“民族革命”。然后这一革命会由得到巴伐利亚军队和警察当局帮助的半军事性部队推进到柏林去；会成立

^① 详情全摘自 Oberlandesgerichtsrat Ernst Pöhner 1923年12月9日宣言，载于 Hauptarchiv der NSDAP NS. 26, no. 120.

^② 转引自 Franz-Willing, 前引书, p. 136; Konrad Heiden, *Der Führer*, London, 1944, p. 149.

一个由第一次世界大战英雄鲁登道夫将军领导的“全国政府”，在这个政府中，卡尔、赛塞尔、洛索这些巴伐利亚的领导人会同希特勒及其他民族主义分子并排坐在一起；一支“国民军”将取代“国防军”，全巴伐利亚的冲锋队头头都已接到通知，他们的队伍也已动员起来；德国其他城镇的较小的民族社会主义小组也动员起来了。11月6日，总监冯·卡尔对这些半军事性部队的头头们说：建立“全国独裁政权”有两种途径，正常的途径是靠不住的，而已作的一切准备都是为了非正常的途径；一切准备就绪就开始行动，他会发布命令的。

11月7日，在慕尼黑，人们听说卡尔将于次日晚上在比格尔布罗啤酒馆举行的大会上向聚集的慕尼黑显贵们发表讲话。这次讲话是人们等待已久的事件的信号呢，还是再次推迟的意思？无论如何，希特勒决定采取行动。慕尼黑冲锋队接到去包围啤酒馆的命令；慕尼黑内部和外部的队伍——不仅是冲锋队，还有来自高地自由军团以及其他半军事性秘密组织的队伍——将增援他们并占领各公共建筑。所有的人都将从隐蔽的武器库领取武器。这个计划执行了。在卡尔开始向拥挤的大会讲话时，冲锋队占领了啤酒馆的门口，搬进了一架机关枪，兴奋激动的希特勒走在他忠实的党徒前面，从人群中挤过去，跳上一张椅子，朝天花板放了一枪。他的武装人员占领了大厅。卡尔、洛索和赛塞尔被要求同希特勒一起进入邻室。希特勒在那里向他们概括介绍了他的纲领：宣布成立一个在希特勒领导下的全国政府，由鲁登道夫负责指挥军队。鲁登道夫被迅速接来，并在希特勒的要求之外又加上他的请求：“洛索，现在咱们要干了。”洛索以合适的军人姿态答道：“阁下的希望对我来说就是一道命令。”赛塞尔也表示同意。这场革命就开始了。

其他的部队占领了公共建筑和战略据点。罗姆指挥下的“帝

国战旗”自由军团未遇到任何抵抗就占领了国防部；警卫布了岗哨，电话业务由那些同军队合作的业务员操作。步兵学校的学员由一位著名的自由军团团长，前陆军中尉罗斯巴赫召集起来，举着卐字旗向比格尔布罗啤酒馆开去。希特勒在一种充满狂热的气氛中向他们发表讲话。此时洛索和卡尔已离开了啤酒馆。有三位级别比洛索低，并反对他老是摇摆不定的巴伐利亚将军当时成功地劝说了他们的司令官将军再次改变立场，反对希特勒及其政治讹诈的手法。在比格尔布罗啤酒馆，到了半夜时候，人们也开始怀疑国防军的态度，因此希特勒就派了一名使者西里少校去见洛索以弄清他的方针路线。而洛索、卡尔和赛塞尔告知他，他们认为在枪口下说出保证的话是无效的。当西里坚持说，应不惜任何代价避免在陆军和民族社会主义党人之间打起仗来，洛索回答说：“我们不同叛乱者谈判。”^① 这位使者被逮捕。

11月9日上午，民族社会主义党和其他半军事性部队在慕尼黑很多地区开设了招兵处。冲锋队抓了一些部长和“人质”。讲演者在街头拐角处向群众发表讲话并得到热情的拥护。他们预期的增援从外地到达了，但也从军队得到增援。有一个营长向他的上级军官汇报说，他的部队“热情地作好希特勒领导下为自由而战斗的准备”^②；另一支部队只是在到达时才得到通知，他们不是为此目的被召集到慕尼黑来的。在比格尔布罗啤酒馆的头头们决定在整个上午开上街头去召集民众。可是游行队伍在慕尼黑市中心的奥第昂广场遇上了警察警戒线，当他们拒绝解散队伍时，警察就开枪了。有十五人被打死。希特勒由于与他手挽手同走的那个人被打死而得救了，因为那个人被枪弹击中心脏，倒下时把希特勒也拉

^① 西里少校关于1923年11月8—9日事件的汇报，未注明日期，载于 Nachlass Traub, no. 9, Bundesarchiv Koblenz.

^② 1936年11月11日陆军少将翁鲁致希特勒的信，载于 Hauptarchiv der NSDAP, NS. 26, no. 76, ibid.

倒在地上。这就是“希特勒暴动”的结局。可是，这个名词很不准确，因为希特勒的目的并不在于为他自己，甚至也不是为他的党（这个党在巴伐利亚以外力量很弱）夺取权力；他是要同其他许多具有同样目的的组织，同巴伐利亚国防军和警察合作，发动国民革命，就像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同民族党人一起，并靠军队的帮助向罗马进军一样。甚至到11月9日，冲锋队还和“帝国战旗”自由军团、“高地”自由军团以及其他同类部队紧密合作，被打死的十五人中有七名就是它们的人，这是在后来的宣传中从没有提到的事实。

当人们得悉警察射击打死人的消息后，慕尼黑爆发了拥护鲁登道夫和希特勒，反对卡尔的激烈的示威游行。大学生们要求他辞职。“打倒卡尔！”是激动的群众总口号。^① 警察和士兵遭到袭击和被人吐唾沫。1924年4月的选举中，“民族主义集团”在慕尼黑获得十万零五千张选票，成为地方上最强大的政党。在全巴伐利亚它获得五十一万二千张票，占投票的百分之十七。希特勒的吸引力并没有因暴动的失败而遭到损害。

在这之前几个星期，希特勒和他的九个同伙以叛乱未遂罪遭到慕尼黑一个法庭的审讯。他们被判处短期“体面”拘留；鲁登道夫被宣判无罪释放；他驱车回家时成了一次凯旋的游行。在审讯中，希特勒很小心注意同军队保持良好关系，有朝一日他还需要它们。“当我听说开枪的是警察，不禁感到高兴，因为至少不是军队玷污它自己的荣誉；军队一如既往，白璧无瑕。总有一天，国防军
116 不论是军官还是士兵，都会站到我们一边来的。……有朝一日这些难以驯服的部队会扩大成营，营扩大成团，团扩大成师，到那时，原来的帽章将会被人们从污泥中捡起来，原来的旗帜又将在我们面

^① 大学生鲁道夫·勒希勒 1923年11月14日致其父母信，载于 Hauptarchiv der NSDAP, NS. 26, no. 116,32, ibid.

前飘扬。……”^①他可没有下定决心，截断自己的退路。

在这些事件中，看来有些令人奇怪的是，尽管希特勒社会出身微贱，态度狂暴并缺乏建设性的纲领，他怎么能不仅对群众，而且也对诸如在奥第昂广场被打死的巴伐利亚最高法院法官特奥多尔·冯·戴·普弗尔腾、或是鲁登道夫将军和冯·洛索将军这样一些阅历较深的中年人都产生影响并加以支配呢？鲁登道夫的知友，前上校包尔在“暴动”前几天给他的信中写道：“目前所缺乏的是有才干的领袖和团结，……而甚至像希特勒、格雷费、武尔这样一些人也没有明确的纲领，而且也是不可教育的……”，然而这也没用。三个月前，包尔曾从维也纳发给鲁登道夫一份很长的报告，谈关于奥地利民族社会主义党人及他们与慕尼黑的关系，也同样带有警告的口气。包尔刚刚参加过在萨尔茨堡举行的奥地利民族社会主义党人的一次集会，这次集会参加的“人很多，大多数是十七至十九岁的青年人，……年龄较大、较明白事理的人和政治家是我所完全看不到的。通过的决议中有一项特别重要，说他们根本不愿参加奥地利即将举行的选举。……第二个决议看来更有问题，说这些奥地利人要接受希特勒的军事独裁的领导。我同希特勒的冲锋队队长戈林上校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我得到的印象是非常之坏。首先我非常怀疑他以及他的下属能否建立一个军事上有用的组织。其次，这些人完全过高估计了他们自己的运动的力量，特别是完全忘了，在今天，要去干不能得到法国支持的事是发疯了。……我认为必须讲清楚，在一切纯属奥地利的问题上，奥地利民族社会主义党应听命于奥地利人，要是他们一如既往仍接受我的命令，那只不过是自然的事。至于德国的问题，当然他们也将效劳……”；但甚至在这些德国人的问题上，包尔也拒绝接受来自希

^① 转引自 Heiden, 前引书, 第 167 页; Hofmann, 'Der Hitlerputsch', p. 255. 政治犯必须在一个已不使用的要塞中服刑, 他们在那里享受到相当的特权。

117 特勒或戈林的任何命令。^①然而鲁登道夫把这些告诫完全当作耳边风,过了几年他才终于同希特勒决裂。

如果说希特勒能够影响某些资历很深的军官,那么他蛊惑人心的号召力对于年轻的中尉、军校学员以及参加过世界大战的军人就更无疑问了。他们的世界曾经是霍亨佐伦帝国与战争,但现在那个世界消失了,据他们认为,这是被 11 月罪犯们摧毁的。希特勒答应他们复仇、民族复兴、一个摆脱一切外国势力的强大而自由的德国。虽然意大利是战胜国之一,这种民族主义呼声在那里就很有力量,而在一个被战败和受屈辱的国家,这种呼声就远远更加有力了。在希特勒的追随者和支持者中间,军人和复员军人的人数很多,而巴伐利亚国防军则对他的非凡的发迹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巴伐利亚州独立执行的政策、人们对柏林和马克思主义的厌恶、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事件的冲击,这些因素也起了作用。然而政治军官们的这位学生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他不再满足于充当“吹鼓手”,充当大将军们和右翼政客们的扈从了;他是一个群众政党的领袖,能够支配群众。希特勒于 1923 年 11 月 8 日在比格尔布劳啤酒馆宣布成立的政府是他的政府,鲁登道夫在这个政府中被降到国防部长的职位。吹鼓手已变成乐队的第一把手了。希特勒在 1924 年 3 月被审讯时宣称:“一个天生的独裁者并不是被人推上当独裁的,而是他自己的意愿;他并不是被别人迫着向前的,而是自己奋力向前的……。一个认为自己是受召唤而来统治国家的人,就没有权利说:如果你们需要我,或请我,我就同你们一起工作。他应责无旁贷地站出来……。”^②

① 1923 年 8 月 20 日和 11 月 7 日, 马克斯·包尔上校致鲁登道夫的信, 载于 Nachlass Bauer, no. 81, Bundesarchiv Koblenz.

② Hofmann, 前引书, 第 254 页。

《我的奋斗》

希特勒在莱希河上的兰茨贝格堡的城堡中度过的几个月（他在1924年底获假释）没有白过，他把时间用来口授^①《我的奋斗》第一卷，这部书交错着他个人的自传和民族社会主义党运动的历史，还阐述他的思想和猛烈攻击他的许多敌人。第一卷意味深长地称为《算一笔帐》；第二卷在两年以后出版。这本书尽管语言浮夸，文体拙劣和内容颇多重复，但成了民族社会主义的圣经，而意大利这样的国家却没有这种圣经。因为希特勒后半生的经历仍保留这些基本思想不变，这里我们可以略谈其中几点。 118

首先，希特勒由于读了《犹太长老会谈记录》这部从俄国传入德国的所谓犹太人的世界阴谋的杜撰故事，他的激烈的反犹主义情绪更加强了。“这个民族的整个生存在多大程度上有赖于继续说谎，在《犹太长老会谈记录》中得到绝妙的证明这书是犹太人无比痛恨的。据说这些记录是根据伪造的材料写成的，《法兰克福报》为此而一再向全世界这么诉说，这最好地证明这些记录是真实的。可能许多犹太人下意识地干的事，在记录中却得到有意识的证实。而这就是要害所在。揭露出来的事实来自哪个犹太人头脑完全是无关紧要的，要紧的是记录几乎是用令人厌恶的肯定事实揭露犹太人的本质及其活动，并暴露他们的内部联系同他们的最终目的……。”^② 犹太人强烈追求统治全世界的最可怕的例证是“俄国，在那里约有三千万人遭到他们以真正疯狂的暴行或部分以非人的折磨所杀害或饿死，为的是要使一帮犹太知识分子和交易

^① 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是由他口述，由别人替他笔录并整理的。第一卷大部分由鲁道夫·赫斯在兰茨贝格监狱中笔录整理。——译者

^② Adolf Hitler, *Mein Kampf*, 97th ed. Munich, 1934, p. 337.

所巧取豪夺的资本家稳妥地统治一个大国。……”也正是这些犹太人，“他们把黑鬼带到莱茵河来，他们总是心怀同样鬼胎，目的明确，要通过黑鬼到莱茵河而必然产生杂种人来毁灭为他们所痛恨的白种人，以便把白种人从高度文化和政治的水平上猛推下来，让他们自己做白种人的主人……。”^① 犹太人的“最后目的乃是非民族化，即要其他民族杂交而成为杂种，降低最优秀的民族的种族水平，并通过灭绝民族知识分子来统治杂种的种族……。所以，犹太人统治的结果总是毁灭一切文化，最后连犹太人自己也发疯了。因为他们是各民族的寄生虫，他们的胜利意味着他们的受害者死亡，而他们自己也等于完蛋了。……”^② 这是一种真正的启示录式的幻想，是日耳曼传说和希特勒非常喜爱的瓦格纳歌剧中出现的毁灭和破坏的主题。

119 这种见解也同样影响希特勒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思想。在他看来，“法兰西是，并且继续是最可恨的宿敌。这个民族，越来越受黑人同化，是同犹太人统治全世界的目的有联系的，因而存在对欧洲白种人生存的潜在威胁。因为在地处欧洲心脏的莱茵河上掺杂着黑人血液，既符合我们民族的这一沙文主义宿敌的残暴和邪恶的复仇愿望，同样也符合犹太人的冷酷的谋算，他们想就此开始使欧洲大陆的中心地区的民族杂种化，通过使白种人受一种低级人种的感染玷污而剥夺其优越生存基础。……然而，对德国来说，法国的危险意味着我们有责任……向那些象我们一样受到威胁但不愿忍受和默认法国的统治愿望的国家伸出手来。在可预见的未来，德国在欧洲只有两个盟国，即英国和意大利。……”^③

他认为应该放弃战前的殖民和贸易的政策，而赞同一种领土

^① 同前引，第 357—358 页。

^② *Hitler's Secret Book*, New York, 1961, p. 213. 此书写于 1928 年，第一次出版于 1961 年。

^③ *Mein Kampf*, pp. 704—705.

扩张的政策，这是中世纪的条顿骑士团和日耳曼移民曾推行的一项政策。“我们要从他们六百年前止步的地方开始。我们要停止德意志人不停地向南欧和西欧的移动，而把我们的目光转向东方的土地。……不过今天我们谈到欧洲新的土地时，我们能想到的首先只能是俄国以及它的那些邻近的属国……，”因为俄国“崩溃的时机已成熟……。德国将成为世界大国，否则它就要不复存在……。”^① 至关重要的是“为我们的人民取得今后一百年间的足够的生存空间”，而这“只能在东部”找到。^② 在几乎不超过十年内，这一政策就付诸实施，不仅是进攻俄国，而且也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

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这些德国主要政党，被希特勒认为是叛徒。中央党的领袖“喜欢一切波兰人，一切阿尔萨斯叛徒和亲法分子，而不喜欢德国人，德国人也不愿参加这样一种犯罪的组织。这个政党，借口代表天主教徒的利益，就是在平时也千方百计地帮助伤害和毁灭具有真正基督教世界观的主要堡垒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旧奥地利利用它所能得到的一切机会以最无耻的方式背叛和出卖德意志精神。他们总是站在我们人民的敌人方面。最自高自大的捷克人的狂妄气焰总是得到所谓德国社会民主党为它辩护。每一个压迫德国的措施都得到他们的认可。……”^③ 无需说，“社会民主党的头头”是犹太人，从报刊编辑开始就是，社会党人的报刊上只登犹太人写的文章。“我把手边能找到的所有的社会民主党小册子拿起来看看作者的名字，都是犹太人。我记得几乎所有的社会民主党头头的名字，他们绝大多数也属于‘上帝的选

① 同前引，第742页。

② *Hitler's Secret Book*, p. 145.

③ 同前引，第57,62页。

民’^①的成员。……”^②这的确十分简单，简单到连最迟钝的德国人也能明白。错综复杂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发展情况都被简化成一种不可思议的公式，一种阴谋，一种人们能够相信的魔鬼般的计划，这些都变成一个信仰的问题。

在那时和以后，德国有很多民族主义的政党和团体。它们也反对凡尔赛条约和议会民主制度；它们也反犹，虽然没有民族社会主义党人那么激烈。然而希特勒干的事他们永远办不到。它们的领袖资产阶级味太重而且太小心谨慎了，它们的政策也是如此；这些政党不能强烈吸引住群众。这些党的党员和选民来自中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下层，不是来自工人阶级。在外交政策方面的纲领几乎唯独是废除凡尔赛条约，恢复1914年边界。希特勒不仅是更加野心勃勃和更加极端。他的生存空间政策在本质上与民族主义者的政策极不相同。他要把东欧的非德意志人居住的广大地区并吞并迁移德意志人去定居。后来他毫不犹豫地为了他的强权政策的更广泛的方案和计划而牺牲了东欧德意志少数民族的生存。他的种族政策往往不顾德意志人的利益，而德意志人少数民族只不过是执行这一政策的方便工具。希特勒不仅要把德意志人，而且要把整个欧洲都按照不着边际的种族幻想曲的形象去加以改造。

① 犹太人的别称。——译者

② *Mein Kampf*, pp. 64—5.

四、民族社会主义：通向权力的道路

121

改组的年代

1923 年秋天，德国的马克稳定了下来；曾经使德国破产的通货膨胀终于被控制住了。先是任总理，后来又任外交部长的施特雷泽曼正确地认为，复兴的关键是与法国改善关系。他在其后的几年中成功地贯彻这一主张。1924 年 8 月，道斯计划签署了，这是首次就德国向法国及其他西方国家赔款这个令人苦恼的问题作出调整。不久他们的军队就从鲁尔和莱茵兰占领区撤出了。美国的贷款开始源源流入德国，德国的经济恢复很快。1925 年至 1928 年是魏玛共和国的全盛时期；繁荣恢复了，而且议会制度似乎也为多数选民所接受。的确，任何 1928 年的政界观察家都不能够预言五年以后希特勒将掌权并破坏议会民主制。1924 年 5 月，民族党和民族社会主义党还获得近二百万张选票，即占全部选票的 6.5%，而到同年 12 月就减少为九十万张票，到 1928 年 5 月又减为八十万张票，仅占当时全国选票的 2.5%。共产党的选举实力也同样减弱，而温和稳健的党派的选票却增加了。

1924 年，希特勒被关在兰茨贝格监狱时，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经历一次严重的危机，这是 1923 年 11 月失败的余波。11 月暴动失败之后，德国很多地方的民族社会主义党组织都被当局解散了。鲁登道夫听从希特勒以前的副手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的意见，¹²²这时要同德国北部的德国民族自由党合并，该党领袖冯·格雷费是一个极右翼的政客。希特勒仍和以前一样反对任何合并，但又

129

要求他应成为新党的唯一领袖，并要求新党接受民族社会主义党的政纲。由于他在被监禁期间不想从事政治活动，1924年6月他辞去党的领导职务，并希望将一切决定都推迟到他出狱后再说。8月份，民族社会主义党在魏玛举行会议，导致对立派系之间发生公开冲突，鲁登道夫表示厌恶而离开了会场。一些领导人赞成与德国民族自由党联合，另一些领导人则激烈反对联合，还有一些人只以保证希特勒仍为党的无可争议的领袖的条件下才拥护合并。最后埃塞尔与施特赖歇尔成立了一个对立的党，即“大德意志民族共同体”，公开反对合并的民族主义政党，并仍然绝对忠于沉默的希特勒。罗姆从狱中放出来后，企图把一些半军事性质的组织与冲锋队合并成另一个组织，称为“前锋社”，这个组织将不介入派系斗争，而要成为这个新运动的核心。罗姆本人将单独负责组织和领导前锋社，而在一些政治问题上这个组织则将接受希特勒的指导。民族社会主义党的其他领导人激烈反对这个新的大胆行动。罗姆总是相信“军人至上”，在一个旨在夺取政权的运动中，军人所占的地位应高于政客，这是受到希特勒强烈谴责的思想。^①显然，1923年的事件更加深了罗姆对所有政客的根深蒂固的怀疑；他很愿意承认希特勒是“一位可信赖的同志”，但他要求如果同希特勒的意见不一致时，则他有反对希特勒的权利。^②

1924年呈现出民族主义运动阵营中发生严重危机和分崩离析的景象。然而，特别是在巴伐利亚，仍然存在着一个忠于希特勒的核心。到今年年底，在贝希特斯加登有六十名党员，在特劳恩施泰因有五十五名，在弗赖拉辛有四十八名，在布兰南堡有二十五名，这些都是上巴伐利亚的小地方。在这一百八十八名忠实的信徒

^① Ernst Röhm, *Die Geschichte eines Hochverrätters*, 7th ed., Munich, 1934, p.349.

^② 同前引, 1st ed., Munich, 1928, p.297.

中,有很大一个百分比——约超过百分之二十五——是政府、铁路和邮局的雇员和官员。剩下的是从事各种不同职业的人,其中只有商贩构成的一个小组,约占百分之十二。^①在这些民族主义运动小党派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冲突,例如,在马格德堡,在德国民族自由党与大德意志民族共同体之间就是这样,德意志骑士团也卷入了;卫戍军司令埃策尔上校则仍忠于民社党。^②在不来梅也发生类似的斗争。另一方面,埃尔哈特及他的旅的军官由于1923年11月暴动失败事件而深感失望。其中的一个人,弗里德里希·威廉·海因茨尖锐地批评了希特勒和鲁登道夫的领导无能,并在法兰克福的一个集合上宣称,要是他们在奥第昂广场被打死了倒更好些;有十二个忠实的党徒立即离开会场以示抗议。在法兰克福,这个运动这时也完全变成“群龙无首”了。^③埃尔哈特与希特勒之间的裂痕再也无法弥合。

在希特勒从兰茨贝格监狱释放出来后,民族社会主义党于1925年初恢复了。希特勒又一次在比格尔布劳啤酒馆地下室向他的党徒们讲话:“要使斗争易于为广大群众所理解,必须总是进行反对两种情况的斗争,一是反对一种人,一是反对一种问题,英国打仗反对谁呢?反对德皇这个人,反对军国主义这一运动。犹太人及其马克思主义势力反对谁呢?反对资产阶级这种人,反对资本主义这个目标。因此,我们运动必须反对谁呢?反对犹太人这种人,反对马克思主义这种运动。……”^④他考虑必须为了心理学上的理由,只树一个敌人,即犹太人;他的意见并没有改变。他

^① Hauptarchiv der NSDAP, NS. 26, no. 88, Bundesarchiv Koblenz 有这四个小组的全部党员名单。这些名单大体表明了与1919年慕尼黑党员名单所反映的相同的社会面貌,第94页(原书页码——译者)已论及。

^② 上述情况是根据前中尉卡尔·格奥尔格·彼得斯1940年的回忆。同前引,第514号。

^③ 这段记述是根据奥托·施罗德1937年的回忆,同前引,第528号。

^④ 转引自 Heiden, 前引书,第207页。

坚持说，他的命令必须无条件服从，而地区领导人必须由他来指定。希特勒不接受罗姆的组成冲锋社的计划，并要求这个组织必须并入民族社会主义党，这样他就有权排除掉一些讨厌的领导人。罗姆于是立刻向希特勒提出辞职，但没有得到任何答复。这两个人之间发生的破裂后来持续了几年。冲锋队按照希特勒的计划改组了，但已不能得到信赖并且是不统一的；于是建立了一支个人的卫队来保卫希特勒。这支卫队身穿黑色制服，很快就变成 S. S. (即党卫队)；这一直是一支较小的部队。

希特勒被禁止在德国大多数地方发表演说，而能够按照他的希望去组织运动的合用的地方领袖不多，再说希特勒的权威也没有得到所有地方领袖的承认。1925年3月，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被任命为德国北方的党的领导人；因为在希特勒被监禁期间，他曾利用那几个月在北方建立了一个党组织，并把几个分裂出来的不同的小派别统一起来，对他的任命主要是承认现状。所以，施特拉塞尔在北方的地位实际上是独立自主的。在他的更激进的兄弟奥托的帮助下，他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办起了报纸，并指派了地方领导人。这些领导人往往就是现已并入民族社会主义党的民族主义运动组织的现有的领导人；在别的情况下，这些领导人是由党员选举或认可的。施特拉塞尔一派的纲领是含糊的，但在某种意义上比诸希特勒的政纲更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或者毋宁说施特拉塞尔的纲领是试图恢复“二十五点”纲领中原来的社会主义要求，慕尼黑的党的领袖对这些要求已不再很认真对待了。1925年秋天起草的这份纲领，设想要把大庄园分成三十至一百二十英亩的农庄；这些农庄由德国政府以世袭租借的方式给予农民；允许庄园主也以世袭租借的方式保留六百英亩土地；禁止把这些田产转让、出售或抵押。德国政府将取得大工业企业约值百分之三十的股份，雇员取得百分之十的股份；另外百分之九至十一归公共机

构，但是经营管理和领导仍然完全属于私人的。雇工不到二十人的小企业，必须参加强制性行会。纲领还设想雇工领取的工资“大部分用实物支付”。^① 这些关于强制性行会和实物付酬的条款表明这个经济纲领的空想是多么没有希望，并且离真正的社会主义多么遥远。奥托·施特拉塞尔甚至在他被开除出民族社会主义党后，还继续在几年内传播一种建立在世袭租地权和行会基础上的“德国社会主义”。

在对外政策方面，施特拉塞尔要求恢复 1914 年边界，把中欧 125 所有的德意志人统一在一个大德意志帝国（包括奥地利、南蒂罗尔和苏台德地区）中，还要求在非洲中部建立一个殖民帝国，其版图包括从比利时、法国和葡萄牙的殖民地中分割出来的部分。不过施特拉塞尔的某些报纸也支持年轻的民族国家有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利；而他们的某些追随者还梦想同苏俄建立联盟，为反对凡尔赛条约而打一场解放战争。年轻的约瑟夫·戈培尔是施特拉塞尔的热情拥护者之一，当时是他家乡莱茵兰党组织的一个工作人员，那里的情况同巴伐利亚农村的情况大不相同。戈培尔相信施特拉塞尔是“易于接受任何激进思想的”，并且要用他作为“反对慕尼黑党魁的大槌”，戈培尔认为这些党魁年迈了。他预期在老年一代和青年一代之间必然要发生斗争。激进派主张必须先是以社会主义解放，接着“像暴风雨般”进行民族解放运动。这是“一个两代人之间的问题。要老年人否则就是要青年人！要演变否则就是要革命！要社会性的否则就是要社会主义的！就我们来说，作出抉择并不困难。”至于希特勒，他正在动摇中，但是他会参加年轻人一派的，戈培尔是这么希望的。^②

^① R. Kühnl 在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XIV (1966) 第 324—33 页上载有施特拉塞尔的纲领。

^② *Das Tagebuch Von Joseph Goebbels 1925—26*, ed. Helmut Heiber, Stuttgart, 1961, pp.27, 30 (11 and 30 September 1925).

1925年11月，施特拉塞尔在汉诺威召集德国北方党的一些领导人开会，向他们阐述他的基本思想。戈培尔和另一位地方领导人接受制订一份更详细的党纲的任务。在希特勒眼中，这些步骤等于是公开反叛。1926年1月，戈培尔在施特拉塞尔的一份报纸上写道：“要是我们保卫财产和教育的利益，我们就将一事无成。如果我们为我们的目的而调动了饥饿、绝望和牺牲等因素，我们就什么事也能做到。……我相信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①他认为民族社会主义党同共产党之间继续不断的冲突“很可怕”，并计划要会晤共产党领导人。他的一位亲密的朋友卡尔·考夫曼，即后来汉堡的党区领导人，在回答一位共产党员时宣称，如果德国同西欧国家签订公约，“纳粹党将同共产党并肩反对社会民主党人的诡计。”德国西部另一位党的领导人，教师伯恩哈德·鲁斯特宣称，
126 在任何社会民主党人或所谓黑、白、红三色旗德国的领导人和共产党人之间，他更同情共产党人。”^②戈培尔主编的《民族社会主义党人书信》是用来团结民族社会主义党人中的激进派和反保守派的，但是正如戈培尔所指出的，也是作为“一件反对慕尼黑的老迈官僚的武器”。^③

在同慕尼黑的斗争中，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引起了当时德国人的强烈政治热情，这个问题是：对于以前的统治家族——霍亨佐伦家族、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等——究竟应对他们丧失的权利和财产偿付一大笔金钱呢，还是应予没收？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这些政治上的左派激烈鼓动应毫无补偿地予以没收。但资产阶级政党和政府则也同样激烈地反对这个意见，认为妨害了财产权；因此，

① 同前引，p.53, n. 1.

② 转引自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i, no. 4 (October 1966) 第22—23页上 Jeremy Noakes 的“1924—1927年纳粹党内的冲突和发展情况”一文中所引的杜伊斯堡和汉诺威秘密警察的一些报告。

③ *Das Tagebuch von Joseph Goebbels 1925—26*, p.22 (21 August 1925).

左派就提议举行公民投票，由选民作出决定。施特拉塞尔的一些报纸和德国北方民社党的一些激进的领导人，忠于支持工人阶级的原则，主张支持公民投票，但希特勒斥之为“犹太人骗局”。他认为，民族社会主义党必须保卫私有财产权，否则，他们怎么能指望争取农民和工匠，白领工作者和下级公务员呢？这些人已被共产主义的幽灵吓坏了。两年以后，他煞费苦心地为党纲第十七条辩解，这一条要求为“公共用途”无偿征用土地，他宣称这首先是针对犹太人的土地投机的。

1926年1月25日，施特拉塞尔又在汉诺威召集德国北方的党的一些领导人开会，以便在一个比较直言不讳的社会主义路线和公民投票反对前统治家族的问题上取得他们的支持。希特勒派了戈特弗里德·费德尔去反对这一行动并命令遵守党纪。然而除了科隆的罗伯特·莱以外，德国北方所有的领导人都出席了会议，支持施特拉塞尔并表示他们对他的信任。于是其中之一被派到慕尼黑去，向希特勒解释：北方工业区具有不同的情况，在那里反对资本主义具有现实的意义。希特勒通过在巴伐利亚的班贝格召开党的所有领导人会议的办法来反击这些行动，在那里他能确保得到很有力的支持。戈培尔仍然希望一个更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纲领会吸引希特勒，他的家乡埃尔伯费尔德将成为“德意志社会主义的麦加^①”，他写道，“而谁也不再相信慕尼黑了”。2月14日，希特勒在班贝格发表长达数小时的讲话：德国的任务是摧毁布尔什维主义，那是犹太人制造的东西，而意大利和英国是德国的天然盟国。至于当前的主要争论，即关于前皇族的补偿问题，他强调说，财产权不应予以破坏；权利应该仍然是权利，皇族们的权利也如此。埃塞尔、费德尔、莱和施特赖歇尔都同意。施特拉塞尔在这次

^① 伊斯兰教的圣地。——译者

非常简短的讨论中谈得含糊不清，很糟糕。戈培尔认为希特勒的观点“糟透了”而且“很可怕”，他自己倒是希望能同苏俄建立反资本主义同盟，然而他没有讲话。^①会议以希特勒及其慎重政策全面胜利而结束。这是党内最后一次公开讨论原则问题。从此以后，党只有一个政策，即领袖的政策。

同月，即1926年2月，希特勒在汉堡的一次私人集会上向工商界领袖发表讲话，那些人的政治立场是右的，然而并不倾向于任何极端主义的观点。希特勒讲话的主题是，德国要复兴成为一个强国，只有扑灭马克思主义才能做到；如果不能扑灭马克思主义，国家就不能复兴，就象一个人如没有治愈肺结核病无法康复一样。意大利也曾有过同样的情况；但这个问题在那里已经解决了，“不是由于有一个人天才地认识到这种危险，而是由于意大利民族中工商界那部分人的判断力，他们了解只要这种祸害还流行，希望任何经济、贸易的繁荣都是可笑的；这也是对于德国的前途具有决定性的问题。通篇讲话一句也没提到犹太人和反犹主义。希特勒一向是善于使自己适应他的听众的。他也对这些工商界领袖们提到一个他承认的事实：“胸甲骑兵俾斯麦是受人尊敬的。为什么？广大群众爱戴他，因为他们很软弱；他们需要有人领导，然而他们要的不是某个领导对他们说：或许可以这么办，或许可以那么办，或许还可以有不同的办法。群众希望这位穿胸甲骑兵高统靴的人告诉他们：就该这么办！”^②这些话在心理上影响很大。

2月份在班贝格获得的胜利在5月份达到顶点。某一次党员大会——类似1921年7月使希特勒得以控制慕尼黑的党的大

^① 同前引，第59—60页（1926年2月11和15日）。

^② 转引自 Werner Jochmann, *Im Kampf um die Macht*, Frankfurt, 1960, pp. 101—4, 110—11.

会——宣称“二十五点”纲领保持不变，同时又通过新的章程。慕尼黑地方组织被宣布为党的“支柱”，因而它的领导人当然是全党的领导人。党的第一主席希特勒确是选出的，但只是由他的个人影响最大的慕尼黑党组织的党员选出的。他一旦当选，就拥有独裁权力，任命和撤换党的地方领导人，即各党区领袖和各主要的委员会（宣传、组织、内部调查等委员会）主席。各委员会的主席，同党的第一主席、书记和司库一起组成党的中央委员会。由于多数成员是由主席任命或撤换的，他的意志实际上在全党起控制作用，大大超过了法西斯运动初期墨索里尼所达到的程度。第一主席不受多数通过的决议约束，甚至也不受慕尼黑地方党组织多数决议的约束；在开除和解散党支部方面他拥有最后决定权。这是一种彻底的中央集权制的结构——服从希特勒一人的意志。自1921年7月以来，这已成为慕尼黑的党的法律，如今这一制度又转变成德国全党的制度了。而且意味深长的是，德国似乎被看作仅附属于“运动首府”慕尼黑的，而慕尼黑的党则等于是整个党。希特勒在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十五个月中，已堂而皇之地东山再起。此后谁也不怀疑他是党的无可争辩的领袖了。

有一位地方党的领导人甚至在5月会议之前就认识了这一点，这就是约瑟夫·戈培尔，他在2月的班贝格会议上保持着异常的沉默，但仍在写关于慕尼黑“恶棍”的文章。4月里他去慕尼黑，同希特勒会晤了几次。结果是彻底转而相信希特勒的思想，即关于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土地问题与只限于某些托拉斯和象交通运输等部门的国有化的思想。戈培尔的疑虑消除了。他很愿意承认希特勒具有“政治天才”。他在日记上吐露：“阿道夫·希特勒，¹²⁹我敬爱您，因为您是既伟大又单纯。”不久又有一些甚至令人作呕的赞词：“他是一位天才，神圣命运的具有自动创造力的工具。我战战兢兢地站在他而前。他就是这样机伶得象只猫；一发出怒吼，其

宏伟气派有如狮子。”^①他立即就得到了报酬。1926年秋，戈培尔被任命为大柏林党区领袖。那里是施特拉塞尔兄弟的政治中心，他将能够削弱已被他抛弃的前盟友的政治影响。

那时的柏林，不仅在施特拉塞尔的追随者和反对者之间，而且在党的领导人之间、在冲锋队头目之间、各区领导人之间都正发生激烈的冲突。他们的集会引起热烈的辩论，往往变成纯粹个人的辩论，并且在对立派别之间发生殴斗。地方党的领导人无视党区领袖的一切命令，使党的工作深受影响。这一切有待戈培尔去治理；他首先是要向至今未受纳粹党的影响的柏林工人进行党的宣传；首都将为褐衫大军“所征服”。1923年试图从慕尼黑征服它的错误不会重演。堡垒必须从内部攻破。

在奥地利也是这样，希特勒在从兰茨贝格释放出来后影响增大了。许多地方小团体向他欢呼并加入了慕尼黑指导的运动。于是有一段时间存在两个组织，一个是比较独立的老组织，过去曾由里尔博士领导，在他辞职后，这时由卡尔·舒尔茨领导，另一个组织承认希特勒为领袖。1926年奥地利民族社会主义党在帕绍举行会议，由希特勒主持；会上大多数人无条件地接受他的领导，并把已宣布保持不变的二十五点作为党纲。希特勒于是指派一位退役上校弗雷德里希·詹科维克任奥地利民族社会主义党的领袖，并下令清洗那些仍然赞成奥地利党自治的人。虽然奥地利党仍然有自己的党中央委员会，最初设在维也纳，后来设在林茨；实际上它就象德国任何一个地方党组织一样不久就受希特勒的控制。奥地利照搬德国党的结构，设有县和村镇级的地方领袖，还有希特勒青年的专门组织、冲锋队和党卫队。党内那些赞成奥地利党自治的人不是被开除就是被强迫辞职。希特勒这时全面控制了党，并

^① *Das Tagebuch von Joseph Goebbels 1925—26*, pp.72, 74 (13 and 19 April 1926); p.92 (24 July 1926).

且他的党也不仅限于巴伐利亚，而是开始在全德国和奥地利扎根。

这个党仍然是个小党，但它是个正在不断发展的党。1925 年有党员二万七千人，1926 年有四万九千人，1927 年有七万二千人，而 1928 年达到十万零八千人。它就这样能够在经济日益繁荣的时期，同时也是一个它在选举中并没有得到任何选票的时期增加了新党员。如果说这看来有些奇怪的话，可以解释的原因部分是，在这几年间民族社会主义党成功地吸收了已在德国存在几十年的大多数种族主义的和民族主义的团体，以及它们的某些著名领袖，象特奥多尔·弗里奇和雷文特洛伯爵等。许多老党员后来在履历上都自豪地写明，在加入社会民主党之前，他们曾是弗里奇的铁锤联盟、德国民族防卫同盟、德国民族自由党或某一个民族主义体育俱乐部的成员。尽管(或因为)有这个情况，民族社会主义党却比以往更强调同这些民族主义政党之间区分的界线，甚至使用暴力来反对后者。当他们的领袖，也是希特勒的一个老朋友冯·格雷费在法兰克福的一个集会上讲话时，有一个爆炸物抛向空中，引起一阵恐怖的叫喊，警察不得不把人们赶出会场。民族社会主义党已达到目的：阻止了他们的危险的民族主义对手再举行集会。^①

在早期，其他许多加入的人曾是某个自由军团，如高地自由军团、威金自由军团或其他半军事性秘密组织的成员。情况确实是这样，在 1925 至 1927 年间加入的一百二十四名党员这一数量有限的实例中，百分之四十四的人曾属于某一个自由军团或半军事性组织的成员。许多参加者都十分年轻，是中学生、大学生等等。运动的劲头及其狂热劲和拒绝作任何妥协的态度，创造“英雄”业绩的无数机会，与政敌的不断冲突，所有这些都吸引了这些年轻人

^① 一位民族社会主义党的代表阿达尔贝特·吉姆贝尔自豪的叙述，载于 Hauptarchiv der NSDAP, NS. 26, no. 532, Bundesarchiv Koblenz.

和退伍士兵。在这几年间，表现整个运动特征的，与其说是党组织，不如说是党的强有力的助手冲锋队。

冲锋队得到弗兰茨·普菲费尔·冯·扎洛蒙强有力的领导，他以前是一个上尉和威斯特伐利亚及波罗的海地区的自由军团的头头，曾参加过卡普暴动和鲁尔地区的破坏活动，体现了这些活动的特征，特别是体现了通过冲散政敌的群众集会和征服街道来打击政敌的倾向。他的仇恨是针对着魏玛共和国的。在他看来，这个共和国已破坏了一个较为美好的过去和军人的光荣。在他的领导下，冲锋队受训练来控制街道；正如他的一位战友后来提出的：“街道是我们的战壕”。^① 世界大战的观念、战壕的观念就这样输入冲锋队的斗争中，而在战时还是小学生的青少年可以同“前线战士”在一起显示他们的勇气。汉堡的德意志民族自由党的一位领袖向当地的一个民族社会主义党人吐露说：“没有青年人，我们什么也搞不起来，甚至连散发传单也不成。”^②

就在这时，冲锋队不再穿与其他半军事性组织一样的防风上衣，而是有了具有特色的制服：褐色衫、褐色裤、褐色帽，这是受到法西斯黑衫队的启发而设计的服装。它不行军礼，而采用法西斯党伸出右手的敬礼。冲锋队不是象过去在慕尼黑那样按照军队分成连、营等单位，而是以突击队作为基本单位。所有这些迹象表明冲锋队同其他半军事性组织之间的区分界线鲜明得多了，它将成为一个政党依靠的暴力组织，而不能象在戈林和罗姆领导时期那样享受自治权；因为在那两人领导下，冲锋队曾常常同一些目标与民族社会主义党的目标相近的组织合作。

希特勒特别强调区分界线，使他的运动成为那些民族主义和

① 保罗·特恩在莱茵兰向克雷费尔德叙述他 1937 年的回忆，同前引。

② Albert Krebs, *Tendenzen und Gestalten der NSDAP*, Stuttgart, 1959, p.43.

极右翼团体及政党在混乱动摇中的支配因素，并把他的敌手们逼至绝境。他在1926年致冯·格雷费的一封信中表达了这个思想：“我过去一度是个鼓手，今后也将是个鼓手；然而我只为德意志敲鼓，而不是为你和你们这类人敲鼓，愿上帝助我！”^①希特勒在慕尼黑曾与鲁登道夫以及其他极右翼领袖密切合作的这段经历不会再现了。在另一方面，对于在德国北部和西部的民族社会主义党党员和领袖们来说，这个党是他们或他们的父母曾参加过的旧的反犹团体和民族主义团体的延续，而对于希特勒来说，可能还有别的理由来强调这个区别。党员大多来自中产阶级最低层——工匠、小商贩、下级公务员、白领雇员——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发展都使他们感到威胁。一般中产阶级和产业工人一样都没有加入这个党。^②

1926年，柏林的纳粹新党区领袖戈培尔博士写道：“我们不相信，并且永远也不会相信联盟，即一种在这方面或那方面或多或少一致的团体的联合，然而我们相信最强的意志将取胜……。德国的问题不是民族主义者的联合，而是摧毁马克思主义从而实现民族主义的目的。新的民族主义运动将由工人、德国的最年轻的一代来实现。它将是社会主义的，或永远不是。不存在联合的问题。只有战斗，战斗到一方胜利而另一方粉身碎骨。……”^③这位新的党区领袖和他的领袖一样自信；但在1926年，很少有什么迹象表明他们的自信是有理由的。然而，如果没有二十年代中期的耐心的艰苦准备工作，三十年代经济危机期间党的迅速进展则是不可能的。

① *Völkischer Beobachter*, 19 March 1926.

② 这是前汉堡党区领袖阿尔伯特·克雷布斯的分析，前引书，第41页，柏林和北德意志其他城镇也是这样。

③ *Nationalsozialistische Briefe* (1 September 1926) 上的文章。

山雨欲来

1928年大选时是战后最繁荣的时期，稳健政党和共和派政党都获得了重大胜利。主要的共和派政党社会民主党获九百多万张票，天主教中央党获三百七十五万张票，还有两个自由主义的政党获四百多万张票。这四个政党加在一起获票共占投票的百分之五十五，于是，一个由社会民主党总理领导的“大联合”政府在议会中得到一个可靠的多数。右翼反对派遭到大大削弱：在投票中，民族党降到占14%，民族社会主义党降到占2.5%，总共减少五百二十万张票。共和国的无法和解的反对派中还包括共产党，它获得三百二十五万张票，即占总数10%还多。回顾起来，这似乎表明，就是在最繁荣时期，也有27%的选民这样表示了他们拒绝魏玛共和国的态度。同时也表明，为数甚多的政党，如一个经济的政党，一个农业的政党，两个农民的政党，一个汉诺威派的政党等等，在竞选中都未能获得相当数量的选票。在比例代表制的制度下，党派众多，必然在幕后进行交易，于是，在这个并没有真正议会政府传统的国家引起很多批评。

在这些党派中最大的是社会民主党；但它的选民几乎纯粹是工人阶级，并且它缺乏精干有力的领导人，他们多数出身于工人阶级，诚实、辛劳、忠于共和国和民主政治，然而眼光狭隘，已到中年，不可能作出任何重大决策，甚至还不能激起他们自己的党员的热情。其他温和的党派也是如此，在整个魏玛共和国历史时期，没有出现一个政治家能够掌舵通过惊涛骇浪，坚定前进，或能够以民主主义的理想鼓舞本国青年。相反，很值得令人注意的是，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一直和共和国政府关系疏远或持敌视态度，他们或是眷恋霍享佐伦君主国的荣耀；或是从左的方面批评共和国政府。

在中学,青少年并没有受到民主政治精神的教育,他们受到的教育充其量只是对民主政治持十分冷漠的态度,痛恨法国这个宿敌,痛恨凡尔赛条约以及按照条约在欧洲建立的制度。而这时正是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执行一项与法国和解并使德国加入国联和洛迦诺公约的政策的时候。连前总司令保罗·冯·兴登堡元帅自1925年起担任共和国总统这一事实也未能使中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下层同新秩序和解。他们厌恶那些控制普鲁士政府,也时时控制着德国政府的“新贵”社会民主党人,而且他们也惧怕工人阶级,虽然社会民主党人够温和的,而共产党人不再构成一种严重的威胁。

魏玛共和国及其平庸的领导人很不吸引人。一些涉及犹太金融家巴马特也即斯克拉雷克兄弟的贪污舞弊案件也不会使魏玛共和国更引入注意。虽然这是些孤立事件,但在共和国的敌人眼中,这些事件却成了高层领导人普遍腐败的象征。这些敌人也立刻利用了这些事件。曾接受斯克拉雷克兄弟馈赠的柏林市长从外地出差回市时,遇上民族社会主义党所动员的一群暴民大喊大骂,不久他被迫辞职。象这类事件给民族社会主义党,还有共产党提供了真正的子弹,他们好用来攻击魏玛的“制度”,攻击“头头们”靠牺牲诚实的工人的利益使自己致富,攻击犹太人和投机商靠全国养肥。然而,在繁荣年代,有效得多的攻击是右翼报纸大康采恩散布的宣传,特别是舍尔出版社,它拥有几百家地区小报;还有几百个“爱国”俱乐部和退役军人团体的宣传,它们反对共和国及其体制,反对同法国和解,主张要有一个复兴的强大德国,以期打碎“凡尔赛的枷锁”。

这种有组织的恶意宣传打动了数百万人的心,并使他们易受民族社会主义党的口号的影响。民族社会主义党怒斥施特雷泽曼的外交政策,并使他和其他主要政治家不断受到人身攻击,这是造成他于1929年10月过早去世的一个因素。一个狂暴的民族主义

运动很快席卷德国大多数地方，这是一种激烈仇视其他民族和种族、仇视任何和平主义或国际主义纲领的民族主义运动。这种德国所特有的、自世界大战前年代起即已产生的民族主义运动，由于军事上失败和凡尔赛的苛刻条件，使之惊人地发展；后来德国虽然已再次成为一个重要的强国并在国联和国际政治上起重要作用，这一运动也未尝减退。这的确是民族社会主义运动之所以产生的一个主要因素。另一个因素是瞧不起被人通称“说废话的铺子”的国会、部长们和议员们的普遍情绪。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民族社会主义党的宣传同民族党人的宣传只有程度上的不同，没有原则上的不同，并且可望得到大部分居民的支持。

这一点也表现在 1929 年期间，当时德国政府接受了杨计划，这一计划要求德国在以后五十八年中向它以前的敌国偿付赔款，但撤销了以前的道斯计划的某些限制。民族党领袖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也是舍尔出版社社长，为反对这一解决办法发动了一个激烈的运动。他们成立一个全国委员会，退役军人的最大的民族主义组织钢盔团的头头们、中央银行的行长沙赫特博士和希特勒都参加了。委员会起草一份“反对德国人民遭受奴役法”，该法律拒绝根据凡尔赛条约的条款向外国作任何偿付，并威胁要对签订这样一个条约的任何部长处以叛国罪。这一法案以民众倡议的方式，得到四百壹拾三万五千选民的签名，正好超过有权投票者十分之一，但遭到议会拒绝。不过由于这一法案已得到百分之十以上的选民投票，必须提交公民投票表决；1929 年 12 月公民投票得到了五百八十三万九千选民投票支持，比前一年支持两个右翼政党的投票还多几万。这一事件表明，有多少德国人可以被一项十分荒诞无稽的民族主义运动鼓动起来，这一运动的主要目的是要损害德国外交政策的信誉和使政府官员丢脸。最重要的是，这一运动头一次为希特勒提供一个全国性讲坛。胡根贝格的报纸显著地

刊登了他的每一次演说；他从同盟者得到大量的经费并吸引了数百万人的注意。这位世界大战的“无名陆军下士”变成了全国政治舞台上的人物，而他的谩骂的本领也证明大大超过他的同事们，有些鲁尔工业家，象基尔多夫和蒂森，这时就向该党捐赠大笔经费。

他们也以同样的劲头利用了某些地方问题，而且常常取得相当大的成功。在最北部的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农民受到竞争和经济变革的沉重打击，许多人负债累累而拖欠捐税，牲口或农具往往被当局夺走。1928年，某些地区，特别是西岸地区，农民中开始一场抗税运动。抗税很快就变成一场激烈的对抗运动，农民广泛拒绝为农场“资产”付税，并顽强地坚决阻止政府当局夺走牲口等物和强制拍卖。德国许多地方的活动分子，其中有被解散了的埃尔哈特旅和其他著名的自由军团成员，纷纷来到该地区。他们指导农民制造老式手榴弹去攻击政府大厦。他们组织暴力示威并以武力阻止强夺牲口农具等物。1929年，许多农民和几位领导人被捕受审，然而政府当局有一段时间无法镇压这一运动。运动是针对这些政党和政权本身的。如同欧洲许多国家曾发生过的，¹³⁶这是一个被激怒了的农民运动，而在思想意识上则和民族社会主义运动有密切联系，尽管并不受其控制。当这一运动瓦解之后，民族社会主义党就继承了它的业绩，因为传统的保守派和农民组织已大大削弱了；激进主义站稳了脚跟后，也可以轻易引向民族社会主义党的轨道。在这一地区和下萨克森，民族社会主义党人早在1933年以前就在乡村间取得支配地位。1932年4月，戈培尔写道：“我们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一家独唱。这一地区已在我们掌握之中。”^①

在这种情况下，民族社会主义党只要能够利用农民的真正不

^① Joseph Goebbels, *Vom Kaiserhof zur Reichskanzlei*, Munich, 1934, p.80

满情绪，就毫不犹豫地宣传目的而重新高谈犹太人杀人祭神的故事。1929年，在维尔茨堡附近的一个村庄，人们发现一个小男孩遭到杀害，当时这种宣传大肆渲染，于是，维尔茨堡组织了一次群众大会来抵制它。在会上要发言的有一位教士、一位犹太教教士、一位大学教授、市长，还有左派领导人。但当地的冲锋队阻挠他们发言，冲锋队在他们每讲一句话就大叫“听，听”并高唱他们的战歌，直到警察宣布休会才罢。^①在纽伦堡附近，弗兰科尼亚的纳粹党区领导人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主编的《冲锋队员》，以尖刻攻击犹太人及其所谓的性罪行而迅速出了名。寄给报纸的许多册通信证明许多德国人很认真看待它，并且相信它至少有一部分是真实的。^②柏林纳粹党大区领导人戈培尔博士开始使用一种新的宣传方法。当时，根据埃里奇·马丽亚·雷马克的著名小说摄制的美国电影《西线无战事》，在应军事当局作了某些删节后于1930年公映。为阻挠放映，戈培尔及其年轻的信徒们不仅恶意干涉观众，而且在影院中放出一群白鼠，引起观众惊慌。有关当局屈服了，电影审查最高委员会撤销该片公映的许可证。

137 在党内，希特勒的权威日增，地方组织残余的一点点自治权也给剥夺了。本来是讨论政治问题和宣传问题的会议，现在变成为发布命令而召集的会议了。决议不再按前几年的惯例，通过表决决定，而是由上面决定。如果说以前党的地方官吏是由党员选举的，现在也告结束了；无论小地区或大地区的领导人这时都由慕尼黑指派。例如，在1929年，中央下达一道命令，汉堡的大区领导人被撤职，改由卡尔·考夫曼接替，就象戈培尔三年前被调到柏林一样。最高领导人偶尔也举行会议讨论某些重要问题，但没有举行

^① 党卫队队长沙尔夫的自豪的叙述。载于 Hauptarchiv der NSDAP, NS.26, no. 530, Bundesarchiv Koblenz.

^② 这些通信保留在施特赖歇尔文件中，同前引。

任何正式讨论。根据 1928 年 10 月在慕尼黑召开的这类会议的一位参加者的回忆，多数与会者仅仅等待希特勒的决定；但他“拉长着一张厌烦或嘲笑的脸孔，难得说话。显然他瞧不起‘说废话’；于是，等与会者为这种冷漠感到气馁后，他就作出了决定。”^①党内任何人也不敢对希特勒的无限权威提出异议。就是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也暂时接受了这一现实，而且他作为中央机构的负责人之一，成为该党最有影响的领导人之一。他的兄弟奥托仍然坚持德意志式的社会主义，不得不带着很少的拥护者离开了党，组成一个分裂的组织“黑色阵线”。希特勒于 1930 年对一个怀疑者吼叫道：“什么是社会主义？难道不是犹太人发明的使德国人倾轧不和的玩意儿！”^②约在同一期间，他在《星期日快报》上写道：“我们使用的‘社会主义’这个名词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毫无关系，马克思主义是反对私有财产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则不是。”^③

然而，对于党员，特别是在大城市里，反资本主义并不是仅仅一个毫无意义的口号。据前任汉堡大区领导人报告：“对于资本主义和财阀统治的任何攻击在党内中产阶级下层出身的地方工作人员中都有强烈的反应。”^④这一口号对于开始大批参加运动的失业工人，对于“红色冲锋队旗帜下的德国无产阶级”甚至更为适用，戈培尔在柏林投合了他们的心意。许多青年学生和青年军官特别易受民族社会主义党把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混合起来的主张所吸引。他们盼望彻底解决德国问题，盼望能够结束这个“制度”的新的革命事物，这种事物既不是反动的，也不是共产主义的，而是德意志的社会主义的。这些思想虽然从没有明确提出过，但却影响了广大的大学生和其他青年。这些思想的拥护者未必赞成民族社

① Krebs, 前引书, pp.131—2.

② 同前引, 第 46 页。

③ *Sunday Express*, 28 September 1930.

④ Krebs, 前引书, 第 47 页。

会主义的政党，但是从长远看来，在许多表示目的相似但本身软弱而不可能有任何成功希望的团体中，民族社会主义党看来是很有吸引力的。

在军队中，同国防军的严谨保守的将军们正相反，出身最古老的贵族家庭的青年军官为民族社会主义所吸引。1929年，陆军上尉亨宁·冯·特列斯科（他后来因参加反希特勒的阴谋而出了名）在波茨坦军官聚餐会上发表讲话，赞成民族社会主义党的“打碎权益集团的枷锁”的口号。在继续保持着普鲁士卫兵传统的波茨坦各团中，特别是在青年中尉中，这样一些口号被欣然接受，正象1923年在慕尼黑步兵学校学生中产生的影响一样。也在1929年，乌尔姆一个炮步团有三位陆军中尉向十几位同事军官分发一份传单，提出所有赞成“民族革命”的军官应联合起来，“这样国防军就不会向人民的民族起义开火，而是参加起义，并成为未来的人民的民族解放军队的核心。”这些中尉们被说服了，他们就在秋天同民族社会主义党领导人举行的会议上宣布，如果民社党人使用暴力反对杨计划或在德国夺取权力，这一部分军队不会反对他们，“一些单位甚至会参加这个运动。”^①

不久这些青年军官被逮捕。1930年9月德国最高法院以谋反罪对他们进行审判并判处他们短期的“体面”拘留，关在一个堡垒中。在审判时，他们自豪地宣称，解放战争一直是军队的最终目标，因而无论如何，军队决不应被用来反对“最终的民族运动”。情况已很清楚，军队不再是一致的了，许多青年军官正在寻求新的革命理想。至于高级军官，其中最少有一位路德维希·贝克上校——他后来领导了反希特勒的阴谋——在军官聚餐会上公开庆

^① Richard Scheringer, *Das grosse Los unter Soldaten, Bauern und Rebellen*, Hamburg, 1959, pp. 179, 194. 舍林格尔是被告之一，不久即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贺民族社会主义党在 1930 年 9 月选举中取得的胜利:但是这肯定不是高级军官中普遍的情况。一个具有如此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并如此明确主张德国重整军备的运动,必然在对魏玛共和国持冷淡的中立态度的陆海军中得到很多同情支持。

在审判三名中尉时,希特勒作为证人受到审问,并向热烈欢呼的旁听席宣告:“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在斗争中取得胜利后,就会设立一个民族社会主义法庭,而 1918 年 11 月[革命]将受到报复,许多脑袋将在地下乱滚。”^①这样,民族社会主义党将保持“合法的”途径,许多脑袋也将“合法地”滚在地下。因为希特勒决心不再重蹈 1923 年慕尼黑冒险的覆辙。这次审判是在使民族社会主义党在全德初次取得大胜的 1930 年 9 月选举只有数日之后举行的。他们在选举中获得六百四十万张选票,占总数 18.3%,并在议会中取得一百零七个席位(而 1928 年只获得十二个席位)。票数有些增加的其他政党只有共产党和天主教中央党。其他一切政党损失惨重,特别是右翼政党,其党徒开始抛弃它们转向民社党。经济危机已开始,失业人数剧增,而未来该由那些主张用极端主义手段解决的人来决定。

危 机

从 1930 年起,德国陷入一场经济危机,比起 1923 年的通货膨胀危机来,这场危机持续时间更长,从某些方面来讲更严重。失业数字急剧上升,从 1930 年的二百二十五万八千人增至 1931 年 12 月的五百六十七万人和 1932 年 2 月的六百一十二万八千人。其中半数以上没有得到任何经常救济而只有所谓“福利”补助,这完

^① *The Speeches of Adolf Hitler*, ed. Norman H. Baynes, London, 1942, vol. i, p.191.

全不足以维持一家的生活。成千上万的青年工人从未有机会进入工厂或车间。冲锋队在这些年间正是特别从失业队伍中招募了一支三十万人的队伍。其成员60%以上是长期失业者：例如在汉堡，四千五百人中有二千六百人长期失业。许多失业的冲锋队员住在冲锋队“兵营”里，获得食宿之所。但还有一大支大学生无产者，成千上万的大学生在未来既无找到工作的希望，现在又没有什么钱可付学费以维持学业。民社党在大学中特别迅速发展起来。有很多人参加了民社党大学生组织，更多的人投票支持它。1931年在格拉茨举行的德奥大学生大会上，民社党获得明显的多数。在埃学尔兰根、布雷斯劳、耶拿、罗斯托克、格赖夫斯瓦尔德等地的大中，它也获得迅速发展。其他许多大学的大学生会议也受到民社党和右翼团体的联合控制。双方在扰乱他们不喜欢的某些具有显著的左派观点的教授的课堂或殴打左派学生和犹太学生时通力合作。政治冲突在某些大学中变成日常发生的事。在大工业城市的大街上也是如此，在那里，民社党、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或毋宁说它们各自的半军事性组织相互激烈争夺政治支配权；政治敌手遭到无情的攻击和殴打。冲锋队在这种暴力气氛中自然就发展壮大起来，吸引了很多青年恶棍无赖和爱好斗殴的职业打手；^① 特别对年轻一代以及退伍士兵和军官中许多热心的民族主义者和反共分子具有吸引力，这些人切望与马克思主义和赤色分子作斗争。一个复员军官在阿尔托纳城与共产党人进行了几次街头流血冲突后，热情洋溢地写信给一位同事军官说：“对于我们来说，民族社会主义是一种目的、一种信仰、一种宗教；据我们看来，党组织是一种过渡形式，同时也是联合德意志民族的手段。如果在今后半个月内左派激进主义分子未遭到国家和各州当局采取有力措施加以反

^① 他们的自传式汇报，其中有好几百份保留在 Hauptarchiv der NSDAP 中，绝妙地描绘了 1933 年以前冲锋队藉以发展壮大的暴力气氛。

对,我们就会发生内战……。”^①

尽管法律和秩序时时受到严重威胁,而警察也不得不对付骚乱者——这些骚乱者往往是共产党人和民族社会主义党人——但并没有象意大利“向罗马进军”前发生的那样破坏当局权威的事,没有发生诸如法西斯分子组织数以百计的惩罚性讨伐,没有焚烧或破坏社会党人或工会的财产,也没有迫使社会党人、市长或其他官员辞职的事。直到1932年7月以前,普鲁士警察一直坚定服从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并象对付极左派一样采取有效行动来对付极右派。不论什么地方军队都不同褐衫队来往,而且许多士兵也同样讨厌他们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军事上的无能。军队领导人决心阻止以褐衫队民兵的形式成立一支对立的军队,而意大利则曾发生过那种情况。高级军官集团中对冲锋队的厌恶情绪因大多数冲锋队领导人来自自由军团而更加深化。而且,在非常保守的将军们眼中,他们是不可信赖的危险的革命党人和冒险家,有的还有一段声名狼藉的历史。

激励柏林冲锋队的是什么精神,这可从相隔六个月的两次叛乱中看出。1930年8月,愤怒的冲锋队队员冲击了党的总部并威胁了党区领导人,使他被迫求警察保护。希特勒不得不亲自干涉,通过由他自己担任冲锋队最高领导的职务而恢复了他的权威。以后他就有权任免冲锋队领导人,这些人必须向他个人宣誓效忠。普菲费尔·冯·扎洛蒙上尉辞职。几个月后,罗姆上尉被他过去的被保护人希特勒从巴伐利亚召来并担任了冲锋队参谋长。党卫队则变成一支由它自己的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领导的独立的部队。希姆莱年轻时曾参加慕尼黑暴动,后来成为施特拉塞尔的秘

^① 1932年7月22日, L. K. 施特里德致杜维尔特少校的信,载于Reichswehrministerium, Wehrmachtsabteilung, Geheim-Akten, O. K. W. 881, World War II Records Division, National Archives, Washington, D.C.

书。

然而，这次改组并没有结束冲锋队内的反叛倾向。他们尤其是直接反对希特勒正式的“合法性”方针。罗姆在德国东部的副手，前自由军团领导人瓦尔特·施滕纳斯上尉，拒绝接受这一方针，一心要把戈培尔从他的党区领导人位子上搬开，并为冲锋队取得更大的独立性。希特勒再次进行干预，并在1931年4月命令撤了那些不可信赖的冲锋队头目的职务，改由忠诚的党卫队成员担任。单在柏林就有数百名冲锋队员退出或被开除，他们不久就和奥托·施特拉塞尔的革命的民族社会主义党人合到一起。但是这个分离主义运动规模一直很小而且很孤立。它向“工人、农民和士兵”^①发出的呼吁在群众中没有得到什么响应。另一方面，据有几次向罗姆所作的汇报，在冲锋队中仍广泛散布一种意见，认为希特勒的合法方式是不切实际的。失业者以及其他许多人不相信种种合法途径的策略而要采取行动，不惜任何代价的行动。他们想拼命，危机持续的时间愈长就愈想拼命。

然而希特勒由于宣告采取合法途径而办到一件事，即按其宣告的表面价值受到某些高级官员赏识。在施滕纳斯被开除几个月后，国防部长格勒纳将军询问普鲁士内政部政务次官阿贝格，他是否给过施滕纳斯钱。阿贝格回答说，因为他没有经费，偏巧未能这么做，但是施滕纳斯应该得到支持。格勒纳宣称，要是这样做是十分错误的，因为希特勒是遵守法律的人，“必须支持他来反对其他无法无天的人。”吃惊的阿贝格问将军是不是信了希特勒说的任何一句话，但格勒纳一再说：“他是遵守法律的人。我们不应做任何事情反对他。我们必须支持他。”^②在1932年1月举行的一次军事领导人的会议上，格勒纳在会晤希特勒后宣称，希特勒是个“谨

^① 有意思的是，这是施滕纳斯的报纸的名称。

^② 转引自 Heiden, 前引书, 第337页。

慎的人，并决心根除革命思想”，说他“要精益求精”，说“希特勒的意图和目的都是好的”。^①国防军这时接受属于民族社会主义党人的新兵，而且也允许士兵参加挂有卐字标志的集会。这种来自最高层的支持对于民社党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从其他方面也得到十分明显的支持。1931年，希特勒向农业界领袖和勃兰登堡贵族详细阐明了他的目的。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对于农业同盟丧失的选票被民族社会主义党所获得一事很不高兴。但当希特勒说完话，其中的一个人站起来说：“我代表所有出席会议的人要求不要开始讨论。我们所经历的庄严时刻不应受到干扰。农业同盟宣布放弃对纳粹党的一切反对，而且反而要开始进行密切的合作。”^②农业同盟是泛德意志联盟的老会员之一，此后也支持希特勒。与农业利益集团靠得很拢的民族党也支持希特勒。1931年1月，希特勒与胡根贝格会晤并发表一项声明说，他们将在今后合作以推翻魏玛的“制度”。 143

10月份，民族主义反对派在巴特哈尔茨堡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群众大会，右翼政党领袖们都参加了，有钢盔团及其他半军事性质组织的头目，以及诸如泛德意志联盟领袖克拉斯和退役的将领泽克特将军等。然而会上也出现大量的磨擦现象。钢盔团分遣队比冲锋队神气得多，希特勒在他们分列前进之前突然离开了会场。民社党议会党团领导人威廉·弗里克设法安抚他们自己队伍中持怀疑态度的人，这些人对于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合作提出批评。弗里克指出墨索里尼的榜样，民社党将效法他，首先必须组成一个民族主义联合政府，但他们要求充当政府的领导人而并不放弃自己的任何目的。1932年1月希特勒向一些更重要的听众发表讲

^① 1932年1月11日在国防部举行的会议。转引自 F.L. Carsten, *The Reichswehr and Politics*, Oxford, 1966, p.334.

^② 赫尔曼·格梅林博士于1931年2月4日写的信，载于 Hauptarchiv der NSDAP, NS. 26, no.513, Bundesarchiv Koblenz.

话，那是些在迪塞尔多夫工业俱乐部聚会的来因与鲁尔地区的工业家。这次讲话强调首要的事是要在德国恢复一个健全的全国政体，这给与会的资本家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从而重工业的大笔捐献源源而来，流人民社党的金库中”。^① 弗里茨·蒂森的报告这么说，是他安排了这次聚会，他已在前一年参加了民社党。

由于得到这种支持，并由于国家经济每下愈况，民社党发展迅速。1929年底，它有党员十七万八千人，1930年底约有三十八万人，而1931年底超过了八十万人。党员38%的年龄在三十岁以下，这人数远比其他任何党派多得多。从整个社会来看，他们当中体力劳动者占的比例较少，而白领工作者、公务员、农民和独立经营的商人较多。象以前一样，这类社会集团因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标准和不满情绪而特别易受民社党所吸引，但尤其是危机的受害者，不仅失业者，而且也有普遍被剥夺继承权者都纷纷加入该党；于是，该党仔细组织的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增添了热情的听众。大会上奏起令人鼓舞的军乐，浩浩荡荡的褐衫队队伍把密集的旗帜扛进会场，最后讲演人就在“万岁”欢呼声中现身。探照灯照亮了讲台和讲演人，讲演人的声音常常被雷鸣般的掌声所淹没。这种气氛逐渐地也感染了那些出于好奇或模糊的同情而来参加大会的人，他们被卷进大会上弥漫的激动与狂乱的情绪中，千年至福的希望和深深的仇恨交加的旋涡中。千百万德国人神魂颠倒地希望这个运动，特别是其领导人，将使他们摆脱贫困和痛苦，建立一个拥有力量和光荣的“第三帝国”，一个比俾斯麦的第二帝国更强大的德国，并且把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威胁永远排除掉。

这种宣传也比别的政党的宣传远为广泛，深入到最小的市镇和最偏远的村庄。在新教的德国北方，路德派教士常常惯于在这样的集会上讲话。民社党人认识到民族主义和宗教如能联合则更

^① Fritz Thyssen, *I Paid Hitler*, London, 1941, p. 132.

好，于是谈“制度”的罪恶外，最常谈的话题是两者的联合。“使纳粹党受尊敬的原因是他们的强烈的民族主义，巧妙利用宗教和保守派给予的支持”。汉诺威附近一个小镇上一位政治舞台研究者作了如下一番描述。^①在那里，象在其他地方一样，正是对社会民主党的痛恨把这些居民赶入了民社党的怀抱。在这个小工业城镇中，社会民主党是居于统治地位的政治力量，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共产党力量微弱得不足道，几乎没有什么犹太人。由于得到许多声望很高的人——其中有地方法官、中学校长和几位教师、铁路管理局的高级官员——的支持，民族社会主义党在那里设法获得的选票，1930年达到全体选民的28%，1932年7月达到占全体选民的62%，这两次的得票数都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数。中产阶级政党实际上是瓦解了；然而镇上的主要民族党人对民族社会主义党人取得的成功感到很高兴，而民族党的报纸也在社论上给他们以支持。但是民社党组织的党员人数却仍较少：在这个 145 镇上，1933年以前冲锋队约有五十人，而党员只有约四十名。

至于民社党势力的地区分布状况，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由于连年发生农业危机，一直是民族党获得选票最多的地区。接下去是其他农业地区，如汉诺威—不伦瑞克、梅克伦堡、波美拉尼亚、西里西亚、东普鲁士，但也有萨克森和图林根等的一些经济灾难特别严重的工业区。所有这些地区都位于新教的德意志北方。普法尔茨和弗兰科尼亚是德国南方唯一落入这个组织手中的地区，这两个地区主要是农业区，受到农业危机严重打击。居民部分是新教徒，部分是天主教徒。民社党获票较全国平均数少的那些地区主要是德国南部和西部的天主教区，这些地区部分是工业区，部

^① William Sheridan Allen, *The Nazi Seizure of Power — The Experience of a Single German Town*, Chicago, 1965, p.133. 他对于一个小镇的有意义的研究所作的评述也适用于其他许多城镇。

分是农业区,以及柏林、汉堡、莱比锡、迪塞尔多夫和科隆等大城市。尽管民社党的宣传集中在工人阶级居住区和大城镇,毫无疑问,天主教区远比新教区能够抵制它的诱惑,大城市和工业区也比小城镇和农业区能抵制。天主教徒常常被民社党的新异教的一套所吓坏。一般来说,在象弗兰科尼亚和普法尔茨这样的有不同宗教信仰的居民杂处的地区,新教徒似乎特别易于受民社党宣传的欺骗。非常奇怪的是,同全国其余地方,特别是某些城镇比较起来,在这同类地区,战后接替民社党的人取得了十分巨大的胜利。所以,即使在1945年大变动之后,政治行为的模式也有持续下去的倾向。

半独裁政府

从1930年以后,统治德国的不再是议会,而是依赖老总统兴登堡元帅信任的政府,这个政府颁布一些“紧急法令”,事后交由议会通过。总理是海因里希·布吕宁,他是天主教中央党的领袖,是由暗中掌握军队很大实权的冯·施莱歇将军向总统提名的;施莱歇得到总统的充分信任。议会中最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为了防止成立公开的右派政府,容忍了布吕宁的政府及其紧急法令。政府的这种方式依赖于总统与总理的密切合作,而总统在1932年已八十五岁了,很容易受其近侍人员的影响。此外,同年他的任期也已届满,需要举行另一次选举。

民社党提出希特勒作他们的候选人,他刚成为德国公民。而共产党提出他们自己的领袖。那些保证要抵制右派和左派极端分子以保卫共和国的政党,除了那位年迈的元帅外,竟然不能找到别的更好的候选人,而老元帅是七年前作为右派提出的候选人与中央党领袖竞选而被选上的。这真是表明魏玛共和国末年德国民主政

治可悲状况的朕兆。这些温和的政党,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为了防止希特勒上台”,投票选了兴登堡,他是霍亨佐伦王室的忠诚的臣仆和极端保守主义的象征。尽管他们这么投了票,兴登堡在1932年3月的第一次投票中未能获得绝对多数,而希特勒却取得30%的选票。这样就需要进行第二次投票,这次兴登堡获得占总数53%的选票,但希特勒的那一份也增至37%,而共产党候选人只得到10%的选票,这显然证明,来自右的危险要比来自左的危险大得多。选举也表明社会民主党的地位岌岌可危,它的主要口号是保卫民主,即保卫依靠发布紧急法令和一位并非民主党人的年迈总统的那种民主。

在重新选举总统后只有几天,这种保卫之变化无常就变得很明显了。兴登堡的老战友,国防部长格勒纳将军要解散冲锋队,因为冲锋队应对德国每日发生的许多政治暴行负责。格勒纳是在德国一些主要的州的内政部长施加的强大压力下这样做的,同时也得到军队领导人和总理的支持。4月13日,这道命令在总统签署下发布了。但只过了两天,施莱歇将军就向总统汇报说,“在总统府和国防部正酝酿着一场反对这项紧急命令的骚乱。”在波茨坦的皇太子也声援他的朋友施莱歇的意见,他写信给格勒纳说:“我只能认为这道命令是个严重错误和对国内和平的严重威胁。我简直不能理解,你身为国防部长,竟能帮助摧毁在冲锋队和党卫队领导下统一并从中获得宝贵教育的最好人材……。”^①事实上,这是一次政府危机,因为它是取决于总统和军队司令部的信任的,这二者不再信任格勒纳将军。当施莱歇威胁说主要的将军们要集体辞职后,格勒纳被迫于5月辞职。这个事件致命地削弱了布吕宁政府,动摇了兴登堡对他的总理的信任,布吕宁一直是忠实地支持格勒纳的。施莱歇要把民社党拉进政府,使他们也分担政治责任。然

^① 转引自格勒纳文件,前引书,第344页。

而，只要布吕宁任总理，这一点是做不到的。5月底，布吕宁由于总统撤消了对他的信任，也被迫辞职。新总理弗兰茨·冯·巴本是施莱歇提名的候选人。

巴本意思是要完成布吕宁未能完成的“奇迹”，即使民社党驯服并吸收他们加入政府。但这必须先付出代价才能这样办理，议会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就解散了，7月举行新的选举。这次选举给希特勒带来新的胜利，他的党获得一千三百七十五万张选票，有二百三十名代表当选，从而成为议会中最强大的政党。共产党所获票数中等，这时有八十九名代表当选。这两个极端的政党头一次一共拥有超过50%的席位，因此拥有多数票的政府也无法组成。巴本政府——普遍称为“贵族政府”——只得到民族党的支持，而民族党只获得总数6%的选票和三十七个席位。这样，接替一个仍拥有议会多数的政府的是一个几乎没得到民众支持的政府。甚至在选举之前，民主政治的一个最后堡垒就被摧毁了。德国最大的州普鲁士的政府是由社会民主党控制的，这时因军队采取行动而被罢免，巴本由一道总统法令被任命为普鲁士的州长官。普鲁士的警察同军队比较是忠于共和国的一支力量并能够很好保卫民主政体的，这时转而受不同的人指挥。共和国群众组织保卫民主的意志，如果需要依靠武力来实现，这时就更无能为力了。

希特勒在布吕宁倒台和大大加强他的力量的选举举行之前，极其注意不去冒犯施莱歇而且不能有损两人之间的友好关系。这两个人经常会晤，施莱歇公开谈到他厌恶总理。有一次一家民社党的报纸攻击施莱歇，希特勒马上干预。犯过失的人不但被撤去《汉堡日报》主编的职务，而且被开除出党。希特勒对他说，这样一种攻击必然要破坏军队对纳粹党的信任：他是独自对党的政策负责的，编辑不应有自己的意见，也不允许有独立的路线。^①选举过后，

^① A. 克雷布斯 1932年5月19—20日的日记记载，载于 Nachlass Krebs,

施莱歇和巴本还试图争取希特勒实行合作的政策，答应给他副总理和普鲁士控制警察的内政部长的职位。可是希特勒要求不低于总理的职位和六个其他部长的职位，这样使他能完全控制政府。他也大谈要铲除马克思主义者，要给冲锋队三天在街上自由行动权，要求给他自己全部权力。

于是，巴本政府打算使民社党“驯服”的企图在8月间落空了。同月，一个波兰裔的共产党员被五个民社党员踩踏至死。当凶手被博伊滕法庭判处死刑时，希特勒给这些凶手发去了电报：“我的同志！面对着这一穷凶极恶的血腥判决，我感到自己靠无限忠诚的纽带和你们连在一起。从这个时刻起，你们的释放已成为一个有关我们的荣誉的问题，同竟可能作出这种事情的政府进行斗争是我们的责任！”^①即将公开进行战斗。希特勒所需要的是全部权力，而不是一块饼；而他的党徒们一如其领袖疯狂和不顾一切。

希特勒做着疯狂地扩张德国的迷梦，而且他使来访问他的人欣喜。他对其中之一说，要达到“对所有欧洲国家占有决定性优势”，从奥地利、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波兰西部和波罗的海诸国中必须建立一个核心；邻近德国东部的地区“要进行德意志农民殖民。我们要把捷克人和波希米亚人迁移到西伯利亚或沃利尼亚^②去……”^③他还告诉另一个党徒说：“有朝一日我们将统辖庞大的地区，负责广阔空间的安全。我们只用十万人或三十万人的兵力能办到吗？我们要动员几百万的兵力……”^④这些话首先是针对

(接上页注) no.1, Bundesarchiv Koblenz.

① *The Speeches of Adolf Hitler*, ed. N.H. Baynes, vol. i, p.166 中的译文稍有不同。

② 曾先后属俄国、立陶宛和波兰的地区，现分别并入乌克兰社会主义共和国和波兰。——译者

③ Hermann Rauschning, *Hitler Speaks*, London, 1939, p. 46.

④ Krebs, 前引书, p.145.

军队领导人说的，希特勒认为这些人完全是些蠢才，只知道谈论职业军人和一小支机动部队。然而令人对他的疯狂预言感到吃惊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他的这些梦想竟变成了可怕的事实。在他的脑子里，想入非非的幻想与现实奇妙地混合在一起。

1932年秋，当取得权力的一切希望看来由于政府的反对而受挫时，可以看到希特勒的党徒们已变得多么肆无忌惮。柏林运输工人不顾工会的劝告，爆发了罢工。这次罢工是共产党领导的，但民社党党员也加入了，以便表明他们坚决反对“反动”势力。有几天柏林一片混乱。赤色分子和褐衫党人的联合阵线攻击那些愿意工作的司机和试图保护他们的警察，把水泥倒入电车轨道的转辙器，破坏铁轨，拉下高压电线，进行大规模破坏。警察要恢复秩序十分困难。许多人被这一事件所暴露出来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幽灵吓坏了，他们投希特勒的票原是希望保护他们免遭布尔什维主义威胁而不是要使二者更接近。在罢工过后几天的选举中，民社党遭到多年来第一次重大的失败，失去二百万张选票和议会中三十四四个席位。大多数其他政党也丧失了选票，但共产党的得票又增加了，这时有一百位代表当选，而民社党是一百九十六名。失业人数在1931年—1932年冬天曾大大超过六百万，到秋天已下降到五百一十万。第一次有迹象表明经济危机的高潮已过。这会成为希特勒完蛋的开始吗？然而，很有意思的是，希特勒自己不把11月选举的失败归咎于任何客观因素，而认为主要是由于施特拉塞尔派的“不正当行为”和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的持久的暗中破坏工作和怠工，^①他就此成功地在自己党内找到一个罪人，一个叛徒。

^① Gobbels, *Vom Kaiserhof Zur Reichskanzlei*, p.199 (under 8 November 1932); 同前引, pp.191—2, 论11月2日运输工人的罢工。

夺取权力

1932年11月的选举不仅使民社党受挫，而且也打破了巴本政府的希望，它仍然几乎得不到什么议会支持。巴本因此要求总统给予广泛的权力来修改宪法，不需议会就可进行统治。但他遭到国防部长施莱歇的反对，后者不愿让军队参与保卫这个如此得不到民众支持的政府，并担心巴本政府会使军队上街去“反对百分之九十的国民”。必须不惜任何代价避免这一局面出现，国防部中安排了一次军旗游戏，证明军队是不会有能力对付赤色分子和褐衫党联合举行的总罢工和怠工的。而在这样的局面下军队就会受到工会和几百万其他人的支持这一点却没有得到考虑。这个军旗游戏达到了它的目的：巴本不得不辞职，而施莱歇将军不得不勉强当上总理。他的计划是同工会合作，当个“社会的”总理，并且要争取一些“温和的”民社党人支持他的社会改革计划。在重新试图和希特勒谈判破裂后，他给施特拉塞尔一个部长职位。

然而这个分裂民社党的企图彻底失败了。施莱歇取得的唯一成功是施特拉塞尔于12月7日辞去党内一切职务并到外地去“休假”。但他并不打算在党内纠集反对派，也不接受施莱歇领导下的任何职位。希特勒把他的亲信召集起来，向他们发表了长时间的讲话并使他们重新以效忠他为义务。他们庄严地保证对付一切困难，要效忠到底，而希特勒也亲自接过施特拉塞尔的多数职务。戈培尔的日记证明，党内存在深刻的危机，存在分崩离析的危险。他在12月8日的日记中记载：“组织内意气十分消沉。财政困难使得任何有意义的工作也不可能做。”两天后又写道：“柏林党区的财政状况毫无希望。”同月早些时候他认为“国家的形势是灾难性的”，在15日他写道：“现在正是我们掌权的时候。不过暂时

连一点点的机会也没有。”^①

圣诞节时，戈培尔仍认为前途“黑暗而没希望”，但过了几天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1933年1月4日，希特勒在科隆银行家冯·施罗德家中与巴本会晤，两人之间达成和解。巴本在四个星期前匆匆去职之后，已变得同施莱歇不共戴天；而政府仍完全依赖老总统的信任，他必须签署“紧急法令”。然而兴登堡真正喜欢的总理是巴本；因为他尚未搬出总理办公室，所以两人每天都碰头。此时，轮到巴本在施莱歇当老板时遵矩守法的时候了，但巴本却在策划一场见不得人的阴谋。民社党和民族党恢复了联盟关系。同希特勒的会晤在柏林继续进行到1月下旬，总统的儿子奥斯卡·冯·兴登堡上校和总统的副部长奥托·梅斯纳博士也参加了会晤。正是通过他们使老元帅赞成任命希特勒为总理的计划。他们是巴本铸造的链条中的环节。

施莱歇得知这个谈判，跑去找总统并要求给他类似巴本想得到的权力，即解散议会和共产党及民社党这两个极端的政党，暂时在不要议会的情况下进行统治。然而总统对于反对巴本的阴谋以及施莱歇参与其中的事记得很清楚，拒绝给予他想要的权力。兴登堡本来想要的是另一届巴本政府，但军队领导人竭力反对，他们仍然担心会为了保卫这个政府而反对大多数国民。有两位主要的将军于1月26日跑去找总统，警告他这样一个方针有危险；但总统似乎是误解了他们焦虑的因由，宣称：“先生们，你们别以为我会任命这个奥地利陆军下士为总理，不可能。”^②可是四天以后，这位奥地利陆军下士却被那位曾坚持不要他的总统任命为德国总理了。

152 另外只有两个民社党人入阁，即弗里克和戈林，被多达九名的保守

^① Goebbels, 前引书 pp. 217-19, 223, 225, 229.

^② 冯·哈默施泰因与冯·布舍-伊彭堡两位将军都传达了这句话，Carsten, 前引书, p.391.

党人和民族党人所包围。这正是向罗马进军后的墨索里尼政府的局面。但指望非民社党人能制止住这股汹涌潮流的任何希望都是注定要落空的。他们的缺乏群众支持的老式的谨慎的策略是敌不过充满着狂热的生气勃勃的革命群众运动的。一党独裁的无限权力，在意大利是需要好几年才能取得，在德国只要几个月就取得了。

1月30日晚上，当组成希特勒政府的消息宣布的时候，全德国掀起了一股热烈而疯狂似的浪潮。每个城镇都组织了火炬游行，参加者不仅有冲锋队和民社党，还有钢盔团（其领袖也成了政府的一员）以及一些类似的民族主义组织。有几小时，群众游行队伍经过柏林大街时向希特勒欢呼，他被他的亲密的合作者围着站在总理办公室窗前，和兴登堡总统站的窗口只隔着几个窗子。在一连串软弱的和越来越不受群众支持的政府之后，德国这时有了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11月选举中42%的投票者已投了在1月30日联合竞选的两个政党的票。这不是多数，政府仍要依赖老总统的信任。但在第一次会议上，政府就决定解散议会重新举行选举，以便从选民取得支持它的裁决并把42%变成一个多数。由于政府控制着政权和国家的财力，它具有影响选举结果的广泛可能性。新的国防部长冯·布洛姆贝格将军是施莱歇的宿敌，他亲自保证对军队的控制。布洛姆贝格受到他的参谋长和师里牧师的影响而支持民族社会主义运动，这些人是希特勒的热烈颂扬者。

建立希特勒政府没有遇到什么反对。因为新总理是由总统合法任命的，而且这一任命又受到成百万的民族主义者和守法的德国人的欢迎，要说有什么抵制只可能来自左派。但德国的左派本身就四分五裂。共产党发出总罢工的号召，象1920年曾推翻卡普“政府”那样的总罢工，但无人响应号召。多年来，共产党一直把社会

民主党称为“社会法西斯分子”，只是在程度上不同于“民族法西斯分子”，常常受到诽谤中伤的社会民主党这时怎么能够同他们的共产党敌人联合起来呢？他们自己也不主动采取什么行动，就连六个月前巴本搞政变推翻了普鲁士的政府他们也没有采取行动。德国工人阶级运动的反抗力量已因连年的挫折和失业，因试图保卫一个已无民主可言，并且在群众中已激不起什么热情的共和国政权而遭到削弱。虽然成千上万的党员热情希望从柏林发出将号召他们武装起来的信号，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却决定什么事也不干。按照他们的意见，党既然曾经受过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法的风暴，它同样也能渡过新的迫害浪潮并胜利地抬起头来。许多人存着万一的希望，即希特勒也会象他的一些前任者一样，毫无解决德国的问题的办法，然后又被另一位总理所取代。很少人认识到民社党一旦掌了权，只有地震才能搬开它。从军事方面来说，任何反对冲锋队、警察和军队的联合力量的抵抗都是毫无希望的；这三种力量已联合起来反对左派，尤其是欢迎借这个机会来清算“1918年11月的耻辱”。

这时任普鲁士内政部长从而控制了警察的戈林，实际上为这样一场斗争作好了准备。成百上千的公务人员被撤职，由民社党人取代。他命令警察避免采取任何反对冲锋队和钢盔团的行动，但对“国家的敌人”不必手下留情，要狠，必要时可以开枪。2月22日成立了一支五万人的“警察辅助队”，其中四万人来自冲锋队和党卫队，一万人来自钢盔团，以帮助正规警察对付反对派。成立了国家秘密警察（盖世太保）来对付反对政权的敌人并逮捕政治嫌疑分子。因此，就是在国会大厦被纵火焚烧之前，要粉碎所有反对派的恐怖机构已行动起来。在德国很多地方，冲锋队认为复仇的时刻已到，他们滥用法律、不分青红皂白地逮捕和拷打人。

选举的六天以前，2月27日晚上，国会起火了。现在一般人认

为并不是民社党人纵火的，或最少不能证明是这样。但看来还是令人费解，一个半疯的前荷兰共产党员马里努斯·万·戴·卢贝，¹⁵⁴如没别人帮助怎么能完成这一功绩。无论如何，正是民社党从这件事得到好处，就在当天晚上，数以千计的著名共产党员、社会党人和激进派，其中包括许多国会议员，被逮捕了。其他数千受害者被围捕，抓到冲锋队营房，受着非人的待遇，许多人被毒打至死。反对派报纸被取缔，根本不可能进行反对活动。2月28日颁布了一道“保卫国民和国家”的法令，取消了人身自由，出版、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等基本民主权利，允许搜捕、查抄和检查邮件。对谋反、放火、怠工和放毒都可以处死刑；对谋害总统、政府官员或高级官员生命的人以及武装叛乱分子也可处死刑。所有这些表面上是针对共产党的，但可以毫不困难地扩大应用到反对政权的其他敌人身上。

在这种恐怖气氛中举行了3月5日的选举，这是最后一次表面上仍然用民主方式来选举议会。民社党获得占全数44%的选票，它的盟友民族党获得8%。这使它们获得一个52%的勉强的多数，但不是修改宪法所需的三分之二的多数。社会民主党实际上保住了他们的力量，甚至共产党也只减少一点点并仍拥有八十一名代表，天主教中央党得到少数席位。因此，这三个主要反对派政党从选举中几乎没有遭到什么削弱，但是民社党却进一步蚕食了资产阶级政党。3月21日，在埋葬着普鲁士历代国王的波茨坦要塞教堂举行了新议会的开幕式，这地方是反映霍亨佐伦王室过去的丰功伟绩的殿堂，象征着老德意志的力量和新德意志力量的统一。穿着正式的制服的老元帅、许多现役的和退役的将军，还有不穿党制服而穿着晨礼服的阿道夫·希特勒也是这种象征。“波茨坦节日”起了消除德国国内许多人的忧虑和危惧情绪的作用。

两天后，议会在克罗尔歌剧院开会。剧院大厦及周围街道布

满穿制服的冲锋队和党卫队来威吓代表们。共产党人被剥夺了席位，许多社会民主党人也被阻挠参加会。政府向议会提出一项“授权法案”，“以消除国家的不幸”；这一法案给予政府四年为期的不必商诸议会的立法甚至修改宪法的全权。法案以四百四十一票的多数对九十四票通过。这一法令成为建立第三帝国的基础，并于1937年期满时颁布法令延长。只有社会民主党投票反对授权法。它的领导人奥托·韦尔斯发表了一篇庄严的讲话，保证他的党忠于人道、正义、自由和社会主义各永恒的原则，这不是授权法令所能摧毁的。如果说他的党没有对独裁制度的建立作任何抵制，至少也没有丧失荣誉。所有其他政党，包括中央党在内，都投票赞成授权法。议会政府告终，或毋宁说是逐渐消亡了，因为从1930年以后它就逐渐为“总统”政府所取代，很少有人为其消逝感到遗憾。而且，所有这一切都是利用宪法规定的机构“合法地”完成的。

一 体 化

1933年春夏间发生的事情，最好用“一体化”这个词来形容，这就是说，从滚球俱乐部到养蜂，一切事情都在民社党控制下进行。军队通过新的国防部长领头前进。3月1日，冯·布洛姆贝格将军宣称“只有一个党在行进中，因此保持‘超党派’的态度已丧失其意义，只有一个方针：毫无保留地支持。”三个月后布洛姆贝格向负责指挥的将军们重新提到“只剩下一件事：十分忠诚地为民族社会主义运动效劳。”^①军队从迅速开展的重整军备中得到巨大的好处。同时，各州政府也就范了。普鲁士由戈林控制。对其他州也

^① 布洛姆贝格于1933年3月1日和6月1日分别向师级和军级指挥官发表的讲话，载于Carsten，前引书，pp.395,397.

任命了一些专员去接管政府，并于3月底解散其议会。然后任命一个本地的民社党员——往往就是党区领导人——为有关的州的帝国州长，拥有任免官员的全权。这样，德国就不再是联邦国家了。普鲁士、巴伐利亚、萨克森等州丧失了几百年来曾拥有的权力。 156

接着就轮到工会了。5月1日被宣布为“全国劳动节”，在工会领袖全力支持下在全国进行了庆祝活动。但在第二天，全德国的自由工会的房屋和办公处就都被冲锋队占领，工会被解散，工会领袖被逮捕，许多人和成千上万政权的其他敌人一起被关进集中营。6月，基督教工会也遭到同样的命运。成立了“德国劳工阵线”来取代这些工会，所有的雇主和雇员都得加入，不象意大利那样分别加入单独的行业协作组织，而是在共同的组织中。“德国劳工阵线”虽然接管了工会的财产，但并不起工会的作用，因为不再有什么集体谈判或工人阶级行动，它的宗旨是维持工业和平和促进社会福利计划。社会民主党的房屋、报纸、财产也同样被剥夺；6月，这个党因“颠覆和敌视政府”而被解散。民族党，它的一些部长在政府中与民社党员共事，试图发起一个绿衫队运动来与希特勒的褐衫队抗衡，在这么做的过程中吸引了很多反对民社党的人，也招来了惩罚。6月底，民族党的机关被警察占领。这个党于是“自动”解散，之后，其领袖胡根贝格辞去政府职务；而在意大利，民族党是加入了法西斯党的。7月初，其余的政党——中央党、人民党、巴伐利亚人民党——也自行解散。于是法律规定民社党是国家唯一的政党；任何想保持或组成另外的政党的企图都该惩处以徒刑或监禁。德国是一党制国家。

国民活动的一切领域都经历了同样的过程。设立了一个全国文化协会，下设美术、音乐、戏剧、文学、广播、电影和报刊等附属协会，来控制文化生活。在这些领域中工作的任何人都必须参加有

关的协会,所有的犹太人和反对政权的人都被排除在外;从而丧失生计。甚至早些时候,政府所憎恶的一切作家,不论是犹太作家、
157 左翼作家或简单的颓废派作家,他们的书就已被狂热的学生群众烧毁。犹太人教授和左派教授遭受到组织得很好的扰乱,已不可能讲课了。根据一项“专职行政机构复原”的法律,大学和行政机构遭到清洗,犹太学生不许参加考试。在很多情况下,犹太医生、律师等执业时都受到阻挠。1933年9月1日,施特赖歇尔宣布在全国范围内抵制一切犹太人商店。一切俱乐部和社团,不论其宗旨如何不得具有政治性,都得受民社党的控制,其会章按照“指导原则”重新制订。

反对派不敢抬头。反对这个政权的人们只能秘密集会,参加小团体,连这样也要冒被立即逮捕和在集中营中关一段时间的危險。关于这些集中营中所发生的恐怖的故事迅速传播开来,这是独裁统治最有效的武器之一。数千反对这个政权的人简直吓得不敢做任何事情。但还有成千上万的人不顾恐吓和迫害,继续为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工作,其中大多数人不久就被逮捕或被迫逃离本国。几年以后,自豪的德国工人阶级运动只剩下数量很少的残存者了。

在一个不同的领域也仍有对抗。新教教会的某些派别继续抵制受到政府支持的“德意志基督教徒”的一切企图,后者想“调整”教会并使其教义和原则符合《我的奋斗》中概述的原则。尽管有很多新教教士遭到迫害,但它仍是整个第三帝国期间一直存在的半合法有力抵抗的唯一领域。所有反对民族社会主义的人都遭到盖世太保的无情迫害,盖世太保不久就成为一支非常有效的警察力量,全国谈虎色变。

还有一个问题未解决,那就是冲锋队的问题。在起初的恐怖浪潮过去以后,冲锋队员在政府中并无职务。它的领袖们自信地期望,随着军队的迅速扩充,他们会被纳入军官团,得到与他们在

冲锋队中相应的军阶。但军队领导人也同样坚决地阻止这样做，他们要保持垄断“服兵役者”的权利。冲锋队首领罗姆上尉，一直要求实现“军人至上，高于政客”，^①但在新政府中，政客显然占上风，而军人则仍是那些古板的保守的将军们，不是罗姆所支持的自由军团的革命领导人。他的部下中间不久就嘟囔着“第二次革命”，不是要针对希特勒，而是反对他周围那些保守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军队开始采取军事警戒行动，冲锋队也采取军事警戒行动报复。1934年6月间，紧张形势日益明显，不过罗姆并没有准备搞暴动。他把部下送出去休假，自己也回到巴伐利亚的维塞家中，盼望希特勒会来访问他。但是罗姆的对手，尤其是党卫队大头目希姆莱，以及一些军队领导人成功地使希特勒确信，罗姆正策划一次暴动。希特勒决定和力量更强的部队站到一起，来反对他的老朋友和保护人。罗姆是希特勒亲切地称呼为“您”(thou)的少数几个人之一。

希特勒委托希姆莱扑灭巴伐利亚的叛乱，戈林则负责镇压普鲁士的叛乱。到处都是党卫队在清洗它的冲锋队同志。6月30日的前夜至凌晨，吃惊的冲锋队头头们被从床上拖起，抓走，未经任何审判就枪决了，其中很多人是在柏林附近的利希特费尔德的党卫队营地被处决的。而且戈林和希姆莱还利用这个机会来清算其他许多敌人。在希特勒之前任总理的施莱歇将军，在柏林附近家中与他的妻子一起被枪杀了。著名的保守党和天主教领袖们也遭到同样的命运；1923年“背叛”了希特勒的古斯塔夫·冯·卡尔、1932年12月叛离的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曾是施莱歇的得力的部下的布雷多少将都遭到杀害。到底有多少人被杀害，从来没有得到肯定的证实，但人数肯定有数百之多。这就是冲锋队员多

^① Ernst Röhm, *Die Geschichte eines Hochverrätters*, 7th ed., Munich, 1934, p.349.

年来梦寐以求的著名的“长刀之夜”，然而使用长刀的是党卫队，它就这样战胜了敌手们，很快就成为德国最强大的力量。如果说军队领导人是希望消除冲锋队威胁他们的危险，他们却反而帮助党卫队建成一支与他们的力量对抗的更可怕的力量，党卫队自成一个军队体系，不久就控制全国。6月30日的清洗，消除了政权的敌人和潜在的敌人，完成了民族社会主义的“革命”。阿道夫·希特勒无疑地彻底控制了全国。

159 他的令人大为惊讶的成功，首先是由于经济危机把千百万绝望的德国人赶入他的阵营，这是十年前意大利并未发生过的危机。这也应归功于民社党的巧妙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其他政党无法匹敌，应归功于他们的暴力、劲头和在攻击这个制度及其代表们时在动员群众和煽动暴民闹事方面不择手段的方法。但人们仍然不解，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及其众多的领袖人物怎么会上当受骗并被这样的方式和目的争取过去。无疑，正是希特勒的民族主义帮助他赢得那些对凡尔赛条约深感不满并希望恢复德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人；而他的反犹太主义又吸引了那些想为德国所有灾难寻找合适的替罪羊的人。我们必须记住，从十九世纪以来，狂热的民族主义和强烈的反犹太主义情绪就一直是德国所特有的流行病，虽然表现得不象后来那么激烈。

社会党人或共产党人主张阶级斗争和国际团结的宣传从未感化工人阶级以外的人们，但民社党的宣传却总是能运用某些在成百万的人民中可以激起赞同和响应的题目，并对不同的听众施展手腕。在大危机的情况下，它成功地利用了中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和他们憎恶共和政权的情绪。共和国对任何人都不特别具有吸引力，它承受了凡尔赛条约和马克通货膨胀的重担，这大大剥夺了中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下层。道斯计划和扬计划的签署，在民族主义者眼中看来，又使德国继续“受奴役”，并应对经济衰退负责。

因此，坚决捍卫共和国的人很少。共和国并未遭到正面攻击，但它的基础由于不断磨擦消耗而遭到破坏和削弱。在决定性时刻，它竟把共和国宪法捍卫者的重任委诸于霍亨佐伦王室的年迈的卫士，这真是对历史的嘲弄。于是，不用敌人发一枪，堡垒就投降了，正象十年前罗马向墨索里尼屈服一样。

五、东欧的几种法西斯主义

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都是来自人民，出身于较为低下的社会阶层，他们在年轻的时候，都同样经历过真正穷困潦倒的时期。他们两人都了解下层人民，会说他们粗俗而纯朴的语言。这些都是他们后来成功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使他们两人都成了人民群众所怀抱的社会期望的象征。一个上层阶级的人或知识分子中的成员，要想成为人民的领袖，成为群众爱与憎的代言人，则就困难得多了。不过，奇怪得很，在大多数欧洲其他的国家里，法西斯党的领导人却都是出身于上层阶级，有的甚至是属于富有的贵族家庭，如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奥斯瓦尔德·莫斯莱爵士等；有的本人是职业军官，如费伦涅兹·斯扎拉西，维德昆·吉斯林等；有的是高级文官，如芬兰的维尔霍·安纳拉等人。还有一些人出身于中产阶级和专业人员的舒适家庭，受过高等教育，取得过学位和职位，如荷兰的安通·米塞尔特，比利时的莱昂·德格雷尔和罗马尼亚的科内柳·泽列亚·科德雷亚努等。的确，对于其中的某些人说来，社会出身确实表明是为他们敏锐地意识到的一个严重障碍，而另一些人则力图通过采取超激进的要求与行动来克服这种障碍。如果说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轻视一切知识分子和所有的理论，遇事往往依靠他们自己的直觉和灵机一动，而不求助于知识，那末那些曾经受过高等教育和训练的法西斯党领导人在从事政治活动中，也同那两个成功的独裁者一样并不带有知识分子气。这些人谁也不认真地致力于发展一种法西斯主义理论，谁也不花大力气去从事理论探讨。他们所依据的思想与理论通常都是

照搬意大利的(特别是总体国家思想),或是德国的(特别是种族主义理论)。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夺取政权的主张,尤其是后来一个强大的、扩张主义的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这一切都在欧洲许多国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从而在其他国家促进同样的运动发展,而德国经常直接地或间接地给予它们以支持。 161

芬兰: 从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到法西斯主义

欧洲有两个小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直同德国保持着特别密切的关系,它们是芬兰与匈牙利。它们之间不仅存在着战斗友谊和军队间的紧密联系,而且它们还都有赤色分子与白卫分子进行内战的创伤性经历,都曾受到共产党革命的威胁,随后又都进行过激烈的反共活动。是的,正是芬兰在三国中受到的威胁最大,一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很靠近苏联,二是因为国内存在具有激进革命传统的强大的左翼工人运动。这要追溯到芬兰争取独立斗争的那些年月以及1905年俄国第一次革命的时期。芬兰当时是沙俄的一部分,在那里,1905年的革命变成一场民族斗争,社会各阶层全都参加进去,为争取本国的宪法权利,反对俄国干涉和侵犯芬兰的特权而共同奋斗。为了维护法律和秩序,武装的民族卫队建立起来,但是在赫尔辛基,这些卫队变成无产阶级和赤色的组织。为了抵销他们的影响,于是白色保卫军组织起来。1905年的罢工运动变成革命运动,极大地增强了工人的自信心。在两年内,社会民主党党员的人数增长四倍,在革命结束后的第一次大选中,该党在芬兰议会中获得百分之四十的席位,实属巨大胜利。1917年初,当俄国第二次革命爆发时,社会民主党人甚至在议会中取得了绝对多数,即二百个席位中的一百零三个席位。这是无论哪个国家都从未发生过的事情。工人们

就变得越发激进和越发革命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虽然芬兰这个公国在形式上同俄国并肩作战，但是国内的舆论却基本上是亲德国的。特别在大学里，有一种广为传播的说法，那就是，唯有俄国战败才能使芬兰获得更大的自由，而唯有德国才能使这一点得以实现；必须抓住战争带来的机会去赢得独立。1915年初，芬兰的代理人被派往柏林，他们在那里赢得德国总参谋部对他们事业的支持。在随后一些年里，大约有二千名芬兰青年秘密地离开本国，志愿参加了德国军队，其中大部分是学生，不过也有一些其他社会团体的年轻人。他们在石勒苏益格附近的一个军营里受训，组成一个特别的“猎兵”大队，后来在东线同俄国人作战。这支队伍就是未来的国民军核心。后来芬兰军官团中的骨干分子，就是从这支“猎兵”队伍中选拔的。这些“猎兵”凭着坚固的同志关系和德国士兵连结在一起。第二次大战时期，这种关系又重新出现，当时有许多芬兰青年志愿参加了武装党卫军的斯堪的纳维亚师。这些“猎兵”对子德军及其威力佩服得五体投地，满脑子装着浓厚的亲德意识。

与此同时，在芬兰国内，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在迅速发展。俄国革命爆发后，再次出现了赤卫队和白卫军，但规模比1905年大得多。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革命爆发后一个星期，芬兰的社会党人便宣布举行革命形式的总罢工。在芬兰的大多数俄国军队都站在当时似乎是左右局势的赤卫队的一边。他们搜家、捕人、抢劫。那些主要的社会党人坚决主张，芬兰必须走俄国的道路；温和派这时失去了影响。1918年1月，在赫尔辛基宣布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革命政府，有两个工会代表参加进去。

在前一个月，即1917年12月，芬兰议会就已经宣布国家独立，并批准建立军队。陆军元帅古斯塔夫·曼海姆男爵被任命为军队的总司令，他是在俄军服役的芬兰军官中最负盛名的将军；跟着，

他就主动打响了赤卫队和白卫军之间的内战。他们在一些地方大败组织松散和装备低劣的赤色分子，不过，南方的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和首都，只是当冯·德尔·戈尔茨伯爵将军率领的一个德国师赶到的时候，才从赤色危险中摆脱出来。德军的到来，受到所有的民族主义分子和反共分子的热烈欢迎。有一个人当时写道：“他们来了，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的代表；对于他们，我们已经了解四年了，他们是西线坚不可摧的守卫者，是打败俄国的战士，是罗马尼亚的征服者，啊，兴登堡的、鲁登道夫的、尤其是威廉皇帝的钢铁战士们……”^①由于芬兰政府军占有优势，由于俄国军队士气低落，再加上赤卫队得不到有力的援助，没有几个月内战遂告结束，不过双方都曾采取极端残暴的手段，留下了永难磨灭的伤痕。在政府方面，死亡人员中有四分之一都是被赤色分子杀掉的，受伤的人数非常多。在赤卫队方面，被处死的被俘人员的数字大约是阵亡人数的一半。俘虏被送进临时集中营，在这里，主要由于缺乏食品和医药，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根据曼海姆元帅的证词，集中营里的死亡率“惊人之高”。政府决定，所有的俘虏都必须受审。审判的过程拖延时日，而食品又奇缺。“这一措施势必加深苦难与仇恨，并且把分割我们民族为两派的那道裂缝更加扩大开来……”^②但是，极右派的拥护者还是把内战看作是对俄国的辉煌胜利：无敌的白军在国内消除了红色祸害，并且树立起一道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屏障。这种轻易得来的胜利造成了危险的幻觉。赤色分子俘虏中被宣判死刑的人，只有一百二十五个枪决了，而更多的人则被分别判处了长短不等的徒刑。

1918年底，芬兰共产党建立。这时，约有半数的社会民主党

^① Eino Leino, *Helsingin valloitus*, p.78, Marvin Rintala 引用, *Three Generations: The Extreme Right Wing in Finnish Politics*, Bloomington, Indiana, 1962, p. 48. 这是关于本节所讨论的问题的最重要的著作。

^② Gustaf Mannerheim, *Erinnerungen*, Zürich, 1952, p.222.

人加入了共产党；许多党的小组和组织，包括赫尔辛基的组织在内，都变成共产党的了。1920年，经过一番激烈的斗争，工会联合会落入共产党手中，同样还有大多数的个别行业工会。1922年大选时，共产党得到选票总数的14.8%，即实得十二万八千张选票。这¹⁶⁴表明，他们的力量仍然相当强大。不过，随后几年，由于政府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共产党的力量有一定的减弱。同时，在1920年10月，同苏俄缔结了和平条约；芬兰的独立以及它的历史边界都得到承认，另外还获得远在北方的有着宝贵矿藏的佩萨莫港。议会的绝大多数代表都赞同这一条约。

可是，在极右派看来，条约使人十分失望，因为大芬兰的理想未能实现。所谓大芬兰，就是应该包括从波的尼亚湾到北冰洋的全部领土：东卡累利阿、科拉、因格里亚和爱沙尼亚。这样的话，芬兰民族就能够实现它作为西方文明在最北方的守卫者的历史使命了。如果只把东卡累利阿和科拉两个地方拿到手，那就会把芬兰领土面积扩大一倍。这两地的大多数居民都是操芬兰语，不过在因格里亚，说芬兰语的人只占少数，而彼得格勒则就完全是俄国城市了。爱沙尼亚已经成为独立国家。虽然芬兰总统K. J. 施塔尔贝格试图采取一种妥协的、医治内战创伤的政策，然而极右派还是煽动仇恨他及议会议员的情绪；后者，因为曾经接受了在极右派看来实属耻辱的对俄和约。在东卡累利阿，内战在1921年—1922年仍在继续，同时右派行动主义者偷偷地越过边界去攻击苏联人。内政部长试图封锁边境，以阻止这类非法越境行为，竟被暗杀身亡。他的死，就象当时埃茨贝格尔和拉特瑙在德国被刺身亡一样，叫行动主义者拍手称快。在芬兰，政府履行和平条约的政策也遭到极右派分子的切齿痛恨和拼命反对。

1922年初，由三个从东卡累利阿战场返回的年轻士兵发起建立一个大学在校生与毕业生的组织，即所谓的“大学生卡累利阿协

会”，该协会是为大芬兰思想而献身的。协会的成员结为“仇恨俄国人的兄弟”，每一个新会员都必须宣誓：“在我们的旗帜下，面向我们的旗帜，我以我尊为神圣与宝贵的全部事物的名义宣誓，我要把我的事业与生命献给我的祖国，为了芬兰卡累利阿和因格里亚的民族觉醒，为了大芬兰。……”^①但是，参加该会并不容易。头一年，可能成为会员的人必须去上完若干课程，并且服务一段长时期，然后才能成为候补会员；过了这一年，他才能够宣誓成为正式会员。该会的会员总共有二、三千人。不过很快在中学里建立起许多分会，并且许多毕业后担任教员、公务员、牧师等的人都广泛地传播该会的思想。会员中甚至还有主教和内阁部长。这个协会的领导人及其下属都有军衔，其他会员必须服从他们，同时规定铁的纪律。按照该会的观点，领土扩张的先决条件，是建立由芬兰语完全占支配地位的国内秩序，因而它大力攻击操瑞典语的少数民族，他们约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一。该会会员还持有强烈的种族主义观点，不过这种观点与德国的民族社会主义党分子的有所不同；那些德国民社党分子由于处在种族十分混杂的国家里，所以便主张德意志民族的纯洁性。芬兰的种族主义者认为，在争取欧洲控制权的斗争中，将会取胜的不是那些种族纯粹的民族，而倒是那些种族混杂的民族：斯堪的纳维亚人和俄罗斯人都是比较纯粹的民族，而芬兰是属于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的混合血统，因此后者更有可能先控制北欧，进而是整个欧洲。这样，芬兰就将作为一个大国而崛起。因为芬兰有近三百万芬兰人，所以大规模的领土扩张不可避免；爱沙尼亚人受到优厚待遇，被列为操芬兰语的民族，他们应与芬兰合并。这些思想在第一次大战中的“猎兵”们中间就已经流传开来，它们对于战后的青年学生一代发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首先，东卡累利阿依然是他们的目标：必须用武力把它

^① Rintala, 同上书, p.105.

征服，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确实做到了。这一套主张可说是一个有吸引力的神话，不过它在学校范围以外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

从更广的范围来说，内战中的白卫军并未解散，他们依然存在（就象德国的自由军团一样），不过已经改称为国民卫队。这支有约十万人的装备精良的队伍和正规军一起存在，听命于他们自己的总司令。这位司令官 1921 年成为总统的下属。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给予国民卫队以强烈的影响。早在 1922 年，议会的军事委员会主席就曾宣称：“人民试图把我们和法西斯主义者相提并论，由此不难看出，象国民卫队这样的武装组织存在对于议会生活的极端危险是多么大啊。我必须老实地承认，我们的国民卫队成员是丝毫不以那种比较为耻的，正相反，我们情愿并且自豪地承认，我们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的精神同志。……”^①国民卫队对于法西斯主义中特别感兴趣的方面，就是在意大利可以那般任意地对赤色分子施以暴力，同时反共十字军取得成功。而当时在芬兰，共产党继续保有力量，1929 年大选中，他们再一次获得选票十二万八千张，占总票数的 13.5%，虽然前几年，他们的力量已经略有衰退。

反共运动（内战中的那些事件是人们记忆犹新的）仍然没有减弱势头，而且由于共产党在大选中的胜利，更给这种运动火上加油。1929 年 11 月，有一个共产党青年组织在拉普阿村举行集会，与会者都身着红色衬衣。他们遭到国民卫队和农民们的攻击和毒打，红衬衣撕成碎片，会议在忿怒群众的阻止下无法进行下去。几天之内，出现了群众性的运动，即所谓的“拉普阿运动”：要求宣布共产党为非法，剥夺它的代表在议会的席位和在地方政府的职位，勒令他们的报纸停刊，禁止他们举行集会。为此提出了一项法案，

^① Rintala 引用，同上书，p. 154.

但遭到反对，未获通过。不久，该运动的成员采取直接行动，如捣毁共产党的印刷厂，阻止共产党代表出席议会会议；另有一些共产党人被殴打或绑架，受害者们被迫越境，逃往俄国。这些受害者当中不仅有共产党人，还有温和派分子。在被波及的其他许多人里，有退休的芬兰总统施塔尔贝格和他的夫人，他们是被先前的“猎兵”捉住的，为的是要清算他过去对“猎兵”运动持否定态度的老账。这次捉拿事件的策划者是原先的“猎兵”军官、现任总参谋长瓦伦纽斯少将。政府当局对于这些无法无天的行为束手无策。

1930年6月，拉普阿运动向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封闭所有的共产党报纸，立即逮捕全部的共产党官员。三天后，颁布了取缔共产党出版物的命令；7月间，有两个共产党议员在议会一个委员会的会上被绑架，跟着内阁决定拘捕共产党的议员。拉普阿运动和国民卫队的一万三千名武装人员突然涌进赫尔辛基，坚持他们的要求，特别是定要解散共产党。这次进军是由五名高级军官组织的。P. E. 斯温胡弗武德的政府谴责“暴民行动”和拉普阿法令，但是政府的成员却参加了进军者在首都举行的公众集会。公众之间没有什么不同意见：所有的资产阶级力量在反对共产党的战斗中看来都是团结一致的。在10月的大选过后，议会终于以必要的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了反共法令；斯温胡弗武德曾经威胁说，如果那些法令不通过，他便要辞职。只有社会民主党人表示过反对。然而，拉普阿运动并不就此心满意足。他们又把矛头指向社会民主党人，所采取的手段比以前更为激烈。这个运动的领袖维赫托里·科索拉自命是奉上帝的派遣来领导芬兰人的，他在服装与举止方面也开始模仿起墨索里尼来了。

拉普阿运动的目的在于摧毁所有的党派以及议会本身。其领导人宣称，谁也不会为党派的死亡而哭泣；工会的权力必须打垮，用于社会立法和公共教育方面的经费必须缩减，平等的选举权必

须取消。可是，该运动的主要目的（取缔共产党）已经达到，而它的暴力行为却有增无减。因此，它在1930年曾经得到的群众的大力支持，开始逐渐地变弱了。那些领导人看到，他们已经无法再依靠群众的支持去取得政权，于是便改用政变的手段。暴乱开始于1932年2月底，当时他们冲垮了社会民主党在芬兰南方的门策莱举行的一次集会。叛乱军队接管了这个地区，宣称要摧毁社会民主党，即使他们必需首先摧毁支持和保护该党的国家权力也罢。起初，他们要求内政部长和当地的长官辞职，但第二天，又要求整个内阁辞职，并且建立一个听命于拉普阿运动的新内阁，即要“摆脱党派目的，依靠全国爱国分子的支持……”。军队里许多军官（前“猎兵”）对政府的忠实值得怀疑，又有大批的国民卫队的军官公开地支持叛乱，然而，当时已经当选为芬兰总统的斯温胡弗武德采取了有力的行动。他以总统个人名义向全国发出呼吁书，要求制止叛乱。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军队实行动员，命令国民卫队回家，以及暂停各项基本自由权利。拉普阿部队被打垮了，而其领导人，竟按照1930年通过的反共法令被关押起来，真是叫人哭笑不得。在短短几天内，叛乱被平定。根据一项法庭决定，拉普阿运动被解散。但是同时，其对立面，特别是内政部长和当地长官也都被撤销职务，而国民卫队的司令官却仍旧留任。

过了几个星期，在1932年4月，人民爱国运动却又宣告成立，从而不致使拉普阿的神圣火焰熄灭。该运动的目的在于“组成广泛的白色战线，……消灭一切赤色的人与事。这种行动不仅针对共产主义，而且还针对社会主义，因为后者要想摧毁爱国精神、宗教精神与民族精神。……”^①这个新运动，同大学生卡累利阿协会完全一样，也是坚决反对瑞典少数民族及其语言的，同时也反对自由主义，认为它是一种垂死的力量。他们要创造一种新的社会与

^① Rintala 引用，同上书，p.222.

政治秩序来代替自由主义。应该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权力，政府不应再对议会负责。芬兰应成为只使用一种语言的国家；民族与祖国是最可宝贵的，其他的一切都处于从属地位。应建立一个总体国家，而议会则应按照总体的观念加以改变。应该制订经济计划，每个公民都由国家保证给予工作，社会正义应占支配地位。整个芬兰民族应统一在大芬兰之中。这个运动把被解散的拉普阿运动的领袖科索拉尊为自己的领袖。此人很快就被释放了出来。但是，真正的领袖却是一个高级文官维尔霍·安纳拉，他还有一个最亲密的助手布鲁诺·萨米亚拉，是赫尔辛基大学的刑法教授。人民爱国运动的成员都穿黑色衬衣和黑色裤子，打蓝色领带，和原先拉普阿分子的制服没有什么两样。

这个新运动的纲领非常近似大学生卡累利阿协会的纲领，特别在大芬兰思想方面，而且比拉普阿运动的纲领更加明显地亲法西斯党。这个运动十分赞赏欧洲的那两个成功的独裁者，并且采取遵从他们两人的领导原则。这个运动的领导人有些同时又是大学生卡累利阿协会的领导者，该会有一位杰出的成员，后来成了人民爱国运动青年组织的指挥官。这完全是模仿希特勒青年团和意大利法西斯青年组织巴利拉^①的，该运动把这种法西斯青年组织当作榜样，竭力仿效。这个新的党首先是受过教育的人和学生们的组织，在这一点上，它和大学生卡累利阿协会是相同的，而和拉普阿运动就不相同了。学生中的大多数、许多文职官员以及半数左右的路德教徒都支持这个党。在1936年的议会选举中，该党的候选人中有百分之十以上是教士，另有百分之二十是教授和教师。不过，它也得到一般人民的拥护，如在1936年的选举中，它得到九

^① 巴利拉系意大利热那亚一爱国少年，1746年因带头反抗当时统治意大利的奥地利军队，掀起全城起义，驱逐奥军。墨索里尼以巴利拉作为一切青年团体之总称。
——译者

万八千张选票，占总票数的8.3%。这是该党最兴旺时期的记录，后来在1939年，它就仅仅得到6.6%的选票，几乎和它在1933年的所得差不多。因此，它失去1936年曾经获得的十四个议会席位中的六个，而且这也是它最后一次参加选举。有一段时间，它甚至把保守党争取过来，实行合作的政策，并在选举中结为盟友，但是后来由于保守党的反对，这种局面于1935年告终。因此，可以说，即令1939年战争没有爆发，这个党的力量也已经走下坡路了。战争使大芬兰思想终于走到尽头，同时一般说来，也结束了激烈反共的局面，不过这是1941年以后的情况；1941年的时候，在前“猎兵”军官率领下的芬兰军队曾经胜利地开进东卡累利阿的首府彼得罗扎沃兹克。

由此看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年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芬兰社会的上层阶级曾经受到一种强大的传统力量的影响。它的内容首先是反共和扩张主义思想，但随后，由于深受德国和意大利的样板的影响，便变成浓厚的法西斯主义和独裁专断。至少在1931年—1932年期间，这股力量一度严重地威胁着一个民主政府的存在，虽然它并没有达到推翻这一政府的目的。纵观这整个的运动，它的知识分子气和学究气显然太重，因而难以达到目的，而且，大芬兰思想也太脱离现实，无法付诸实现。由于芬兰几乎没有犹太居民，该运动便提出反瑞典人的主张，可是由于瑞典少数民族有强大的力量 and 影响，它简直无法实现这一目标。这个运动为自己规定了无法实现的目标，必然归诸失败。

修正主义和反犹太主义：匈牙利的 民族社会主义党人

象芬兰和德国一样，匈牙利在1919年经历了创伤性内战，有

过一个短期的共产党政权，并且跟着出现过随之而来的一场白色恐怖。1918年秋季的革命赶跑了哈布斯堡家族的国王，由米哈伊·卡洛伊伯爵领导的自由主义政府开始执政。但是，这个政府无法阻止邻国瓜分匈牙利；这些邻国垂涎的是那些斯拉夫人的居住区或混合民族的居住地，它们贪得无厌，而且受到胜利的协约国的唆使。因此，卡洛伊伯爵这个真诚的民主主义者于1919年3月被迫辞职，把权力交给了以共产党新闻记者贝拉·库恩为首的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组成的联合政府。贝拉·库恩搞教条主义和恐怖主义统治，结果使得大多数匈牙利人转向强烈的反共的立场，正象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的短暂尝试在巴伐利亚人中间所引起的反响那样。贝拉·库恩政府从未得到过苏联的任何援助，而罗马尼亚军队按照协约国的命令倒是侵入匈牙利并占领了布达佩斯。苏维埃共和国在8月间倒台，领导人逃出匈牙利。白色恐怖的统治代替了红色恐怖。海军上将米克洛斯·霍尔蒂在匈牙利南部的塞格德组织了“塞格德委员会”，使用“独立小分队”在全国清除布尔什维主义。当罗马尼亚人占领布达佩斯的时候，这些小分队把他们的活动转移到匈牙利西部尚未被占领的地区。当罗马尼亚部队最后于11月撤离首都时，霍尔蒂的部队跟着开了进去。他们到处进行大屠杀，杀死犹太人，绞死共产党人，又建立特别法庭，把共产党人或共产党嫌疑犯处以死刑或长期徒刑。

这种种事件发生后，在匈牙利作为政治力量的左派在长达二十五年的时期内，一直销声匿迹。虽然霍尔蒂政府容许社会民主党存在，但它只是在布达佩斯和其他少数几个城市才有影响，并且从未对政府构成威胁。共产党人受到迫害，转入地下，整日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只是到1944年红军进入匈牙利时，他们才公开进行活动。此外，共产党人还因一个不利条件而吃亏，那就是它的领导人（以及在流亡中重新组成的党的领导人）几乎全是犹太人。比

较说来，1918年以前匈牙利虽然没有什么反犹主义（的确，匈牙利的犹太人很快就马扎尔化了），但1919年的事件却引起了强烈的反犹运动。犹太人构成匈牙利人口的5%，但他们在某些部门是举足轻重的，根据1920年的人口普查，律师中的半数，医生中的60%都是犹太人，这类“独立公民”中的53%从事经商，他们有80%从事金融和银行业。在白领工人中，工业界的39%、金融界的44%，以及贸易界的48%都是犹太人。犹太人在新闻界和艺术界也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把1918年—1919年的事件归咎犹太人是很容易的，因为他们在战争中得到好处，但又逃避了服兵役，他们在“胜利的”军队背后捅了一刀，他们建立了红色恐怖，因为“很难相信工人和农民（纯粹的匈牙利人）会对这些革命行动负责。……”^①不但是共产党人，而且还有社会民主党人和自由党人都都被认为是受到犹太人影响的，因而是“非匈牙利的”。正如一位密切关注匈牙利政局的观察家所指出的那样，“对于匈牙利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青年一代来说，正象对塞格德一代人本身来说那样，犹太人问题显得极为严重”。^②这种普遍的反犹主义便促进了民族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但是在保守的统治阶级（他们大多属于马扎尔贵族）中，只存在着有限的、非种族的反犹主义，它更加近似于德国保守的民族主义分子的反犹主义，而不象希特勒的主义。

经过1919年的和平解决，匈牙利面临的境况比德国和奥地利更糟。原来的老王国疆域很大，统治的马扎尔人只占人口的少数。根据特里亚农和约，这种状况颠倒过来。匈牙利失去原有人口的

^① István Deák, 'Hungary', in *The European Right*, ed. H. Rogger and E. Webber,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65, p.370.

^② C.A. Macartney, *October Fifteenth-A History of Hungary, 1929--1945*, Edinburgh, 1956, vol. i, p.78. 这是关于研究两次战争之间的匈牙利的叙述详尽的唯一著作，其中有匈牙利政治方面的大量材料，是以许多参加者的回忆作为基础的。

63.5%，只剩下七百六十万人。他们几乎全是讲马扎尔语的，唯一有相当数量的留在匈牙利的少数民族是讲德语的“斯瓦比亚人”，大约有五十万。但是，有三百二十万马扎尔人却被留在新国家的边境之外，其中绝大多数在罗马尼亚(特兰西瓦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斯洛伐克和鲁特尼亚)。这种由协约国经手的处理办法在匈牙利引起了深深的不满，每当有机会，就立刻出现普遍要求修改这种“不平等条约”的呼声。这和凡尔赛条约在德国引起的反响是一样的。这样一来，那种在第一次大战中把两国联合起来的约束力量仍在起着作用，即使在魏玛共和国的年代也是如此，而且，当希特勒在德国夺取政权后，这种关系又得到了新的活力。不过即使在这之前，匈牙利就已经在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它为自身的利益也正在要求修正条约)找到了有力支持它的修正论主张的支持者，它的修正论是针对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这“小协约国”的。匈牙利建立的政府，由海军上将霍尔蒂为摄政王(代替不在位的国王)，伊什特万·拜特伦为总理。这个政府不是法西斯统治，而倒是一个十分保守的右派政府。老贵族仍然十分牢固地把持着权力和占有他们的巨大产业的所有权。这可能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欧洲剩下的唯一封建统治了。在这种统治下，大多数的农业人口的生活贫困不堪，他们或没有土地，或仅有难以维持自己家庭生活的少许财物。然而，并没有实行土地改革，也没有社会民主党出面来组织农业劳动者的任何企图，因为任何这类企图都将遭到政府坚决的反对。这种局势就使极右派有机可乘了。

和德国与芬兰的情形完全一样，匈牙利的大多数军官(还有很多年轻的知识分子)都蔑视自由主义和民主思想，并且反对议会制度。他们还发展了政治野心。但是匈牙利过去没有自己的军队，直到1918年只有奥匈帝国的皇家军队，这支军队对于德国血统的年轻人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而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1919年以后。

那些成为职业军官的人大多是斯瓦比亚人，他们把从军当作职业，对德国军队羡慕不已（就象芬兰的“猎兵”一样）。“军队非但不脱离一切公共事务，却还要指导国家，干预每一件事情。”^①军队在国家中成了一个独立的机构，而军官们认为他们自己是注定要拯救这个国家的。有好几年（1918—1920年以及1929—1932年）国防部长一直由一个前职业军官担任，即居拉·格姆伯斯，也是斯瓦比亚人，一个乡村教师的儿子。但他是个马扎尔化了的德国人，一个强烈的匈牙利民族主义分子和反犹分子，他认为犹太人正在损耗国家的力量。他在组织1919年的反革命行动中曾起领导作用，随后便自诩为“匈牙利的民族社会主义党人”，而这还是在德国人使用此名词之前。他还组织一个既有文职人员又有军人的秘密组织，他自己则作为保护匈牙利民族的“最高领袖”，接着不久，这个组织变成从种族出发的反犹团体。1923年，他成立“种族防御党”，积极参与了为试图复辟维特尔斯巴赫王朝在慕尼黑进行的各种活动。这些活动同后来匈牙利建立以格姆伯斯为首的极右派政府一事相比，可谓是异曲同工。的确，早在1921年，他就已和慕尼黑的极右派领导人有了接触，当时那些人正在南方组织德意志人的反革命活动。后来，他发现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荣耀事业，于是开始把自己打扮成为匈牙利的“墨索里尼”，想要在匈牙利铲除犹太人和共济会成员。他要在摄政王之下占据如同墨索里尼在国王之下所占据的那种地位。

1929年，格姆伯斯被重新任命为国防部长，但这并没有使他想实行法西斯统治的热情有所减低。当经济危机爆发，土地价格急剧下跌时，拜特伦的体制也随之崩溃。右派中的年轻人对拜特伦的种种做法十分不满，如他对和平条约采取妥协和履行的政策，给予犹太人以宽厚的待遇等，同时他们对议会制度本身也强烈

^① Nicholas Kállay, *Hungarian Premier*, New York, 1954, p.139.

不满。正是由于他们造成的这种压力，1930年10月，霍尔蒂任命格姆伯斯为首相。于是经他安排，他的追随者们和大批爱国团体举行了规模盛大的示威。当他站在阳台上，学着墨索里尼的样子，向群众讲话时，下面的人群以事先精心安排好的呼声高喊：“我们的领袖万岁！”然而，新领袖并没有废除议会，也没有使自己成为独裁者，匈牙利政府在霍尔蒂仍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情况下几乎依然如故。在1935年的竞选运动中，格姆伯斯重复他的目标：建立一个一党制的总体国家和一个“没有阶级差别的单一的匈牙利国家”。同一年，在他访问柏林时，格姆伯斯和戈林签署了一个秘密协定，他答应在匈牙利建立一种和第三帝国相似的政体。但是，没有实行什么实际的改革，而当格姆伯斯于1936年10月死去时，匈牙利也并不比1932年更加接近于法西斯主义。

虽然格姆伯斯具有强烈的亲法西斯的倾向，但他缺乏一个法西斯党把他推上权力的宝座（这个党应是区别于秘密组织的一种群众运动）。但到他死去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几个法西斯小组和党派。的确，匈牙利的一个政治特色是，同时总存在着许多彼此竞争和相互敌对的法西斯组织。而只是到1944年10月，德国人把斯扎拉希扶上台之后，它们才联合成为一个党。这些党派中最激进的一个是“镰刀十字党”，是佐尔坦·伯什泽尔门尼在1931年建立的，他是一个破产地主的儿子，年轻时参加过1919年的反革命行动。他只是发表了1920年民族社会主义党的纲领的译本，于是便把它作为自己的纲领了。同格姆伯斯相比，他显然是更多地从德国得到启示，而不是从意大利。但是，他的运动在地方上有很多的支持者，特别是在匈牙利东部十分穷困的工人和农民中间。该党提倡实行土地改革和为穷人主持正义，因而吸引了很多这样的人，即如果有合法的共产党存在的话，那么他们本来会成为共产党人的。该党还激烈地反对犹太人，其成员把他们自己形容为“犹太猪

芻及其佣工的掘墓人”。不过，镰刀十字党不是没有土地的无产阶级的真正的群众运动。1934年，作家伊姆雷·科瓦奇碰到一批农民，他们打着上面标有“我们受够了”的旗帜。“这是发生在蒂萨河那边的一个大庄园里，他们都是季节性工人，非常贫穷。……当我问他们时，他们反复说：‘我们为一个理想而战’；但是他们说不清这个‘理想’究竟是什么内容。他们痛恨共产党人和绅士们。”^① 镰刀十字党在政治行动上是要打一场二十世纪的农民战争。他们计划向“罪恶的”布达佩斯进军，把首都夷为平地。但在约定的这一天，即1936年5月1日，只有几千农民集合起来，很容易便被驱散了。有几百人被捕，他们则宣称甘愿为“理想”牺牲。伯什泽尔门尼被准许逃往德国，运动被镇压下去。大多数的农民从始至终忠于摄政王，他们不愿意支持政治上的激进主义。

1932年6月，一个无党派的议会代表佐尔泰因·梅斯科创立一个反对党：“匈牙利民族社会主义农业劳动者与工人党”。他穿着褐色衬衫进入议会，衣领上显眼地标上卐字符号。他的党的标志是箭十字，但有时候又是棕底配上绿色的卐字。他们的褐色衫后来也改成为绿色的。他的党比镰刀十字党的革命性要少些，而且他们仍然完全忠于霍尔蒂摄政王。这个党从未产生过任何群众性的影响。跟着，很多类似的党纷纷成立。它们中的绝大多数一直都很小，但都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受到希特勒的影响。他们都欢迎德国国力的增长，那样就可以帮助匈牙利实现根据特里亚农条约规定的修改边境的目的。他们希望，一个民族社会主义的匈牙利能够获得德国的支持，而一个由犹太人统治的民主的匈牙利则将会招惹希特勒的恼怒。他们的反犹主义并不是由外面输入
175 的，它在匈牙利有着很深的根源。犹太人在匈牙利的工业界和金融界占有优势，这确是事实，而不是象在德国那样只是幻想的东

^① Deák 引用，同上书，p.385，见 Imre Kovács' *A néma forradalom*。

西。直到 1939 年，匈牙利首相帕尔·泰莱基伯爵还不得不向德国人说明，大规模地驱逐犹太人将会引起匈牙利经济生活的完全瘫痪，因而也不会符合德国的利益。后来，匈牙利首相米克洛什·卡洛伊回忆说：“反犹主义就是特洛伊木马，而里面藏着的便是偷运进匈牙利的民族社会主义思想。该党内的格姆伯斯分子都是反犹分子。……反犹主义是左右他们思想的中心；这是他们的一种疾病。……”^①他假定，中产阶级下层和知识分子中的反犹主义者有其经济原因，因为犹太人妨碍他们社会地位的提高——但占据高位的许多贵族成员却也同样妨碍着他们。

然而，除了经济原因之外，还有奇特的种族主义（象在德国那样），即对伟大的匈牙利的过去的崇拜。有许多秘密的和半秘密的团体都在培养这种思想。1919 年格姆伯斯创立的团体曾经采取古怪的种族模式，他们试图恢复对传说的种族和种族领袖的记忆，这些人在九世纪曾经率领马扎尔人越过喀尔巴阡山脉来到匈牙利。还有一种图兰人的新的神秘信念以极为偏激的形式发展起来，他们崇拜一个名叫哈杜尔的战神（想象中的古代马扎尔神），同某些人迷的德国人（鲁登道夫将军的下属）崇拜沃坦是一模一样的。图兰人试图证明，马扎尔人是古波斯人、赫梯人、埃及人和苏美尔人的后裔，就连耶稣本人也是图兰人。象这样古怪的思想影响了后来的许多民族社会主义者，正如“人民的意识”为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那样。但是，这些思想在这两个国家中都没有赢得群众的支持。一般说来，给人以启发的是德国而不是意大利。但与德国对比，匈牙利的极右派常常主张进行过激的社会改革，要结束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同时铲除过去的一切遗风。的确，在把过去看得如此之重的一个国家里，这样做是极为重要的。同时，这却使得右派极端分子完全得不到统治阶级及其官方

^① Kállay, 同上书, pp.33,39.

领导人霍尔蒂的欢迎。民族社会主义者狂热的反犹主义和他们的政治暴力也同样是不受欢迎的。

176 所有这一切，特别适用于许多民族社会主义党派中最重要的一个政党，即箭十字党。这个名字得自该党的两个交叉的箭形的党徽（不过，那些相同的组织也使用这个标志）。该党从建党起直到痛苦结束，它的领袖和预言家始终是费伦涅兹·斯扎拉西。他生于1897年，是奥匈帝国军队中的一个职业军士的儿子；他曾作为军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役，后来成为匈牙利总参谋部的少校。任少校的期间，他发展了“匈牙利主义”的思想，这和大德国思想或大芬兰思想有些相似。不过在匈牙利来说，这就是要恢复拥有几百万非马扎尔臣民的古代王国的疆土，“周围是喀尔巴阡山，并一直延伸到亚得里亚海”，在这片土地上，马扎尔人将重新享有他们古老的支配地位。正如斯扎拉西指出的：“为伟大祖国所进行的斗争，必须由祖先的土地上的领导民族，即马扎尔人来领导，正如一千年以前，在马扎尔人的领导之下，那块土地把上帝恩赐的统一熔接于国家的统一中。”^① 斯扎拉西把这个大匈牙利称为“伟大的喀尔巴阡—多瑙河祖国”。这种国家应由在国家中居于指挥地位的军队来创造：“如果军队看到作为三大支柱的宗教、爱国主义和纪律在国民中间发生了动摇，那么军队便有责任使全体国民重新尊从这三大支柱。”^②

在参谋部工作的时候，斯扎拉西发展了他的思想，但他被告诫不要参与政治，于是1935年，他辞去军职，成为他自己创建的“民族意志党”的领袖。他深信，他是天命注定要去把他的国家引向匈牙利主义的目标的：“我已被更高的神圣权威选中来恢复马扎尔民族的荣誉——谁要是不理解我或是丧失信心，就让他见鬼去吧！充

① Macartney 引用，同上书，i, p.162.

② Deák 引用，同上书，p.394.

其量我将会孤单一人，但即便那样，我也要凭着我自身内部蕴藏着
的秘密力量的帮助来创建匈牙利主义国家。”^① 匈牙利主义的胜利
将会使欧洲重新加以组织，而它的衰亡则将意味着民族社会主义
的衰亡。“每一个党员必须接受匈牙利主义的思想，必须承认箭十
字党是实现匈牙利主义目标的实际工具。”^② 马克思主义是危险的
敌人，必须加以消灭，而自由主义由于其自身的弱点，是注定要死
亡的。箭十字党对工人们特别具有吸引力，斯扎拉西决心访问工 177
人阶级的家庭，但他从未提出过一个明确的社会纲领。这主要是
因为他只停留在高度的匈牙利主义思想的领域之内，而完全不关
心实际问题。虽然他确曾主张，制订农业生产计划，把农村无产阶
级转变为拥有少数田地的小农，以及建立农业合作制度。经济应
由全国组合理事会进行指导，民族银行应实行国有化，工作应既是
义务又是权利，而罢工则应加以禁止。斯扎拉西始终坚持采取符
合宪法的方式，即只有“在国民公意和国家首脑”授权的情况下，他
才出来掌权；他对摄政王始终是忠诚的，但是他认为，各个政党
是违反宪法的，因为它们不是从人民自由表达的意志中得到权力
的。^③

斯扎拉西的党发展迅速，1935年9月仅有八千党员，到1937
年4月，已增加到一万六千多人。这时该党重新改称为“箭十字
党——匈牙利主义运动”。但到1937年10月，它和另外几个民族
社会主义组织合并，其中也包括镰刀十字党的残存人员，取名为
“统一匈牙利民族社会主义运动”。不过，这个联合组织只存在几
个星期。与此同时，斯扎拉西却名扬遐迩了。1936年10月，在格
姆伯斯死后，霍尔蒂军事内阁的首脑拉约斯·凯赖斯泰斯—菲谢

① Deák 引用，同上书，pp.388—9.

② Macartney 引用，同上书，i, p.163.

③ 同前，i, p.165.

尔从霍尔蒂的利益着想,要求斯扎拉西就政治局势问题作报告。而斯扎拉西告诉他,军队是“救世主,它可以迫使国家走上真正的道路,”同时必须实行军事政变:摄政王必须“站在国民的最前面”采取行动,“并且同国民在一起”。^①的确,这时已有许多下级军官和某些高级军官开始同情箭十字党,他们就象希特勒取得政权以前的德国军官所表现的那样。那时在德国,年轻的军官们急迫地想要进行一场社会和政治改革,而那个居于统治地位的保守党是不可能推行这些改革的。至于说到其他社会集团,毫无疑问(象在其他一些国家那样),箭十字党能够得到中产阶级下层和知识界的强烈支持。这是因为他们反对统治阶级,而且也因为他们都持有反犹太主义态度。但是,同德国和意大利相比,产业工人的比例是相当大的(根据一项[值得怀疑的]估计,1937年他们占全体党员的半数),而且是在这样一个工业化仍然非常不完善的国家里。看来完全可以设想,如果是在其他国家,这些工人中的许多人都会成为社会主义者或是共产党人。根据该党的一个前高级官员所作的同样估计,1937年该党有17%的党员是军官(一个大数目),有12%的党员是专业人员或店主、散工等,而农民只占8%。

正值政治紧张局势在全欧洲不断加剧,而且匈牙利的邻国奥地利已被德国占领时,箭十字党的发展显然使政府忧虑。希特勒成功的本身对急欲修正特里亚农和约的匈牙利,必然产生强烈反响。1938年7月,斯扎拉西因发行颠覆性传单受到审判,被判处三年苦役,剥夺公民权利五年。同年8月,他被逮捕,监禁在塞格德。在他的追随者的眼里,他成了牺牲品,因而名声也更大了。特别是1939年初,当顽固的保守派帕尔·泰莱基被任命为首相之后,对箭十字党的迫害愈益严厉。然而这种迫害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因为在1939年5月的选举中,箭十字党获得重大的成功,

^① 同前, i, p.175.

得票数为总数三百多万张选票中的九十多万张。在布达佩斯，它所得的票数为社会民主党的一倍，只稍微少于执政党；它在工人阶级选区的胜利尤为显著。非法的共产党曾经劝告它的追随者们去投票十字党的票。结果，三十一名箭十字党代表，连同另外十八名民族社会主义代表一同进入国会，而执政党获得一百七十九个席位，四个较小的党派（小农党、社会民主党、自由党等）总共获得三十二个席位。代表中几乎有五分之一都是民族社会主义者，而左翼证明是无能的。

这个时候，匈牙利已经开始从与希特勒德国实行的政治合作中获得了好处。慕尼黑会议以后，它得到斯洛伐克南部的一些地方，这一地区的大部分居民都操马扎尔语。随着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进一步瓜分，匈牙利又获得鲁特尼亚，这里的居民主要是乌克兰人的后裔。此外，下一年，同样又是因为沾德国和意大利的光，它还得到了特兰西瓦尼亚北部地区，这里马扎尔人和操罗马尼亚语的居民各占一半。领土的增加也使匈牙利人口中添进了大批的犹太人，犹太人已经占人口总数的6%以上。^①和匈牙利本地的犹太人相比，那些犹太人的绝大多数都没有被同化，也不会讲马扎尔语。政府和国会曾经通过几项反犹法律，限制他们在经济生活中分一杯羹。但是，这些法律是以匈牙利的特有方式执行的，根据这一方式，企业雇佣更多的非犹太人职员，支付薪水，但却不要求他们做很多工作。于是公司业务照旧进行下去。与此同时，德国人却坚持要求采用更加严厉的反犹措施，这种压力得到匈牙利民族社会主义者强烈的响应。不过，其他社会团体也纷纷要求制订反犹和种族主义的计划。1941年8月，匈牙利总参谋长冯·韦特将军拟订一项备忘录，其中不仅提出通过征服政策以恢复古代的边界，而且还要把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和犹太人等少数民族逐出这个

^① Kállay, 同上书, p.75. 说是8—9%, 不过看来估计过高。

大匈牙利，而唯有“种族纯粹的马扎尔人”才能在这里居住。^①

180 尽管德国的影响在匈牙利不断增长，同时两国在 1941 年又结成反对南斯拉夫和苏联的联盟，但箭十字党运动在战争年代并没有多大的发展。相反，在党员人数和影响方面还有过起伏变动。有些议会代表脱离了党，另有一些变成为激烈的反德分子。许多人怀疑党是背叛了匈牙利自身的利益，为外国人的利益服务的。开始，泰莱基伯爵拒绝把斯扎拉西释放，但在第二次维也纳奖赏（把特兰西瓦尼亚北部给了匈牙利）几个星期之后，斯扎拉西终于在 1940 年 9 月得到自由。他很容易地重整了党员队伍，并且控制了那些倔强的代表；有几个对立的组织也自愿听从他的领导。可是，不久磨擦又出现了；有八个对立的组织阴谋互相倾轧，并且也反对斯扎拉西。当年年底，他在日记中写道，他的声望已经下降了。几个月后，即 1941 年夏季，他曾写道：“有一批工人，即秘密的共产党人脱离了党。党在进行一场无情的清洗，所有那些不能旗帜鲜明地同富豪作斗争的人，那些马克思主义者和犹太人，通通都被驱逐出去。”^② 不过，该党又吸收了许多新成员，估计 1940 年底已有十一万六千人。三年之后，斯扎拉西又一次写道，他存在一种忧虑的情绪，因为“党员人数已经降到十万以下了。不仅是一般的党员，就连党的领导集团也都普遍地产生了厌倦和沮丧的情绪。宣传和组织工作实际上都已完结。目前党的统治集团已无法领导一个全国性的党了。”^③

看来，象这样很不团结、充满内讧的运动，要指望依靠自己的努力去掌握政权是绝对不可能的。是的，正是德国人最后废黜了

^① Martin Broszat 引用，‘Faschismus und Kollaboration in Ostmitteleuropa Zwischen den Weltkriegen’,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xiv, 1966, p.245.

^② Macartney 引自斯扎拉西的日记，同上书，ii, p.42.

^③ 引自斯扎拉西的日记，同上，ii, p.199.

霍尔蒂，因为他企图使匈牙利从战争中摆脱出来。当红军已经踏上匈牙利土地的时候，德国人才把斯扎拉西和箭十字党推上权力的宝座。然而斯扎拉西决不是德国人的走狗。几个月之前，即在1944年4月，他曾第一次会见德国全权大使费森迈尔博士，并通知他，只有根据他自己的条件，他才会上台；德国必须承认“匈牙利思想”以及他的其他纲领，他的党必须得到所有重要部长的职位。他对其他民族社会主义组织和那些脱离箭十字党的人也采取同样不让步的态度，他要求这些人完全放弃信仰，无条件地承认他作为领袖的权威地位。只是到1944年10月15日德国发生军事政变之后，才和这些误入歧途的绵羊达成协议，他们的领导人被允许加入箭十字党。斯扎拉西也不批准按照德国人的命令去消灭犹太人。在他于1944年9月拟定的行动计划中，他规定，在战争结束以前，犹太人可以在匈牙利范围内受雇于公共工程，而到战争结束后，他们将移居国外。他是一个诚实正直的人，但却是极其不切合实际的，没有办法控制他的信徒和各个对立的组织，总是在匈牙利主义思想这种高深的境界中徘徊，而由于这种种理由，他就很不适于占有他所渴望的那个崇高的位置。

在匈牙利，法西斯运动之所以非常容易产生与发展，是有着几个客观因素的，如政府和社会中都存在着封建残余，社会需要进行改革，没有共产党存在，社会民主党表现软弱无能，在中产阶级下层中充满着极强的反犹和反共情绪。但是这种运动一直是分裂的、很不一致的。希特勒在二十年代早期曾经无情地消灭一切竞争的181组织，但这种手段在匈牙利是从来没有实行过的。因此，老的政权只能由德国人来把它搬掉，但已经为时太晚了，因为不过几个月，德国就已最终崩溃，希特勒试图在欧洲建立的新秩序也同样完结了。此外，斯扎拉西缺乏其他法西斯领袖们的那种势头，也缺乏他们所具备的策略和残忍的手段。他是新匈牙利的预言者，对于

许多下层人具有号召力;但是要想去夺取权力,这是很不够的。权力一直稳固地掌握在老统治阶级的手中,直到德国人插手把问题解决为止。

反犹与反共:铁卫军

如果说匈牙利的国家结构在特里亚农条约之后极为简单的话,那么他东部的邻国罗马尼亚就十分复杂了。由于罗马尼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之一”(实际上它败于德国),1919年,在损害保加利亚、匈牙利和俄国的情况下,它得到大片人口十分混杂的地方,而且还有着强大的少数民族。即使根据1920年罗马尼亚官方公布的数字,在近一千七百万人中,只有70%的人是讲罗马尼亚语的。在少数民族当中,特兰西瓦尼亚的匈牙利人最为强大,占总数的9%强,达到一百五十万人。第二个大的少数民族是犹太人,占总数5%以上,达到九十万人。然后是乌克兰人和德国人。绝大多数犹太人居住在新获得的地区,即比萨拉比亚、布科维纳和特兰西瓦尼亚;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没有被同化,不讲罗马尼亚语,而讲依地语。和在匈牙利的情况一样,犹太人在罗马尼亚的贸易、财政和工业中(和其他外国人一道)占据了主要的地位。在这个地主统治的国家里,本地的中产阶级发展得很晚,犹太人基本上占据了他们的位置。罗马尼亚北部的许多城市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犹太化了。

即使在1914年以前,当富有的罗马尼亚地主们雇佣犹太代理人经营他们的产业并且代为收税的时期,罗马尼亚就已经存在强烈的反犹主义了。犹太人被指责剥削农民,同时垄断了贸易和工业。他们因这个国家的种种弊病而受到责骂,象在沙皇俄国那样,在政府的纵容下,对犹太人进行了有组织的大屠杀。在知识分子

中,反犹主义是由 A. C. 库扎倡导的,他1901年在罗马尼亚东北的扎希大学里担任政治经济学教授。他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在于驱逐阻碍本国力量发展的外国人,尤其是犹太人。为此,库扎为著名的历史学家尼科莱·伊奥尔加于1906年创办的一家刊物写文章,大力攻击正在破坏农民利益的犹太高利贷者和客栈老板。1909年,尼科莱和库扎创建了民族民主党,在青年中间散布民族主义思想。此外,库扎反对自由主义和民主,在早期阶段还曾采用卍字作为标志。但他为了农民的利益,为了给下层阶级赢得政治权力,也曾开展过土地改革运动。他对青年一代有强烈的影响,对一般知识分子也如此。他有一个最热心的追随者名叫容·泽列亚·科德雷亚努,是胡希一所中学的教师。

由于俄国革命的爆发,罗马尼亚人得以吞并位于普鲁特河与德涅斯特河之间的比萨拉比亚,这样就造成了同苏联的几乎是永久的冲突。这种长期对峙的局势给比萨拉比亚的农业和贸易造成严重的损害,引起普遍的不满,出现很多农民起义,而这些起义都遭到残暴的镇压。该地区的行政管理十分糟糕。因而不得不在那里连续保持戒严状态。政治动乱还不只限于比萨拉比亚一地。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在罗马尼亚的工人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发生了多起大罢工,人们还担心俄国可能入侵。有一个年轻的民族主义者试图把同学们组织起来,反抗这种入侵,在他看来,犹太人鼓动家们正在煽动罗马尼亚的工人们采取行动。“每一个犹太人,无论他是商人、知识分子或银行家,都是……以罗马尼亚人民为目标的共产主义思想的代理人。”^①这个在1919年以反布尔什维克战士的身份而开始他的政治生涯的年轻人名叫科内柳·泽列亚·科德雷

^① Codreanu, *Eiserne Garde*, Berlin, 1939, p.10. 下文,同上书, p.11. 科德雷亚努的自传是了解罗马尼亚法西斯主义的必不可少的书,虽然它描述了一幅理想的图画。

亚努，他是容·泽列亚·科德雷亚努的儿子，生于1899年。他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陆军学校受训，在那里学了什么是命令、纪律和领导权威。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曾贪婪地阅读过他父亲搜集来的库扎的文章。

183 1919年秋天，年轻的科德雷亚努进入库扎任教的扎希大学。但是，他发现工人们和他的同学们都受到左派的强烈影响；国王、政府和军队遭到攻击。科德雷亚努把这些事实和大学中的若干犹太学生联系起来。^①在这种气氛中，科德雷亚努和他的政治伙伴一道开始了第一次战斗：他们袭击了政治敌人和犹太人，把他们赶出学生会和宿舍，捣毁了敌对报纸的印刷机，强迫校方在开学时举行宗教仪式，逐渐地建立了他们对学生组织的控制。科德雷亚努的政治观点从一开始就是格外激进。他曾对扎希大学的反共战斗组织“民族良心卫队”的领导人指出，仅仅击败共产主义是不够的，还必须保卫工人的权力，必须建立民族工人组织以反对那些自私的、覬觐权力的政党。1921年，因为攻击《舆论》报的编辑，大学评议会作出决定，把科德雷亚努开除，但是法律系的全体教员拒绝承认这一决定。当他被选为法律系学生会主席时，大学评议会不予批准，但这并不起什么作用。此时，学生会所有的讨论和谈话都集中在犹太人问题上，库扎教授关于政治经济学问题的讲演不止一次地被当众宣读，其中告诫所有的罗马尼亚人都来关注“我们时代的这个最严重的问题”。

当扎希大学生的正式联合会仍然由他们的敌对派掌握时，科德雷亚努和他的同伴们于1922年建立了“基督教学生联合会”，同时宣称其敌对的组织已解体。在这个新成立的组织里，他们废除了选举和民主制度，采用领导人当家的原则。这并不是由于有什

^① 根据上书 (*Eiserne Garde* p.76) 提到的数字，33%以上的扎希大学学生都是犹太人，他们在医学系和药学系居于有力的支配地位。

么理论依据,而只是出于本能地否定多数裁定的原则,这是他们根深蒂固地存在“血液”中的。第二年,库扎和其他一些教授,(其中包括科德雷亚努的父亲)在大学举行一次隆重的仪式,成立了“基督教徒与全国防卫同盟”。新运动的旗帜是黑底白圈,圈中有一个卐字,象征着反对犹太人的斗争。同盟的目的是在行政机构、军队、法律界和教育界排斥犹太人,并且在大学和其他学校里限制犹太人的数目。该组织反对一切政治党派,认为它们与国家利益是根本不相容的;在随后几年,它又吸收了一些由学生和教员组成的小法西斯组织。在布加勒斯特,他们自称为罗马尼亚民族法西斯,它的纲领不但在于强烈反对犹太人,而且还反对资本主义,要求土地应属于耕种者所有。科德雷亚努和他的同学们暂时在受库扎左右的这个同盟里工作。 114

1923年,科德雷亚努和他的一些朋友第一次被捕,罪名是他们计划杀死那些给予犹太人以及犹太知名人士公民权的“卖国贼们”。在弗克雷什蒂的监狱中,他一直埋头制定一项计划,即组建一个称为“天使长米迦勒”的青年人组织,因为和其他国家相似的运动比较,罗马尼亚是有着强烈的宗教气氛的;后来这个团体每次召开集会,就总是先举行天主教仪式。为了吸收罗马尼亚青年参加民族主义行动,第一个“十字架兄弟会”在扎希大学成立。它的领导人是由科德雷亚努指定的一个名叫容·莫塔的学生,他刚刚把《犹太长老会谈记录》译成罗马尼亚文,并且看到犹太人的幽灵在到处活动。“十字架兄弟会”发展到许多中学,它的成员一概受到纪律与严格的组织原则的教育。1925年,科德雷亚努又一次入狱,这一次是因为他开枪射击三个粗暴对待被捕学生的警官。但是,他被陪审团宣告无罪,这个陪审团的成员对于民族旗帜与卐字都是引以为荣的。他返回扎希大学的时候,所乘坐的火车竟饰以鲜花,每一站都受到由牧师和教师们带领的欢庆的人群的迎送。

大批群众在布加勒斯特迎接，科德雷亚努被人们扛过肩膀拥出车站。在科德雷亚努看来，这种高涨的热情有可能把该同盟推上权力的宝座，但库扎并没有证实局势果真是如此。在下一年的选举中，该同盟获得十二万张票，仅占总数的5%，在议会中得到十个席位。但后来在1927年的选举中，连这些席位也没有保住，该同盟只获得五万张选票，并且不久就分裂成为几个组织了。

就在选举前不久，科德雷亚努终于和他的老师库扎分道扬镳并且成立了他自己的组织“天使长米迦勒军团”，他自己任领导人。第一次点名持续了一分钟。科德雷亚努让在场的少数学生检验他们自己是否足够坚强并下定决心来加入新的运动。然后他任命了185 分队长，以便执行他的命令。该会没有纲领，不是一个政党，也不参加政治活动，只是一个以信仰为动力的团体。科德雷亚努从老会员、教授和军官当中挑选一些人，组成一个评议会，其成员享有最高的地位，不过他们只是在被请求的情况下才应提出建议。该会旨在保卫罗马尼亚民族，反对破坏其结构的一切企图，反对那些玷污和败坏民族高贵性的政客们。对科德雷亚努的那些狂热的、忠诚的追随者来说，他就是他们的“首领”，离开他，他们就不能实现自己的使命。“我们爱他，我们听他的话，我们遵照他的命令行动。他是我们的希望，是罗马尼亚明天的希望。我们因有他而强大。我们因有他而令人生畏。我们因有他而胜利。”^①

这个团体的会议带有一种奇特的、半宗教的特征。会议只能持续几分钟，并且遭到警察的不断干涉。1929年12月，科德雷亚努在小城贝雷什蒂向一次集会发表讲话，然后骑马走遍这一地区的村庄。用他自己的话说：“经过四公里行程之后，我们来到斯利

^① Eugen Weber 引用，‘Romania’，编入 *The European Right*, ed. H. Rogger and E. Weber,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65, p.532. 韦伯(Weber)教授关于铁卫军的文章是研究这个问题的最有价值的著作。

夫纳村。夜色已经降临。人们手持灯笼和火把在街上等候我。在村口，我受到会员们的迎接……。在科莫内什蒂也是一样，全体村民都手持火把和灯笼在等着我。年轻人在唱歌。……从一个村庄到一个村庄，我们的队伍在扩大。我们很快有了二十名骑手。我们都很年轻，在二十五岁至三十岁之间……。我们的人数这么多，大家认为需要有一种标志和制服。由于一时没有其他办法，我们就用火鸡羽毛来修饰帽子……。我们到达的消息不胫而走，迅速地传遍所有的村庄，人们到处都在热切地盼望着我们。我们在路上碰到的每一个人都问道：‘先生，你什么时候到我们村子去？昨天，老老少少一直等你到半夜。……’当我们一行回到贝雷什蒂时，骑手已经增加到五十个。我们集合起来，排成一路纵队，唱着歌骑马前进。我们受到热烈的欢迎。罗马尼亚人满怀喜悦地走出他们的房子。他们在我们经过的路上摆上装满水的大桶。根据老风俗，这就是给我们带来丰足和吉祥。我们在准备开会的广场上集合。这时已经聚集了三千多人，但我们没有举行会议……。”^① 136

几个星期过后，在1930年1月，科德雷亚努率领他的十字军越过普鲁特河进入比萨拉比亚：“傍晚时候，我做了一些约长二十公分的白亚麻十字架，把它们贴在骑手们的胸前。我自己则有一个小的木质十字架，用手举着。这样，我就和邪恶的犹太人形成对抗，给他们以打击。第二天早晨，我们三十名骑手渡过普鲁特河……。我们高唱歌曲，穿过街道：‘罗马尼亚人，觉醒啊！觉醒啊！’我们在中心广场停下。很快，有七千农民集合在我们周围。他们都不知道我们是什么人，要想干什么。但是，他们全都觉得我们是来解救他们的。……星期一早晨，我派波托莱亚带领五十名会员去卡胡尔。他们在当天要负责维持秩序。……十点钟，我们组成

^① Codreanu, 同上书, pp.331-4。上述引文是大加删简的，原来的文字很长。

一支行进纵队，越过普鲁特河进入了卡胡尔。在队伍前面，约有一百名身穿绿衬衫的会员骑马开路。他们举着旗帜。火鸡羽毛在我们帽子上飞舞，白色的十字形在我们胸前闪耀。我们看上去就象十字军一样，而我们也正愿意如此，作为骑士，以十字架的名义正在和邪恶的犹太势力进行斗争，以解放罗马尼亚。……我只作了简短的讲话，我说：‘我们不会离开你们！我们绝不会忘记你们在犹太人怎样暴虐的奴役之下正在含辛茹苦，过着牛马的生活。你们将得到自由！你们将成为你们劳动的主人，你们收获的主人，你们土地的主人！……’”^①就是这样，科德雷亚努在这个最穷困和最被忽视的地区，受到了农民们的欢迎。在这里，贸易和放债大都是掌握在犹太人手中，而各政党对当地农民是不予重视的，政府也不加过问。科德雷亚努的团体有着强烈的人民倾向，他们赞美农民们那未被损害的灵魂，设法要恢复历史上那种纯朴的价值标准。该会成员下地和农民们一起干活，同时在农民中宣传他们的主张，而那些党派政客们至多也就是在竞选时期到村里来发表一通演说罢了。

137 该会本身具有杰出人物的特点，而没有众多的会员。通过他们的斗争，锻炼出一个罗马尼亚的新权贵，但不是以金钱和财富为基础，而是建立在坚忍不拔和坚强有力的信念之上：“就象烈火炼真金一样，罗马尼亚民族真正的杰出精神将在该会斗争的烈火中变得更为纯洁。”会员们不得使运动在道德上败坏下去，不允许会员自己发财致富，不准过奢侈的生活，不得有个人野心和追求高官显位。^②但是科德雷亚努认识到，如果他想要竞选获胜并取得政权，还必须有一个群众性的运动才行。于是，1930年，他建立了铁

^① Codreanu, 同上书, pp.338—45。

^② 上文摘自科德雷亚努1937年2月12日发出的通知以及他为培养“整套”领导人所作的指示第80点，引文见 *Rumänien am Rande des Abgrundes*, Bucharest, 1942, p.157.

卫军，作为一个大规模的全国性组织去同犹太人的共产主义进行斗争。这个新组织的坚定的骨干力量，就是由米迦勒天使长军团组成的。尽管该军团原来主要吸收学生和知识界，但铁卫军后来则成为一个下层阶级的群众运动。1936年，一个特别的工人团加入了铁卫军，于是铁卫军一下子就拥有好几千个成员。值得一提的是，在罗马尼亚这样的一个国家里，同匈牙利一样，共产党是被禁止的。在1931年的选举中，铁卫军只得三万四千张选票，占总数的1.2%；但在下一年，它获得七万三千张票，并在议会取得五个席位。这一运动的主要力量在乡村，特别是在普鲁特河一带地区，几年前，科德雷亚努曾经朝气蓬勃地在那里的村庄进行活动。1931年，只是在卡胡尔一地，铁卫军就得票五千张。而这还是在警察严重困扰的情况下所获得的选票。1932年，政府下令解散了铁卫军，它的房屋被占领和封闭，它在扎希的印刷所也关闭了。

1933年12月，容·G·杜卡政府再一次解散了铁卫军，并且逮捕几千名成员。为了报复，有三个学生杀死了总理。科德雷亚努和另外几个铁卫军领导人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结果判处三个杀人犯无期徒刑，但宣判科德雷亚努和其他被告无罪，同时宣布解散为非法。这个裁决在全国普遍引起了人们对铁卫军的深切同情，贸易界和工业界的要人们开始对它表示支持。但是科德雷亚努遇到一个追求独裁的对手，这就是卡罗尔国王本人。正当极权主义在欧洲各地不断发展的时候，卡罗尔声势浩大地建立起他自己的青年组织，和各政党相持对峙。人人都想自己独裁，到头来是一场激烈的斗争。国王一度还认为，在他和各党派的斗争中，他能够利用铁卫军。由于得到宫廷的间接支持，铁卫军的力量迅速增强。1935年5月，已有四千二百个“小据点”或地方小组，1937年1月增加到一万二千个，当年底则达到三万四千个。在布加勒斯

188

特,有两家大报听任科德雷亚努的支配。在首都,食品店、餐馆和报摊纷纷建立起来,以击败犹太商人。后来,这一运动发展到其他许多城市。在1937年的选举中,铁卫军得到巨大的胜利,一跃成为全国第三大党。它得到四十七万八千张选票,占总数的16%,在三百九十个议席中占有六十六个。这次选举之后,科德雷亚努公开主张罗马尼亚同德国与意大利结盟,即建立“民族革命的国家”,以反对小协约国家,反对布尔什维克,虽然罗马尼亚历来同小协约国的其他成员,即同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有着同盟关系,也同法国有同盟关系,是共同反对匈牙利和任何国家的修改边界的要求的。

可能是因为这项声明(它和现有的制度太矛盾了),或者也可能是因为铁卫军在选举中获得巨大的成功,使得国王和政府确信再和铁卫军合作是不可能的事。不论怎样,卡罗尔国王突然翻了脸,对铁卫军发起攻击,这个运动遂告崩溃。1938年2月,宣布解散议会和一切政党;一个新的宪法明令颁布;唯一的政党——“民族复兴阵线”宣告成立,所有的政府官员都当然属于这个党;部长职位完全由国王任命,并且只向国王一人负责;普选权由一种以法人团体为基础的选举权所取代;只有国王才能提出对宪法的修正。宪法的公布使罗马尼亚变成为半法西斯的国家,就在这一天,科德雷亚努解散了铁卫军,因为正如他所指出的,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流血和内战的爆发。但几个星期之后,他和许多同伙被逮捕,他们的房屋遭到搜查,为的是寻找罪证,同时也在准备对他们进行新的审讯。检察当局起诉说,铁卫军是一个恐怖组织,参与了外国的间谍活动,拥有秘密的武器库,准备发动武装叛乱。科德雷亚努由于阴谋罪和叛国罪被判处十年苦役,而他的许多同伙,凡是未能逃脱的,也都遭到类似的命运。1938年11月底的一个夜晚,科德雷亚努和另外十三个人,其中有杀死杜卡总理的几个凶手和一个所

谓的叛徒，浑身捆绑被拉出监狱，被押送他们的宪兵绞死了。事后 189
宣布，他们是在“企图逃跑时被打死的”。

这件事并没有就此结束双方残忍的恐怖行为。1939年9月，铁卫军成员为了报仇，刺杀了卡罗尔独裁政权的“有力人物”——总理阿尔曼·克林内斯库，此人是一直负责整治铁卫军的。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的报复行动，有好几百个铁卫军成员立即被枪毙，有很多是无辜者。在科德雷亚努忠实的追随者看来，他们被害的首领成了烈士和圣徒。在他被害两年之后，他的遗体和其他十三名被害者的遗体，被隆重地从墓里掘出，殓后安放在伊利古尔加尼的教堂里，任人凭吊，神父们在一旁彻夜祈祷。然后，“首领的神圣遗体”连同其他十三人的遗体一道，被埋在该运动的“绿色房子”的陵墓，其他的“烈士”们也都埋葬在这里。“这一个星期将定为虔诚礼拜周”。^①至于该运动本身，在幸免遭受迫害的那些人当中，一个更加激进和残忍的领导人又站出来了。许多铁卫军的成员都暂时逃往德国避难。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对罗马尼亚的影响以及在经济上的控制都不断地加强。卡罗尔国王变得越来越亲德了，但是他的政权不得人心，而且在对外政策方面遭到彻底的失败。1940年6月，在苏德关系仍然十分密切的时候，苏联便向罗马尼亚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让出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北部。没有其他选择，只好从命，这些有争议的地区遂让给了苏联。政府的方针变得更加亲德，有些铁卫军成员被任命为部长，反犹措施付诸实施，罗马尼亚在1939年曾经接受的法国与英国的保证也被抛弃。然而，这些步骤并没有能够确保德国支持反对匈牙利提出的修改边界的要求。1940年8月第二次维也纳的裁决，便使匈牙利得以部分地实

^① 细节载1940年12月1日的 *Glasul Strămoșesc* 报，引文见 *Rumänien am Rande des Abgrundes* , p.180.

现了要求,获得特兰西瓦尼亚北部,但特兰西瓦尼亚南部和巴纳特仍然留给罗马尼亚,同时,保加利亚的要求也部分地得到满足,它得到南多布罗加。这种肢解使国家丢掉了1919年所得到的大部分地区,卡罗尔国王已无法维持下去。在铁卫军组织的一次失败的起义之后,他被迫于9月4日召请伊翁·安东内斯库将军,他曾
190 因同情铁卫军而失宠。两天后,卡罗尔退位,把权力交给他的儿子,跟着带着自己的情妇和财产离开了罗马尼亚。安东内斯库将军宣布自己为首领,并发布王室命令,成立以安东内斯库为领袖的“民族军团国家”。新政府大都是由将军和文官组成,而科德雷亚努的继任者霍里亚·西玛当上了副总理,其他铁卫军分子也得到了重要的政府职位。这时,罗马尼亚的局势和德国在1933年1月30日的局势十分相似,铁卫军虽然在政府里不是多数,但却是最强大的一支力量,看来把对手挤垮,夺取全部大权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不管怎样,这只是铁卫军成员们自己的看法,他们许多人都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可以把旧账算清,同时大捞一把。不少人这时都已是趋炎附势之徒、见利忘义之辈,他们的纪律性已经败坏了。无论是否有当局的许可,铁卫军的警察便任意搜查住宅,抓人并严刑拷打,没收人家的财产,或强迫他们以象征性的价格把财产卖掉。比如,该军团的一个名叫鲍鲁的成员以五百万列依的价格搞到一个价值五千万的工厂,而结果又只实付五十万。他还派出自己的人取代原来的董事和经理。政府最后开列的这类事件有一千一百六十二起,另有一千零八十一一起则是赤裸裸的霸占。警察方面没有干涉或参预此类事件。假如这仅仅是对付犹太人还有情可原,但受害者当中也确有“真正的罗马尼亚人”。霍里亚·西玛许诺暴力将会停止,但他自己却无法控制他的那些无法无天的信徒。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使高等教育适应于民族军团国家

的结构”。该委员会了解自己的任务就是从教育机构中清除军团的敌人(特别是他们的老对手——库扎的追随者),以及开除那些拒不执行军团命令的学生。教育部长宣布说:“教师们必须由他们的学生给以再教育。”^①

这种形势的存在,不久就在领袖安东内斯库将军和铁卫军之间发生了很大的磨擦。9月间,霍里亚·西玛下令叫军团成员“向安东内斯库将军表示感激、忠诚和完全的信任,因为他使军团的地位提高并且获得荣誉”。但是四个星期之后,西玛写信给他,强烈地抱怨说,新闻界仍然被准予批评和攻击政府;认为经济指导无方,军团成员对于“几起非法事件”负有责任,虽然“在大多情况下,这些事件是出于真诚而做的”。西玛继续写道:“请记住,这是军团的政权,军团成员是有特权的,有事应首先征询他们的意见,你那慈父的关怀应该首先给予他们。两年以来,他们已经受到打击,难道现在还要他们再遭受一次打击吗?……所以我们恳求你继续走‘首领’的道路,并且给予我们实现军团纲领(这是我们还没有开始的一项任务)的自由,因为直到现在,我们一直是自己政府的犯人。……”对于这封信,安东内斯库的回答是,让两个指挥来指挥同一个乐队是不可能的;一个国家之内,如果有两支警察队伍、两套司法系统、两个政治和经济的领导当局,如果每个人都进行干涉,每个人在他高兴的时候便自行发布命令,那么已经开始崩溃的国家秩序就会以难以想象的速度继续崩溃下去,结果将是一片混乱。他不愿意让军团成员和这个国家都变成为无政府状态的牺牲品。^②显然,双方的态度是针锋相对,无法调和的。

更糟糕的局势随之出现。安东内斯库决定解散独立的军团警察,但是内政部长把它与普通警察合并一起,于是这支力量又得到

^① Weber, 同上书, p. 562.

^② 信件全文载于 *Rumänien am Rande des Abgrundes*, pp. 103—5.

了新的权力。军团成员拒绝交出武器。他们杀害了著名的历史学家尼科莱·伊奥尔加、经济学家韦尔吉尔·马德杰亚鲁以及关在吉利瓦监狱中的六十四名政治犯，其中大多数是卡罗尔统治时期的警察头子和代理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连逮捕状都没有。严刑拷打有增无减。社会上不断出现要进行第二次革命，即所谓“长刀之夜”的谣传，那时候军团将夺得全部权力。军团的一家报纸形容霍里亚·西玛说：“霍里亚，我们时代的代表，比山还要高大。他象一个天使携带着天使长的宝剑。……霍里亚是思想，是感觉。霍里亚是明灯，是意志，是我们全部力量的所在。我们满怀狂热的忠诚站在他一边，至死不渝。霍里亚是我们的统帅。……”^①两个“首领”之间的权力斗争已不可避免了。

在1941年初，问题的实质在于希特勒是支持安东内斯库还是支持西玛。安东内斯库去德国一趟，他使希特勒确信，他只能在安东内斯库和西玛之间选择其一。希特勒原来早就打算统治和征服东欧，因此，需要罗马尼亚有一个有秩序的政权，可以给他以帮助，故此，他挑选了安东内斯库将军。这和他在法国支持贝当元帅，在匈牙利支持霍尔蒂是完全一样的，只要他们能交出他所需要的货物。他甚至建议安东内斯库，使用他希特勒在1934年对付不听话的冲锋队那样的办法去对付军团分子。从德国回来以后，安东内斯库委派可靠的军官取代了内政部长和警察总长的职位。属于军团的高级文官和警察局长们也同样被撤换，由忠于安东内斯库将军的人接替。在布加勒斯特，广大群众抗议这种人事变动，不久，他们就和军队、警察发生了冲突。疯狂的骚乱和抢劫发生了，许多犹太人和其他人被杀害。军团还成立了执法队，枪杀一切“叛国者”和原来著名的政治家，借口他们都是共济会成员。

1月21日傍晚，西玛向安东内斯库提出他的要求：将军必须

^① *Glasul Strămoșesc*, 15 December 1940, 引文见同上书, p.180.

引退，由西玛接替他的职位，所有的部长职位都由军团成员担任。第二天，反叛达到高潮。一切公共建筑物和电台都被军团占领。在大街上，用出轨的电车和运输车设置路障；如果军队前进，就把油车点燃。乡下的军团成员被命令进城来增援他们的同志。在布加勒斯特，张贴着这样的标语：“罗马尼亚的共济会分子、英国的雇佣分子与犹太人又在蠢蠢欲动了。他们藏身在自己阴暗的巢穴里，正在制订反对轴心国和军团政权的计划。他们仇恨军团……。凡是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及其思想的敌人，也就是我们军团的敌人！我们全都是为着同一个理想即欧洲的新秩序而战斗的……。”军团的敌人受到威胁，要给他们以严厉的惩罚，已经被送往地狱的克林内斯库的命运也就将是他们的命运。军团的目标是：“同德国和意大利生死与共”。^① 战斗仅仅持续了两天。事情再次证明，非正规训练和装备不良的军团成员不是正规军的对手。仅在布加勒斯特，就有三百七十人被杀死。德国的坦克举行了支持政府的示威。安东内斯库获得胜利，战败了的军团成员纷纷逃往德国。2月15日“民族军团国家”正式废除，由“民族和社会国家”取而代之，安东内斯库大权独揽。

在罗马尼亚(同在匈牙利一样)，左派力量无足轻重，缺乏实力，因此法西斯分子能够发展成为一种运动，支持实现激进的社会变革，提倡土地分配与实行有指导的经济，这些吸引了许多农民，但和匈牙利比起来，吸引的工人就少得多。不仅铁卫军的领导人，而且他们的许多追随者都是来自学术界和半学术界，然而他们的宣传和纲领却具有人民性。象在匈牙利(以及在奥地利)那样，上升的中产阶级特别欢迎反犹的口号，因为他们答应把他们在贸易与工业、教育与专门职业方面的那些成功的对手排挤掉。科德雷亚努把几个方面的要求，即宗教的、社会的、民族的，反共和反犹的

^① 1941年1月22日的标语，引文见同上书，p. 299。

要求全都揉合在一起了。但是一旦失去他这个具有吸引力的个人，军团于1938年和1941年在政府坚决的打击下，就曾两次土崩瓦解。铁卫军并不具备单独夺取政权的力量，即便获得政权，也无法把政府维持下去，这些因素清楚地使它区别于德国与意大利的法西斯党。落后的、不发达的罗马尼亚社会，农民和知识界中的不满情绪，以及缺乏有力的左派势力，这一切都为极右派提供了时机，但结果证明他们没有抓住此良机。他们的狂暴行为和缺乏纪律性本身，造成了他们自己无法克服的障碍，并且使他们失去了军队的支持，而这毕竟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六、西欧的几种法西斯主义

194

西班牙：从民族工团主义到长枪党

西班牙象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一样，是一个极为落后的国家，比较说来，工业极少，农民十分穷困，又有一个尚未解决的土地问题，因为大片的土地仍归教会和贵族所有。但和东欧国家对照，西班牙有强大的（但已严重分裂的）工人阶级运动，在左派与右派之间，以及在共和派与君主派之间，又有许多激烈的冲突。左派中力量最强大的是工团主义者或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他们控制着工会运动，但反对从事政治活动，也不参加竞选。然而，和他们并肩站在一起的，是强大的社会党（分为左派和右派）和社会党工会，还有人数不多的共产党和分裂出来的各种左派团体。始终存在着来自左派，特别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暴力威胁，他们的目标是要推翻现存制度。他们极端好斗，激烈反对统治阶级，同时也反对教会及其特权。他们不但在城市无产阶级中有强大的影响，而且也在无地的雇农和贫苦的农民中有很大影响。社会的反叛从来都是随时会爆发的。除了农民起义之外，在城市和农村还有革命的罢工运动的传统，而这些罢工时常都得靠军队的机枪才能镇压下去。上层阶级和中层阶级依靠雇佣带枪的保镖来对抗左翼的暴力，他们认为根本不应该对工人和无地农民做出让步，而是坚持要保有他们的传统权力。在欧洲，几乎没有那个国家象西班牙这样，社会差别是如此的显著，社会冲突又是如此的剧烈。 195

然而，历届政府却都是软弱无力的，又总是不停地变动，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年代，政治暴力有增无减。此外，西班牙

军队 1920 年代初期在摩洛哥遭到惨重的失败，公众对无能的领导和腐败的政客们的不满情绪迅速增长。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米格尔·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埃斯特拉侯爵和加泰罗尼亚总司令在 1923 年 9 月决定实行军事改变，以便把西班牙从“职业政客手中”解放出来，“这帮人……对始于 1898 年的这一灾难性的和腐败的阶段负有罪责”。西班牙在 1898 年曾惨败于美国，丢掉了古巴。于是，政府辞了职，国王阿方索十三世邀请普里莫·德里维拉当政，国会宣告解散，宪法也废除了。不过，代替那个“颓废的”议会政府的新政权还不是一个法西斯政权，而是一个由军官们牢固控制的老式的军事独裁政权。国内的混乱平息下来。只是在 1925 年，一个新的政党“爱国同盟”诞生，它借此企图动员公众去支持现政权。这个组织也还不是法西斯党，除了对国家、教会和国王崇拜之外，它没有什么思想，也没有自己的冲劲。它是一个保守主义者的大杂烩，其职责就在于支持独裁统治和煽动爱国情绪。尽管普里莫·德里维拉十分佩服墨索里尼，但要模仿墨索里尼，他不是没有这个愿望，就是还缺少坚强的意志。他甚至还同社会党工会合作。的确，除了爱国主义、反议会主义，和联合全体西班牙人之外，这位将军没有别的什么政治纲领。当他的健康情况开始变坏，不满情绪在武装部队中蔓延的时候，军队的将军们对于是否使他继续执政下去便犹豫起来了；于是，在 1930 年初，他被迫辞职。他离开了西班牙，不久就死去。他的政权，除了军队干预政治之外，再没有给这个国家留下什么持久的痕迹。不过，军队干预政治倒也是可以一直追溯到十九世纪的一个相当稳固的传统。

随后是一个短暂的半独裁统治时期，但是国王日益受到指摘，因为人们认为他应对独裁统治和以往的失败负责。共和情绪不断增长，在 1931 年春天的地方选举中，共和派在各大城市中获得了多数。他们强烈要求国王退位，甚至温和的中产阶级和军官们也

已开始抛弃国王。在普里莫·德里维拉死后不到十五个月，国王也步他的后尘，被流放了。在1931年6月的选举中，左派政党在国会中获得决定性的多数。一部新的共和宪法获得通过，从而使西班牙第一次成为一个民主国家。新宪法还坚决反对教权主义，威胁着由来已久的教会特权。曾经被普里莫·德里维拉镇压下去的左翼暴力很快地再次出现了，这种暴力不得不靠军队去平定。这种形势在有产阶级中引起了普遍的恐惧，而政府看来已不能应付这一局面。第二共和国所带来的形势，倒很象普里莫·德里维拉政变以前那几年的形势。共和国是自由党人统治的，但他们无法使政府稳定，因而在1933年11月的选举中，右派获得重大胜利，而左派所得票数减少大半。

正是在这种政治脆弱和动荡不安的形势下，一些年轻的西班牙人，主要是学生或已经毕业的学生，开始转向法西斯主义，想用它来解救国家的灾难。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认为这种灾难不仅仅在于政府的软弱和丧失了帝国的威力，而且还在于社会的不公正和压迫。他们所受到的主要启发不是来自意大利，而是来自德国。1930年时，这些团体中的两个核心人物拉米罗·莱德斯马·拉莫斯和奥内西莫·雷东多·奥尔特加，年龄都是二十五岁，曾在德国的大学里读过几个月书，他们在那里和民族社会党的学生们来往密切。他们满怀热情地回到西班牙——在他们眼里，无论是共和制或是君主制，这个国家反正已经是腐烂透顶了。他们开始出版《我的奋斗》一书的摘要、论述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的一些文章，并向青年发出热烈的呼吁。他们在呼吁中提出必须恢复西班牙的强盛，西班牙应当重新成为“英雄战士的国家”。与此同时，他们赞成对政治上的左派采取“直接行动”：同左派青年组织展开巷战，破坏他们敌人的政治俱乐部，设法弄到武器，后来还自制炸弹。这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为莱德斯马·拉莫斯所赞扬的无政府主

义者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他们“用行动去作宣传”的做法所产生的影响。

1931年3月，这两个年轻人和他们的门徒在马德里和巴利阿多里德的大学里，开始出版名为《国家的征服》的周报，莱德斯马·拉莫斯在该刊中写道：“我们对君主制不感兴趣，对共和制也不感兴趣。这些是老头子们关心的事。无论它们哪一方得胜，我们都要反对……；”“我们的主要目标是革命的效率。因此我们不追求选票，我们需要大胆的、勇敢的少数派。……”^①有很多文章纷纷批评西班牙的衰落，并且把今天的西班牙同十五和十六世纪在天主教国王们统治下的全盛时期进行对照。西班牙必须再一次成为英雄的国家，有良好的纪律，实行军事化，并且充满着民族的热情。不过，他们的这些要求比起民社党的纲领来显然也是更为激进的。这家报纸不久便要求对主要的工业部门、运输业、银行、保险公司等实行国有化，同时由国家来管理对外贸易。1931年6月，这家报纸上刊出这样的口号：“二十世纪的新世界万岁！法西斯党的意大利万岁！苏维埃俄国万岁！希特勒的德国万岁！我们未来的西班牙万岁！打倒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国家！”^②在德国，这些可能是奥托·施特拉塞尔的革命的民族社会主义党的口号，虽然他可能不直接欢呼希特勒，而是宁愿称之为阿道夫合法或是威廉三世。

1931年秋天，马德里大学和巴利阿多里德大学的两个小团体着手创办称为“民族工团主义防御团体”(J. O. N. S.)的组织，这是西班牙的第一个法西斯党。它的旗帜有鲜明的特征，即采用无政府工团主义的黑红两色旗，再附加上昔日天主教国王们使用的“辮

^① Bernd Neilsen 引用, *Die verbotene Revolution*, Hamburg, 1963, p.51, 以及 Stanley G. Payne 引用, *Falange*, Stanford, 1961, p.13. 这是关于本节所讨论问题的两本基本著作。引文取自 *La Conquista del Estado* 第一期。

^② *La Conquista del Estado*, no. 13, 6 June 1931, Payne 引用, 同上书, p. 14.

与箭”。这种轭与箭被用来作为该党的党徽，象征着光荣的历史和革命的今天。该党在宣言中提出：尊重天主教传统，实行帝国的扩张，收回直布罗陀、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与一切分裂主义倾向斗争，废除议会制度，解散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和反民族的党派，宣布阶级斗争为非法，由国家控制经济，把大地产分割为小块，强迫所有的老板和雇员加入各种民族辛迪加，以及用民族主义的暴力去反击赤色的暴力。在未来的民族工团主义国家中，青年人将占据所有的高级公职，生产将纳入计划，财富将重新分配。很明显，这个纲领甚至比铁卫军或匈牙利的民族社会主义党的主张还要激进。这个党决心要同传统的右派分道扬镳了；但它对于强大的、生气勃勃的西班牙左派的吸引力却也仍然十分有限。的确，该党只是在大学生当中有些追随者，而且人数从来也不很多。此外，有少数失望的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也曾对它发生过兴趣。 198

1933年，希特勒夺取了政权，民族工团主义防御团体为此表示了热烈的庆祝。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的儿子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创建了另一个法西斯党。他当时三十岁，对于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的著作以及布尔什维克的著作都有很深的研究。同年8月，这位年轻的侯爵（他继承他父亲的爵位）会见了莱德斯马·拉莫斯，试探是否有可能将他的党与民族工团主义防御团体合并成一个新党，叫做“西班牙法西斯党”，但是莱德斯马拒绝了。两个月以后，普里莫·德里维拉在10月间成立了他自己的党——西班牙长枪党。当时大约有两千人参加了在马德里的集会，他们主要是来自右派。民族工团主义防御团体却从来未动员过如此之多的人。普里莫·德里维拉向与会者解释说：“现在成立的这个运动不是一个党，它本身只是一个运动，但我几乎可以说它是一个反对党。有一点必须彻底讲明的，就是这个运动既不属于右派也不属于左派。在右派方面，他们想要维护不公

平的经济制度。而左派，则是要推翻这种经济制度，即使这意味着要把很多好的东西都丢掉。……”政党必须消除，“谁也不是生来就成为一个党的成员的”。至于说到一个法西斯党的领袖必须是一个属于人民的人，工人们所能信任的只能是一个工人出身的人，他对此大声宣布：“不错，我们是系着领带，是的，你们可以说我们是年轻的绅士；但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与年轻绅士们是毫不相干的。我们进行战斗，结果我们自己团体的许多成员要付出重大的应有的牺牲。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它将把所得的果实公平地分配给上下各阶层的人民。……”为达到他们的政治目标，只要有必要，他们就决不犹豫地使用暴力：“我们的地点在新鲜空气之中，在晴朗的天空之下，手中握着武器，星星在我们头上闪耀。……”^①

几个月以后，在1934年2月，民族工团主义防御团体的全国委员会在马德里召开会议，研究与长枪党合并的可能性。该团体在199 1933年也有了发展，它在马德里成立一个出租汽车司机和招待员的辛迪加，在其他的西班牙城市也成立了以学生为主的一些小组织，但是这个团体仍然是一个很小的组织，没有什么财政来源。于是，他们决定和长枪党合并，定名为西班牙长枪党（不是准确的简称）。民族工团主义防御团体的旗帜、党徽和口号被保留下来，运动由三人领导，即普里莫·德里维拉、莱德斯马·拉莫斯和鲁伊斯·德阿尔达。这样一来，普里莫·德里维拉就不得不接受他的很多老朋友所不喜欢的激进的要求和行动；而在民族工团主义防御团体中，对于贵族和知识分子这些少爷们的不信任态度也仍旧存在。莱德斯马·拉莫斯和他的朋友们尤其反对的是，在长枪党

^① 这篇演说系 Payne 引用，同上书，pp. 38—41，以及 Bernd Nellessen 引用，*José Antonio Primo de Rivera, Der Troubadour der Spanischen Falange*, Stuttgart, 1965, no. 6, pp. 38—45。

内部看来要取消三头政治，而建立一种由普里莫·德里维拉为领袖的统一的领导体制。1934年10月，在全国委员会上，通过了一个有关这方面的决议；而莱德斯马仅仅以一票的多数被任命为一个新的政治委员会的主席，负责起草一个权威性的党纲。普里莫·德里维拉通过这种反常的民主程序而获得了对运动的控制权。但是，三个月以后，爆发了公开反对他的领导的叛乱，莱德斯马和他的一些密友都被开除出党。他们原指望很多人会跟着他们走，但是事与愿违。

长枪党企图组织工人并对社会党运动发起攻势，但是所得成果很有限。1934年，“全国工团主义工人同盟”成立。这是一个富于战斗性的组织，声称它完全赞同左派的经济目标，斥责“公司”工会，并且要求把民族主义注入无产阶级革命中去。但是很显然，只有某些出租汽车司机和招待员对此感到兴趣。普里莫·德里维拉设法从富有的贵族、君主主义者和金融家那里得到了财政援助，但是其他一些人因为不喜欢长枪党的激进口号而纷纷退出了这个组织。1934年通过的长枪党纲领，否定资本主义制度，因为它“错误地判断人民的需要，使私有财产失去人性，使工人聚集在一起而变成散漫的饱受痛苦与失望的人群”。这一纲领还主张把银行和大的公共设施收归国有，重新分配耕地，按照新地区图重新安置农民耕种贫瘠土地，以及征用那些“非法获得，或是使用的”土地。“大多数人过着悲惨的生活，而一小撮人却在穷奢极欲，这种状况是无法容忍的”。^①普里莫·德里维拉清楚地意识到，他的党所坚持的种种政策势必要给他自己以及他所属的那个社会阶级带来灾祸。在1935年的竞选运动中，他在塞维利亚解释说：“等到我们革命胜利的那一天，我们阵营中的许多人将会丧失很多东西，甚至说不

^① 长枪党纲领的第10、12、14、19和21点：Nellesen，同上书，no.22，pp.115--17；*Verbotene Revolution*，pp.165--7。

定会失掉一切。但即使如此，我们还是渴望革命，因为我们知道，当西班牙遭受毁灭的时候，再多享受几年特权又有多大意思呢？……”^①他的这种开诚布公的态度赢得追随者们的忠诚不渝。

在1934年—1935年间，该党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法西斯党，行法西斯的举手礼，以蓝衬衫作为制服，但到1935年底，它还只有大约八千个党员。1936年2月，在该党参加的唯一的一次选举中，它在马德里仅仅得到五千张票，占总数的1.2%，在巴利阿多里德得到四千张票，占总数的4%。普里莫·德里维拉本人在加的斯得到七千张票，但失去议席，因而该党没有一个人得到选民的授权。只是在学生中间（大多数的学生还都不到选举年龄）它继续得到有力的支持，学生党员的数目比其他社会阶层党员的总和还要多得多。多数党员都在二十一岁以下。但是，普里莫·德里维拉不得不按实际情况行事，便采取了务求精良的组织原则，不要求组织广大群众，“而是要挑选未成年者——不要多，而要少，还要是热心和可信的；这样，世上的一切事情就都办成了”。^②令人奇怪的是，他同希特勒和民族社会主义党人的联系始终很少。当他1934年春访问柏林时，他发现德国人是压抑的、分裂的，以后他再也没去过德国。他似乎也没有同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同墨索里尼进行过接触。的确，看来无论是希特勒还是墨索里尼都没有对这个天生的贵族有什么深刻的印象。

在1936年2月的选举中，长枪党遭到惨败，左派得到决定性的胜利，从而在议会中得到明显的多数；但政治暴力行为并没有因此而有所收敛，恰恰相反，由选举产生的人民阵线的统治碰到极左与

^① 1935年12月22日的演说：Nellessen, *José Antonio Primo de Rivera*, no. 20, p.109。

^② 1935年12月17日的演说：Payne, 同上书，p.75。

极右两方的武装组织之间越来越多的冲突与战斗。为了阻止这种暴力，政府于1936年3月解散了长枪党；包括普里莫·德里维拉在内的绝大多数领导人被捕，整个组织瓦解了。为了报复，转入地下的长枪党策划对政敌的谋杀，对象乃是地方上的社会党工作人员和曾判决参与谋杀的年轻长枪党人的执行法官。普里莫·德里维拉在监牢中继续指挥他的运动，告诫新的领导人要保持独立，不要和传统右派或军队结成同盟，因为“长枪党不是一支保守力量”，对于“凡是不以建立民族工团主义国家为目标”的任何运动，长枪党一概不参加。^① 到此时，他清楚地知道这种行动正在准备中；在6月底，他命令追随者给予支持。7月12日，即在民族主义者叛乱发生的前几天，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将会发生的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共和派在全国的专政。我还担心另一个虚伪的企图，就是……建立一个虚假的、保守的法西斯政府而不具备革命的勇气和新鲜血液。”^② 普里莫·德里维拉已失去了他的自由，但是他的政治独立性和勇气仍在。

他所担心的事情偏偏发生了。7月17日，一些将军没有等到时机成熟就在摩洛哥发动叛乱，几天以后蔓延到西班牙。这些军队的领导人含糊地谈到要挽救共和国，恢复秩序，实行改革，但是除了消灭人民阵线以外，他们没有明确的目标，也没有纲领。这个时候，长枪党感到自己没有领导人（他们还在监狱里），也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在长枪党的历史上，它第一次变成为一个大规模的运动（在由军政府控制的那些地区），但那只是加剧了混乱局面。长枪党的几个老骨干简直不知所措，几千人急急忙忙穿上了蓝衬衫，自愿加入了长枪党民兵。但是，弗朗哥将军并不打算采纳革命口

^① 1936年6月的社论与通告，Payne引用，同上书，pp. 111-12。

^② 1936年7月12日的信件，Nellessen引用，José Antonio Primo de Rivera, p.23.

号和长枪党的要求，他对所有这些没有半点赞成。他是一个老派的保守主义者，领导的叛乱是由军官们发起的一次暴动，而不是一场社会革命或民族革命。普里莫·德里维拉从牢房里发出的警告丝毫不爽地应验了。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他在1936年11月受到“人民法庭”的审判，罪名是参与暴动的准备工作，被判死刑，并在几天以后执行了。既然他已经完全不碍事了，所以他就成为弗朗哥独裁统治的法定烈士和保护圣徒。假如他还活着，他对弗朗哥的政权无疑是会反对的。

由于领袖还在监狱里（即使在普里莫·德里维拉死后，许多信徒还是不信以为真的），在将军们控制地区的长枪党领导人想出一个权宜之计，成立一个七人执政团，设主席一人，领导全党直到领袖重新出现为止。于是他们任命曼努埃尔·埃迪利亚为主席，他原是桑坦德的地方领导人，一个职业的机械工。不过各项决定都要经过多数赞同后才能作出，就象头一年的做法那样。在七人执政团领导下，长枪党继续迅速壮大，许多机会主义分子和前左翼分子纷纷加入进来，部分原因是他们受到压力以及逃避报复。但是核心领导机构对下面几乎没有指挥，组织上的混乱情况十分严重。长枪党民兵毫无战斗力，被军队当作笑料。该党的报刊发表文章支持希特勒的德国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甚至大肆进行反犹的宣传工作。这在西班牙只是一个学术问题，因为全国只有几千个没有什么影响的犹太人。但是，真正的长枪党人也坚持他们自己的思想，诸如强调天主教和光荣的历史，而厌弃在他们看来是属于异端的对民族与祖国的崇拜，正如埃迪利亚在1936年10月指出的那样。^①

到1937年初，长枪党领导集团分裂成为三派。拥护埃迪利亚的一派，大多是地方党的领导人，此外还有些模模糊糊受到民族社

^① Payne 引用，同上书，p. 127。

会主义影响的假法西斯知识分子也站在他一边。其次是长枪党的传统主义者，他们都是普里莫·德里维拉的忠实信徒。最后一派包括新成员、机会主义者、君主主义者，以及想要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长枪党的保守派。领导集团内的混乱状况在迅速加剧，对于无法给党以任何指导的埃迪利亚的反对情绪也越发高涨起来。批评他的人担心，他可能在军队的庇护下力图使自己成为领袖。在4月12日突然召开的委员会领导人会议上，有三个人申述他们反对埃迪利亚的理由，并宣布把他免职。由一个三人集团来取代他的职位——这正是重复该党早期的做法。在七个成员中，有四个投票反对埃迪利亚，于是，他于4月18日召集长枪党的全国委员会，以便选出一个领袖。但是，他在会上也只得了少数选票，有许多人弃权，还有一些人投了别人的票。第二天，全国委员会打算再次开会选举新的政治委员会，但因当权的军事集团出面阻挠而作罢。

1937年4月19日那天，弗朗哥将军发布一道命令，把长枪党和“义勇军”（拥护王室的君主主义民兵组织）合并成为一个政治组织，取名为“西班牙长枪党”，并且把这两个组织各自的民兵合并成为一支全国性的民兵。弗朗哥自封为这个政权的新的法定党的领导人，于是，一位军队的将军成了民兵的司令官。从此长枪党就处于弗朗哥的控制之下，它的政治独立和自主也便就此完结了。原来的领导人埃迪利亚几天后被捕，因企图叛乱罪名受到军事法庭的审讯，并被判处死刑，但没有执行，只是单独长期监禁。其他的领导人也分别遭到短期成长期的拘留。这个新的法定的执政党是一个大杂烩，其中包括传统主义者、君主主义者、好斗的天主教徒、右派以及保守派，原来的长枪党人只占少数；所有的文职人员与军官当然都是它的成员。各派仍旧保有他们各不相同的政治目标，除了弗朗哥作为他们的领袖之外，党内没有团结一致，也没有共同的

思想。而弗朗哥的立场倒是更加接近于西班牙的元首传统、成功的军队统帅的传统以及米格尔·普里莫·德里维拉的传统，而离开原来长枪党的传统较远。在弗朗哥的引导下，这个党离开了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和民族工团主义者所制定的目标和道路。

弗朗哥的新的长枪党(全名很长)不再具有任何政治职能,也不得再有任何政治的主动性。它同军队牢牢地拴在一起,它的民兵也都由军官指挥。在这个法定的党里,从前的长枪党人被他们的天主教和保守派伙伴冷眼看待。这些天主教徒和保守分子不相信原为长枪党所特别强调的社会和经济的改革,他们把原长枪党人看成为激进派或秘密的社会党人。由于弗朗哥也持有同样的观点,根本无意向激进要求让步,从一开始情况就很不妙。意大利外交大臣齐亚诺伯爵就曾清楚地看出这个新的长枪党不是法西斯党,1938年有一个原长枪党人访问意大利,齐亚诺把他拉到一边对他说,新的党内有那些年长的保守分子在,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法西斯党。在西班牙内战结束的时候,这个全国性的党的影响及作用就变得更加不大了。不过在建立一党制国家之后,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和德国的民社党也都出现过同样的情况。它们真正发挥重要的作用是在夺取政权之前,而不是在这之后。只有在西班牙,前长枪党的力量实在太弱,从未试图去夺取政权。

或许可以说,长枪党的激进主义是部分地与这种情况相关联的,即如果它果真成为一个大党,那么它便有可能抛弃许多激进主义,不过,就对西班牙社会弊病的认识来说,它比那些传统的组织和右派政党都要清楚得多。至于它是否真会获得力量去独立地实现社会改革,这很难说,可是看来它不大象是能够做到这一步的。按照现状说,同左派政党结盟是办不到的,而同右派政党联合则会导致妥协,而妥协所涉及的问题又偏偏是长枪党同传统右派以及

同弗朗哥政权之间分歧最大的那些问题。

弗兰德: 从民族主义到法西斯主义

1830年以后建立的比利时王国, 包含两个几乎同样强大的民族, 它们各有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一个是瓦隆人, 他们讲法语, 和法国有文化联系, 是更加发达的民族,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较多, 他们在王国的重要岗位上和国家生活中都占很大的比例。弗拉芒人的语言和文化在北面的荷兰人一样, 他们不但在经济上, 而且在政治上都处于劣势的地位。在二十世纪, 他们的不满情绪开始滋长, 要求与瓦隆人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由于他们的出生率高, 弗拉芒人在数量上将超过瓦隆人, 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瓦隆人坚持他们的特权和支配地位, 不愿在各方面作出让步, 如在语言方面, 在学校和一般教育方面, 以及在行政机构和军队方面, 等等。而另一方面, 弗拉芒人可以指望荷兰的支持, 因为在荷兰, 某些知识分子具有共同的传统意识, 他们着迷于大荷兰思想。不过, 随着德国好战的民族主义的兴起, 那里的领导人也开始对比利时的事情发生兴趣, 他们对于弗拉芒“兄弟”们的心愿表示同情。特别是十九世纪末建立的“泛德意志联盟”,^① 他们 205 认为弗拉芒人是德意志人, 瓦隆人的每一次胜利无不是对德国“事业”的一次打击。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当比利时的大部分地区被德国占领的时候, 上述倾向发展到成熟阶段, 德国人对弗拉芒运动给了坚决支持。弗拉芒人在政治要求上也变得更加激进了。1914年10月, 在根特成立了“青年弗兰德”组织, 它坚决反对比利时, 同时指望德国成为弗拉芒人利益的当然保护者。它在纲领中宣称: “这个国家

^① 参见前面第28—9页(边码, 下同)。

连同比利时这个名字都必须取消。一定要建立一个弗兰德王国，王国在政治上与军事上都要与德国联系起来……。”^①但是，其他一些民族主义的弗拉芒人却没有走得这样远。他们的著名领导人和发言人奥古斯特·博姆斯博士提出：“自由的弗兰德存在于自由的比利时之中，”他既不想和德国结盟，也不想和法国结盟。在1917年，“弗拉芒人国民议会”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弗拉芒人委员会”。该会的多数人都要求解散比利时王国，在1918年3月作出决定：“弗兰德必须在政治上独立，有自己的政府，有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力，并且在外国有自己的外交代表。……”^②这些弗拉芒人的“行动主义分子”并没有群众影响，他们绝大多数都是知识分子，只有学生们才容易接受他们思想的影响。这个运动过于亲德，以致不能在更广泛的范围唤起众多的同情，而当时，德国人要想在弗兰德建立保护国的意图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

与此同时，正在英吉利海峡岸边同德国人交战的比利时军队中间，出现一个具有十分不同特征的运动。军队中的法定语言是法语，领导人都是讲法语的军官。然而，很多士兵都是来自西弗兰德，该地区在当时是唯一不属德国控制的。在西部前线的战壕战相持不下的时期，士兵们在乡村教士的鼓动下，开始试图在军队中确立使用他们自己语言的权利。他们的口号是：“一切为了弗兰德，弗兰德为了基督。”用此口号的几个字的首字母组成的十字形成了运动的标志。这个运动不是亲德的，也不反对比利时，它非常尊敬比利时国王阿尔伯特一世。但是，它无疑困扰了军队的领导人，他们企图进行镇压。于是，它被迫转入地下；在1917年夏天，出现了一个非法的组织，在连、营、团、师各级都设有代表和委员

^① A.W.Willemsen, *Het Vlaamse-nationalisme*, Groningen, 1958. p.5. 这实际上是关于这里所讨论的问题的唯一的专题著作。

^② 同上, p.34.

会。这个“前线运动”的领导人是一个下士，和平时期在根特当教师，名叫阿迪埃尔·德·伯克莱尔；他下面的领导人也都是知识分子。其中有一个名叫若里斯·范·塞维伦，是根特大学法律系的学生。大学生在这个运动中始终占有绝对的优势，如象他们在德国占领区在运动中所处的地位那样。1917年7月，他们发表一封给国王的公开信，详细陈述了士兵的疾苦，要求建立一支弗拉芒人的军队和取得弗拉芒人自治。军队领导人对此则采取了比从前更加严厉的迫害。

然而，迫害并不能破坏这个领导有方和组织良好的运动，在前线的一个地区，运动一直坚持了几年。但是，德国最后于1918年秋垮台，德军撤出比利时，这时候，比利时部队进展得十分迅速，收复的地区十分多，以致于部队中的一切内聚关系都打乱了，弗拉芒的领导人彼此失去联系，也无法控制局面。“前线运动”的目的难以实现了。1919年初，原先的士兵们成立了“弗拉芒人阵线”，它不久就发展成为一个政党——前线党。该党的宗旨和士兵运动的目标相同：在军队中成立弗拉芒人团，实行弗兰德自治，由弗拉芒人决定一切有关弗兰德的问题，学校上课应使用本民族语言，根特大学应变成为弗拉芒人的大学等等。该党强烈地倾向于天主教，领导人都是卢万大学和根特大学的学生或以前的学生；而且在农村，主要是在靠近首都的一些地区的小农中间，该党也有很大的影响；在这些地区，上层社会人士讲法语，或者受到法国文化的影响。在1919年10月的选举中，前线党得到弗拉芒人选票的6.3%，在议会中占有五个席位。其中一个新议员是一个青年教师，名叫斯塔弗·德·克莱克，他在布鲁塞尔附近他的家乡有极大的声望。即使在选举之前，为了弗拉芒人的理想，在德国占领区的“行动主义者”当中已经出现过许多的殉难者，他们在1919年曾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博姆斯博士被判死刑，另外还有三十八个人也被判

处死刑,但判决都没有执行。另有十五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几百人
207 被判处多到二十五年不等的有期徒刑。这些严厉的判决反倒使弗拉芒人运动持续不衰,并且促使“前线党”获得成功。

然而,在1921年的选举中,该党遭到一些挫折。首次当选为议员的是若里斯·范·塞维伦,他当时二十七岁,是一个西弗拉芒人市长和公证人的儿子。他象其他党的领导人一样,非常重视天主教和弗拉芒民族文化。他把比利时王国作为死敌而加以谴责,虽然他自己的语言是真正的法语,并且他深深地受到法国文化的熏陶。说他是个政治家,倒不如说他是个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更恰当些,但是他那有朝气的个性使他在西弗兰德很得人心。^①1921年遭受的挫折,到1925年得到克服,该党获得二万五千张选票和六个议席。而到1929年,情况更好,该党得票十三万二千张,并占有十一个议席。该党已经得到相当多的弗拉芒人的选票,但由于比利时选举制度的复杂情况,范·塞维伦却失去了议员席位。到这时,他已经变成为夏尔·莫拉斯学说和墨索里尼学说的坚定的拥护者,与比利时王国不共戴天,而且立誓要摧毁它。1929年,他建立了弗拉芒民兵,身着绿色衬衫,手拿棍棒。他对他的母校根特大学的学生们有着强烈的影响,这些学生正在寻找一种新的思想,即民族主义和右翼的思想,遥望着弗兰德边界那边的世界。在他们中间,逐渐产生了一种大尼德兰的思想,把荷兰人、弗拉芒人、弗里西亚人和卢森堡人全都包括在内。他们的日报《青年大荷兰》开始提出了法西斯的口号。范·塞维伦本人攻击自由主义和议会主义,认为这些是缓慢而无效的,无用而陈旧的。比利时议会从未受到弗拉芒民族主义者的欢迎:“现代”的解决办法必得撇开这种制度,另外去寻找别的,独裁主义思想正在扩展开来。当根特大学的弗拉芒

^① 有一部由范·塞维伦的一个赞美者为他写的有趣的传记: Arthur de Bruyne, *Joris van Severen, Droom en Daad*, Zulte, 1961.

学生的多数人争取过来的时候，大多数的退役军人却完全持冷淡的态度，他们的报纸《斯凯尔特》对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以及一切法西斯思想意识进行了尖锐的抨击。

可能是由于范·塞维伦从前的战友采取这种拒绝的态度，或者可能是由于他对法西斯主义的一概羡慕之情不断地增长，使得他在1931年10月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尼德兰全国社会连带主义者联盟，简称为“尼社联盟”，其成员称作“迪纳索斯”。尼社联盟的思想基础是反民主和独裁，它强烈地攻击传统的弗拉芒民族主义者，把他们说成是“民主的废话垃圾箱”。在尼社联盟里，领袖范·塞维伦的意志就是法律。他发布运动的“进军命令”，组织内部实行军事纪律。那些身着制服的民兵构成运动的核心和骨干，也就是即将到来的新制度的精锐力量。这种新制度就是总体国家。民主政体和资本主义的混乱，连同政党和财政势力必须统统铲除。他们还从德国那里搬来反犹主义，虽然只是在安特卫普有相当一批具有影响的犹太人。范·塞维伦猛烈谴责由米塞尔特·安通领导的荷兰民族社会党，因为他们非但不反对犹太人，反而接受他们为组织成员，因为他们据说是属于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运动还从德国和意大利学来了对暴力的崇拜，以及由暴力而产生的同政敌进行巷战和会场战等的神话，那些政敌虽然人数占优势，但却常常被击败。但是尼社联盟的主要目标还是夺取政权，建立“人民的尼德兰”，把所有荷兰民族的各支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民族团结的有机的国家。在弗兰德由联盟成员夺取政权，在荷兰则按公共意志夺取政权，然后两个国家联合成为一个尼德兰国家。^①在十六世纪荷兰起义期间开始形成的人为的分裂要永远消灭。由于有这般十

^① 以上是1934年3月31日范·塞维伦向民社联盟学生第一次会议所作演讲的摘要，1940年范·塞维伦死后，由民社联盟以复制形式出版，题为：*Zoo Sprak de Leider*, pp. 6—10。

分的自信和无容置疑的理想主义，范·塞维伦很快就在学生中引起了强烈而热情的反应，但是他对工人的吸引力却小得多。范·塞维伦其人过于知识分子气，过于花花公子气，他不是一个民众的领袖。这个运动和西班牙的长枪党，和东欧的某些法西斯运动经历了同样的过程。甚至经济危机的突然到来也没有造成什么根本的改变。这个联盟的运动始终只有很少数人参加。

然而，在尼社联盟建立几年之后，第二个法西斯运动也在弗兰德发展起来了。1933年10月，“弗兰德人民族联盟”宣告成立，领袖是议员斯塔弗·德·克莱克。该党也采用制服和法西斯的敬礼方式；旗帜是黄颜色，上面有一个弗兰德的黑色雄狮。该运动的目标是要结束瓦隆人对弗兰德的统治以及法国势力的影响，结束“现行的自由主义社会制度及其产生的自然结果，即阶级压迫与大规模的资本主义”。^①该运动的领袖是在一个中央委员会的协助之下工作的，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党中央各机关的负责人和地方的领导人。同尼社联盟一样，这个新的党十分热衷于民族团结一致的力量，它的目标是把所有讲荷兰语的人统一在一个有机的大尼德兰国家里。但是斯塔弗·德·克莱克缺乏范·塞维伦的那种活力和吸引力。他很容易受别人的影响，到头来总是赞同那些对他施加的影响最大的人们的意见。因此这个联盟从来没有发展成一个步调完全一致的、有坚强领导的政党，各个地方组织始终保留着大部分的自主权。该运动在反犹问题上不象尼社联盟那样激烈，但是它却更加公开地亲德，深受希特勒的榜样的影响。1934年，它的报纸《弗拉芒人民》宣称：“就日耳曼语系来说，我们弗拉芒人在精神上属于西方德意志人阵线。……如果我们不想被法国的土地强盗所消灭，那么在我们历史悠久的奋斗中，我们今天就更加需

^① Willemssen, 同上书, p.315.

要寻求德国的支持。”^①

在随后的几年里，弗兰德人民族联盟及其报纸显得更加亲德了。它赞颂希特勒的政体及其领导的天才，赞颂在希特勒的领导下德国民族得以复兴。斯塔弗·德·克莱克被欢呼拥立为运动的领袖。“他就是秩序的象征，领袖想什么，信徒就做什么。”^② 特别是年轻的成员深深受到独裁主义思想的影响，但构成该运动地方组织骨干的前军人则并不如此深地受到影响。开展了宣传工作，反对百货商店，支持中产阶级，同时在安特卫普还试图挑起反犹情绪。在1936年和1939年的选举中这个联盟获得巨大成功，分别得票十六万八千张和十八万五千张，占弗拉芒人选票的12%以上，在某些乡村，甚至多达占总数的20%—35%。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成员参加党的会议。这些数字足以说明二十年代初期以来的民族主义运动已经发展到了怎样的程度。可惜的是，这些数字无法同尼社联盟的情况相比较，因为后者没有参加选举。尼社联盟党的会议的参加情况也比前者逊色。

当弗兰德人民族联盟越来越变为德国的宣传工具时，范·塞维伦的尼社联盟却沿着自己的道路在继续发展。起初，他们主张只有弗兰德才同其他荷兰语地区联合组成尼德兰国家，而这就意味着分裂比利时。尼社联盟的确就是这样公开宣传过的。但在1934年，不顾运动某些领导人的强烈反对，发布了新的“进军令”，那种对比比利时国家的消极的毫无意义的态度被一种较为积极的态度所取代；不是把它打碎，而是应该把它征服，依靠的不是暴行和武力，而是尼社联盟的力量和价值观的稳步发展。古老的尼德兰十七个省份应重新结合成为一个荷兰帝国；帝国中没有“瓦隆”民族和“瓦隆”文化，瓦隆人应象荷兰人和弗拉芒人一样，分散到他们

^① *Het Vlaamsche Volk*, 25 February 1934, 引用, 同上书, p.344.

^② 献给1935年5月5日会议的小册子, 引用, 同上书, p.332.

在历史上所属省份和基层去；他们不是“外国人”，而是在几个世纪内，同尼德兰人有着同样的命运的；他们是罗马化了的尼德兰人，都是属共同的法兰克人血统。应由一个独裁制度代替议会制度；取消议会，成立由家庭和家族的代表所组成的最高委员会；由一个专家团体来起草法律；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政党要一律取消。不能盲目地仿效德国的榜样，因为每一个国家都必须根据各自的实际规律和习惯来建立自己的“新秩序”。犹太人不仅是外国人，而且是危险的和有损害性的，因而应该相应地对待他们，但并不是采取第三帝国对待他们的那种方式（这已是在1938年11月纳粹对犹太人实行大屠杀之后）。^①在这方面以及其他方面，就对强大的德国邻居而言，范·塞维伦都力图保持自己的独立，而这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几个月。佛兰德人民族联盟也同样对第三帝国迫害犹太人与教会的行为表示不满。

范·塞维伦对于瓦隆人和比利时国家的态度的改变，强烈地影响了尼社联盟的政策。瓦隆人被接纳为联盟的成员，专门发行了一些法语出版物以争取他们。在尼社联盟举行的进军和示威
211 中，比利时的旗帜也和荷兰的旗帜一样打了出来。国王利奥波德和女王威廉娜都被承认为统治者，不仅应对他们表示尊敬，而且在这种越来越受到威胁的政治形势下，还必须给予他们以支持。这时范·塞维伦赞成一个强大的比利时的存在，并且同荷兰结盟和实行经济联合。当利奥波德国王于1939年夏天对布鲁日进行正式访问时，尼社联盟领导人的孩子们手持鲜花前往欢迎。早些时候，范·塞维伦宣传的是仇恨比利时的一切，而这时却大不相同了。虽然有些热情的弗拉芒人因为不同意新方针而离开了这个运

^① 以上的细节取自范·塞维伦的两次演说（1938年4月30日和1939年5月20日），以民社联盟的小册子出版，题为 *Drie Redevoeringen van Joris van Severen*, 2nd ed. 1939。

动，范·塞维伦还是始终得到信徒们对他的忠诚拥戴。对于信徒们来说，范·塞维伦依然是他们的领袖，是他们永远尊崇的领袖。他的神秘力量是不会仅仅因为政策的改变而发生动摇的。

范·塞维伦在第二次大战中死去，这使得他的神秘力量更加神秘了。1940年5月，德国入侵比利时之后，他被逮捕，送往法国，在法国人撤退时，他同其他犯人一起在那里被法国士兵杀死。在战争时期，他的某些信徒和占领当局相互勾结，而另一些人则加入了比利时抵抗运动。我们不知道范·塞维伦是否会赞同这后一种作法，但我们知道他对第三帝国及其政策一直是表示不满的。另一方面，比较坚强的弗兰德人民族联盟的领导人，甚至在早些年里就对希特勒及其政权赞叹不已了。这大概是理所当然，他们在战时便从德国人那里接受了大量金钱，公开地同民社党分子勾结在一起，恰似某些早期的弗拉芒领导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同德国人合作一样。弗兰德人民族联盟拥有广大群众的支持，但这并没有使该党的领导人在行动上采取更加独立的立场。特别是，他们的组织缺乏象尼社联盟的范·塞维伦那样坚强的领袖。

列克斯^①运动：从好战的天主教到法西斯主义

比利时弗拉芒地区的法西斯运动，在若干年内，在讲法语的瓦隆人地区并没有相对应的运动，瓦隆人地区比起弗拉芒地区来要先进得多，工业化程度也高得多。甚至就连1930年代初期严重的经济危机（它在全欧洲曾经引起极权主义运动急剧地兴起）也没有 212 在瓦隆人中间引起相似的反响。象弗兰德一样，瓦隆地区也笃信天主教，而正是从好战的天主教青年运动中，一个法西斯党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发展起来了。这个党的领袖叫莱昂·德格雷

^① 列克斯或列克斯党，又可译为国王党。——译者

尔,生于1906年,是乡村小镇布隆的一个富裕的酿酒商的儿子,在他小的时候,曾经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种种恐怖情景以及德国人的占领。从1921年到1925年,德格雷尔受到那慕尔耶稣会的教育,在那里,他接触到法兰西行动党的“理智的法西斯主义”。“某些耶稣会士……是夏尔·莫拉斯理论的公开的热心宣传者。每天傍晚,太平圣母院的修辞学教授都会把刚从那慕尔来的……许多法兰西行动党人带到操场上去。”^①

正是莫拉斯对二十年代的比利时学生们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在卢万,《法兰西行动党》报纸每天要销售几百份。“我们年轻人满怀热情地读着莫拉斯的文章,”神父雅克·勒克莱尔1925年这样写道。^②莫拉斯向青年人提出一个有力和有根据的学说,一个合乎他们的坚强的天主教和保守信念的解决当时种种问题的办法。由莫拉斯倡导的这种右派革命将会解决社会的种种弊病,并且使社会受到一种新精神的鼓舞。1926年,德格雷尔成为卢万大学法律系的学生,在那里他同比利时青年天主教行动党及其组织者皮卡尔交往密切。德格雷尔是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徒,是基督王的宣传者。当莫拉斯受到罗马谴责的时候,德格雷尔和其他热心的天主教学生都没有反抗,而是屈服了。1931年“天主教行动”运动创办一个名叫“君王”的出版社,德格雷尔任社长,当时他二十五岁。随后一年,他开始编辑一种月刊,也叫《君王》,其目的是要振兴基督教。他的这种大胆尝试很快获得成功,出版了不同组织和行业的许多刊物和小册子,而这些组织与行业全都是支持一个基督教改革运动思想的。为了他的刊物,德格雷尔曾经到墨西哥进行了一段时期的访问,报道墨西哥政府是怎样迫害天主教的。

^① Louise Narvaez Duchesse de Valence, *Degrelle m'a dit*, Paris, 1961, p.48. 关于莫拉斯及其主义,可参见前面的13—14页。

^② Jean Stengers 引用, 'Belgium', 编入 *The European Right*, ed. H. Rogger and E. Weber,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65, p.142.

从强烈的天主教到强烈的反共和反马克思主义，中间不过只有一步的距离，德格雷尔的宣传运动很快就更富有政治性了。他不但攻击共产主义，还攻击共济会的纲领、严重的财政和贪污现象，特别是政客中的贪污腐化。在《弗莱》这家刊物上，德格雷尔猛烈地斥责政治金融家，其中指名道姓的有在天主教方面颇负盛名的人。一些杰出的天主教政治家和天主教党本身，由于被动和无能，也受到了尖锐的批评。财政上的不法行为和丑闻给德格雷尔提供了充足的攻击材料。1935年11月，天主教社团与党派联合会在科特雷举行会议，保罗·塞热部长在会上讲了话，他也是一个著名的商人。他的讲话被德格雷尔和他的同伙打断。德格雷尔上台发言，他以最尖刻的措词痛斥党的领导人，并且正告塞热说：“你太老了，滚开吧！不要谈论什么纪律和权威了。你根本不懂那是什么。……”^①不久，德格雷尔出版了一个题为《我控诉塞热》的小册子，猛烈地攻击这位部长是经济上的剥夺者，是骗子和懦夫。这就意味着德格雷尔和天主教党正式地决裂了。

到1936年初，德格雷尔开始认真着手创建他自己的党。他得到很多年轻的天主教徒和比利时青年天主教行动党的组织的热烈支持，他们深为他的激情和演讲所吸引。那一帮腐败的政客必须铲除，德格雷尔轻蔑地把这些人叫做“无赖”；一定要对他们来一次彻底的大清扫。每当这些“无赖”在某地召开会议，德格雷尔的信徒们就会拿起扫帚，把会议地点前面的街道打扫一番。德格雷尔在国内到处旅行，向大批听众发表充满热情的讲演，斥责政客们以及在他们和腐败财政之间存在的关系。这种宣传很得人心，因为某些财政腐败已使公众意识到问题的所在，并且大家对传统形式的政府普遍表示不以为然和感到不满。在德国，斯克拉雷克兄弟丑闻和其他丑事也同样为民社党人提供了某些最好的攻击材

^① Pierre Daye 引用，*Léon Degrelle et le Rexisme*, Paris, 1937, p.72.

料。^① 德格雷尔开会的地点也象希特勒一样是选择华丽的场所，大
214 厅装饰得非常美丽，代表们身着不同的服装，高坐在讲台之上，每个发言人登台时，先吹起喇叭，又用聚光灯照着他们和那些密密麻麻竖起的旗帜。

新的列克斯党即国王党的纲领于 1936 年 2 月公布。^② 它尖锐地攻击了“政治金融的丑闻”和“比利时与刚果的超资本主义独裁统治”。它并不要求废除议会，而是要求严格限制它的作用，即只是控制预算和批准法律，它的开会期限应缩短为一年中的两个月；采用普选权（妇女没有选举权）和公民投票，以保证“人民和政府之间的直接联系”。纲领中还有很多社会要求：严格控制银行，控制资本主义，保护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尊重劳动，通过创建新工业来和失业作斗争，禁止已婚妇女就业，让农民返回去种地，土地应属于农民。但是纲领却没有提到如何来实现这些目标，也未提到大宗的财产是否要予以剥夺。财富应予分散，广大群众应是非无产阶级化，但是同样也没有提出方法来实现这些目标。象其他国家一样，纲领中也勾画出建立总体国家体制的蓝图，“基本上是社会的，建立在各个阶级团结一致的基础上”。总之，这个纲领是一个很不明朗的旨在谋求社会进步的纲领，它对每个人都作出了一定的许诺。但是，它并不是特别的激进，比起其他国家最初的法西斯纲领来，还是相当不激进的。比利时还没有受到任何激进行为的摆布。

的确，德格雷尔想要进行的决定性改革并不是在社会方面，而是在政治领域之内，即各政党都要加以消灭，因为它们被腐败的政客们支配着，而这些政客们又被一个不知名的寡头政治集团所支

^① 参见前面的 133—4 页。

^② Louise Narvaez Duchesse de Valence, 同上书, pp. 164—5, 可看到该纲领。这本书中还包括引自列克斯出版物的其他许多文字, 以及对德格雷尔的评论与意见。除去德格雷尔的赞美者写的一些书之外, 似乎再没有有关列克斯运动的著作。

配，并且在国内造成混乱。要恢复秩序和政府的稳定，就必须削减议会的权力和扩大国王的权力。国王有权任命和罢免部长；这种权力由议会来行使是不适宜的。^① 这里面并没有极权主义，倒是重又搞起了家长制统治，也就是七十年以前俾斯麦在德国建立的那一套制度。德格雷尔的一个最亲密的追随者，新闻记者达耶·皮埃尔，曾经明确地斥责任何极权主义的倾向，否定把国家同法西斯党等同起来，反对由一个组织严密的少数派来制定法律。虽然后者的这种概念可能有其道理，但它并不适用于比利时。^② 德格雷尔也拒绝使用暴力；他坚持认为要依靠合法手段去取得胜利。当有人提出异议，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从来都没有象他这样犹豫过，他回答说：“我既非希特勒又非墨索里尼，也没有兴趣去模仿他们。”^③

这个完全新的党，在1936年5月的选举中，得到的票数占总数的11.5%，在议会中获得二十一席，（总席位为二百零二个）。天主教党人损失最大，失去十六席。而且，这个胜利的取得是正当经济迅速恢复和失业人数急剧下降的时候。弗拉芒民族主义者也取得了重要的胜利。而列克斯党人在弗拉芒选区得到的平均选票比他们在本民族选区所得到的平均票数要低得多，只占7%。但是在比（利时）属卢森堡，票数却高达占29%，在那慕尔，占20%，在列日，占19%，在布鲁塞尔，也接近于19%。在讲法语的地区，列克斯党已经成为一个大规模的运动。几天以后，德格雷尔受到利奥波德三世的接见，他向国王清楚说明；他想要得到的是“权力，全部权力，而不是……为他自己或是他的一些助手谋求一个大臣职位。”^④ 这时，他的野心已经膨胀到无限的地步，他的运动将会把他

① Pierre Daye, 同上书, p. 127.

② 同上, p. 30.

③ Louise Narvaez Duchesse de Valence, 同上书, p. 256.

④ 同上, p. 205. 选举的数字根据 Stengers, 同上书, pp. 159—60.

推上权力的宝座。

德格雷尔在弗兰德也有热情的支持者，他们是一些分散的弗兰德—列克斯党小组，但是在那里，几乎不可能在竞争中胜过弗兰德人民族联盟，因为该联盟也具有同样的独裁主义倾向，努力争取同样的社会集团。但是在1936年10月，德格雷尔获得另一个胜利。他和弗兰德的民族主义领导人达成一项协议，即在弗兰德实行地区性自治；弗兰德人民族联盟和弗兰德—列克斯党组织实行合并。这看来是一大成功，但是却没有使德格雷尔受到热心的亲法分子的欢迎，而这些人是在瓦隆地区给予他大力的支持的。这一协议只维持了八个月，1937年6月被斯塔弗·德·克莱克废止。事实证明，弗兰德的事情实在难办，连如此多才的政治家德格雷尔也无能为力。他的信徒们主要是来自中产阶级及其下层，鲜明地代表着白领工人和农村居民的利益，正象民社党和其他地方的类似运动一样。但是，他在工业地区里所拥有的信徒一直很少，
216 那些地区是社会党人的据点。他们曾经尽力作过勇敢的尝试，即把年轻的列克斯党的妇女派去帮助工人阶级家庭，并且在1936年的矿工大罢工时期，还把几千名矿工的孩子从矿区送到其他地方的列克斯党成员家里去居住。作为未来的总体国家制度的核心力量，列克斯联盟的组织遍布各界，如贸易、工业、农业、手工业、各种专门职业，甚至远到刚果。还建立特别的青年组织、儿童服务队，以及在集合示威时负责维持秩序的防卫队。这种防卫队由一个退休的宪兵上校指挥。那些不属于这些组织的信徒，则被编入遍布于全国各地的地方小组。

1937年初，德格雷尔认为他已有足够的力量，于是在一个星期之内，在布鲁塞尔的最大礼堂——体育馆内举行六次巨型集会。在会上，德格雷尔每夜都向大批听众发表讲话。会议大厅里挂着许多列克斯党的黑红两色的旗帜，还装饰着大量红布。他象希特

勒一样,也认为红色是有特殊作用的颜色,但是他在会上并不鼓吹社会革命。他的讲话完全能够在他的听众中引起激动和热烈的情绪,他们的集体情绪达到了最高潮。他也和为他十分钦佩的希特勒有共同之处,他用抑扬顿挫的语气讲了如下的话:“希特勒经过的最小的地方也都留下几百张照片,把他访问的每一步都保存下来。那些面孔是出神的。那些手是不由得举起的,向内弯曲,摆出虔敬的姿势。妇女们哭喊着,孩子们的跟里放着异彩。……热爱希特勒的首先是人民。谁不承认这一点,那他就在撒谎。希特勒的运动,曾经特别是并且一直是工人的运动。希特勒曾经在艰苦的条件下多年生活在工人中间。……他一直是‘人民’中间真正的一员。他的生活比任何一个工人的都要节省,从不吃肉,只有蔬菜和水。他憎恨宫殿和欢迎盛会。他总是和群众打成一片。……朴实而勇敢,这才是人民所爱戴之处。……事实是希特勒受到工人阶级的拥护,这是不论何人在何时与何地都从来没有得到过的。……”^①希特勒达到“奇迹”境地,他赢得工人的支持,而这是德格雷尔不能达到的目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年月里,德格雷尔没有能够接近这个目标,因为他的运动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他的信徒们尽力高喊“列克斯党必胜!”而德格雷尔认为显示他的巨大声望的时候已经到了。1937年3月,他命令布鲁塞尔的一个列克斯党的议员辞去职务,同时凡是在列克斯党的名单上的将要取代该议员的其他人,在必要时也都不干。这样一来,就必得举行一个补缺选举,在这种选举中,德格雷尔(并非议员)自己要出来充当候选人。但是首相保罗·范·齐兰接受了这个挑战,而那些大党(天主教党、社会党和自由党)都没有提出他们自己的候选人。甚至连基督教

^① 1933年4月25日的 *Pays Réel* 中的一篇文章,引用于 *Degrelle avait raison*, Les Éditions Rex, Brussels, 1941, p. 35.

会这一次也不再保持中立了，在选举投票的前一天晚上，马利纳的枢机大主教谴责雷克斯对国家和教会都是一种危险，并禁止所有真正的天主教徒去投德格雷尔的票。这样一来，他的败局就注定了。虽然弗拉芒民族主义者指示他们的信徒去投德格雷尔的票，但结果，他只得到六万九千张票，而范·齐兰得票是二十七万五千张。这是一次失败。后来，在1939年4月的一次大选中，列克斯党的票数下降到总数的4%，他们议员的人数降为四名。

德国第二次占领比利时之后，德格雷尔和列克斯党徒和德国人合作，得到他们大量的金钱支持。一个瓦隆军团成立，德格雷尔从士兵做起，步步高升，最后成为高级军官。军团在俄国战场和德军并肩作战；从俄国撤出后，回到德国，仍在一起，一直到悲惨的结局。当时，德格雷尔和几个忠实的信徒侥幸逃脱，他们经过丹麦、挪威，然后坐飞机到达西班牙，找到了避难所。德格雷尔在这里开始埋头于写书。^① 在他自己的国家里，他的名字几乎已被人们遗忘了。由于列克斯党以及弗拉芒民族主义者同德国人合作，这就破坏了它们运动的基础。但是，弗拉芒的“行动主义”仍然是一个喧闹不休的和极端主义的组织，总是想要为弗拉芒人的“权力”有所作为，并且想要和敌手较量一番。^②

如果不是因为弗拉芒人存在不满情绪以及他们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那末比利时大概永远不会产生强大的法西斯运动，因为比较说来，列克斯运动是短暂的，它没有任何深厚的社会的或民族的不满作为基础。它兴起得快，衰落得也快。它并不那么极端，以致能够在一定时间内赢得群众的支持，并且这个运动也没有发展成

^① 参见，例如 La Cohue de 1940, Lausanne, 1949, 或 La Campagne de Russie 1941-1945, Paris, 1949 (叙述瓦隆军团在俄国的战斗)。也可比较德格雷尔自传 (*Degrulle*) 中向 Duchesse de Valence 口述的部分, Paris, 1961。

^② 战后，弗拉芒人的数目大大超过瓦隆人，两个民族都享有平等的权利。1950年，弗拉芒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是瓦隆地区的五倍，即7.7%比1.5%。

为一个具有干练领导人强大的党的组织。德格雷尔的雄辩才能并不足以代替一个优秀的组织。就是在议会里，他的二十一个议员也都没有给人什么深刻的印象。弗拉芒运动则有较深的根基，有多年的历史；但是它分裂了，最有活力的领袖范·塞维伦只领导一个主要由热情的学生组成的小组织。总的说来，比利时的几个各不相同的法西斯组织与党派，和其他国家的法西斯组织相比，是比较右倾保守、缺乏激进色彩的，而在这里，它们反映出本国的保守主义思想。考虑到这些情况，我们就很难说，任何法西斯政党怎样才能变得十分强大，以致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夺取政权并且把它维持下去。

英国法西斯联盟

墨索里尼在意大利获得成功以后，在英国，也象在其他许多欧洲国家一样，法西斯组织纷纷建立起来。他们采用不同的名称，如英国法西斯党，法西斯同盟，英国民族法西斯党，帝国法西斯同盟等，但是它们始终都是保守党内持极右立场的一些小组织。其成员几乎完全都是属于上层阶级和中间阶级，其中包括心怀不满的托利党人，这些人认为应该拯救大英帝国，或者保护不列颠种族的优越地位。只有阿诺德·斯潘塞·利斯的帝国法西斯同盟是个例外，他于1924年加入英国法西斯党，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种族法西斯主义者”。不久，他就着手建立他自己的作为独立组织的分支机构；其成员身穿黑色衬衫，专门进行反犹宣传。利斯认为揭露那些身居高位的犹太代理人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他并且发狂地信奉德国人提出的种族理论，甚至包括为了宗教目的而搞杀人祭神的一套东西。后来，他又赞同北欧日耳曼国家结成战斗同盟，去反对其他国家。说他是一个法西斯党人，还不如说他是一个民族社

会主义者更为恰当。他的追随者并不是来自社会上层或中层，可是他于1929年创建的帝国法西斯同盟仍然是规模很小的。该党的旗帜是英国国旗，再在中心加一个卐字符。

219 只是到1930年代初期使英国受到严重打击的经济危机的时期，一个规模较大的法西斯运动才产生出来，而这同早先的那些小法西斯组织也并无渊源关系。它的创始人是奥斯瓦德·莫斯利爵士，他于1896年出生在一个男爵家庭。他受过上等阶级的传统教育，在二十一岁时，成为议会中的一个保守党成员，代表中产阶级的选民。但是几年后，他退出保守党，于1924年成为议会中的工党议员，在拉姆齐·麦克唐纳政府中谋得一个次要的职位。莫斯利在政治上感兴趣的東西是“现代主义”，而在工党里并没有找到有什么是比托利党更加“现代”的。于是，他和几位朋友于1931年建立了这个新党，该党的政治立场是比较偏左而不是偏右，不过它从未兴旺过。跟着，在1932年初，他被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所吸引，便专程前往意大利，在这个发源地来学习“现代”的运动；在他看来，这种运动和早先士兵的运动大同小异。正是由于有了这段经历，莫斯利才变成为一个坚定的法西斯主义赞赏者，但他赞赏的是意大利法西斯，而不是德国法西斯。在他从意大利回到英国以后，他向英国的法西斯分子提出建议：他们应该和新党合并，组成一个法西斯联盟，并且接受莫斯利为联盟的领袖。他后来完全控制了那个运动及其政策。他们采用了法西斯的举手礼，同时把黑衬衫作为党的制服。1933年，在切尔西建立起“黑色旅馆”，身着黑衬衫的卫队常驻在此。这些人有免费的膳宿供应，得到若干零用钱，他们执行警卫、司机和通讯员的任务，过着半军事化的生活，吃饭、操练和“熄灯”的时间都靠吹号来规定。指挥部的黑衫队员把自己看作是运动的精华力量，肩负着领袖的警卫队的职责。黑衫队员是运动的积极分子，他们在需要的时候必须为运动效力。另外，还

有一般成员，但他们就没有这种义务。到1933年底，这个运动大概有五千名领取薪金的成员，但是不可能说出其中有多少是黑衫队员，有多少是一般成员。该党标志是从意大利学来的“束棒”。“这本是罗马帝国的权力、权威和统一的象征”，也即“今日不列颠帝国作为其主要看守人的”那种传统。^①

从组织上看，英国法西斯联盟也是一个十足的独裁主义党。²²⁰党的干部不是通过选举而是由上级任命产生的，他们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享有绝对的权威。一切政治决策都是由莫斯利本人作出，他在重大问题上是否同由少数人组成的理事会磋商，则完全取决于他个人的意愿。至于党的会议，也同希特勒的会议一样，力求搞得威严排场。1934年4月，该党在艾伯特纪念堂召开一次会议，会议开始时，先是吹起响亮的号声，然后，由两路纵队的黑衫队员举着英国国旗和法西斯旗帜步入会场，在靠近主席台地方各就各位；过了一小会儿，莫斯利单独地出现了。在会议结束时，黑衫队员一遍又一遍地齐声喊叫：“莫斯利！我们要莫斯利！”六个星期以后，在奥林匹亚举行一次规模很大的会议，也是一次声名狼藉的大会，因为黑衫队员对于会上提出质问的人和打断会议的人使用暴力来禁止他们发言，把他们赶走，这是地道的德国冲锋队式的暴力行动。在1934年6月30日，德国冲锋队受到清洗之后，莫斯利公开支持希特勒，随后，过了几个星期，民族社会主义的影响也变得明显了。而当该党于10月间在艾伯特纪念堂举行第二次集会时，这种影响就更加清楚了，莫斯利在会上表示他完全赞同希特勒的反犹主义：“不是以种族或宗教为理由，而是以法西斯的基本原则为根据，我们要表明，我们不能容忍在本国存在着一个有组织的

^① Oswald Mosley, *Fascism: 100 Questions asked and answered*, London, 1936, p. 1. 唯一合用的关于莫斯利运动的著作是：Colin Cross, *The Fascism in Britain*, London, 1961。关于“束棒”，可参阅前面的第47页。

社会，这个社会不是效忠于英国，而是效忠于外国的另一个种族。……我们将不再会为了犹太问题的争吵而和德国作战。”^① 莫斯利还指出：犹太人“必须把英国的利益放在犹太人的利益之上，否则就要把他们驱逐出英国。……犹太人就全体而言，他们竟宁愿在不列颠民族内部又组织成一个民族，并且把他们的利益置于英国利益之上……”。犹太人只能被当作外国人来对待，他们不得成为公职人员或者议员。“根据法西斯主义，为国家服务的任何人都必须是纯粹的英国人。”^②

在政治领域方面，莫斯利要求所有政党和党派制度必须废除，但并不废除议会。但是，“在法西斯主义下选举出来的议会将是一个技术性的议会而非政治性的。公民权将是职业性的而非地区性的。无论男女都将根据他们的行业或职业投票选举。……”^③ 这种议会的作用应该缩小，它只应处理一般性的问题，具体的问题由全国法人社团会议来决定。国家的经济生活应由这个会议以及二十四个单独的企业加以控制。法西斯党最高委员会（如象在意大利那样）应协助国王选定首相。应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由人民授予它行动的权力。“通过授权政府以行动大权，法西斯主义并非导致自由的结束，而倒是自由的开始。真正的自由是经济上的自由。……”^④ 由于一些明显的原因，他完全没有谈到政治自由问题。但是，所有这些目标的实现，都是“依靠法律的和宪法的手段。我们是通过赢得议会多数来谋取权力的”。^⑤ 莫斯利还许下要进行社会改革的诺言，要向贫困与失业开战，要开展公共建设和医疗健康事业，而“金融匪徒的控制”必须结束。

① Cross, 同上书, pp. 126—7.

② Mosley, 同上书, 第95和98点。

③ 同上, 第14点。

④ 同上, 第9点。

⑤ 同上, 第16点。

在大萧条年代,和其他法西斯组织不同,莫斯利倒能够吸引中产阶级下层和工人阶级的许多青少年。那些工人阶级出身的青年通常都是来自其影响日益衰落的好战的独立工党。他们对于官方的工党的那种谨小慎微的政策不感兴趣,对于从未赢得过大批的工人阶级追随者的小共产党也没有什么兴趣。在伦敦的东区,居住着大量的犹太人,这里的法西斯领导人都是无产阶级出身。1930年代中期,这里发生过大规模的法西斯进军,进军者遇到有组织的左派的抵抗。为保护进军者和举行露天集会,黑衫队员有组织地无情使用暴力。但是,此次这一武器失灵了,因为许多不太极端的运动的拥护者不同意这样做。虽然该运动公开的反犹行动在东区吸引了许多人,但对其他大多数人来说,尤其是那些具有强烈民族感情的人来说,那种做法象是从德国进口的货色。莫斯利把自己同希特勒拴在一起,这在英国是不得人心的。在共产党的影响十分有限的国家里,反共也并不是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不过,在1937年3月,伦敦郡议会的选举中,法西斯分子在伦敦东区仍然取得重大胜利,获得贝思纳尔格林东北选票的23%,斯特普尼选票的19%。

关于希特勒的政策,莫斯利对之完全抱有一种错觉。他认为,在皇帝的德国和希特勒的德国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前者“依赖于由犹太人金融所支配的输出资本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在世界市场上向我们提出挑战,并且凭借威胁我们帝国的海军竞争而加 222 强这种挑战”。而希特勒的观念“和皇帝的观念是针锋相对的。他的新德国并不想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帝国,因为他认为族种的杂交将会导致种族的败坏衰微,而新德国在世界上不是为了去提高野蛮人,而是另有使命。……”^①所以,对莫斯利来说,英德两国的利

^① *Oswald Mosley's Tomorrow We Live — British Union Policy*, London, n. d. (无日期), pp. 65—6.

益并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互为补充的。但是，这是把希特勒的思想与目标乃至德国的种族主义学说完全地理解错了。确实，希特勒愿意同英国结盟，但这仅仅是为了促进他征服世界的美梦，而他的政策势必要与英国的利益发生冲突。1936年初，这个运动的名字更改为“英国法西斯分子与民社党人联盟”，这又说明是进一步受到了德国的影响。在政策委员会里，有些人对于这种改变表示异议，但是莫斯利没费什么劲就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

莫斯利作为一个领袖无疑具有他个人的吸引力以及创造性的思想。但是，他象西班牙的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一样，有两个难处，一是他来自上层社会，从未摆脱上层人的心理状态，二是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只是为法西斯主义的英国设计蓝图，而并没有身体力行去处理政治方面和组织方面的实际问题。这个联盟组织有几年曾经吸引过大量的追随者，但其中的大多数人没呆多长时间就相继离去了。根据一项内部估计，1938年这个组织只有三千名积极分子和一万五千名一般成员。到这年为止，大概有十万人曾经在这个运动的行列中逗留过。在地方上，这个组织的力量仍然十分弱小。1937年，它的候选人在南安普敦得到二十九张票，在爱丁堡得到四十一和五十一张票，在谢菲尔德是九十七和九十八张票，利兹是七十四和一百零六张票。这些微不足道的数目表明，在争取大批的支持者这个问题上，法西斯分子是失败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这个组织的领导人和许多成员在整个战争时期一直在押，运动完全崩溃了。虽然战争结束以后，有人试图恢复它，但它再也没有得到大批的追随者。在大多数人眼中，都认为，由于它与希特勒结成联盟，这表明它是不爱国的，同时由于它采用暴力手段而失掉许多同情者。战后的政治气氛对于恢复极权主义或不容异说的倾向是不利的，甚至连大英国帝国的逐渐

消亡也都并没有在右派中引起任何广泛的反对。同希特勒和科德雷亚努比较起来，莫斯利的一套做法无疑是不那么狂暴和极端的，然而对于他的大多数同胞来说，那都是太过分的。由于不存在共产党的威胁，也没有因打败仗或受到某个统治集团的不公平对待而造成的民族的不满，所以不存在可能被法西斯主义利用的其他重要因素。英国的民族环境和政治结构都不利于法西斯主义的发展，何况奥斯瓦德·莫斯利爵士既不是希特勒，也不是墨索里尼。

奥地利的卫戍军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奥地利失去了它的帝国，成为一个有着过大的首都——维也纳——的小共和国。维也纳已经不再为帝国的需要服务了。更有甚者，它成为一个赤色城市，由左派的工人和士兵委员会统治，而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同时主要的政治气氛（如在克恩滕、施蒂里亚、蒂罗尔）是保守的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施蒂里亚和克恩滕还受到新成立的国家南斯拉夫的威胁，它对有多民族杂居的边境地区提出了领土要求。而在德国东部边境，因为有争执的地区问题，在非正规军之间展开了游击战。在奥地利这一边担负保卫任务的是自由军团，和在德国成立的那种军团相类似。这支力量也同样在国内能够被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

在南斯拉夫进攻的直接危险过去之后很久，这种半军事性的组织在地方上仍然不断地发展壮大。工业家们向这些队伍提供充足的资金，把他们当作抗衡马克思主义工会的力量，不过它们同时也从国外得到帮助。施蒂里亚部队所得到的金钱和武器是巴伐利亚的相似组织，尤其是那个名声狼藉的埃舍里希协会送来的，这个协会是在巴伐利亚为了内战而武装起来的。地方当局，首先是施

蒂里亚地方长官林特伦博士也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因此施蒂里亚的家乡防卫队甚至还拥有机枪和飞机。这个组织的领导人是当地的律师瓦尔特·普弗里默博士，他还在学生时代就是大学生协会的一名成员和舍纳勒的热情的追随者，因而他的思想和舍纳勒的思想一样也是亲德的和“人民化”的。他的队伍佩带卐字符，
224 除了打施蒂里亚的白绿两色旗之外，还打德国的黑白红三色旗。在蒂罗尔，另一个律师里夏德·施泰德勒博士也处于相似的地位；他是南蒂罗尔上阿迪杰人，这个地区被迫割让给了意大利。他的部队也得到巴伐利亚的埃舍里希协会送来的武器。1920年3月在柏林的卡普暴动失败以后，他得到一个精力旺盛的参谋长，名叫瓦尔德马尔·帕布斯特少校。此人从德国逃出来，居住在因斯布鲁克，这里是与德国的反革命进行联系的又一个地点。

哈布斯堡君主政体的崩溃，战争的失败，以及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这一切都为这类组织提供了大量的新队员：军官、复员军人、小农、小业主、各种专业人员，等等，他们都是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引起的经济与社会变革的打击的。他们全都仇恨红色的维也纳，仇恨那里强大的工人阶级运动、世界性的文化、寄生虫和投机商。但是，在好几年时间里，这些准军事组织只是在地方上有重要性，然而它们没有明确的纲领。在1927年，由于激怒的人群在维也纳焚毁了司法宫，由于警察对示威者开枪射击，社会党人宣布举行总罢工，这使人们重新激起了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强烈仇恨和恐惧。在各地，卫国军成功地挫败了罢工运动，并且得以接纳许多渴望阻止红色潮流的新成员。它的许多地方组织第一次获得了集中的领导和指挥。在此以前，这个组织的纲领还只限于反对马克思主义，而到这时，它已经反对议会制度了，树立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以法人团体或集团为基础的极权国家，就象意大利那样的榜样。伊格纳茨·西佩尔博士的政府看到在反对社会党人的斗争中卫国

军是很好的盟友。于是，卫国军组织得到加强，它们同军队和警察的官员们建立起很宝贵的联系。不过，它的队伍仍然佩带地方的徽章，穿着地方的衣帽。他们的政策也常常带有教会的或民族的地方色彩，而民族的含义要末是指奥地利，要末是指泛德意志。地方的教士们往往支持这个运动，为它祷告。

以上这一切都得到以伊什特万·拜特伦伯爵为首的匈牙利右翼政府的有力支持，这个政府是在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被镇压之后建立的。^①由于拜特伦伯爵采取主动态度，墨索里尼开始对奥地利卫国军运动发生了兴趣。在此之前，该运动原是以德国作为榜样并且得到德国支持的。1928年4月，拜特伦在米兰会见墨索里尼，他向领袖建议，墨索里尼应对奥地利卫国军运动给予金钱和武器的帮助，那样他们的组织就会充满力量，一个右翼的政府就会在奥地利建立起来。墨索里尼同意这个建议，他答应向奥地利卫国军提供一百万里拉以及所需的武器，条件是对方要在不久的将来设法去夺取政权。两个月以后，施泰德勒博士交给拜特伦一份备忘录，其中指出奥地利卫国军正处于从纯粹的军事组织转变为国家和政治组织的过渡阶段，有了后者的动力，卫国军将迫使资产阶级政党修改那部原是在维也纳暴民的压力之下通过的“半布尔什维主义的”宪法。这份朴素表达的备忘录，立即就从布达佩斯送到了罗马；在罗马，法西斯的外交部长迪诺·格朗迪宣布，他的政府赞同奥地利卫国军的目标，并将满足他们的全部要求。但是，他坚持奥地利卫国军领导人必须签署一项声明；即在他们夺取政权之后，他们应把南蒂罗尔（连同当地大量的讲德语的人口）的问题看作是不存在的。施泰德勒按时把声明送到布达佩斯，两个星期之后，意大利政府便把一千六百二十万里拉交给匈牙利人，由

^① 参见前面170—2页。

他们转往奥地利。^①但是，奥地利卫国军领导人甘愿放弃对南蒂罗尔的主权却引起了强烈的反对，甚至在他们自己的队伍里也不例外。

由于这些事件的发生，奥地利卫国军运动在意识形态方面越来越亲法西斯。1929年该运动把它的纲领送交奥地利总理，其中就包括建立“以等级集团和法西斯基本原则为基础的独裁主义国家”。他们的领导人开始作起进军红色维也纳的美梦来。1930年5月，几百名卫国军的领导人在科尔诺伊堡举行宣誓仪式，誓词强烈表露法西斯倾向。它鲜明地否定“西方民主议会制度和党派国家体制。我们要用来代替它们的是各阶级的自治和有利的国家领导人员。”誓词中还宣称：“我们决心要接管这个国家，并且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来改造它以及它的经济。……我们决心要以总体国家为基础，开创一个经济上独立发展的局面。……”就在同一天，普
226 弗里默博士宣称：“从各方面来说，信心是很清楚的，即在奥地利，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够拯救我们。我们必须作夺取政权的尝试。……”^②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在奥地利各地，卫国军的部队都先后根据科尔诺伊堡誓言，举行了宣誓。

然而，卫国军领导人之间很不团结。1930年9月，施泰德勒博士失去领袖地位，接替他的是恩斯特·吕迪格尔·施塔伦贝格亲王（奥地利一个显赫贵族的后裔），而由普弗里默博士作助手。施塔伦贝格具有泛德意志和反犹的倾向。他接受了内政部长的职务，并且在将于1930年11月举行的选举中，在所谓的祖国集团中名列首位。但是普弗里默要求他坚决不举行选举，而是为在10月

^① 这些文件归入匈牙利档案，由 Lajos Kerekes 出版，载于 *Österreich in Geschichte und Literatur*, vol. ix, January 1965, pp. 1—13.

^② Josef Hofmann 引用，*Der Pfrimer- Putsch*, Vienna and Graz, 1965, pp. 20, 24, 以及 Ludwig Jedlicka 引用，见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i, January 1966, pp. 138—9.

间举行的向维也纳进军做好准备工作。选举还是举行了，施塔伦贝格的集团只得到二十二万八千张选票和八个议席，这个失败是更加激进的成员事先已经预见到的。这种惨败表明一种严重的危机，在极端分子一方，他们越发坚定了要组织暴动的决心。卫国军内的法西斯主义倾向变得更加明显，意大利又从旁给以鼓励，大量的武器送到卫国军的手中。1931年春，普弗里默宣称，目前，人民并不象宪法中所规定的那样在管理国家，而倒是那些党魁们当家，他们只知道谋取私利。因此，现在正是通过“解放的政变”来推翻这个违背宪法的国家的大好时机。5月间，他们草拟一项纲领，保证要“消灭自由主义的和蛊惑人心的党派制度，要消灭自由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而发扬“以古代日耳曼民主为基础的等级观念”。^①

这场期待已久的暴动和废黜政府的运动终于在1931年9月由普弗里默作了尝试。在施蒂里亚，这次暴动开始非常成功。有武器装备的卫国军部队占领了很多小地方，并且包围了施蒂里亚首府格拉茨。但是，其他卫国军领导人不支持他，向维也纳的进军也一直没有开始。政府当局的反应则是异常的宽容，它允许卫国军的部队可以携带武器和平解散。普弗里默和其他的地方领导人受到审讯，但被宣判无罪，陪审员以法西斯的敬礼来表示自己站在被告一边。但是，暴动的失败在卫国军领导人中间导致了进一步的剧烈争吵，在施蒂里亚，则带来了分裂。在这里，跟随普弗里默的部队和民族社会主义党人签订了盟约，不久就被他们合并了，而施塔伦贝格另外组成他自己的队伍。他开始认识到，只有同国家及其政党组织结为联盟，才比较容易取得权力，于是他便和执政的基督教社会党更加接近，该党此时由多尔弗斯总理领导。这并不意味着卫国军放弃了它要建立一个独裁国家的目标，因为同基督

^① Hofmann, 同上书, pp. 35, 55.

教社会党合作也同样能够达到目的。墨索里尼继续向施塔伦贝格提供充足的武器与金钱。

的确，这种支持在此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必要，因为在1933年1月，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奥地利的民族社会主义党正在迅速地发展壮大。还在1931年1月的时候，帕布斯特少校就曾向匈牙利访问者指出；他们的组织所以能迅速壮大，其原因部分在于他们从自己的成员那里收集捐款，因而在财务上具有独立性，而奥地利卫国军则过于依赖工业界和外国的津贴。但是，妨碍奥地利卫国军发展的，却是其领导人之间的内部竞争，它的政治纲领含糊不清，它基本上持保守主义的立场。它现在面对着一个得到德国人大力支持的更加极端的运动，这个运动并且答应实现泛德意志的梦想，而一种明确的“奥地利”意识还没有扎下根。

1933年8月，多尔弗斯总理在里希翁纳会见了墨索里尼。墨索里尼要求奥地利在国内政策方面实行一种公开的亲法西斯的方针，而为此目的，他打算动用奥地利卫国军作为一种压力集团。为了阻止奥地利落入德国的手掌，奥地利所有的部队应在民族独立的口号之下团结起来。在这次会见几个星期之后，多尔弗斯向所谓的“祖国阵线”提出了他自己的以法人团体或等级为基础的政治复兴的纲领。但是，这不能使奥地利卫国军领导人感到满意，他们依照墨索里尼的旨意，要的是一个法西斯的奥地利。不过，多尔弗斯还是依靠卫国军的支持，因为祖国阵线力量太弱，又太不团结，不能保卫政府去反对左翼的社会党人和右翼的民族社会主义党人。还不能说祖国阵线就只是换了新名字的基督教社会党，同时它也未发展成为一个有生气的法西斯党。尽管墨索里尼作了种种努力，奥地利并没有成为一个法西斯和独裁的国家。

228 1934年初，意大利外交部副大臣苏维奇·富尔维奥访问维也纳；因为墨索里尼决心要使里希翁纳会议的纲领付诸实现，要把各

政治党派，尤其是社会党人铲除掉，同时一定要使奥地利成为一个意大利那样的总体国家。多尔弗斯还是犹豫不决，然而卫国军的领导人强烈要求要按照法西斯的观念来改变政治结构。在施蒂里亚，他们动员了他们的部队，从事暴力行动，并且以最后通牒的方式提出了他们的要求，即地方政府应该接受由准军事组织的成员组成的委员会的帮助。在施蒂里亚和奥地利北部，他们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首先，必须把社会党人留下的影响肃清，剥夺他们的职位。这样一切准备就绪，然后由政府采取措施来对付社会党人，因此后者被迫在1934年2月举行起义。他们很快遭到血腥镇压，社会党被解散了。

1934年5月1日，施塔伦贝格被任命为副总理，并代表多尔弗斯成为祖国阵线的领导人，而到这时候，卫国军还是拒绝加入祖国阵线。同一天，颁布了新宪法，其中规定废除议会制，成立独裁政权。议会不再由选举产生。议员们也无需再讨论政府的议案，而只能表示接受或是拒绝。议员席位是以行业合作协会为基础，拟定有七个方面，即工业、贸易、农业、专门职业、公务人员等。每一方都既包括雇员也包括雇主在内。但是，大多数行业合作协会从来没有存在过，整个宪法一直是一个虚幻的大厦而已。

1934年7月，多尔弗斯总理被民社党人暗杀，而这一次又是墨索里尼出面支持，才挽救了奥地利，同时也建立起半独裁的政府。但是，这个政府日益受到了德国和奥地利民社党人的威胁，后者得到德国的支持，而且必要时还可以跑到德国去避难。在搞垮社会党和工会后，它已经不再可能在政府的这个反对者和那个反对者之间进行挑拨活动，而那样做本身已经引起受害者们永久的仇恨。与此同时，奥地利卫国军进一步瓦解了，许多成员纷纷加入了民社党的行列，因为民社党具有同样的观点，并且正在壮大力量。在这方面，祖国阵线是无法与之竞争的，因为它已经没有革命

229 的热情，它太资产阶级化了，也太保守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把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搬到奥地利来的试验是必定要以失败而告终的。

在奥地利得胜的，不是墨索里尼，而是那个在奥地利培育长大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政治野心家希特勒。他的德奥合并的政策由一个真正的法西斯党——奥地利民社党付诸实现了，这个法西斯党不管政府如何迫害还是继续得到发展。他们提出的吸引群众的主张是以几十年来成为强大潮流的泛德意志主义作为基础的，这也是大学生们多年来所怀抱的理想，而如今德国已是一个强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在奥地利，泛德意志主义因1919年的和平条约而大大地增强了；根据条约，奥地利丧失了老省份，而又被禁止加入新的德意志共和国。二十年之后，西方的战胜国倒又心甘情愿地把它们在1919年所禁止的东西送给那个奥地利出生的独裁者。这样，法西斯在奥地利获得胜利，但是属于德国模式的，而不是意大利模式的，同时这意味着奥地利的一切都要从属于柏林那些新主子。柏林，而非维也纳，才是由那个奥地利下士统治的“大德国”的首都。

七、法西斯运动

230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在欧洲出现的各种法西斯运动都有十分不同的特征，它们反映出它们所在国家的完全不同的民族背景。有的比较保守，有的在要求与行动上都比较激进。有的激烈地反对犹太人，有的则不是如此。有的采取革命行动，发动反对政府的武装叛乱，而有的则坚持合法手段作为取得政权的唯一可能途径。有的在下层人民中拥有大量的追随者，有的则始终几乎完全在中等阶级或中下层阶级中发展成员。情况十分繁杂，人们不禁会问，它们有什么共同点，我们有什么理由可以把法西斯主义单独地拿出来讨论？下面就试图来探讨一下这些共同的特性，即区别于法西斯主义和当代其他运动（或是右的或是左的）的各种因素。

法西斯运动正如其他作者所曾指出的那样，^① 在意识形态方面都有许多共同之处——多到它们都能够互相借用。它们不仅仅有强烈的民族主义主张，激烈地反对共产党和反对马克思主义——它们因此就和其他极右派的政党与团体（例如意大利和德国的民族主义政党）有了共同之处。法西斯分子不仅痛恨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以及各政党，而且还要消灭它们，而代之以新的独裁主义和总体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只有一个党，党和国家的等级制度是重叠的，由党的机构来接管国家的职能。党员是唯一有资格担任国家高级职位的人。从理论上说，党和国家是一致的，但在实际上，它们之间产生许多磨擦。在德国是如此，在意大利也是如 231

^① 特别是：Ernst Nolte, *Three Faces of Fascism*, London, 1965。

此。同样，从理论上说（虽然在实际上并非总是如此），法西斯党具有强烈的高人一等优越感的特点。那些早期的党员认为他们自己负有拯救和领导自己国家的重任，许多法西斯党都并不把吸收大批党员作为目标，有时候还规定不发展党员的时期。法西斯党被设想为严密组织起来的半军事性机构，国家和社会应由它们去征服；在这些机构中，类似军事性的组织或民兵（身穿黑色的、棕色的、绿色的或蓝色的衬衫或制服）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当中有“行动主义分子”，这些人在争取权力的斗争中首当其冲。夺取全部权力就是他们的目的。

法西斯运动意识形态的部分内容，是一种强有力的神话，关于国家和民族的神话。这通常采取领土扩张的形式作为目标，如大德国，大芬兰，对非洲进行帝国的征服，大尼德兰国家以及帝国等。这种运动还夸耀和崇拜过去：古代的罗马帝国、天主教国王们的西班牙、尼德兰的十七省、古代的日耳曼人和图兰人的光荣业绩。这种神话是二十世纪的宗教，不管它与现实有怎样微小的联系，还是被狂热地信奉。这些运动的旗帜与徽章反映这种历史神话，如卐字象征着雅利安主义，束棒象征着罗马共和国，还有鞭和箭，弗拉芒雄狮，交叉的大镰刀或箭。特别是关于“领袖”的神话，领袖被忠实的信徒尊崇为圣人，他不会做错事，不能加以批评，他是上帝的恩赐，具有超人的品格。他有一种人的推动力与吸引力，能够激发起广大群众的狂热情绪。谁要是在德国参加过有希特勒在场的集会，都不会忘记他所能唤起的那种感情，那种宗教狂热与虔诚的气氛。他的那种吸引力后来竟使得久经沙场的将军在他面前发抖。这种吸引力也被某些其他的法西斯领袖运用过，如科德雷亚努、普里莫·德里维拉、范·塞维伦、德格雷尔等，表现得同样有力量，^①而且还不象刻意培养自己神秘感的希特勒那么装腔作势。

^① 一部关于在小城市温特斯韦克的荷兰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有趣的著作表明，

另外,还有些崇拜也表现了法西斯运动的特点,特别对暴力与“行动”的崇拜。在德国和其他地方,有关街道战斗和在大会场取胜的战斗的这类神话仍旧深刻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同样,对于那些“在精神上同我们的队伍一同前进的”“烈士们”的纪念也是如此。^①在罗马尼亚和德国,这种崇拜达到宗教的程度。在其他党,这种神话都没有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对于希特勒和科德雷亚努来说,这种神话还包括对犹太民族极端的偏见及其梦想取得世界权力的内容。法西斯运动既培养爱也培养恨。

同许多中产阶级或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一样,法西斯党迎合从上到下社会各个阶层的口味。只有那些为它高兴攻击的对象除外,即奸商、寄生虫、金融强盗、统治集团、贪心的资本家以及反动地主。即便这些人,如果有谁能够迎合领袖的要求,谁就是例外。不过,无疑有某些社会集团对于法西斯党的要求的反应是格外强烈的。特别是那些因社会与经济变革而被逐出家门的人或受到威胁的人,他们的社会地位受到损害,他们失掉传统的地位,对未来担心害怕。这里首先是中产阶级下层分子或者是他们中的某些人,如手艺人、独立商人、小农场主、政府低级职员和白领工人。在早期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原来的军官和军士也许显得更为重要,因为他们找不到工作,他们曾习惯于使用暴力,都感到自己被剥夺了“合法的”报赏。在意大利、德国和其他地方,“前线”一代人对法西斯主义产生起过主要作用。在这些人看来,战斗是一种生活方式,他们把这种生活方式搬到国内来使用。他们只是为了

(接上页) 在地方上情况也是一样的。此著作是: G.A. Kooy, *Het échez van een 'volkse' beweging-Nazificatie en Denazificatie in Nederland 1931-1945*, Assen, 1964。当地民族社会主义的领导人是一个很受人们欢迎的老兵。

^① 德国国歌(“霍斯特·韦塞尔之歌”)中的词句。霍斯特·韦塞尔是早期的一个“殉难者”,在柏林被共产党人枪杀。

他们自己才喜爱战斗的。^① 大多数重要的法西斯运动都起源于1919年，这并非偶然。那是匈牙利和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一年，是在许多人心里引起恐惧与仇恨的内战爆发的一年。那些被吓坏了的人是不会轻易忘记的。紧跟着在第二年，意大利北部的工厂被占领，也曾发生同样的影响。

不过，这并不是说，中等阶级下层的人就此独立行动（出于对自由主义和议会制政府的厌恶），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去实现法西斯主义。在最近出版的一本关于马克思主义问题的书中，曾经写道，中等阶级下层“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采取运用〔国家〕权力的政策，甚至加强这一权力，直到他们得到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超级国家”。^② 这是把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大大地简单化了。在许多不同的国家里，中等阶级下层分子被逐渐吸收到法西斯党内，但是他们作为一个社会集团，并没有采取主动精神，他们也无意“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而去运用国家的权力，有一份早期的社会学分析材料根据意大利的情况提出这样的看法，即意大利所以有可能向法西斯主义发展，是因为那里的资产阶级软弱，无产阶级强大，又组织特别良好，在国内某些地区已经居于支配地位。^③ 虽然这对意大利说来是合适的，但对德国说来就不那末贴切了。因为在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在1919年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而对某些不发达的国家来说，就根本不合用，如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从我们在上面讲到的那些情况中可以看出，法西斯运动可以在那些具有强大的左翼运动的国家里发展起来，如意大利和西

^① 例如科德雷亚努在他自传中的一段里所揭示的：*Eiserne Garde*, Berlin, 1939, p. 11.

^② J.P. Nettl, *Rosa, Luxemburg*, London and New York, 1966, vol. ii, p. 554.

^③ Franz Borkenau 'Zur Soziologie des Faschismus',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vol. Ixviii, 1933, p. 521. 这多少带有讽刺意味，因为此文是在希特勒上台后几个星期发表的。

班牙，不过在情况相反的国家里也同样会发展起来。看来，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彼此的力量如何同法西斯主义的产生没有多大关系。有一种主张更有道理，法西斯主义的产生是由于一种小毛病，即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失调，而受害者以中等阶级下层分子居多，其他社会阶层较少。

除了已经提到的社会阶层外，还有在中学和大学里读书的年轻人，他们在早期也成为法西斯主义的热心的信奉者。他们对现存社会感到厌倦，讨厌他们日常的工作，强烈地向往有可能带来根本变化的一种运动，从而可以以一种浪漫主义的光荣投身进去。这些年轻人出身于中等阶级或其下层的家庭。他们不容易找到进入共产党阵营的途径。而他们感到，战后时期软弱和多变的政府毫无吸引力。在魏玛共和国，在战后的意大利王国，在罗马尼亚腐²³⁴败的政府中，在西班牙孱弱无能的政府中，都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激发青年人的热情。它们是沉闷和平淡无味的，政府部门充满着平庸之辈和趋炎附势之徒。正是因为这种原因而并非什么经济威胁，才使得许多理想主义的学生参加了法西斯阵营。同样，战后一代人中的许多青年军官和士兵也都被民族伟大的幻想和修改和约的前途所吸引。仔细阅读一下由早期加入民社党的成员编制的自传材料，^①就可以看到最大的骄傲就是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渴望看到德国重新强大和统一起来，摆脱“凡尔赛条约的枷锁”，同时也铲除派别斗争和政党之间的“讨价还价的交易”。这往往是同仇恨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以及反对犹太人联系在一起。参加法西斯党的人通常都很年轻，他们喜爱不断的斗争和战斗，这样可以和他们的同志厮混在一起。他们也喜爱制服和举行宣传游行。

法西斯主义所以得到成功，也还有其他重要的因素。首先，是

^① 有大量的这类自传材料收入 *Hauptarchiv der NSDAP*，现存科布伦茨联邦档案馆。

破坏性的经济危机，它造成几百万人失业，并且威胁着更多人的经济生存。如果不是德国货币发生了巨大的通货膨胀，从而破坏了社会的根本基础，跟着在三十年代初期又出现了不景气，那么希特勒就不会在德国取得成功。如果不是战后发生经济危机以及由此在中产阶级当中引起恐惧，那么墨索里尼在意大利也是不会获得成功的。其他许多法西斯运动的产生也都归因于1930年代初期的不景气，这种不景气使得所有的政府叫苦不迭，陷于被动。同样重要的一点，是统治集团和政府中有些人提供了帮助，或是获得了军队和高级军官的支持。如果没有这些，那么就不会有向罗马的进军和墨索里尼政府的成立。如果没有巴伐利亚政府和军队提供帮助，民社党在二十年代初期就不会在慕尼黑成为一个群众性的党。后来，国防军领导人的模棱两可的表现以及他们对共和国的极端蔑视，对于希特勒都是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的，这里的意义并不低于他从某些工业家那里得到的财政捐助。如果一度没有得到国王卡罗尔和工业界人士的支持，那么铁卫军就不会成为一种大规模的运动。在西班牙，将军的造反把长枪党推到显著的地位。在芬兰和匈牙利，军队都为法西斯党提供了极宝贵的援助。这方面的因素一定不能把其重要性估计过高，不过也不能加以忽视。

最近，有人提出，“德国危机是自成一类的”。“虽然法西斯主义传遍全欧洲，德国的类型毕竟是独特的。其所以独特，不仅在于它设法取代了革命的动力，而且还在于把民族、天性与种族的思想放在首要地位。……”^①就民族思想而论，它并不算是独特，而是在种族理论上还有着芬兰与匈牙利提出的极为相似的东西。这两个国家居住的都是非印欧语系民族。属于同一类型的还有意大利法西斯党提出的“罗马”思想，以及荷兰人是属于共同的“大尼德兰”

^① George L. Mosse, *The Crisis of the German Ideology*, New York, 1964, p.315.

民族的理论。而且,在摧毁“革命的动力”方面,意大利法西斯分子比民社党分子做得更为成功。他们的讨伐队在意大利绞杀了革命运动。而在德国,这方面是在民社党成立以前由自由军团完成的。这并不否认,德国法西斯主义的产生因为在某些社会圈子里存在着民族与反犹主张就变得非常容易了,而这仅是促其产生的因素之一而已。其他的因素是战争失败,由于凡尔赛条约而产生的耻辱感与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想,鲁尔被占领与赔款问题,魏玛共和国的软弱与不得人心,通货膨胀与经济危机,以及中产阶级及其下层的恐惧与不安全感。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使得希特勒的得势成为可能,而所有这些又和欧洲其他国家的相同的事态发展彼此配合起来。即使希特勒凶残的反犹思想,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也找得到相同的倾向。

法西斯运动是不是革命的?无疑,他们许多人都要求进行根本的社会变革与改革,特别是在迫切需要这种变革的东欧与西班牙。但是,在比较稳定与保守的西北欧,这种运动不是那么激进的。意大利法西斯党和德国民社党最初提出的要求是激进的,可是很快它们便都把大部分激进主义抛弃了。如果许多法西斯领导人都坚持认为,他们必须以合法的方式取得政权,这也不足以证明他们的运动不是革命的。即使这种坚持并不仅仅是有用的宣传,法西斯运动也确实是以根本改变政治结构为目的的,即废除议会政府和民主,同时以新权贵代替统治集团。一旦上了台,他们自然地要起用老专家、文官和将军,不过这些人已不再发号施令。他们从新领导人那里接受“进军命令”。这些新领导人往往是出身于完全不同的社会阶层,比老统治阶级的地位要低得多。法西斯“革命”不是通过街道和街垒战斗来解决问题,而是依靠在内阁和政府大楼里进行的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存在着“夺取政权”的。政权由老统治集团转交给新的领导人,他们则利用这种政权来达

到自己的目的。

新统治者的目的和老统治者的目的之间存在着表面的相似之处，即德国的扩张或在非洲征服殖民地，但在实质上却有着巨大的差别。希特勒的目的不在于德国的扩张，甚至还不止是大德国，而是要征服世界。他并不关心苏台德的德意志人、南蒂罗尔人以及任何其他地方的德意志少数民族，反倒愿意为了他的野心而把他们送上祭坛。墨索里尼的征服方法往往是十分荒谬的，是完全受他的“罗马帝国”观念支配的。没有谁会认真地坚持认为，这两个独裁者的行动都是为了他们的国家。赫尔曼·劳施宁的断言有相当道理：法西斯党搞的是一场“虚无主义的革命”。希特勒青年团爱唱一首歌，歌中预言：当德国人垮台的时候，欧洲就会燃烧起来。欧洲燃烧了起来，可是她已经复原了。法西斯主义是深刻的社会与经济危机的产物，是欧洲社会的一种危机。

八、新法西斯主义

237

法西斯政权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宣告垮台，先是在意大利，随后不久在德国。它们威信扫地：它们征服和扩张的政策破产了，它们无情地镇压一切的反党派，以及它们对于自己的敌人实行非人道的虐待办法。在这两个国家里，在同盟国占领军的戒备的情况下，各民主党派和各种工会逐渐地恢复了它们的政治活动。不过，在欧洲各地，成千上万怀有信心的法西斯分子和民社党分子在战争中幸存下来，他们常常因为遭到监禁、审判以及被排斥在公职之外而感到愤怒。只要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设法组织起来，再次开展斗争，反对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反对讨厌的外国佬和所谓共产主义的颠覆。是的，由于战争，苏联的力量深入中欧的中心，东欧和中欧的大部分地区被迫信奉了共产主义，恐惧实际上确是存在，而这种恐惧曾经是推动法西斯运动发展的强大动力。而且，还有几百万人被赶走或驱出家门，他们从红军进驻的地区逃出，或者被赶出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而其中的许多人怒不可遏，急于报仇雪恨。当战后欧洲的事务有了较为妥善的安排之后，新的危险出现，威胁着所谓的种族纯洁，因为外国工人纷纷向更为富饶的国家移民，或是从战胜国原来的殖民地涌进来许多移民。欧洲警察的恢复确是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得快得多，但是也再度出现过严重的经济危机、大批的失业者和飞速的通货膨胀，这些在五十年前曾经驱使大量的不满者投入法西斯党的怀抱。因此，在这个或那个国家里，法西斯主义的复活几乎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战后，经过三十五年，不论在欧洲什么地方，都还没有出现过

238 大规模的法西斯运动，然而小团体和小党派则相当多，其中有些属于公开的法西斯主义者或民族社会主义者，而其余的却回避这一表示其特性的名称，声称它们是忠于民主制度的。这个或那个党在一个时期内有可能得到若干拥护者，在选举中赢得相当的票数，但是通常跟着发生的是走下坡路和组织瓦解，同时还经常出现内部的纷争以及不同的“领袖”之间的相互倾轧。人们对于法西斯主义威胁的警惕性大有提高，并且随时准备在其萌芽时期就同这种危险进行斗争。在某些国家，根据法律规定，曾经制止进行法西斯主义或种族主义的宣传鼓动工作，有的甚至还迫使新纳粹组织解散。反法西斯主义的宣传工作比法西斯分子搞的那套宣传更富有生气，因为法西斯分子从大工业界和农业界方面所得到的财政津贴似乎已经告罄。东欧的共产党各国，过去一度曾是产生法西斯主义的温床，现在，那里的许多前法西斯分子已经找到了新主子的庇护，不过没有合法的法西斯团体能够幸存下来。在西欧，在那些战时曾经被德国军队占领过的国家，总的说来，法西斯组织留下来的特别少，因为在那些国家里，人们对于民族社会主义的厌恶情绪格外强烈，那些法西斯首领，如德格雷尔、多里奥、米塞尔特和吉斯林之流，又曾在占领期间通敌卖国。

在法国，法西斯主义一直是微不足道的，“新秩序”（创建于1969年）一类的组织已经解散；有两个极右派团体，在上次的选举中总共才获得不到百分之一的选票。在比利时，弗拉芒的人民组织有一支半军事性的防卫部队，它持坚定的种族主义与反共的立场，不过它只有几百个人。在荷兰，有一个尼德兰的人民组织，创建于“七十年代，并有一个领袖；它曾参加1977年的选举，提出的口号是‘保持尼德兰白人化’”，所针对的是外国人以及从原来荷属殖民地移入的居民。可是结果，它只得到三万三千张选票，占总数的0.4%。弗拉芒和瓦隆民族主义者的支队曾经参加在德国举行

的右派大会，同时前党卫军分子的集会也为“国际”大会提供过同样的机会，不过，所有这些活动的规模都很小。在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由于推翻了右派军事独裁政权，遂使那里的右派失去了国际的支持与威望。不论在这三国中的那一个国家里，军人要想卷土重来，看来是不怎么可能的，虽然在西班牙，那里的军队对极左派和巴斯克分离派的恐怖行为可能令人感到难以容忍。1978年年底，²³⁹一家英国大周刊登载过一篇题为《法西斯分子都跑到哪里去了？》的文章。^①只要看一看第二次大战之后的欧洲，是不难找到答案的。这就是，只是在三个国家里，出现过重要的法西斯复活现象，即如人们会料到的，在意大利和德国，以及叫人有点诧异的，在英国。

意 大 利

意大利的新法西斯党，与欧洲其他国家的不大相同，它在战后不久建立起来，在连续三十年内一直没有间断地进行活动，而其他地方的这类党派发展起来后，又相继在混乱中消失了。意大利的这个党叫做意大利社会运动，由原先的一些知名的法西斯分子于1946年创建。它所受到的鼓舞，首先是来自1919年意大利法西斯主义革命兴起时期的种种活动，^②继而是来自墨索里尼（在他被关押和随后又被德国人解救之后）意欲创建激进的法西斯共和国的打算，即加尔答湖畔萨洛共和国，这个共和国本身并无权力，而是依赖德国的扶植。该党公认的领袖是乔治·阿尔米兰特，原是萨洛共和国的国务次长。这个党的纲领的基础，是要恢复原本的法西斯主义，绝不向君主制度或已有的政权作任何妥协，同时还提出若干要求，如消灭“寄生的财阀统治集团”，建立等级制度的公共秩

^① *The Economist*, 16 December 1978, p. 23.

^② 参见前面的49—52页。

序,国家以行业合作协会而不是以工会作为基石,国家应出面干预劳工纠纷,结束“党派政治恐怖”,要恢复地中海范围内的一切殖民地。很快,数千名从监狱释放出来的和从殖民地归来的法西斯分子都加入了意大利社会运动。不过,该党的群众基础的中心不是在北方,而是在南方,那里对于意大利的党派斗争和萨洛共和国都不了解,而且依然处于十分贫困和落后的状态,尽管战后作了种种努力在当地建设工业。在1946年6月举行公民投票时,意大利南方的大多数人赞成保留君主制度,而意大利全国的多数人则表示反对。1948年举行了战后第一次的选举,这个法西斯党仅仅得到百分之二的选票,不过赢得六个议席,但全都是在南方。^①在随后240几年,该党同君主派结成联盟,遂变成为南意大利型的典型的名人政党。由于南方的种种问题难以解决,这就为该法西斯党提供了无穷的宣传良机,使它有可能同当政的天主教民主党讨价还价和实行暂时的合作,同时偶尔也获得机会去利用群众的不满与造反。在北方,工业却得到迅速发展,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而南方是停滞不前,这样南北双方的差距扩大了。成百万的南方人纷纷向北方迁移,有的还越过阿尔卑斯山去谋取生路。

1951年,意大利社会运动在西西里地方议会获得十一个席位,他们提出诸如“地中海是意大利的生存空间”、“重返非洲去工作”等的口号,从而巩固了他们在南方的地位。随后,当他们在那里的地方选举中进一步取得胜利的时候,内政部长马里奥·谢尔巴提出一项议案,根据意大利宪法,应该解散这个运动以及那些右翼的准军事联合组织。但是,由于辩论中有人故意拖延时间,使这个提案迟迟不能通过。在1953年的大选中,该运动更进一步获得

^① 参见 Petra Rosenbaum, 'Neofaschismus in Italien',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onn, 7 December 1974, pp. 14—19, 以及 *Neofaschismus in Italien*, Frankfurt, 1975, pp. 36—40.

成功,所得票数占总数的 5.9%,得到的议席是二十四席。在南方的几个地区,这个法西斯党同当政的基督教民主党合作共事,双方平均分配那些有利可图的官职。人们开始纷纷向该党不停地提供捐助,要想按照法律途径来反对这个党已经困难了,谢尔巴的提案一事遂被遗忘了。但是,该党的领导人是在现存制度之内从事活动,甘愿适应议会程序的需要,又同其他右翼党派进行合作,这一切做法遭到激进的法西斯分子的反对。党内开展了斗争,更为激进的团体分裂出去,如新秩序和民族先锋。后者采取反犹和种族主义的立场,要求搞垮民主制度,而用一种“真正的秩序”的政权来取而代之。这个组织公开同情民社党,曾翻译出版了《我的奋斗》以及詹蒂莱与莫斯利的著作,以鼓吹“民族的与社会的革命”,并且还把党卫军的格言(“我们的荣誉就是效忠”)也当作它的座右铭。不过,这两个组织的人数一直都不多。另有一些更为偏激的组织,如墨索里尼行动小队,与当初法西斯的小分队是一脉相承的,同样也是信奉暴力的。他们在罗马和其他地方捣毁左翼党派的办公室,在街上袭击人们,而警察对此始终持消极态度。更具有重要意义的组织是称作工人民族联盟的法西斯工会,由意大利社会运动的一个领导人于五十年代初期创建,当时是为了同真正的工会相抗衡。他们很快便拥有大量的党员,特别是在南方,他在那里向雇主们供给“可靠的”工人。 241

在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的历次选举中,意大利社会运动并没有取得什么新的胜利。在 1958 年和 1968 年之间的三次大选中,它获得的票数分别占总数的 4.8%,5.3%和 4.5%。议会的法西斯主义看来不会给该党带来什么结果,年轻的偏激分子指摘他们的领导人,说他们在现制度之内苟且偷安,同天主教民主党人达成种种协议。在党的大会上,发生了公开的争吵。党的领袖阿尔图罗·米凯利尼反对把新法西斯的词语应用于本党,并建议抛开

所有的法西斯口号与手段,对此,阿尔米兰特代表全体决心进行法西斯革命的党员表示坚决反对。随后,米凯利尼被任命为党的主席团的成员之一,但已经失掉许多追随者,他们视他为机会主义者。“新秩序”号召抵制选举,它的领袖皮诺·劳蒂同其他国家的新法西斯团体建立了联系。意大利社会运动中的青年与学生组织对党的领导人的因循守旧的态度提出尖锐的批评,在他们看来,那种态度是消极的和非法西斯主义的。这些年轻人以及其他极右派的团体所鼓吹的是政治暴力与革命的法西斯精神。他们组织野营,进行军队方式的操练与武器训练。同左翼学生与工人的暴力冲突发生了。米凯利尼于1969年去世,乔治·阿尔米兰特继任党的领袖,他一直是一个偏激的法西斯分子,反对南方的党内的名人,对于萨洛共和国的法西斯主义竭尽忠诚。

1969年是多事的一年,政治与社会冲突变得十分激烈,出现大规模的罢工,学生闹起风潮,政府危机持续不断,暴力行动与政治恐怖日益增多,参与其事者既有极左派组织,也有右派团体。政府看来没有办法或者并不愿意去解决全国人民面临的种种难题,去恢复法治和保持稳定的局势。对左派颠覆的恐惧心理增强,而“向左派开放”(天主教民主党同各左翼政党一道组成联合政府)又变成成为实在的可能性了。墨索里尼行动小分队、新秩序、民族先锋等这些团体,对左派采取恐怖手段,搞起了爆炸活动。当年年底,有一枚炸弹在米兰的农业银行爆炸,十六人死亡,八十八人受重伤。警察当局在当地的无政府主义者当中搜寻罪犯,而只是几年之后,才抓获几个法西斯分子。然而,不管看守如何严密,主犯到底还是逃到国外去了。审判一再拖延,直到1979年初才有结果,但是三个主犯却不见踪影了。在1970年的选举中,意大利社会运动仅仅取得小胜,得票从占总数的4.5%增加到5.2%,而且这还是在天主教民主党同社会党的联合政府的危机扩大之后取得的。

在中等阶级的下层，有许多人开始把这个法西斯组织视为堡垒，以对付来自左派日益增长的威胁、工会的势力，以及权威与社会的分裂。“混账的党派统治”这个口号，对于那些因为在国营工业、统治集团与利益集团中存在的官僚主义、贪污腐败和管理不善等而深感不满的人们是具有动员作用的。

到1970年夏天，事件终于爆发——在南方的一个最不为人注意的地方勒佐·卡拉布里亚发生了暴动。原因在于这个新地区的首府究竟应该选定在勒佐呢，或是卡坦扎罗或科森察，以及从权力的转移中获得预想的利益问题。同勒佐竞争的这两个地点和罗马的关系要密切得多，因此意大利政府宣布，卡坦扎罗将成为地区的首府，而科森察是一所新大学的校址。于是，在勒佐出现了罢工、群众示威和骚动；在愤怒的工人与农民的骚乱下，公共交通断绝；当地的意大利社会运动的成员猛烈地攻击党派统治。当局又宣布，勒佐也不适宜于成为新的重工业中心的地点，这一下又引起了新的骚乱。由法西斯联盟组织的一个行动委员会制定暴力行动的计划：袭击天主教民主党的办公处和其他左派政党的办公地点。后者被焚毁。被该委员会鼓动起来的大批人群，同新法西斯主义的大学生和中小学生们汇合在一起，这些学生是来自西西里的城镇，如卡塔尼亚、墨西拿等。同时，附近一个半军事营地的黑衫队员们也加入了这个群众的行列。到7月底，意大利社会运动的报纸，由起初持谨慎的态度，发展到公然地支持叛乱，并且赞同“自由与独立的勒佐”这样的口号。讨伐队被派往卡坦扎罗和科森察。同行政当局的部队进行的战斗持续到9月间；在战斗过程中，一些公共建筑物、邮政局和车站被焚毁。该运动的宣传喉舌把那些有组织的暴力行为说成是出于起而反对腐败政党统治的人民的正当的忿怒情绪。1971年达成妥协，地方议会轮流地在卡坦扎罗和勒佐两个地方举行。勒佐的暴乱说明法西斯偏激分子是怎样掌握了

243

主动权的；这些人被党的领导人当作行动部队使用，同时也是该运动所依靠的力量。

阿尔米兰特在他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一个劲地强调共产党接管的威胁，而意大利必须动用武力来消灭这种威胁。在1972年的选举中，他提出的口号只是法律与秩序，一种“公正的权力与责任的等级制度的秩序”。还提到行业合作协会制是社会安宁的保证；殖民地应该归还给意大利；罢工应予禁止；年轻人必须学习杰出人物统治论的思想。意大利社会运动在选举中获得迄今最大的成功，在全国得到近百分之九的选票：在北方所得票数少得多，在巴勒莫是15%，那不勒斯是20%，雷焦是21%，卡特尼亚是23%。这是南方人反对管理不善、玩忽职责和中央政府的一种叛逆行为。可是，意大利社会运动也曾聪明地利用了天主教民主党统治集团的进退维谷的处境，该集团一方面摆出阻挡共产党威胁的姿态，而同时缺少共产党的支持却又再也无法维持统治。差不多有三百万人投票赞成意大利社会运动与民族右派联合提出的名单。投票人主要来自中等阶级的中层与下层、公务员、白领工人、士兵、大学师生，同时也有南方贫穷的城市群众。意大利社会运动在众议院占有五十六个席位，在参议院占有二十六个席位，成为全国第四个最有实力的党。

不过，随后几年，地方和地区选举并没有使意大利社会运动获得预想的成功，尽管政府继续衰弱，人们对于天主教民主党与左派的联合越加感到幻想破灭。在1976年的大选中，意大利社会运动所得票数下跌到刚刚超过6%，而共产党却得到近35%的选票，同天主教民主党的力量相匹敌。虽然意大利面临的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共产党的威胁显然并没有减退，虽然存在着严重的失业现象，学院无产者人数空前增多，大多数保守的意大利人仍然认为天主教民主党而非意大利社会运动才是他们反对左翼危险的保护

者。的确，天主教民主党人近来恢复了一些力量，他们依然是最强大的政党；没有它，政府便无法组成。在1979年6月的大选中，他们只失掉很少选票，而共产党的票数却下降到占总数的30.4%。再一次为“秩序”而竞选的意大利社会运动也失去选票，所得只占5.3%。这次失败至少有一部分原因在于该运动内部发生了争吵²⁴⁴与勾心斗角。1976年，有半数的议会代表离去，建立了民族民主党。他们指摘阿尔米兰特由于采取激进主义而毁掉了他们的事业，使得党陷于孤立地位。在意大利南方的一些城镇，意大利社会运动的青年组织公开地威胁并且严重打伤左派学生。意大利社会运动组织名符其实的朝圣活动，即前往普雷达皮奥村庄，向墨索里尼墓致敬。新法西斯工会号召铁路工人罢工，以便使工人们相信左翼工会已经破产，同时还要求工人们把他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但是，这种种做法只是惊吓了传统右派的信徒。

因此，由贵族、大学师生、军官和工业家领导的意大利较为传统的右派同恐怖主义的革命的法西斯分子之间的分裂继续下去。作为领导人的阿尔米兰特试图把这两者结合成为一个党，未能成功。或许，这就是意大利新法西斯主义所以仅仅取得一般性的成就的最为重要的原因，也是它未能利用几乎是永远的不安宁、腐败、不稳定以及政治恐怖主义等条件的最重要的原因。只要这些条件可能继续存在下去，意大利社会运动就将是意大利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部分，不过看来只是在它的边缘上而不是中心部位占有一席之地。罗马虽然多次被征服，但是由落后的南方来征服却是没有实际可能性的，而另一次向罗马进军是完全谈不到的。只有同天主教民主党联合起来，意大利社会运动才有可能希望获得势力与权力，而这看来也是一种渺茫的希望罢了。

德 国

由于战争和独裁制度的彻底垮台，德国比意大利受到的损害还更为厉害。它还受到占领国军队更为严密的控制。这些国家各自占领德国的一部分。因此，经过好几年，一直没有任何极端右翼党派从这块废墟上冒出来，也没有哪一个能够公开宣称自己是民族社会主义党。这里也有人们普遍对于独裁制度的反感这一层原因，当大规模的暴行揭露的时候，在战后德国的报纸与文学作品中就反映出那种感情。在东德，不允许亲纳粹党派存在，在西德，联邦法院几次下令查禁亲纳粹党派与组织，它们跟着被政府当局解散了。同意大利比较起来，这里有过令人迷惑的五花八门的党派与团体，它们全都否认民族社会主义，不过实际上程度不等地都要使这种民族社会主义思想永存下去。他们思想中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反对在联邦德国出现的民主化，特别是由工会取得的巨大影响，同时也反对同东部的共产党和解。因为留在德国的犹太人少得可怜，反犹主义为仇恨外国人所代替，即仇恨那些在德国安家而又没有溶入德国社会的成千上万的外国工人，这些外国工人（与统计材料相反）被认为对罪恶的增多负有责任。

同意大利相比，这里并没有被忽视的和贫穷的南方；几百万的被驱逐者和难民已经被吸收参加到经济活动中去。经济恢复和稳定是显而易见的，尽管有石油危机，尽管政府相继由两个大党——基督教民主党或社会民主党轮流领导。这些因素主要的是由于比较缺少政治的极端主义，不管是右的或是左的，同魏玛共和国当年的情形造成鲜明的对照。中间道路的政党支配着政治局势。由红军和其他派别搞的政治恐怖主义，引起政府采取了严密的防卫措施，而民主制度存在下来。尤其重要的是，威廉时期和威廉之后喧

嚷不休的德国民族主义已经平静下来，人们转而赞成实用主义和因经济繁荣而带来的满意局面。没有人认真地思考向东去取得新土地，甚至也不考虑两个德国联合起来的问题。有关“鲜血与土地”、德意志美德、种族优越性、军事光荣等的呼吁，不再能够引起什么反响了。法国不再是“宿仇”，政治气氛完全改变了。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所以德国的新法西斯主义仅能取得很有限的成功。

四十年代后期，当同盟国对德国政治生活的限制有所放松的时候，有两个极右翼党派建立起来。两者在它们的党名中都意味深长地用上了“帝国”这个词（是从俾斯麦和希特勒那里学来的），其中一个还使用了曾被民社党分子任意误用的“社会主义”这个词。这就是社会主义帝国党，1949年由弗里茨·多尔斯博士创建。此人早年参加过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但后来同它决裂，而同情奥托·施特拉塞尔的革命的民族社会主义。^①多尔斯是一个杰出的组织者和无情的蛊惑宣传家，该党是根据领袖原则建成的。它还有保护队，成员穿白衬衣、黑马裤和长统靴。党的委员会包括 246 创始人、地区党领导人和根据党主席提议而遴选的人；党主席有资格再增添一些成员。这个委员会是该党最重要的机构。该党利用模仿从前的宣传方法，力图把失望和被赶出家门的群众争取过去。它的宣传是反犹和反民主；德国主要的政治家被指控为叛逆；1944年7月20日企图暗杀希特勒一事被当作新的暗箭伤人传说的材料。该党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这里曾是纳粹影响最大的地方）的领袖是奥托·恩斯特·雷默尔，他因为镇压过7月20日柏林的军事政变，曾经被希特勒提升，该党举行会议时，都向那些在战争中死掉的人以及仍然在押的同志们表示敬意，有时候也向“纽伦堡绞架的牺牲者们”（主要战犯曾在这里被绞死）表示敬意。

^① 参见前面的124,137,141页。

该党很快便有了几万党员。在 1951 年下萨克森的议会选举中，它获得 11% 的选票和十五个议席——在奥里希和罗滕堡是 27%，在吕内堡是 28%，在迪弗尔茨是 33%。至少在下萨克森的某些地方，该党显然是个主要政党，对新秩序构成威胁。因此 1951 年后期，德国政府向卡尔斯鲁厄宪法法院提出控诉，宣称该党违反宪法，因为根据其领袖、纲领、宣传与组织形式，表明它是继承民社党的衣钵的。一年后，宪法法院接受提交的证据，宣布解散该党，因为它的纲领与思想非常接近民族社会主义，并且它否认多数民主和各民主党派。雷默尔逃往埃及，大赦后回到德国，后来因犯罪受到审判，再一次出逃。这个党遂从政治舞台上消失。

另一个很相似的党，在同一时期创建，叫做德意志帝国党。它宣扬战争与帝国思想，要求德国人应有更大的生存空间，并且力图争取前民社党分子。该党自称是保守的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它的组织结构是遵循民社党的模式；命令都是由上面发出的。该党声称自己忠于“完整的、不可分的德意志民族的历史”，忠于“人民的社会”（如民社党分子曾经做过的那样）。它的大部分党员都集中在下萨克森，在这里，1949 年它获得 8.1% 的选票，而 1953 年下降为 3.5%。在联邦选举中，该党在 1949 年只得到 1.8% 的选票，到 1961 年，下降到 0.8%，因此不能在波恩议会里获得任何席位。这种下降的情况，显然是由于德国经济不断地繁荣，以及西德经济对于难民和战争受害者所产生的吸引力。在民族民主党于 1964 年创建之后，德意志帝国党遂告解散。它的许多工作人员和党员都参加了这个新成立的右派党。

还有许多难民和被驱逐者的组织，他们组成他们自己的同乡会组织，其中苏台德德意志人由于提出修改边界要求而在国际上有些臭名声。这个组织里积极活动的“维蒂柯邦德”，是由苏台德的许多主要的民社党分子参加的一个头面人物的同盟。这个同盟

极力煽动反对“大规模出卖我们的祖国”，宣称我们祖国甚至战胜了凡尔赛条约。不过，这个组织从来没有大批追随者。苏台德德意志人的同乡会组织中的大多数领导人宁愿参加某个德国的大党，在那里为他们的目标而工作，但是并没有获得明显的成功。比较危险的一个组织“欧洲民族”，是以二次大战党卫军部队中德国和非德国的幸存者为基础而组成的。象其他类似的退伍军人组织一样，它也拥护希特勒对俄国作战的“欧洲精神”，认为那场战争是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十字军。它还宣传新的暗箭伤人的传说，认为凡是反对民族社会主义的人一概是叛逆，还坚持新的种族主义，并且赞扬阿拉伯人反对以色列的斗争。欧洲民族组织最后由德国政府下令解散。党卫军退伍军人成立的一个主要组织 H. I. A. G. 有两万成员，其目的在于争取平等待遇，即对党卫军成员的处理应同对前德国士兵的处理完全一样。武装的党卫军曾经有约五十万人参加，因而这两万人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数目。1964年，一家退伍军人杂志曾经说过，象那样的一些组织都力图使这样的传说永久存在下去，即德国军队由将军到普通士兵“都是为保卫西方文明而反对布尔什维克恐怖主义洪水的”。^① 这样一类的杂志自然否认德国对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负有责任，并且欢呼出版任何这样的书籍，即认为“德国在1939年并不想打仗，并且还提出了可以想象是最温和的要求”：例如，1962年8月的《苏台德德意志人体育俱乐部会员辩护》（它延续了苏台德德意志人体育俱乐部的人民传统）。^② 他们否认民社党分子杀害了六百万犹太人，而充其量承认 248

^① *Kyffhäuser*, no. 6, 1964, A. Hubner 引用, 'Rechtsradikale Jugendgrupp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in I. Fetscher (ed.), *Rechtsradikalismus*, Frankfurt, 1967, p. 139.

^② 1962年8月 *Sudetendeutscher Turnerbrief* 的评论，见美国历史学家霍根(Hoggan)的著作，E. Weick 引用, 'Gibt es einen "Rechtsradikalismus" in der Vertriebenenpresse?', 同上, p. 108.

一个小得多的受害者的数日，这些人的死亡据说是由于军事形势的紧急情况造成的。然而，正是第二次大战中的那些中年战士却并没有能够对军事原因引起强烈的热情。年轻一代的德国人有着十分不同的理想与思想意识，而这同他们父辈们的想法是完全对立的。

战后在德国，许多极右派组织中最重要的是1964年建立的，它的名字并没有强调帝国或社会主义思想，而是叫做民族民主党(N. P. D.)。有一个时期，这个党利用西德社会的反自由主义和独裁主义的倾向和利用对工会和外国工人的忿怒情绪，比之别的组织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虽然它的一度的领导人阿道夫·冯·塔登过去不是民社党人，但是地方工作人员中有近半数、主要官员中有四分之三都是同民族社会主义有关系的，而许多人在1945年以前还曾担任过重要职务，其中，包括冯·塔登在内，都曾在德意志帝国党内任职。民族民主党很快拥有大量党员，1965年6月增加到约一万五千名，两年后超过两万五千名。在它的选民中，男人和新教徒多于女人和天主教徒，中年人多于其他年龄的人。要想了解该党追随者的社会成分情况则更为困难。可以说，农民和工人较少，其他社会阶层的人数则是相当均匀；来自东部的难民和被驱逐者显然并没有提供特别有力的支持。

民族民主党纲领特别强调德意志民族主义：“抢夺古代德意志的土地和分解德国都是属于暴力行动的成分。……对苏台德的要求一定不准任何人放弃，不管什么政府或什么党派……”那种认为德国应单独对两次世界大战负责的武断之言是“荒谬”的，反击这种谎话是全民族的任务。^① 美国人的参战被认为是出于“某种反法西斯和反德国犹太人的行动”。^② 战争中被杀死的犹太人的“可靠

^① 民族民主党纲领，H. Maier 和 H. Bott 引用，*Die NPD*, Munich, 1968, pp. 67,68.

^② *Deutsche Nachrichten*, 引自同上书，p. 35.

的”数目估计在三十五万人和一百万人之间。至于集中营，“民族民主党遗憾地认为，在这些集中营里，第三帝国的政治犯是同刑事犯关在一起的”。^① 该党的慕尼黑领导人 1965 年甚至宣称：“民社党德国从来没有任何犯罪行为。这些诽谤都是国际犹太人和犹太报纸的宣传。”^② 同一年，该党一份刊物虽然不否认“希特勒时的犯罪行为”，但却宣称“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右翼极端主义在这些罪恶中所犯下的有意识的罪行恐怕比整个德国人民都多。”^③ 这同一家刊物早些时候曾经写道，海涅是犹太人，因此完全不能算是歌德之后的德国的最伟大诗人。^④ 还有对广播和电视的不断的攻击，认为它们破坏了德国文化；对国际主义崇拜者的不断攻击，认为他们听任艺术作品中的民族特点衰亡；以及对所有那破坏和贬低民族文化的人进行不断的攻击。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民族主义者和民社党人就曾使用过这些口号和呼吁，然而民族民主党组织却宣称，它是毫无保留地忠诚于这些自由主义原则的。

在 1965 年的大选中，即在民族民主党成立十个月以后，它只得到 2% 的选票，没有获得任何议席。随后，它取得相当成功。1966 年 11 月，在黑森获得 7.9% 的票，在巴伐利亚是 7.4%，在两地的议会中分别得到八个和十五个席位。在安斯巴赫、拜罗伊特和纽伦堡，它甚至得到 13% 和 15% 的票。下一年在州选举中，它在下萨克森获得 7% 的票，在不来梅是 8.8%，而 1968 年在巴登-符腾堡（传统的德国自由的西南地区）竟获得 9.8% 的票。通常，在民社党传统强大的城镇和地区，所取得的成功特别明显。可是，在

① N.P.D. Politisches Lexikon, R. Kühnl, G.Ahrweiler, M.Maessen, R. Rilling 以及 R. Tellers 引用, *Die NPD*, Berlin, 1967, p. 94.

② Josef Truxa, 1965 年 6 月 18 日, J.D. Nagle 引用, *The 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 Berkeley-Los Angeles, 1970, p.77.

③ *Deutsche Nachrichten*, no. 52, 1965, 引自同上书, p.74.

④ *Deutsche Nachrichten*, no. 7, 1965, R. Kühnl 等引用, *Die NPD*, Berlin, 1967, p. 144.

该党不同的领导人之间发生了严重的矛盾，主要是在老民族主义分子和比较激进的年轻工作人员之间，而冯·塔登又无法把这些有矛盾的人们结合在一起。在1969年联邦选举中，这个党只得到4.3%的票，而由于有5%的障碍，未能在波恩议会取得席位。这250次失败标志着该党开始走下坡路。此后，它获得的票数不断减少：1972年大选中是0.8%，1976年是0.3%，当时整个西德只有十二万三千人投它的票，而尽管有大量的失业者和存在着经济困难。根据德国政府的一项估计，1978年该党剩下约九千党员，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积极为它工作的。

1977年6月，这个党在法兰克福组织一次全德大集会，与会者还有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和意大利的行动主义分子，不过所动员的全部追随者没有超过四千人。1977年底，该党的青年组织——青年民族民主党成员大概拥有一千五百人。新纳粹倾向是显而易见的，他们1977年举行的联合大会打的是老纳粹的口号：“粉碎红色阵线和反动派！”^①同时，冯·塔登经马丁·穆斯努格提名，重新作了党的领袖，但这并没有为该党提供一个有超凡魅力的领导人。这几年来，德国报纸上除了偶尔提到这个党的某一次“行动”外，一般关于它的报道几乎是找不到的。因而慕尼黑的民族民主党组织一次“反对大屠杀行动”，以抵消上映美国影片《大屠杀》所产生的影响。不过，慕尼黑市长立即制止了该党的行动。除了缺少有超人魅力的领导人以及政府的干涉外，由学生和某些工会组织的反对行动也在促使这个党的垮台中起了作用。通常，该党的保护队对于任何有组织的反对派都采取十分过火的行动，结果它标榜的“法律与秩序”在舆论看来就变成了暴力与捣乱。那些想要反对统治的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党联合政府的选举人（在基督教

^① 这些资料取自北莱茵-威斯伐利亚州内政部长的一篇报告：‘Rechts- und Linksradikalismus’, Düsseldorf, 1978, pp. 7—9。

民主党及其巴伐利亚同伙中)就起到了比小小的民族民主党更好的抗衡作用。基督教民主党把保守派和右派的选票成功地结合在一起了。

除了那些“可尊敬的”极右派党派以外,在西德(在意大利也完全一样)还存在着更为极端的新纳粹组织,主要是年轻人组成的。政府当局曾经列出二十多个这类组织,它们都很小,大体都有一千三百个“行动主义分子”。这些组织的成员倾向于以轻蔑的态度看待他们长辈们的审慎策略和那些“老同志们”举行的会议;在开会时,喝下大量的啤酒,又重弹起上次战争中那些战斗的老调。这些新法西斯组织收集或是偷窃第三帝国的斗争工具与信条,庆祝希特勒的生日,唱老纳粹的歌,在商店、银行和其他公共建筑物上涂写卐字和反犹口号。有时候,他们还利用“民社党外事组”在美国制造标语和宣传品,例如“不要从犹太人那里买东西!”这类行动在法律上是被禁止的,只是当警察关押了这些罪犯,或者反犹口号过于显眼的时候,报纸上才予以披露。这些组织显然不拥有多少同情者,并且它们彼此在策略与思想上也各不相同。不过,根据警方统计,“右派极端主义事件”的数目从1977年的六百一十六次增加到1978年的九百九十二次,而1979年的上半年是八百九十次,因此1979年11月司法部要求制定新的更有力的立法措施,以对付犯罪者。德国政府还注意到,有些新纳粹小组织采取政治暴力策略,如纵火、爆炸、袭击军营以及抢劫银行等,这些都是他们从极左派那里学来的。不过,应当了解,德国的经济、德国的社会和整个政治制度都比意大利的要稳固得多;同五十年前的魏玛共和国比较起来,其稳固程度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只要这种情形保持下去,新纳粹主义是不会构成严重危险的,那些新纳粹小组织也不可能从群众中获得什么影响。

英 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的政治传统和它的社会制度的相对稳定，对于大规模法西斯运动的发展是不利的，因而英国法西斯联盟始终是一个居于次要地位的运动。^①战后，奥斯瓦尔多·莫斯利爵士力图恢复这种运动，东山再起，但没有获得多大成功。然而，有两种变化造成比较有利于极右翼运动发展的环境：一是殖民帝国的迅速丧失以及伴随而来在非洲与亚洲纷纷建立起独立的国家，而所有这些国家对于留下的白人少数民族或多或少都抱有敌视态度；二是从联邦各地涌来大批移民，没有这些人，英国的经济活动就无法正常进行，不过无论他们在那里一起定居下来，就会引起激烈的对抗。虽然整个说来，英国的政治制度仍然是稳定的，但经济方面不安定的状态，工会的势力，一系列大罢工，通货膨胀，以及英镑价值的迅速下跌，都给国内的局势大大地增加了不安全的因素。这些因素，尤其是种族问题，都给法西斯或半法西斯的组织提供了发展的时机。有几个组织（它们常常互相斗争）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相继出现，但没有一个发展成为大规模的运动。

1954年，英国法西斯联盟的一个前主要成员 A. K. 切斯特顿成立了帝国忠诚者联盟。他是一个学者和知识分子，在1938年德国占领苏台德地区之后便和莫斯利决裂，参加了战争。他是一个爱国者，同时又激烈地反犹、反共和反美。他象许许多多法西斯分子一样，认为犹太人的银行应对俄国革命负责，犹太人的金融资本同布尔什维主义完全一样：莫斯科同华尔街联盟的目的在于毁灭大英帝国，建立全球势力。该联盟旨在成为社会名流，追求的是社会影响而不是权力，但它深受其内部冲突与分裂的困扰。该联盟

^① 参见前面的 219—23 页。

在1958年还有三千名成员，到1961年就只剩下几百人了。1957年，科林·乔丹退出联盟，因为联盟在原则上同意接受犹太人和有色人为成员。第二年，约翰·比恩也退出，成立了民族工党，而乔丹则建立了他自己的组织——白人防御同盟。但到1960年，比恩和乔丹携起手来，组成英国民族党，其宗旨在于使英国摆脱“国际犹太人控制的贷款制度的统治”，并且保卫“我们的北欧人民”。当运送移民的火车从港口开来的时候，这个新党就在火车站组织示威。党员们唱道：“红色阵线和犹太人最终都要完蛋，我们的种族和国家将把他们全都砸碎。”^①1962年，这个党分裂了，因为比恩对于乔丹在思想方面与德国民族社会主义有密切联系表示强烈的反对，认为这“忽视了英国、欧洲和白人世界的斗争”。1964年，比恩作为候选人参加在索塞尔举行的大选，提出停止非白人移民的纲领，结果获得9%的选票。

至于乔丹，他于1962年希特勒生日的这一天，成立了民族社会主义运动，还特地准备一个饰有卐字的生日蛋糕。他还谈到，英国造成希特勒的失败实是一种“耻辱”。这个新运动的全国组织者是约翰·廷德尔，但是1964年，他用自己的英国法西斯倾向和乔丹赞成的亲纳粹政策相对立，因而被乔丹开除出党。一个警察在乔丹的家里和他的总部里搜出制造的武器，还有纳粹旗帜、长筒靴、军服和卐字臂章。为组织一个民族社会主义的“世界同盟”，在考兹沃尔茨组织了一次夏令营，乔丹被指定为世界领袖，美国人林肯·罗克韦尔是第二把手，他们的宗旨在于“保护和发扬雅利安民族及其西方文明”。^②1966年，警方发现这个运动的成员总共有一百八十七人，其中只有三十五人仍在进行活动；另有二百七十一人是没有选举权的积极支持者，其中七十七人仍在提供捐助。在廷

^① M. Walker 引用, *The National Front*, London, 1977, pp. 34, 36.

^② 同上, pp. 40—41.

德尔被开除出民族社会主义运动以后，他成立了大不列颠运动，所持的观点是，“一个纯粹的、强大而健康的不列颠种族是英国前途的主要保证，”并且“禁止不列颠人和非印欧人结婚，以保护本种族”。^①廷德尔还主张采用南非模式的种族隔离制度，同时英国应对南非的白人政权给予支持，因为那些白人移民正在“为我们的事业和我们的前途，即遍及全球的英国文明的前途”而斗争。^②但这个运动一直是十分弱小的，并缺乏参加竞选的力量。

1967年初，英国民族党、帝国忠诚者联盟和种族保护协会联合一起，组成一个新党——民族阵线党。一开始，这个新党有一千五百多名党员，绝大多数是原英国民族党成员。该党的宗旨是：同共产党进行斗争，反对那帮老政客，停止所有的移民迁入英国以及遣返非白人移民。民族阵线党“将国际共产主义视为文明的头号敌人，拒绝同共产党世界搞‘缓和’的方针，因为共产党只是企图破坏西方世界。我党认为只有依靠力量和使用力量的意志才能遏制共产主义”。但是，该党也认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是象共产主义一样危险的敌人，而“事实上它们两者是用不同的手段去达到同样的目的：世界暴政”。^③的确，关于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同一的这种古老的奇谈在民族阵线党的宣传中曾多次出现。“象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共产主义不是一场反对资本主义的人民起义，它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在其全部的试验过程中始终都得到资本主义的支持与培养。……”；“俄国的共产主义是靠华尔街的国际银行家们（如库恩洛布公司、沃伯格家族）的经济支援而建立起来的。……”；“‘俄国’革命主要是由美国、德国和瑞典的犹太银行家给以资助。‘德国的’共产主义也没有什么不同的根源——除马克思本人之

① 引自同上书，p. 71.

② 引自同上书，p. 80—81.

③ *National Front Statement of Policy*, (几个日期), p.5.

外,拉萨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全是犹太人)都是最杰出的倡导人。……”^①这里,李卜克内西竟然也被说成是犹太人,罗莎·卢森堡的姓又给拼错了。^②

按照公开的说法,民族阵线党是把反犹主义和反犹太复国主义区别开来的。它声称,它只是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因为犹太复国主义“充满着一种无限的种族命运的观念,而且在它追求世界霸权中也不能容忍反对。……它的范围如此之大,对西方的生存构成了威胁。……”^③民族阵线党的成员声称,他们并不是反犹分子,并且欢迎犹太人加入该党。但是,它的喉舌《先锋报》却又刊载反犹的言论:“犹太人希望,除他们自己之外,所有的种族都成为混血种;所有的民族都丧失他们自己特有的同一性观念,除他们自己的之外。……”^④早期的《先锋报》(在该报主编廷德尔加入民族阵线党之前)专辟一个名为《从犹太居民区来的消息》的定期专栏,作者署名朱利叶斯,他专门鼓吹激烈的反犹思想,曾经宣称:“正是犹太人成为我们的灾祸,正是犹太一人。……”该报第一期上有一篇题为《第三帝国取得的一些社会成就》的文章,其中赞扬德国成立“一年左右的”强制性劳动局和希特勒德国的其他一些制度。1967年9月间,《先锋报》宣布廷德尔的大英国运动正在同民族阵线党携手合作,以便在极右路线的基础上建立统一体。民族阵线党还主张英国退出共同市场,并“抛弃罗马条约,因为这个条约的签署是对选举诺言的背弃”。但是很特别,这种反对的主要理由是出于种族主义的考虑:英国的加入“仅仅是第一步,……最后将会

① 引自 *Spearhead*, no. 92, 1976, p.6; no.94, 1976, p.10; no. 103, 1977, p.11.

② 罗莎·卢森堡的原文应为 Rosa Luxemburg, 引文中错为 Rosa Luxembour。——译者

③ *Spearhead*, no. 75, May 1974, p.7.

④ *Spearhead*, no. 53, June 1972, p.13.

达到由一批国际名流坚持下去的一个世界的暴政；其目的就是使不同的民族全都成为混血种”；“而我们全都会结合成为一个最后的多种族的蚂蚁堆”。^①正是由于对“混种”和对因混血而引起的“退化人”的由来已久的担忧，所以在二十世纪初曾经使豪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萌生了灵感。^②在1967年10月第一次民族阵线党年会上，切斯特顿所强调的也正是这种相同的“致命危险”；不过他还警告要反对另一种危险，那就是种族极端主义。

民族阵线党的传单还攻击连号商店、垄断企业、各政党、共同市场、通货膨胀，并且要求应在精神上对英国来一次清扫。廷德尔宣布：“如果要人民觉醒并能做成某些事情，我们还必须增加一些（政治的）温度。必须激发热情，而只有使用足以激起民众感情的能动性力量才能做到这一点。……”^③然而，无可怀疑的，唯有一个问题可能达到这个目的，那就是种族问题。……阿明将军驱逐了全部持英国护照的亚洲人，尔后，他们又在英国受到接纳，这在民众中引起广泛抗议。当这些移民搬进新家，有了新的工作时，民族阵线党就此事大做其文章。1976年5月，当一架载着西印度群岛人和美国黑人旅游者的飞机着陆时，遇到民族阵线党的成员，他们高喊：“不要卸下行李，你们必须滚回去！”“这是英国，不是巴基斯坦。”在1974年2月的大选中，民族阵线党有五十四人参加竞选，只获得七万六千张票。但八个月后，该党的候选人得票超过十一万三千张。在哈克尼和肖尔迪奇得票多至占总数的9.4%，在托特纳姆和德特福超过8%，这几个地方都在伦敦管辖区。在1976年的地方选举中，在莱斯特，民族阵线党的四十八名候选人

^① *National Front Statement of Policy*, (几个日期), p. 2; *Spearhead*, no. 58, November 1972, p. 8.

^② 参见前面的30—31页。

^③ *Spearhead*, no. 87, September 1975, p. 15.

共赢得四万三千七百三十三张选票，平均占总数 18%。^① 两个月以后，在德特福举行的议会选举中，民族阵线党和民族党一起所得票数超过工党。尽管这些显然是特殊情况，但它们表明在经济衰退和大量失业的时期，该党在有大量非白人居民的地区能够获得怎样的支持。在 1974 年初，民族阵线拥有三十个支部和五十四个地方组织，绝大多数都在英格兰东南部；在西部地区、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它的影响很小。1978 年后期，《经济学家》估计，该党约有一万党员。^② 而另一些方面的估计，数字还要大些。在它的党员中，年轻好战分子显得十分突出，他们有些人无疑被党的集会上经常鼓吹的暴力行动所吸引。象其他地方类似的组织一样，民族阵线党也组织起自己的防卫队，以对付左派进攻者。 256

民族阵线党的发展由于内部的斗争与分裂而受到阻碍（象德国和意大利的新法西斯党一样）。在 1970 年的年会上，切斯特顿再次被一致选举为领袖，但是他的年纪太大，并且总是在南非度过冬季的几个月。在他重新当选仅仅几个月后，民族阵线党行动委员会的多数人就写信要他辞去主席职务。切斯特顿从开普顿的回信是退党。当廷德尔拒绝接替他的职务时，一个前保守党人约翰·奥布赖恩在另一个更合适的候选人不在场的情况下被推举为主席。他后来形容说，民族阵线党总部充斥着一种“可怕的彼此不信任和搞阴谋诡计的气氛。小集团和小集团互相作对。有布朗的小集团，有廷德尔的小集团。……”^③ 在 1972 年 7 月，奥布赖恩离开岗位，表面上是去度假，但马上又秘密返回，给党员发出一个通知，说民族阵线党理事会有八名成员已经辞职并组成一个新组织。这时，约翰·廷德尔就在担任《先锋报》主编之外又接任了民族阵线

① 数字取自 Walker, 同上书, pp. 126, 173—75, 198.

② *The Economist*, 16 December, 1978, p. 23.

③ Walker, 同上书, p. 103.

党的主席。但不久，他的领导地位遭到挑战，这一次的对手是一个比较温和的集团。1974年他在《先锋报》上发表声明说：“尽管我们承认明显的偏爱(原文如此)民主的方法，只要这些方法能够找到，它们就会起作用。”^①这时候，反对他的势力在增长。党的理事会选举金斯利·里德取代他任新主席，而廷德尔成为他的副手。有两次，局而都是胜负不分，只是经过主席投了一票，才解决问题。于是廷德尔决心重新争得主席职位。他激烈地攻击《英国第一》的编辑，因为他曾否认墨索里尼和对领袖的崇拜。在1975年举行的年度大会上，廷德尔提议，将来的民族阵线党主席应由党选举产生，而不再由理事会选举产生。会议在一片混乱中结束。廷德尔派遣他的支持者去占领党的总部，但他们发现金斯利·里德已经把重要的档案转移走了。里德还谴责廷德尔派搞的这种非法占领。11月间，党的纪律法庭将廷德尔开除出党，同时停止另外九名成员的工作。但五个星期以后，他们由高等法院恢复了名誉，因此里德和他的信徒退出党，另外成立了民族党。新党的领导人仍旧保有原党总部和成员的档案。但1976年初，民族阵线党得到法院另一道命令，禁止民族党使用那些档案。民族阵线党的多数支部和大约三分之二的党员仍然忠于廷德尔和民族阵线党，而加入民族党的只有二十九个支部与地方组织。

在1979年的大选中，民族阵线党参加竞选的候选人是1974年10月大选时候选人的三倍多，他们在两个问题上试图利用选民的不满情绪，即种族问题和共同市场问题，以及与后者相关联的食品价格高昂和共同的农业政策。民族阵线党要求强制遣返所有的移民，要求英国退出共同市场。有十九万一千选民（远比1974年的数字要大）通过投民族阵线党候选人的票来表达他们对现存的政党制度的抵制态度。但是这些候选人中没有谁能够获得几千张

^① *Spearhead*, no. 79, September-October 1974, p. 2.

选票,他们全都失去保证金,从而使民族阵线党负债四万五千三百镑。如果人们把民族阵线党的候选人在1974年和1979年参加竞选的八十六个选区中的两次选举结果比较一下,可以看到它的选票从十一万三千六百一十三张下降到六万四千五百四十一张,即下降43%。这种明显的下降可能是由于种族紧张问题有了一定的缓和,而且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工党和保守党之间日益加剧的冲突(在经历1978年—1979年的严冬之后)使得很多心怀不满的前保守党党员又重新回到了保守党中。这种严重的失败又在民族阵线党内部引起新的冲突与斗争,看来,在不远的将来,该党要在英国政坛上扮演主要角色是不太可能了。

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法西斯运动在全欧洲蔓延开来。它们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深刻的社会与政治危机的产物,是对“布尔什维主义”威胁(这又是战争及战后的一个结果)的极度反应的产物。这些运动先后受到贝尼托·墨索里尼和阿道夫·希特勒的榜样的鼓励,他们无情地应付着那些要吞噬资本主义社会的危险。千百万人从法西斯主义那里寻求解决他们所有的问题和忧虑的办法。然而,“布尔什维主义”推进到中欧心脏地带,但也没有使类似的法西斯运动以过去的那种规模发展起来。无疑这部分是因为法西斯的独裁统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击败,以及他们犯下的无数暴行被揭露出来。此外,尽管发生过石油危机和严重的失业问题,七十年代的欧洲社会比起三十年代来是稳定繁荣得多的。国家间的仇恨和民族及“种族”优越感在共同市场的欧洲和许多其他“欧洲的”机构中是难以抬头的。西欧各国彼此已经靠得更拢,相互的了解也远比两次大战之间的那段时期深刻得多。新法西斯的党派曾经能够利用一些特殊的情况,如南部意大利的极端贫穷、英国的种族问题等,但即便如此,这些党的领导人终究也不能象他们的先辈那样成功地鼓动民众。甚至对“布尔什维主义”的

惧怕情绪也已经减轻，虽然几乎半个欧洲都已在俄国的统治之下。在德国和意大利，传统的基督教民主党已经同保守的右派（业已与民主制度取得和解）和有产阶级联合在一起。工人阶级业已和现存的社会制度合为一个整体，不再对中产阶级及其下层构成威胁。整个政治和社会的情况已达到这种程度，即法西斯要想以任何类似三十年代的那种方式得到复活，看来已是极不可能的了。

参 考 文 献

本书经过选择的参考文献主要是英文著作，没有英文著作的，则用法文著作或德文著作，而其他语文著作仅为少数和例外情况。

以法国、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主义作为整体来阐述的唯一著作是Ernst Nolte: *Three Faces of Fascism*, London, 1965。同本书比较，他的书几乎专门集中于法西斯的思想意识。另一本有价值的书是 *The European Right*, ed. by Hans Rogger and Eugen Weber,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65。专门谈论1920年—1945年国际法西斯主义的文献载于1956年第一期的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London, January 1966。

奥地利

Andrew Gladding Whiteside: *Austrian National Socialism before 1918*, The Hague, 1962。(此书研究民族社会主义的先驱者)

Kurt Skalnik: *Dr. Karl Lueger*, Vienna, 1954。(这是一本有用的简短传记)

John Christopher Peter Warsen: 'The Political Career and Influence of Georg Ritter von Schönerer'。(1953年的一篇论文，未出版)

Josef Hofmann: *Der Pfriemer-Putsch*, Publikationen des Österreichischen Instituts für Zeitgeschichte, vol. iv, Vienna and Graz, 1965。(一本关于卫国军运动的最重要的著作)

Lajos Kerekes: 'Italien, Ungarn und die Österreichische Heimwehrbewegung 1928—1931', *Österreich in Geschichte und Literatur*, vol. ix, I, January 1965。(有关卫国军的一些文献)

Colonel Max Bauer: *Nachlass*, in the Bundesarchiv at Koblenz, no. 81。(有关1923年奥地利民族社会主义者的报告)

比利时

Pierre Dayc: *Léon Degrelle et le Rexisme*, Paris, 1937。

Louise Narvaez Duchesse de Valence: *Degrelle m'a dit*, Paris, 1961。

(以上两书是德格雷尔的拥护者所写的关于列克斯运动的记述)

Degrelle avait raison — Recueil des textes écrits par Léon Degrelle entre

1936 et 1940 dans le 'Pays Reel', Brussels, 1941。

(书中包括德格雷尔的文选)

英 国

Colin Cross: *The Fascists in Britain*, London, 1961。(是唯一关于英国法西斯联盟的书)

Fascism—100 Questions asked and answered, London, 1936。(其中包括莫斯利的纲领)

芬 兰

Marvin Rintala: *Three Generations — The Extreme Right in Finnish Politics*, Bloomington, Indiana, 1962。(唯一关于芬兰法西斯主义的书)

John H. Wuorinen: *Nationalism in Modern Finland*, New York, 1931, and *A History of Finland*, New York, 1965。

(此两书也有一定用处)

弗 兰 德

A. W. Willemsen: *Het Vlaams-nationalisme 1914—1940*, Groningen, 1958。

Arthur de Bruyne, Joris van Severen, Zulte, 1961。(塞维伦的传记)

法 国

Eugen Weber: *Action française*, Stanford, 1962。

Edward R. Tannenbaum: *Action française*, New York, 1962。

(以上两书是用英文写的重要著作)

Jacques Doriot: *La France avec nous!*, Paris, 1937, and *Le Mouvement et les Hommes*, Paris, 1942。(这两本书不很重要)

D.W. Brogan: *France Personalities and Problems*, London, 1946。(书中有两篇关于莫拉斯的文章)

德 国

George L. Mosse: *The Crisis of German Ideology —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1964。

Peter G.J. Pulzer: *The Rise of Political Anti-Semitism in Germany and Austria*, New York and London, 1964。

Fritz Stern: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Despair — A Study in the Rise of the German Ideolog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61。

Walter Frank: *Hofprediger Adolf Stoecker und die Christlichsoziale Bewegung*, Hamburg, 1935。

(以上几本书都是考察民族社会主义先驱者的著述)

Mein Kampf, New York, 1939。

Hitler's Secret Book, New York, 1961。

The Speeches of Adolf Hitler, ed. by Norman H. Baynes, London, 1942, *Hitler's Table Talk 1941—1944*, London, 1953。

(以上几本是希特勒著作的英文译本)

Alan Bullock: *Hitler — A Study in Tyranny*, London, 1962。

(一本关于希特勒传记的最好著作)

Konrad Heiden: *Der Fuehrer*, London, 1944。(这也是一本有用的书)

Georg Franz-Willing: *Die Hitlerbewegung — Der Ursprung 1919—1922*, Hamburg, 1962。

Hanns Hubert Hofmann: *Der Hitlerputsch*, Munich, 1961。

Albert Krebs: *Tendenzen und Gestalten der NSDAP*, Stuttgart, 1959。

Werner Jochmann: *Im Kampf um die Macht*, Frankfurt, 1960。(以上是几本近期的德文著作)

另有 Ernst Deuerlein 编辑的文件: 'Hitlers Eintritt in die Politik und die Reichswehr', *Vierteljahrshäfte für Zeitgeschichte*, vii, 1959, pp. 177—227, and *Der Hitler-Putsch*, Stuttgart, 1962。还有由主要的民族社会主义者写的几本有价值的书:

Ernst Röhm: *Die Geschichte eines Hochverrätters*, Munich, 1928; 7th ed. Munich, 1934。

Joseph Goebbels: *Vom Kaiserhof zur Reichskanzlei*, Munich, 1934。

Das Tagebuch von Joseph Goebbels 1925/26, ed. by Helmut Heiber, Stuttgart, 1961。

再有一本关于民社党在一个德国小城市兴起的书: William Sheridan Allen: *The Nazi Seizure of Power — The Experience of a Single German Town 1930—1935*, Chicago, 1965; London, 1966。

匈牙利

C.A. Macartney: *October Fifteenth — A History of Hungary, 1929—1945*, 2 vols, Edinburgh, 1956。(书中有丰富的材料)

意大利

Laura Fermi: *Mussolini*, Chicago, 1961。

(最有用的一部用英文写的墨索里尼传记)

Renzo De Felice: *Mussolini il rivoluzionario and Mussolini il fascista, 1921—1925*, Turin, 1965-66。(这两本意大利文的墨索里尼传记, 材料比较详尽)

Mussolini: *Autobiography*, London, 1937。(此书没有什么趣味)

以下是几本关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有用的英文著作:

Federico Chabod: *A History of Italian Fascism*, London, 1961。

Hermann Finer: *Mussolini's Italy*. London, 1964。

A. Rossi: *The Rise of Italian Fascism*, London, 1938。

Gaetano Salvemini: *Under The Axe of Fascism*, London, 1936。

Adrian Lyttelton: 'Fascism in Italy — The Second Wave', in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January 1966, pp.75—100。(这是一篇有趣的文章)

Italo Balbo: *Diario 1922*, Milan, 1932。(此书非常有趣地记述了1920年代初期意大利的情景)

有关一般背景的重要著作有下列一些:

Margot Hentze: *Pre-Fascist Italy*, London 1939。

Dennis Mack Smith: *Italy — A Modern History*, London, 1959。

Robert Michels: *Sozialismus und Fascismus in Italien*, 2 vols, Munich, 1925。

Wilhelm Alff: 'Die Associazione Nazionale Italiana von 1910',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Xiii, 1965. pp. 32—63。

Luigi Salvatorelli and Giovanni Mira: *Storia d' Italia nel periodo fascista*, Turin, 1956。

罗马尼亚

Eugen Weber: 'The Men of the Archange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January 1966. pp. 101—26。(有关铁卫军的唯一有用的文章)

关于背景知识, 可以参看下列著作:

C. Kormos: *Rumania*, Cambridge, 1944。

Henry L. Roberts, *Rumania — Political Problems of an Agrarian State*, New Haven, 1951。

Joseph S. Roucek, *Contemporary Rumania and her Problems*, Stanford, 1932。

Pavel Pavcl, *Why Rumania Failed*, London, n.d.

俄 国

Hans Rogger: 'Was there a Russian Fascism? The Union of the Russian Peopl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xxxvi, 1964. pp. 398—415; 'The Formation of the Russian Right', *California Slavic Studies*, iii, 1954, pp. 66—94. (有关俄国法西斯主义的仅有的两篇英文文章)

西班牙

Atanley G. Payne: *Falange—A History of Spanish Fascism*, Stanford, 1961. (最有价值的一部英文著作)

José Antonio Primo de Rivera, *Der Troubadour der spanischen Falange*, Stuttgart, 1965, edited by Bernd Nellessen, (这是普里莫·德·里维拉的言论和文章选集)

Bernd Nellessen: *Die verbotene Revolution — Aufstieg und Niedergang der Falange*, Hamburg, 1963.

关于背景知识,可以参看下列著作:

Raymond Carr: *Spain, 1808—1939*, Oxford, 1966.

Gerald Brennan: *The Spanish Labyrinth*, Cambridge, 1943.

Hugh Thomas: *The Spanish Civil War*, London, 1961.

有关法西斯主义的重要的英文著作(1967年,即本书初版之后出版的):

Robert Benewick, *The Fascist Movement in Britain*, 2nd edition, London, 1972.

Karl Dietrich Bracher: *The German Dictatorship — Origins, Structure and Effects of Nationalist Socialism*, 1971 (German edition, Cologne, 1969).

William Cavr, *Hitler — A Study in Peronality and Politics*, London, 1978.

F.L. Carsten: *Fascist Movements in Austria — From Schönerer to Hitler*, London, 1977.

Alan Cassels: *Fascism*, New York, 1975.

Paul Corner: *Fascism in Ferrara 1915 — 1925*, Oxford, 1975.

Joachim C. Fest: *Hitler*, London, 1974 (Pelican — German edition, Frankfurt, 1973).

Alastair Hamilton: *The Appeal of Fascism — A Study of Intellectuals and Fascism 1919—1945*, London, 1971.

M. Lackó: *Arrow, Cross Men — National Socialists 1935—1944*, Budapest, 1969.

- Walter Laqueur (ed.), *Fascism — A Reader's Guide*, London, 1976 (Pelican 1979) (由十二位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撰稿)
- Adrian Lyttelton: *The Seizure of Power — Fascism in Italy 1919—1929*, London, 1973。
- Jeremy, Noakes: *The Nazi Party in Lower Saxony 1921—1933*, Oxford, 1971。
- Joseph Nyomarkay: *Charisma and Factionalism in the Nazi Party*, Minneapolis, 1967。
- Geoffrey Pridham: *Hitler's Rise to Power — The Nazi Movement in Bavaria 1923—1933*, London, 1973。
- Otto - Ernst Schüddekopf: *Revolutions of Our Time — Fascism*, London, 1973。
- Albert Speer: *Inside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70 (German edition, Berlin, 1969)。
- Hugh Thomas (ed.): *Jose Antonio Primo de Rivera — Selected Writings*, London, 1972。
- Henry A. Turner (ed.): *Reappraisals of Fascism*, New York, 1975。
- Andrew G. Whiteside: *The Socialism of Fools — Georg Ritter von Schönerer and Austrian Pan-Germanism*, Berkeley-Los Angeles — London, 1975。

索引

(索引页码为原书页码, 印在本书切口一边)

- Abegg, Wilhelm, 阿贝格, 威廉 142
Abruzzi, 阿布鲁齐 69
Academic Karelia Society, 大学生卡累利阿协会 164—65, 168
Action Catholique de la Jeunoss Belge, 比利时青年天主教行动党 212, 213
Action française, 法兰西行动党 7, 12, 14, 15, 16, 20, 21, 23, 79, 212
报纸 15, 79, 212
Adler, Victor, 阿德勒, 维克托 34
Adowa, battle of, 阿多瓦战役 19
Agrarian League, 农业同盟 29, 142
Ahlwardt, Hermann, 阿尔瓦特, 赫尔曼 27, 28
Albert I, King of the Belgians, 比利时国王, 阿尔伯特一世 206
Albert Hall meetings, British Fascist (1934), 英国法西斯分子的艾伯特纪念堂大会(1934年) 220
Albertini, Luigi, 阿尔贝蒂尼, 卢伊季 63
Alda, Ruiz de, 阿尔达, 鲁伊斯·德 199
Alfonso XIII, King of Spain, 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 195
逊位 196
Algeria, 阿尔及利亚 197
Alldeutscher Verband, 泛德意志同盟 28, 29, 106, 143, 205
Allen, W.S., 艾伦, W *The Nazi Seizure of Power*, 《纳粹夺取政权》 144, 240
Alliance Israélite, 以色列人同盟 26
"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 (film), "西线无战事"(电影) 136
Almirante, Giorgio, 阿尔米兰特, 乔治 239, 241, 243—45
Alsace, 阿尔萨斯 11
Alto Adige, 上阿迪杰 18, 46, 48, 49, 224—25
Altona, 阿尔托纳 139
Amendola, Giovanni, 阿门多拉, 焦万尼 70
Anarcho-Syndicalists (Spanish), 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西班牙的) 194, 196—98
Ancien Régime, 旧制度 12, 14
Ancona, 安科纳 45, 61
Annala, Vilho, 安纳拉, 维尔霍 160, 168
Anti-Communism, 反共产主义 7, 79, 90, 140, 159, 161, 166, 170, 181—83, 193, 213, 230, 234, 247, 252—4
Anti-Semitism, 反犹太人主义 7, 10, 44, 230
奥地利的 32—37, 84, 193, 226
比利时的 208, 209, 210
波希米亚的 39, 43, 83
法国的 11—13, 15—17
德国的 23—31, 83, 87—94, 97—98, 101, 104, 106, 118, 123, 136, 157, 159, 232, 234—35, 245, 251, 254
大不列颠的 218, 220—21, 252—4
匈牙利的 35, 170—75, 177, 179, 180, 193, 235
意大利的 22
罗马尼亚的 181—86, 189, 190, 192

—93, 232, 235
俄国的 42 - 43
西班牙的 262
Antonescu, General Ion, 安东内斯库将军, 伊翁 189—193; 自称元首 190; 得到希特勒的支持 191
Antwerp, 安特卫普 209
Apulia, 阿普利亚 69
Arabs, 阿拉伯人 20, 247
Arbeiter-Zeitung, 《工人报》 36
Arditi (Italian shocktroops), 阿迪蒂 (意大利突击队) 49, 50, 51, 56, 70
“Arrow Cross” Party (Hungary), “箭十字”党(匈牙利) 174—79
Aryan, 雅利安人 28, 31, 33, 34, 95, 231, 253
Assab, 阿萨布 19
Association of Christian Students (Rumania), 基督教学生联合会(罗马尼亚) 183
Associazione Nazionale Italiana, 意大利民族党 19, 20—21, 45—46, 50—52, 60, 65, 67, 74, 156
Athens, 雅典 13
Augsburg, 奥格斯堡 100, 103—4
Aulock, Free Corps, 奥洛克自由团 87
Ausgleich, 协议 32
Aussig Conference (1918), 1918年奥西格会议 82
Austria 奥地利 18, 22, 26, 28, 32—41, 44, 46—48, 79, 84, 96, 103, 125, 148, 171, 223—29, 236, 250; 参见 Habsburg Monarchy.
Anschluss, 德奥合并 229
Christian-social Party, 基督教社会党 28, 35, 36, 38, 227
Fatherland Front, 祖国阵线 227—28
Free Corps, 自由军团 223
Heimathblock, 祖国集团 226
Heimwehr, 卫国家 223—28, 238
National Socialists, 民族社会主义党人 84, 85, 92, 94, 95, 97, 102, 116,

129, 227—29
Pan-Germans, 泛德意志分子 33, 34, 37, 40, 41, 84, 223—24
Parliament, 议会 34, 35, 37, 39, 228
Social Democrats, 社会民主党人 37, 39, 45, 66, 120, 224, 227—28
Avanguardia Nazionale, 民族先锋 240—41
Avanti!, 《前进!》报 21, 46, 47, 50, 65
“aventine”, 阿文丁派 70, 72, 73
Axis powers, 轴心国 192
Badeni, Count Casimir, 巴德尼伯爵, 卡西米尔 37, 38
Badeni, crisis (1897), 巴德尼政府危机 38, 44
Baden-württemberg, 巴登-符腾堡
Bainville, Jacques, 班维尔, 雅克 79
Balabanoff, Angelica, 巴拉班诺夫, 安杰利卡 21 和注, 7, 47 注, 2
Balilla, 巴利拉 (意大利法西斯青年组织之总称) 168
Balkan wars, 巴尔干战争 20
Baltic States, 波罗的海国家 86, 130, 140; 这些国家的内战 86
Bamberg, 班贝格 127, 128
Banat, the, 巴纳特 189
Barmat scandal, 巴尔马特丑闻 133
Bauer, Colonel Max, 包尔上校, 马克斯 116
Bavaria, 巴伐利亚 80, 85, 86, 91—115, 122, 125, 130, 156, 158, 223—24, 240; 自由团 92, 99; 政府 100—12, 113, 234; 国防军 93, 98, 99, 100—11, 114—15, 117; 苏维埃共和国 86, 87, 90, 92, 117, 170, 232
Bavarian League, 巴伐利亚同盟 100
Bavarian People's Party, 巴伐利亚人民党 156
Bayern und Reich, Free Corps, “巴伐利亚与帝国”自由军团 99
Beckstein, Carl, 贝希施泰因, 卡尔 107

Beck, Colonel, Ludwig, 贝克上校, 路德维希 138
Beilis, Mendel, 贝利斯, 门德尔 43
Belgium, 比利时 46, 108, 125, 160, 204—7, 210—11, 215, 217—18, 238, 250; 天主教党 213, 215, 217—18 1936年的选举, 215; 军队中的佛兰德民族主义 205, 206; 德国占领 205, 206, 211, 212, 217; 矿工罢工(1936) 216; 社会党 216, 217 参见 *Rexist Movement*
Berchtesgaden, 贝希特斯加登 122
Beresti, 贝雷什蒂 185
Berlin, 柏林 8, 22—24, 27, 38, 87, 107, 134, 145, 152, 229, 240; 1923年与慕尼黑的冲突 110—12; 民社党内部的冲突 129; 德意志社会主义小组 101—2; Goebbels, *Gauleiter* of, 戈培尔, 纳粹党大区领导人 129, 132, 141, 150; “向柏林进军” 80, 108, 110—11, 113; 运输工人罢工 (1932年); 149; 柏林大学, 25
Bessarabia, 比萨拉比亚 181, 182, 186, 189
Bethlen, Count István, 拜特伦伯爵, 伊什特万 172, 224—25
Bethnal Green, Fascist success in, 法西斯分子在贝思纳尔格林取得的胜利 221
Beuckelaere, Adiel de, 伯克莱尔, 阿迪埃尔·德 206
Beuthen, 博伊滕 148
Bianchi, Michele, 比安基, 米凯莱 63
Bielefeld, 比勒费尔德 101
Bielsko, 别尔斯科 84
Bismarck, Otto Von, 俾斯麦, 奥托·冯 22, 24, 26, 127, 144, 153, 214
Bissolati, Leonida, 毕索拉蒂, 莱翁尼达 20, 49
“Black Front”, “黑色阵线” 137, 141, 197

Black House, Chelsea, 切尔西的“黑色旅馆” 219
Black Shirts, 黑衫党党员, 英国的 219—21; 意大利的 63—64, 67, 131, 242
Blanqui, Louis-Auguste, 布朗基, 路易-奥古斯特 21
Blomberg, General Werner von, 布洛姆贝格 152, 155
Böckel, Dr. Otto, 伯克尔博士, 奥托 27
Bohemia 波希米亚, 25, 37—39, 43, 82, 83, 84, 148—49; 民族社会主义党 82—84, 102
Bolivia, 玻利维亚 141
Bologna, 波洛尼亚 45, 53, 56, 59, 71
Bolsheviks, 布尔什维克 46, 53, 85, 87, 101, 162, 247
Bolshevism, 布尔什维主义 50, 55, 59, 127, 163, 182, 188, 198, 223, 252, 257—8
Bonomi, Ivanoe, 博诺米, 伊万诺埃 20, 55, 57
Borkenau, Franz, 博肯瑙, 弗朗茨 233
Borms, Dr. August, 博姆斯博士, 奥古斯特 205, 206
Böszörmény, Zoltan, 伯什泽尔门尼, 佐尔坦 173, 174
Bötticher, Paul, 伯特歇尔, 保罗 25
Bouillon, 布荣 212
Boulanger, General Georges, 布朗热将军, 乔治 11
Brandenburg, 勃兰登堡 142
Brannenburg, 布兰南堡 122
Bratislava, 布拉迪斯拉发 97
Braunau, 布劳瑙 39
Brazil, 巴西 31
Bredow, Major-General Ferdinand von, murdered 布雷多少将, 费迪南德·冯被杀害 158
Bremen, 不来梅 102, 123
Brennan, G., *The Spanish Labyrinth*, 布伦南, G: 《西班牙的错综复杂情况》 263

Breslau, 布雷斯劳 89, 布雷斯劳大学 140
Brest Litovsk, Treaty of, 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条约 94
British Communists, 英国共产党员 221, 223
British Fascists, 英国法西斯分子 218—19
British National Party, 英国民族党 252—53, 255
British race, 英国种族 218
British Union of Fascists, 英国法西斯联盟 29—23, 251—2
British Union of Fascists and National Socialists, 英国法西斯分子和民社党人联盟 222; 领袖们被拘禁 222
Brogan, D.W., *French Personalities and Problems*, 布罗根, D.W. 《法国的人格与问题》 260
Brückmann, Hugo, publisher, 布鲁克曼, 胡戈, 出版家 107
Bruckner, Lieutenant Friedrich Wilhelm, 布鲁克纳中尉, 弗里德里希·威廉 113
Bruges, 布鲁日 211
Bruning, Dr. Heinrich, 布吕宁博士, 海因里希 145—48
Brunner, Alfred, 布龙纳, 阿尔弗雷德 100
Brussels, 布鲁塞尔 206, 215—17
Brux, 布吕克斯 38
Bucharest, 布加勒斯特 112, 184, 188, 192
Budapest, 布达佩斯 170, 174, 178, 225
Bukovina, 布科维纳 181, 189
Bulgaria, 保加利亚 181
Bund der Landwirte, 农业同盟 29, 142
Burschenschaften (students' corporations), 大学生协会 31, 33, 34, 84, 223

Cádiz, 加的斯 200
Calabria, 卡拉布里亚 60
Călinescu, Armand, murdered, 克林内斯库, 阿尔曼被刺 189, 192
Camelots du Roi, 出售保王党报纸的报贩(组织) 15, 79
Campania, 坎帕尼亚 60
Caporetto, battle of, 卡普雷托战役 48
Carinthia, 克恩滕(卡林西亚) 97, 223
Carnizza, 卡尔尼扎 57
Carol, King of Rumania, 罗马尼亚国王卡罗尔 187, 189—90, 235; 镇压铁卫军 188
Carosi, Sandro, 卡罗西, 桑德罗 59
Carpathians, 喀尔巴阡山脉 175, 176
“Capatho-Danubian Great Fatherland”, “喀尔巴阡-多瑙河大祖国” 176
Carr, Raymond, *Spain*, 卡尔·雷蒙德: 《西班牙》 263
Carrosia, 卡罗西亚 75
Catalonia, 加泰罗尼亚 195
Catanzaro, 卡坦扎罗 242
Catholicism 天主教, 奥地利和波希米亚的, 35, 36, 37, 40; 比利时的, 206, 212—13, 215, 217; 法国的, 11, 13, 16; 德国的, 110, 145; 意大利的, 21, 50, 57, 77—78; 西班牙的, 194, 196, 197, 202
Cavour, Count Camillo di, 加富尔伯爵, 卡米洛 17
Ceccherini, General, 切凯里尼将军 62
Celts, 30 凯尔特人
Cabod, Federico, *History of Italian Fascism*, 卡博德, 费德里科,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史》 262
Chamberlain, Houston Stewart, 张伯伦, 豪斯顿·斯图尔特 30—31, 255; *Foundation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十九世纪的基础》 30, 31, 261
“Cheka”, “契卡” 70
Cherusci, 克卢西人 37

- Chesterton, A.K., 切斯特顿, A.K., 252, 255—56
- Christ, 基督 28
- Christian Democratic Party (Germany), 基督教民主党(德国) 250, 258; 天主教民主党(意大利), 240—44, 258
- Christian-Social Party (Austria), 基督教社会党(奥地利) 28, 35, 36, 38, 227
- Christian-Social Workers' Party (German), 基督教社会主义工人党(德国) 23
- Ciano, Count Galeazzo, 齐亚诺伯爵, 加莱佐 203
- Cimbri, 西姆布里人 36
- Class, Heinrich, 克拉斯, 海因里希 29, 143
- Clercq, Staf de, 克莱克, 斯塔弗·德 206, 209, 215
- Coburg, 科堡 112
- Codreanu, Corneliu Zelea, 科德雷亚努, 科内柳·泽列亚 160, 182n. 21, 182—90, 193, 223, 231—32; 被刺 188; Ion Zelea, 容·泽列亚 182—83
- Cologne, 科隆 102, 126, 145, 151
- Comanesti, 科莫内什蒂 185
- Common Market, 共同市场, 254—55, 257—58
- Commune of Paris, 巴黎公社 9
- Communism 共产主义, 芬兰的 161, 166 法国的 7, 德国的, 参见 German Communist Party 匈牙利的 169, 170 意大利的 53, 54, 58, 69, 243—4
-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共产国际 53
- Conquista Del Estado, La*, 《国家的征服》周刊 196
- Constitutional Democrats, 立宪民主党人 42
- Conti (Senator), 孔蒂(参议员) 63
- Corporate order, 法人团体制度 16
- Corporations, 行业合作协会 50, 74—75, 220—21, 225, 228, 239
- Copporative state, 总体国家 76, 160, 168, 173, 214, 230
- Corradini, Enrico, 科拉迪尼, 恩里科 19, 20, 21, 51, 63, 67
- Corriere della Sera*, 《晚邮报》 63
- Cosenza 科森察, 242
- Coty, François, 科蒂, 弗朗索瓦 79
- Courtrai, 科特雷 213
- Cremona, 克雷莫纳 58, 59, 72
- Crispi, Francesco, 克里斯庇, 弗朗切斯科 19
- Croats, 克罗地亚人 40
- Cross, Colin, *The Fascists in Britain*, 克罗斯, 科林, 《英国的法西斯分子》 260
- Cuba, 古巴 195
- Cuza, A.C., 库扎, A.C. 182, 183, 184, 190
- Czechoslovakia, 捷克斯洛伐克 84, 97, 119, 171, 172, 188, 被肢解 178, 188
- Czechs, 捷克人 10, 32, 36, 37—39, 40, 83, 120, 149
- Dalmatia, 达尔马提亚 48, 49, 50, 52
- D'Annunzio, Gabriele, 邓南遮, 加布里埃莱 48, 49, 51, 52,
- Daudet, Leon, 都德, 莱昂 15, 79
- Dawes Plan 道斯计划 121, 134, 159
- Daye, Pierre, 达耶, 皮埃尔 214
- De Bono, General Emilio, 德博诺将军, 埃米利奥 62, 63, 70
- Degrelle, Léon, 德格雷尔, 莱昂 160, 212—18, 231, 238, 239, 260 崇拜希特勒, 216,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217
- Déroulède, Paul, 戴鲁莱德, 保罗 11
- Deuerlein, Ernst, *Der Hitler-Putsch*, 多伊尔莱因, 恩斯特: 《希特勒暴动》 261
- Deutsche Arbeiterpartei* (Bohemia)

德意志工人党(波希米亚) 38, 82, 慕尼黑, 91—95, 101
Deutsche Reichspartei, 德意志帝国党 246—48
Deutsche Schriften (de Lagarde), «德意志文集» (德·拉加尔德) 25, 261
Deutscher Sozialist (Streicher's paper), «德意志社会主义»周报(斯特赖歇尔的报纸) 101
Deutschnationaler Handlungsgehilfenverband, 德国全国店员联盟 29, 94
Deutsch-Sozialisten, 德国社会党 100—3, 105
Deutschvölkische Freiheitspartei, 德国民族自由党 106, 122, 123, 130—31
Deutsch-Völkischer Schutz-und Trutzbund, 德国民族防卫同盟 106, 130
De Vecchi, Cesare Maria, 德·韦基, 切萨雷·马丽亚 63, 64
Dickel, Dr Otto, 迪克尔博士, 奥托 103, 104, 105, «西方的兴起» 103, 被开除出党 105
Dietsch (Great Netherlands) State, 大尼德兰国家 207—8, 210, 231, 235
Dignano, 迪尼亚诺 57
Dinassos, 迪纳索斯 208
Dobrudia, 多布罗加 189
Dolfuss, Chancellor Engelbert, and Mussolini, 多尔弗斯总理, 恩格尔伯特, 与墨索里尼 227—28; 被民社党暗杀, 228
Doriot, Jacques, 多里奥, 雅克 7, 238; «法兰西与我们» 260; «运动与人类», 260
Doris, Fritz, 多尔斯, 弗里茨 245
Dresden, 德累斯顿 24, 27
Drexler, Anton, 德雷克斯勒, 安东 91, 93, 95, 98, 102—05
Drefus, Captain Alfred, 德雷富斯上尉, 阿尔弗雷德 12, 13, 15
Drumont, Edouard, 德律蒙, 爱德华

11, 24
Dubrovin, Dr A. I., 杜布罗文医生, A.I. 42, 43
Duca, Ion, G., 杜卡, 容 被暗杀 187, 187, 188
Duc d'Orléans, 奥尔良公爵 15
Dühring, Dr Eugen, 杜林博士, 欧根 25
Dustburg, 杜伊斯堡 101
Duma 杜马, 41, 43, 第二届 42, 第三届 42
Düsseldorf, 迪塞尔多夫 100, 101, 143, 145
Dutch, 荷兰 204, 207, 210
Dutch National Socialists, 荷兰国家社会党 208, 231n.2
East End of London, 伦敦东部 221
East Prussia, 东普鲁士 106, 145
Eastern Karelia, 东卡累利阿 164, 165, 169
Ebert, Friedrich, 艾伯特, 弗里德里希 86
Eckart, Dietrich, 埃卡特, 迪特里希 92, 95, 98, 105, 106, 107
Edinburgh, Fascist failure at, 爱丁堡, 法西斯分子在该地的失败 222
Eger, 埃格尔 37
Ehrhardt Brigade, 埃尔哈特旅 87, 88, 95, 96, 98, 99, 123, 135
Ehrhardt, Captain Hermann, 埃尔哈特, 赫尔曼 88, 99, 112; 与希特勒争吵 123
Eisner, Kurt, 艾斯纳, 库特 91, 92
Eiberfeld, 埃尔伯费尔德 127
Emilia, 艾米利亚 52, 54, 55, 56, 59
Empire, British, 不列颠帝国 251—52
England, 英格兰 13, 119, 123, 132
Enlightenment, 启蒙运动 14
Entente, 协约国 46, 47, 170
Eritrea, 厄立特里亚 19
Erlangen, University of, 埃尔兰根大学 140

Erzberger, Matthias, murder of, 埃茨贝格尔, 马蒂亚斯, 被杀害 88, 97, 99, 164
Esser, Hermann, 埃塞尔, 赫尔曼 80, 104, 105, 122, 127
Estonia, 爱沙尼亚 86, 164, 165
Ethiopia, 埃塞俄比亚 1, 58
Etzel, Colonel, 埃策尔上校 123

Facta, Luigi, 法克塔, 路易吉 57, 62, 63, 64, 65
Falange Española, 西班牙长枪党 8, 198, 208, 235
Falange Española de las Juntas de Ofensiva Nacional Sindicalista, 西班牙长枪党(全称) 199-204, 民兵 201-2, 203, 纲领, 199
Falange Española Tradicionalista y de las Juntas de Ofensiva Nacional Sindicalista, 西班牙长枪党(全称) 203
Fara, General, 法拉将军 62
Farinacci, Roberto, 法里纳奇, 罗贝托 58, 72
Fascies, fasci, 法西斯 47, 49, 56, 77, 115, 219, 231
Fasci di Combattimento, 战斗的法西斯组织 49, 50, 55, 纲领; 49, 50, 96, 97
Fascio d'azione rivoluzionaria, 革命行动小组 47
Fascist Grand Council (Italy), 法西斯党大委员会 67, 76, 77, 221
Fascist Militia, 法西斯民兵 62, 63, 67, 71, 72, 73, 74, 77, 78
Fascist Syndicates, 法西斯工会 74-76, 156
"Fatherland Front" (Austria), "祖国阵线"(奥地利) 227
Feder, Gottfried, 费德尔, 戈特弗里德 92, 93, 96, 107, 126, 127
Federation of Catholic Associations and Circles, 天主教社团与党派联

合会 213
Federzoni, Luigi, 费德尔宗尼, 柳吉 20, 65, 67, 70
Fermi, Laura, *Mussolini*, 费尔米, 劳拉, 《墨索里尼》 241
Ferrara, 费拉拉 58, 59, 60
Finer, H., *Mussolini's Italy*, 芬纳, H. 《墨索里尼的意大利》 241
Finland, 芬兰 161-69, 234-35; 国民卫队 165-66, 167, 168; 内战 162-63; 共产党 163, 166; 被镇压 166, 167; 议会 161, 162, 165; 大芬兰运动; 164, 165, 168, 169, 176, 231 "拉普阿运动" 166-68; "人民爱国运动" 168-69; 成立革命政府(1917年) 162; 社会民主党 161, 163, 167; 为民族独立而斗争 161-62; 瑞典少数民族, 165, 168
Finzi, Aldo, 芬齐, 阿尔多 70
First world war, 第一次世界大战 9, 40, 44-46, 161-63, 205, 232, 237, 257
Fiume, 阜姆 48, 49, 50, 52; 邓南遮的远征 51-52
Flanders, 弗兰德 204-11, 215, 236; Lion of, 弗兰德狮子 20, 231
Flemish Council, 弗拉芒人委员会 205; 国民议会, 205; 民族主义 204-7, 215, 217-18, 238
Florence, 佛罗伦萨 19, 55, 71, 72
Forli, 弗利 20, 59, 61
France, 法国 10-17, 19, 21, 44, 46, 79, 121, 125, 188, 205, 238, 245, 250; 反犹太主义, 11-13, 15-17; 各法西斯政党 7, 80; 德国的敌视 99, 107, 108, 133-134; 希特勒关于法国的看法 119; 法国人赞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 79; 君主主义, 14, 15; 街垒战 15; 第三共和国 11-13, 16, 17, 22
France Juive, La, 《犹太人的法国》 11
Franco, General Francisco, 弗朗哥将

军, 弗朗西斯科 201—3
 Franconia, 弗兰科尼亚 106, 136, 145
 Franco-Prussian War, 法-普战争 11
 Frankfurt, 法兰克福 13, 101; 该地的
 民社党人, 99, 123, 130
 Frankfurter Zeitung, 《法兰克福报》
 118
 Franz-Willing, G., *Die Hitlerbewegung*,
 弗朗茨-维林, 《希特勒运动》
 261
 Free Corps 自由团, 奥地利的 223; 德
 国的 86—89, 92, 130, 135, 141,
 165, 235; 占领慕尼黑, 87, 92
 Freemasons, 互济会会员 13, 16, 17,
 20, 26, 42, 52, 91, 106, 173, 192,
 213
 Freilassing, 弗赖拉辛 122
 French invade the Ruhr, 法军开进鲁
 尔 79, 108, 235
 French Revolution, 法国大革命 11,
 12, 13, 14, 19, 30, 80
 French Socialist Party, 法国社会党
 45, 57
 Freytagh-Loringhoven, Professor
 Axel Freiherr von, 弗赖伊塔格-洛
 林霍芬教授, 阿克塞尔·弗赖赫尔·
 冯 89
 Frick, Wilhelm, 弗里克, 威廉 143,
 152
 Friedjung, Heinrich, 弗里德容, 海因里
 希, 34
 Frisians, 弗里西亚人 207
 Fritsch, Theodor, 弗里奇, 特奥多尔
 28, 29, 106, 130; *Hammer* 《铁锤
 报》28, 29; *Handbook of the Jewish
 Question*, 《犹太问题手册》28, 29;
Anti-Semitic Catechism, 《反犹太
 主义问答》28
 Fritsch group (Leipzig) 弗里奇小组
 (莱比锡) 28, 94, 106
 “Front of National Renaissance”
 (Rumania), “民族复兴阵线”(罗马尼
 亚) 188

Frontbann 前锋社, 122, 123
 Frontbewegung (Flemish), 前线运动
 (弗兰德) 206
 Frontpartij (Flemish), 前线党(弗兰
 德) 206—7
 Galicia, 加利西亚 25, 26, 33
 Garda de Fier, 参见 Iron Guard
 Geibel, Emanuel (poet), 杰贝尔, 埃曼
 努埃尔(诗人) 31
 Gentile, Giovanni, 詹蒂莱, 焦万尼 65,
 240
 German Centre Party, 德国中央党
 119, 132, 139, 145—46, 154—56;
 共产党 85, 87, 90, 98, 109, 113,
 121, 125—26, 132—33, 139—41,
 144, 146—52, 154, 157; 保守党 27
 劳工阵线 156; 民族主义党 89, 106,
 134, 143, 147, 152, 154, 156; 民族
 社会主义工人党(波希米亚的) 82—
 84; 人民党 156; 社会民主党 23, 45,
 47, 86, 119, 125—26, 132—33,
 140, 144, 145—47, 152—57; 工人党
 (波希米亚的) 38, 82; 工人党(慕尼
 黑的) 91—95, 101
 Germanic customs and ideology, 德
 国的风俗习惯和思想体系 28, 31, 36
 —37, 175, 209, 231, 236
 “Germanic Order”, “德意志骑士团”
 28, 92, 100, 102, 123
 Germanization, 德国化 25, 26, 40,
 119, 49
 Germany, 德国 13, 17—19, 22—32,
 33, 46—48, 79, 80, 160, 161—62,
 205, 237—9, 244—51, 258; 反犹太
 主义 23—31, 83, 87—94, 97—98,
 101, 104, 106, 120, 159, 171; 军队
 86, 111, 117, 138, 149, 150—51,
 157, 162, 172, 238; 审查 156; 殖
 民地 29, 96, 125; 共产党 参见
 German Communist Party 集中营
 157 经济危机(1930—1933年) 139,
 145, 149, 159, 234—35; elections

选举, 1919年 85. 1924年 121. 1928年, 132—33. 1930年, 139, 1932年 147, 149, 152. 1933年 154; 帝国, 22, 29, 33, 83—85, 97, 111, 117, 144; 授与权力法令 (1933年) 155; 自由团 86—89, 92, 130, 135, 141, 165, 235; 一体化, 155—57; 工业化 22; 通货膨胀 (1923年) 89, 108—09, 121, 159, 234—35; 犹太人 23—27; 参见Anti-Semitism 民族主义, 107, 117, 120, 133—34, 144, 159, 204, 235; 民族主义党人, 见 German Nationalist Party; 一党制国家 156—57, 204; 半军事性组织 93, 99, 109, 130 农民的不满 135, 136; 各种政党 119, 120, 121, 132, 133, 被解散 156; 王族, 没收或补偿的问题 126—27; 半独裁 145—51; 社会民主党, 参见 Germ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大学生 88, 140, 157; 第三帝国 81, 144, 155, 173, 178, 210, 211; 工会遭镇压 156; 失业 139, 149; 工人与士兵会议, 85—86

Gestapo, 盖世太保, 153, 157

Ghent, 根特 205, 206; 根特大学, 206—7

Gibraltar, 直布罗陀 197

Giolitti, Giovanni, 乔利蒂, 焦万尼 52, 53, 57, 62, 63, 68, 70, 72

Gmelin, Dr Hermann, 格梅林博士, 赫尔曼 142

Gobbels, Dr Joseph, 戈培尔博士, 约瑟夫 80, 125, 127, 128, 136; 改宗希特勒的思想 128—29; 任柏林大区领导人 129, 132, 136, 137, 141; 他在1932年底的悲观情绪 150, 151; 他的激进主义 125—27, 132

Goedsche, Hermann, 格德舍, 赫尔曼 24

Goltz, General Count Rüdiger von der, 戈尔茨将军, 吕迪格尔·冯·德尔伯爵 162

Gömbös, Gyula, 格姆伯斯, 居拉 172, 173, 174, 175, 177

Göring, Captain Hermann, 戈林, 赫尔曼 100, 110, 116—17, 131, 152, 173; 普鲁士内政部长 153, 155, 158

Göttingen, University of, 格丁根大学 25

Graefe, Albrecht von, 格雷费, 阿尔布雷希特·冯, 106, 116, 122, 130, 131

Grandi, Dino, 格朗迪, 迪诺 60, 255

Graz, 格拉茨 33, 38, 140, 226

Great Britain, 大不列颠 13, 19, 127, 218—23; 反犹太主义 218, 萧条 219, 221

Greater Britain Movement, 大不列颠运动 253—54

Greater Finland ideal, 大芬兰理想 164—65, 168—69, 176, 231

Greifswald, University of, 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 140

Groener, General Wilhelm, 格勒纳将军, 威廉 142, 146, 147

Grossdeutsche Volksgemeinschaft, “大德意志民族共同体” 122, 123

“Guard of the National Conscience” (Rumania), “民族良心卫队”(罗马尼亚) 183

Habsburg Monarchy, 哈布斯堡君主国 32—33, 36, 40, 41, 83, 84, 169, 224

Hadúr, 哈杜尔 175

Hamburg, 汉堡 101, 127, 137, 145

Hamburger Tagblatt, 《汉堡日报》 148

Hammer, The, 《铁锤》 28, 29

“Hammer League”, “铁锤联盟” 28, 106, 130

Hammerstein, Lt. -Col. Kurt von (later General), 哈默施泰因中校; 库特·冯 (后任将军) 111, 151注, 45

Hanover, 汉诺威 101, 125, 126, 145

Harrer, Karl, 哈雷尔, 卡尔 91, 92, 95

Harzburg, 哈尔茨堡 143
Hedilla, Manuel, 埃迪利亚, 曼努埃尔 202, 203
Heimatschutz (Styria), 家乡防卫队 223
Heimwehr, Austrian 奥地利卫国军 223—28, 31; 暴动 226
Heine, Heinrich, 海涅, 海因里希 249
Heinz, Friedrich Wilhelm, 海因茨, 弗里德里希·威廉 123
Helsinki, 赫尔辛基 161, 163, 166
Henry Colonel, 亨利上校 12, 13
Hentze, Margot, *Pre-Fascist Italy*, 亨策, 玛戈特, 《法西斯以前的意大利》 262
Hervé, Gustave, 埃尔韦, 居斯塔夫 21
Hesse, 黑森 249
Hesse, anti-Semitism in, 黑森的反犹太主义 27
Hilsner, Leopold, 希尔施纳, 利奥波德 43
Himmler, Heinrich, 希姆莱, 海因里希 141; 影响希特勒反对罗姆 158
Hindenburg, Colonel Oskar von, 兴登堡上校, 奥斯卡·冯 151
Hindenburg, Field-Marshal Paul von, 兴登堡元帅, 保罗·冯 87, 133, 145, 151—52, 154, 163; 再度当选总统, 146
Hitler, Adolf, 希特勒, 阿道夫 8, 31, 39, 44, 65, 77, 84, 160, 223, 231—32, 234, 235, 245—6, 251, 257; 《我的奋斗》 39, 81, 107, 117—20, 157, 166, 240; 与 H.S. 张伯伦 31; 与墨索里尼 80, 81; 军队服役 93, 95; 与德国工人党 93—98; 他的不断增长的势力 97, 105—6; 与一些民族主义党抗衡 102—7, 122—123, 130—31, 180—81; 退出该党 104; 任第一主席 105; 在 1923 年 108, 111—12, 117; 1923 年暴动 112—14, 117; 受审并被监禁 115—17, 121; 他的基本思想与纲领 118—20,

236; 他的反犹太主义 93—94, 118, 120, 123, 150, 235; 他关于法国及其他国家的看法 119, 127; 他的生存空间政策 129, 148—49 236; 1924 年危机 121—23; 与私有财产问题 126, 137; 战胜党内敌手 126—128; 在德国得势 135—37, 139, 141—43; 决心取得权力 146, 148; 被任命为总理 151—52, 154, 227; 清洗冲锋队 158, 192, 220; 在德国以外的影响 174, 191—192, 166—68, 200, 202, 209, 216, 218, 220—22; 他在奥地利的胜利 229; 反对希特勒的阴谋, 138, 246
Hitler Youth, 希特勒青年团 129, 168, 236
Hofmann, Hanns Hubert, *Der Hitler-putsch*, 霍夫曼, 汉斯·胡伯特, 《希特勒暴动》 261
Hofmann, Josef, *Der Pfrimer-Putsch*, 霍夫曼, 约瑟夫, 《普夫里默暴动》 259
Hohenstadt, 霍恩施塔特 38
Hohenzollern dynasty, 霍亨佐伦王朝 33, 37, 38, 40, 47, 117, 126, 133, 146, 154, 159
Holland, 荷兰 85, 160, 204, 208, 238; 荷兰的民社党 8, 208, 231 注. 2
Holocaust, 大屠杀 249—50
Holstein, 荷尔斯泰因 135, 136, 145
Horthy, Admiral Miklos, 霍尔蒂上将, 米克洛斯 170, 172—75, 177, 180, 192
Hugenberg, Alfred, 胡根贝格, 阿尔弗雷德 134—35, 143, 156
Huguenots, 胡格诺教徒 13
Hungarian National Socialist Agricultural Labourers' and Workers' Party, 匈牙利民族社会主义农业劳动者与工人党 174
Hungarians, Hungary, 匈牙利, 匈牙利人 25, 32, 36, 40, 161, 169—81, 193, 194, 224, 233, 235; 反犹太主

义 35, 170—75, 177, 179, 180; 军队 170, 172, 176—78, 235; 共产党人 170—171, 174, 178, 各法西斯政党 173—80, 197; 各政治党派 178; 修正主义 171, 174, 189; 社会民主党 170—72, 178, 180; 苏维埃共和国 90, 169, 170—71, 224, 232; 在慕尼黑会议后取得领土 178; 特里亚农条约的后果 171; 白色恐怖 169—70
Husi, 胡希 182
Il Regno, 《王国》 19
Imperial Fascist League, 帝国法西斯同盟 218
Independent Labour Party, 独立工党 221
Indo-Europeans, 印度-欧罗巴人 30
Inflation, 通货膨胀 54, 89, 103—9, 121, 159
Ingria, 因格里亚 164
Innsbruck, 因斯布鲁克 224
Iorga, Nicolae 伊奥尔加, 尼科莱, 182; 被杀害, 191
Iron Guard (Rumania), 铁卫军 187—93, 197, 234; 它的腐败 190; 对外政策 188, 192; 反叛政府 189, 192; 被镇压 188, 189, 192
Israel, 以色列 247
Istria, 伊斯特拉 25, 48, 57
Italian Communist Party, 意大利共产党 54, 57, 69; 自由党人 57, 65, 68, 69, 70; 民族党 19—21, 45—46, 50—52, 60, 65, 67, 74, 156; 社会党 20—21, 45—47, 52—57, 59—62, 65, 66, 68—70
Italy, 意大利 10, 17—22, 81, 117, 127, 160, 172, 178, 233—35, 237—44, 250, 258; 不存在反犹太主义 22; 黑衫队员 63—64, 67, 131, 242; 蓝衫队员 51, 64, 67; 天主教会 21, 50, 57, 70, 72, 77—78; 共产主义 53, 54, 57, 58, 69, 243—44; 经济

灾难 17—19, 54, 159, 234; 1913年选举 20; 1919年 53; 1921年 57 与注 11; 1924年 69; 1929年 77; 法西斯主义根源 22; 创立 47, 49, 50; 壮大 55—62; 纲领 49—50, 96—97, 235; 暴行 56—61, 71—72, 141; 向罗马进军 52, 60, 62—66, 79—80, 107—8, 115, 141, 152, 234, 244; 在意大利以外的影响 79—80, 165—166, 173, 196—97, 202, 207—8, 218—19, 225—29;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 45—49, 夺取土地 52, 53, 55; 占领工厂 53, 54, 55, 92, 233; 一党制国家 73—77, 152, 204; 贫穷 17—19; 暴动与不安宁 (1919—22年) 52, 55—61, 社会主义 20, 21, 52—55, 56—58, 59—62, 65, 66; “特别法庭” 73, 74; 罢工被宣布为非法 75, 76; 工会 45, 54, 76; 被宣布为非法组织 75, 76; 它的统一 17, 77 对埃塞俄比亚的战争 20; 对利比亚的战争 20, 21, 51
Jägers (Finnish), “枪手” 162, 165—67, 169, 172
Japan, 日本 19, 41
Jasi, University of, 扎希大学 182—84, 187
Jedlicka, Ludwig, 耶利卡, 路德维希 238
Jena, University of, 耶拿大学 140
Jesuits, 耶稣会士 26, 88, 212
Jews, 犹太人 10, 11, 12, 13, 22, 23, 26, 27, 89, 170—71, 179, 181, 202, 208, 245, 248, 254; 作为共产党人 90, 92, 170, 182; 在特兰西尔瓦尼亚北部 178; 参见 Anti-semitism
Jiliva, 吉利瓦 191
Joan of Arc, 贞德 15
Jochmann, Werner, *Im Kampf um die Macht*, 约希曼, 维尔纳, 《争夺权力的斗争》 261

Jong Dietschland, 《青年大荷兰》 207
Jong Vlaanderen, 青年弗兰德 205
 Jordan, Colin, 乔丹, 科林 252—53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现代史杂志》 259
 Jung, Rudolf, 容, 鲁道夫 83, 84, 96,
 102
Juntas de Ofensiva Nacional Sindicalista,
 民族工团主义防御团体 197—99

 Kahr, Dr Gustav von, 卡尔博士, 古斯塔夫·冯 110, 113—15; murdered, 被杀害 158
 Kahul, 卡胡尔 186, 187
 Kállay, Miklos, 卡洛伊, 米克洛什 22, 175, 179
 Kapp, Dr Wolfgang, 卡普博士, 沃尔夫冈 88
 “Kapp Putsch”, “卡普暴动” 87—89, 90, 130, 152, 224
 Károlyi, Count Mihály, 卡洛伊伯爵, 米哈伊 170
 Kaufmann, Karl, 考夫曼, 卡尔 125, 137
 Keresztes-Fischer, Lajos, 凯赖斯泰斯-菲谢尔, 拉约斯 177
 Kiel, 基尔海军兵变 101, 102; 85
 Kiev, 基辅 43
 Kirdorf, Emil, 基尔多夫, 埃米尔 135
 Knirsch, Hans, 克尼尔施, 汉斯 84
 Kola, 科拉 164
 Komlossy, 科姆洛谢 35
 Königsberg, 柯尼斯堡 97
 Kormos, C., *Rumania*, 科尔莫斯, C., 《罗马尼亚》 262
 Korneuburg Oath, 科尔诺伊堡誓约 225, 226
 Kosola, Vihtori, 科索拉, 维赫托里 167, 168
 Kovacs, Imré, 科瓦奇, 伊姆雷 174
 Krebs, Albert, 克雷布斯, 阿尔伯特 132, 137, 148; *Tendenzen und Ge-*

stalten der NSDAP, 《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倾向和形态》 261
Kreuzzeitung, 《十字架报》 24
 Kun, Béla, 库恩, 贝拉 170

 Labour Party (Great Britain), 工党 (英国) 219, 221, 255, 257
 Lagarde, Paul de, 拉加德, 保罗·德 25, 26 *Deutsche Schriften*, 《德意志文集》 25, 261
 Landauer, Gustav, 兰道尔, 古斯塔夫 87
Landbund, 农村联盟 142
 Landsberg, 兰茨贝格 117, 121, 123
 Landshut, 兰茨胡特 100
 Landsmanschaften, 同乡会 247, 苏台德德意志人的 247
 Langbehn, Julius, 朗贝恩, 尤利乌斯 26, 27, 28; *Rembrandt as an Educator*, 《作为教育家的伦勃朗特》 26
 “lapua Movement” (Finland), “拉普阿运动”(芬兰) 166—68
 Latvia, 拉脱维亚 86
 “Leader”, the myth of the, “领袖”的神话 231
 “league of Anti-semites”, 反犹太人同盟 25
 “League of Christian and National Defence” (Rumania), “基督教徒与全国防卫同盟”(罗马尼亚) 183—84
 “League of Empire Loyalists”, “帝国忠诚者联盟” 252—53
 League of Nations, 国联 133, 134
 “League of Patriots”, “爱国者同盟” 11
 Lecce, 莱切 75
 Leclercq, Abbé Jacques, 勒克莱尔神父, 雅克 212
 Ledesma Ramos, Ramiro, 莱德斯马·拉莫斯, 拉米罗 196, 198—99
 Leeds, Fascists fail at, 利兹, 法西斯分子在该地的失败 222
 Leese, Arnold Spencer, 利斯, 阿诺德·

斯潘塞 218
Leghorn, Congress of, 里窝那大会 54
“Legion of Archangel Michael”
(Rumania), “天使长米迦勒军团”
(罗马尼亚) 184—86
Lehmann, J.F., publisher, 莱曼, 出版
商 107
Leino, Eino, 莱诺, 埃诺 163
Leipzig, 莱比锡 28, 94, 101, 145
Leist, Lieutenant Hansjochen, 莱斯特
中尉, 汉斯约赫姆 111
Lenin, V.I., 列宁 46
Leopold III, King of the Belgians, 利
奥波德三世, 比利时国王 211, 215
Ley, Robert, 莱, 罗伯特 126, 127
Libertas (vienna), 《自由者》(维也纳) 33
Libre Parole, La, 《自由言论》 11
Libya, 利比亚 20, 21, 51
Liebknecht, Dr Karl, 利布克内希特
博士, 卡尔 87, 254
Liege, 列日 215
Ligue des Droits de Homme, 人权同盟
12
Linz, 林茨 38, 129
Lithuania, 立陶宛 7
“Little Entente”, “小协约国” 171, 172,
188
Loewenfeld Brigade, 勒文费尔德旅 87
London, 伦敦 13
London County Council Elections
(1937), Fascist success in, 法西斯
分子在伦敦郡议会选举(1937年)中
获胜 221
London, Treaty of (1915), 伦敦条约
(1915年) 48
Lorraine, 洛林 11
Lossow, General Otto Hermann von,
洛索将军, 奥托·赫尔曼·冯 110,
111, 113, 114, 116
Louvain, University of, 卢万大学
206, 212
Lower Saxony, 下萨克森 136, 246—
47, 249

Lubbe, Marinus van der, 卢贝, 马里
努斯·万·戴 154
Lucania, 卢卡尼亚 69
Ludendorff, General Erich 鲁登道夫
将军, 埃里希, 80, 106, 113, 114—
17, 121, 122, 123, 131, 163, 175
Lueger, Dr Karl, 卢埃格尔博士, 卡尔
35—36, 38, 40, 238
Lusignoli, Alfredo, 卢西尼约利, 阿尔
弗雷多 63
Lutheran, clergymen, 路德派教士
144, 169
Lützow, Free Corps, 吕措, 自由军团
87, 88
Luxemburg, 卢森堡 207, 215
Luxemburg, Rosa, 卢森堡, 罗莎 46,
87, 254

Macartney, C.A., *October Fifteenth*,
麦卡特尼, 《10月15日》 261
MacDonald, Ramsay, 麦克唐纳, 拉姆
赛 219
Madgearu, Virgil, 马德杰亚鲁, 韦尔吉
尔 191
Madrid, University of, 马德里大学
196, 197, 198, 199, 200
Magdeburg, 马格德堡 123
Magyars, 马扎尔人 171, 172, 176,
178—79; 马扎尔人神话, 175—76
Malines, Cardinal-Archbishop of, 马
利纳的枢机大主教 217
Mannerheim, Field-Marshal Baron
Gustaf, 曼海姆元帅, 古斯塔夫男爵
162, 163
Mäntsälä (Finland), 门策莱(芬兰)
167
Maraviglia, 马拉维利亚 67
Marburg, University of, 马尔堡大学 27
Markof, 马尔科夫 43
Marr, Wilhelm, 马尔, 威廉 25
Marx, Karl, 马克思, 卡尔 9, 10, 39,
254
Masaryk, Thomas, 马萨里克, 托马斯

Massawa, 马萨瓦 19
 Matteotti crisis, 马泰奥蒂危机 67, 70—72
 Matteotti, Giacomo, 马泰奥蒂·贾科莫 69, 70, 71
 Maurras, Charles, 莫拉斯, 爱尔 13—17, 80, 207, 212, 239
 Mecklenburg, 梅克伦堡 145
Mein Kampf, 《我的奋斗》参见 Hitler
 Meissner, Dr Otto, 梅斯纳博士, 奥托 151
 Mesko, Zoltán, 梅斯科, 佐尔泰因 174
 Mexico, persecution of Catholics in, 墨西哥对天主教徒的迫害 212
 Michellini, Arturo, 米凯利尼, 阿尔图罗 241
 Michels, Robert, *Sozialismus und Fascismus in Italien*, 米凯尔斯, 罗伯特, 《意大利的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 262
 Milan 米兰, 46, 49, 50, 52, 53, 55, 56, 60, 68, 225, 241
 Modena, 摩德纳 59
 Montegaldella, 蒙特加尔德拉 58
 Monza, Count Durini di, 蒙扎伯爵, 杜里尼·第· 81
 Moravia, 摩拉维亚 38, 148
 Mormorano, 摩尔摩兰诺 58
 Morocco, 摩洛哥 175, 197, 201
 Mosley, Sir Oswald, 莫斯莱, 奥斯瓦尔德 160, 210—23, 240, 251—2; 被捕 222; 他的个性和失败 222; 他的纲领 220, 221
 Mossano, 莫萨诺 58
 Mosse, G.L., *The Crisis of German Ideology*, 莫斯, 《德国意识形态危机》 260
 Mota, Ion, 莫塔, 容 184
 Movimento Social Italiano, 意大利社会运动, 239—44
 Munich 慕尼黑, 38, 80, 81, 100, 101, 105, 111, 113, 126, 128, 137, 172—

73; 反犹太主义 92, 97, 98; 比格尔布劳啤酒馆地下室 113, 114, 117, 123; 德国社会主义小组 100, 101; 德国工人党 91—95; 霍夫布劳豪斯酒馆 97, 99; 1923 年的暴动 80—81, 112—15, 123, 141; 冲锋队 99, 100, 110, 113—15; 苏维埃共和国 86—87, 90, 92, 117, 170, 232; 慕尼黑大学, 88

Mussert, Anton, 米塞尔特, 安通 160, 208, 238

Mussolini, Benito, 墨索里尼, 贝尼托 20, 22, 44, 46, 79—81, 107, 128, 143, 159, 160, 173, 195, 200, 207, 215, 223, 234, 236, 239, 244, 256—7; 对暴力的爱好 20—21; 赞成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46—48; 在战时 48; 主张取缔社会党出版物 48; 亲自向社会党人报复 49, 50, 65; 建立法西斯党 49; 在 1919 年 52—53; 1922 年以前摇摆不定的方针 56—57, 59—63; 成为首相 63—65, 152; 任首相 67—73; 与自由党的选举联盟 57, 69; 镇压一切反对派 71—74; 与教会, 77—78; 支持奥地利卫国军 224—27; 要求奥地利执行亲法西斯政策 227—28

Namur, 那慕尔 212, 215

Naples, 那不勒斯 58, 62

Napoleon I, 拿破仑一世 108

Napoleon III, 拿破仑三世 13

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 民族民主党 (N.P.D. 德国), 247—50; (意大利), 244 (Rumania), (罗马尼亚) 182

National Front (Britain), 民族阵线 (英国) 253—57

National Party (Britain), 民族党 (英国) 256—57

Nation Europa, 欧洲民族 247

Nationalist Party 民族党, 德国的, 参见 German Nationalist Party. 意大利

的, 参见 Italian Nationalist Party
National Socialism, 民族社会主义
29, 39, 80, 152, 166, 240, 252; 在
学生中, 140, 157, 166
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Workers'
Party (N.S.D.A.P.), 德国民族社会
主义工人党 95—99, 105, 107, 115,
121, 125, 128, 148, 204, 234, 235,
245—46, 251; 二十五点 96, 124,
128, 129, 173; 11月暴动失败 80—
81, 113—15, 123; 1923 年后的危机
121—23; 迅速发展 130, 143, 147;
改组 123—31; 1932 年衰落 149;
宣传 134—36, 143, 144, 159, 213;
夺取政权 150—55, 171
National Socialist Movement (Bri-
tain), 252—53; 民族社会主义党运
动(英国)
National Socialists, 民族社会主义党
人, 26, 28, 36, 39, 80, 83—84, 165,
175, 200, 211, 235, 237—38, 245—
49; 参见 Austrian National So-
cialists
Neo-Fascism, 新法西斯主义 237—57
Neo-Paganism, 新异教 31, 36—38, 145
Netherlands, 尼德兰(荷兰) 7, 204,
208—10, 211, 235, 238
Neril, J.P., 内特尔, J.P. 233
Neustettin, 新什切青 24
New Party (Great Britain), 新党(英
国) 219
“New Right”, “新右翼” 10
Nicholas II, Tsar, 沙皇尼古拉二世 41
Niemen river, 涅曼河 97
“Night of the long Knives” (30 June
1934), “长刀之夜”(1934年6月30日)
158
Nitti, Saverio, 尼蒂, 萨维里奥 53, 62
Nolte, Ernst, *Three Faces of Fascism*,
诺尔特, 恩斯特, 《法西斯主义的三个
方面》 230, 259
Noreia, battle of, 诺雷亚战役 36, 37
Nortz (Police President of Munich),

诺尔茨(慕尼黑警察总长) 109—110
Norway, 挪威 7
Novelli, General, 诺威利将军 62
Noventa, 诺文塔 58
Nuremberg, 纽伦堡, 100, 101, 102,
103, 105, 246, 249; 纽伦堡法令, 27
Oberland, Free Corps, 高地自由军
团 90, 113, 115, 130
O'Brien John, 奥布赖恩, 约翰, 256
Odessa, 敖德萨 42
Old Testament, 旧约 28
Opinia (Rumania), 《舆论》报(罗马尼
亚) 183
Ordine Nuovo, 新秩序 240—41
Ordre Nouveau “新秩序” 238
Organisation Consul (O.C.), “执政官
协会” 88
Orgesch, (organisation Escherich), 埃
舍里希协会 223, 224
Orlando, Vittorio Emanuele, 奥尔兰
多, 维托里奥·埃曼努埃尔 68, 70, 72
Orléans, Duc, d', 奥尔良公爵 15
Ortega, Onesimo Redondo, 奥尔特
加·奥内西莫·雷东多 166
Pabst, Major Waldemar, 帕布斯特少
校, 瓦尔德马尔 224, 227
Palatinate, 普法尔茨 145
Palestine, 巴勒斯坦 26
Panama Company, collapse of, 巴拿
马公司的失败 11, 12
Pan-German League, 泛德意志联盟
28, 29, 106, 143, 205
“Pan-German People's Community”,
泛德意志民族共同体 122
Pan-Germans, 泛德意志分子 33, 34,
37, 40, 223, 227, 229
Papal State, 教廷 77—78
Papen, Franz von, 巴本, 弗兰茨·冯
147, 148, 150—51
Parti Populaire Francais, 法兰西人
民党 7

"Party of National Will" (Hungary),
 "民族意志党"(匈牙利) 176
 "Party of Racial Defence" (Hungary),
 "种族防御党"(匈牙利) 172
 Pavel, P., *Why Rumania, failed*,
 帕维尔, P., 《罗马尼亚为何失败了》
 241
 Payne, S.G., *Falange*, 佩恩, 《长枪党》
 262
 "People's Patriotic Movement" (Finland),
 "人民爱国运动"(芬兰) 168
 Perugia, 佩鲁贾 63
 Petrograd, 彼得格勒 164
 Petrozavodsk, 彼得罗扎沃兹克 169
 Petsamo, 佩萨莫 164
 Pfeffer von Salomon, Franz, 普菲费尔·冯·扎洛蒙, 弗兰茨 130, 141
 Pfordten, Theodor von der, 普弗尔腾, 特奥多尔·冯·戴 116
 Pfrimer, Dr Walter, 普弗里默博士, 瓦尔特 223, 225, 226
 Piacenza, 皮亚琴察 59
 Piave river, 皮亚韦河 48
 Picard, Mgr, 皮卡尔, 212
 Pinerolo, 比内罗洛 53
 Pisa, 比萨 71
 Poiana, 波亚纳 58
 Poincaré, Raymond, 彭加勒, 雷蒙(普安卡雷) 79
 Poland, 波兰 7, 26, 84, 119, 148, 237
 Poles, 波兰人 10, 32, 40, 86, 87, 99
 Pomerania, anti-Semitism, in, 波美拉尼亚的反犹太主义 24, 27, 145
 Pope, 教皇 11, 16, 77, 78
 Popolari, 人民党 57, 65, 67, 68, 69, 70, 72
Popolo d'Italia, 《意大利人民报》 47, 52, 60, 62, 69
 Pordenone, 波德诺内 58
 Portugal, 葡萄牙 7, 125, 238
 Posnania, 波斯纳尼亚 25
 Potolea, 波托莱亚 186
 Potsdam, 波茨坦 138, 147 "波茨坦

节日", 154
 Prague, 布拉格 24, 32, 33, 37; 布拉格大学, 43
 Prato, 普拉托 60
Preussisch Jahrbücher, 《普鲁士年鉴》 25
 Primo de Rivera, José Antonio, 普里莫·德里维拉, 何塞·安东尼奥 160, 198—201, 203, 222, 231; 被处死 201, 垮台 195—96
 Primo de Rivera, Miguel, 普里莫·德里维拉, 米格尔 195, 203
 Protestants, 新教徒 10, 13, 14, 37, 144, 145, 157, 168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 "犹太长老会谈记录" 24, 29, 118, 184
 Prussia(n), 普鲁士 17, 36, 37, 80, 138; 政府 133, 147, 153; 警察 141, 147, 153; 在戈林领导下 153, 155
 Prut river, 普鲁特河 182, 186, 187
 Pujo, Maurice, 皮若, 莫里斯 12
 Pulzer, Peter G.J., *Rise of Political Anti-Semitism in Germany and Austria*, 普尔泽, 彼得: 《德国和奥地利政治上反犹太主义的产生》 260
 Quisling, Vidkun, 吉斯林, 维德昆 160, 238
 Racialism 种族主义, 奥地利的 34, 36, 84 英国的 255—57; 芬兰的 165; 德国的 24, 25, 27, 29, 30, 31, 36, 89, 118—19, 160, 165; 匈牙利的 172, 175
 Racial Preservation Society, 种族保持协会 253
 Ramos, Ledesma R. 拉莫斯, 莱德斯马, 参见 Ledesma Ramos
 Rathenau, Walther, murdered, 拉特瑙, 瓦尔特被暗杀 88, 164
 Rauschning, Hermann, 劳施宁, 赫尔

- 曼 236
- Rauti, Pino, 劳蒂,皮诺 241
- Ravenna, Fascist violence in, 拉文纳, 法西斯分子在那里的暴行 61
- Read, Kingsley, 里德,金斯利 256
- Redondo, Ortega, Onesimo, 雷东多·奥尔特加,奥内西莫 196
- Reggio Calabria, revolt of, 勒佐卡拉布里亚叛乱 242—43
- Reggio, Emilia, Congress of 勒佐艾米利亚大会 21
- Reichskriegsflagge, Free Corps, “帝国战旗”自由军团 114, 115
- Reichsflagge, Free Corps, “国旗”自由军团 99
- Reichsrat (Austria), 帝国议会(奥地利) 34, 35, 37, 39
- Reichstag burnt down, 国会大厦被烧毁 153
- Reichswehr, 国防军 113, 116, 138—39, 141, 155, 234; 接受纳粹新兵 142; 反对巴本政府 150—51
- Remarque, Erich Maria, 雷马克,埃里奇·马丽亚 136
- Reparations, 赔偿 108, 134, 235
- Requetés, 义勇军 203
- Reventlow, Count Ernst zu, 雷文特洛伯爵,恩斯特·楚 106, 130
- Rex, 王(列克斯) 212
- Rex-Vlaanderen, 弗兰德-列克斯组织 215
- Rexist Movement, 列克斯运动 213—18; 会议 213—14, 216; 纲领 214
- Rhineland, 莱茵兰 107, 121, 125, 143
- Riccione conference, 里希翁纳会议 227, 228
- Riehl, Dr Walter, 里尔博士,瓦尔特 84, 95, 102, 129
- Rimini, 里米尼 61
- Rintala, Marvin, *Three Generations*, 林塔拉,马尔文:《三代人》 163, 260
- Rintelen, Dr Anton, 林特伦博士,安东 223
- Ritual Murder propaganda, 杀人祭神宣传 43, 136, 218
- Roberts, H.L., *Rumania*, 罗伯特:《罗马尼亚》 263
- Roccastrada, 罗卡斯特拉达 59
- Rocco, Alfredo, 罗科,阿尔弗雷多 70, 75
- Rackwell, Lincoln, 罗克威尔,林肯 253
- Roger, Hans, and E. Weber, *The European Right*, 罗杰与韦伯:《欧洲的右派》 259
- Rohling, August, 罗林,奥古斯特 24
- Rohm, Captain Ernst, 罗姆上尉,恩斯特 92, 93, 95, 98, 109, 110, 114, 122, 131, 157—58; 与希特勒争吵 123; 被召请来领导冲锋队 141; 被党卫队处死, 158
- Romagna, 罗马尼亚 45, 52, 61
- Roman Empire, 罗马帝国 20, 36, 80, 219, 231, 236
- Rome, 罗马 45, 51, 52, 60, 64, 68, 69, 77, 159, 225, 240, 242; 法西斯分子向罗马进军 52, 60, 62—65, 79, 80, 107—8, 115, 141, 152, 234, 244
- Rosenau, 罗森瑙 33
- Rosenberg, Alfred, 罗森贝格,阿尔弗雷德 107
- Rosbach, Free Corps, 罗斯巴赫,自由军团 87
- Rosbach, Lieutenant Gerhard, 罗斯巴赫,格哈德 114
- Rossi, A. (Angelo Tasca), *Rise of Italian Fascism*, 罗西, A (安杰洛,塔斯卡):《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产生》 262
- Rossi, Cesare, 罗西,切萨雷 70
- Rostock, University of, 罗斯托克大学 140
- Roth, Alfred, 罗特,阿尔弗雷德 106
- Rothschild Banking House, 罗思柴尔德银行家族 11
- Roucek, J.S., *Contemporar y Rumania*,

罗切克:《现代罗马尼亚》 262
 Ruhr, 鲁尔 22, 79, 108—10, 121, 130, 235; 工业家给希特勒捐助经费 135, 143; 被法军占领 79, 108, 121
 Rumania 罗马尼亚, 160, 163, 170, 171, 172, 178—79, 181—23, 194, 232—33, 234; 反犹太主义 181—86, 190, 192—93; 支解 189; 正教会 184; 在德国影响下 189, 191—92; 宣布成立“民族团国家” 190; 宣布成立“民族和社会国家” 193; “罗马尼亚民族法西斯” 184;
 Russia, 俄国, 9, 26, 41—43, 44, 86, 118, 119, 161, 162, 163, 181, 217, 247, 253; 1905年革命 9, 41, 161; 1917年革命 52, 55, 85, 161—62, 182, 252, 254
 Russo-Japanese, War, 俄日战争 9, 41
 Rust, Bernhard 鲁斯特, 伯恩哈德 125
 Ruthenia, 鲁特尼亚 40, 171, 178
 S.A. (Sturm-Abteilung), 冲锋队 92, 99, 100, 110, 113—14, 116, 122, 129, 136, 141—142, 143, 146—47, 148, 152—54; 改组 123, 130—31; 私设军队 131, 139—41; 意见不同者被逐出 141; 清洗 157—58, 192, 220
 Saar, 萨尔 22
 St Germain, Treaty of, 圣日耳曼条约 48, 96, 229
 St Petersburg, 圣彼得堡 42
 Salandra, Antonio, 萨兰德拉, 安东尼奥 59, 62, 64, 68, 70, 72
 Salmiala, Bruno, 萨米亚拉, 布鲁诺 168
 Salo, Republic of, 萨洛共和国 239, 241
 Salomon, Ernst von, 扎洛蒙, 恩斯特·冯 88 注 5
 Salvemini, G., *Under the Aze of Fascism*, 萨尔维米尼:《在法西斯主

义的统治下》 262
 Salzburg, 萨尔茨堡 102, 116
 Santander, 桑坦德 202
 Saxony, 萨克森, 24, 27, 136, 145, 156; 反犹太主义 24, 27, 28; 左翼政府 80, 109—10
 Scandinavia, 斯堪的纳维亚 31, 165
 Scelba, Mario, 谢尔巴, 马里奥 240
 Schacht, Dr Hjalmar, 沙赫特博士·希亚马尔 135
 Scheidemann, Philipp, 谢德曼·菲利普 47, 88, 97
 Schelde, De, 《斯凯尔特》 207
 Scheringer, Richard, 舍林格尔, 里夏德 133
 Scherl Publishing House, 舍尔出版社 134
 Schlageter, Albert Leo, 施拉格特尔, 阿尔伯特·莱奥 108
 Schleicher, General Kurt von, 施莱歇将军, 库特·冯 146—48, 150—52; 被杀害 158
 Schleswig, 石勒苏益格 135, 136, 143, 167, 246
 Schönerer, Georg Ritter von, 舍纳勒, 格奥尔格·里特尔·冯 33—36, 40, 41, 106, 223, 239
 Schroder, Kurt, von, 施罗德, 库特·冯 151
 Schroeder, Otto, 施罗德, 奥托 88
 Schultz, Karl, 舒尔茨, 卡尔 129
 “Scythe Cross” Party (Hungary), “镰刀十字”党(匈牙利) 173, 177
 Second world war, 第二次世界大战 147, 211, 216—17, 237, 247—8, 257
 Seeckt, General Hans von, 泽克特将军, 汉斯·冯 110, 143
 Segers, Paul, 塞热, 保罗 213
 Segotti, 西戈蒂 58
 Seipel, Dr Ignaz, 赛佩尔博士, 伊格纳茨 224
 Seisser, Col. Hans von, 赛塞尔, 汉斯·冯 112—14

- Sentussi, 森奴西人 20
- Scphardic Jews, 塞法尔第犹太人(西班牙或葡萄牙的) 30
- Serbs, 塞尔维亚人 40
- Sesselmann, S.H., 泽塞尔曼, S.H., 101
- Severen, Joris van, 塞维伦, 若里斯·范 206—11, 218, 231, 239
- Seville, 塞维尔 200
- Sheffield, Fascist failure at, 谢菲尔德, 法西斯分子在该地的失败 222
- Siberia, 西伯利亚 149
- Sicily, 西西里 242
- Siena, 锡耶纳 149
- Silesia, 西里西亚 89, 145
- Sima, Horia, 西玛, 霍里亚 1^o0—92
- Sindicati Nazionale dei Lavoratori, 工人民族联盟, 240—42, 244
- Siry, Major Alexander, 西里少校, 亚历山大 114
- Skalnik, Kurt, *Dr Karl Lueger*, 斯卡尔尼克, 库特:《卡尔·卢埃格尔博士》 259
- Sklarek brothers, scandal 斯科克拉雷克兄弟丑闻 133, 134, 213
- Slavs, 斯拉夫人 26, 30, 32, 34, 36, 39, 51, 84, 170, 17^o; 民族主义 40, 84
- Slivna, 斯利夫纳 185
- Slovakia, 斯洛伐克 25, 171, 178
- Slovenes, 斯洛文尼亚人 32, 36, 56, 57
- Smith, Dennis Mack, *Italy*, 史密斯, 丹尼斯·麦克:《意大利》 262
-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社会民主党 奥地利的 37, 3^o, 45, 66, 120, 224, 227—28; 芬兰的 161, 163, 167; 德国的 23, 45, 47, 86, 119, 125, 126, 132, 133, 140, 144—47, 152—57, 250; 匈牙利的 170—72, 178, 180
- Soiuz Russkogo Naroda*, 俄罗斯人民联盟 41—43
- Sorbonne, 索邦 15
- Sorel, Georges, 索雷尔, 乔治 16
- Southampton, Fascist failure at, 南安普顿, 法西斯分子在该地的失败 222
- South Tyrol, 南蒂罗尔 18, 125, 224—25, 236
- Soviet Republics, 苏维埃共和国 参见 Hungary and Munich Soviet Republics
- Soviet Russia, 苏联 125, 161, 164, 179, 182, 18^o, 197
- Soviets, 苏维埃 53
- Sozialistische Reichspartei (S. R. P.) 社会主义帝国党 (S.R.P.) 245—46
- Spain, 西班牙 194 —204, 217, 233, 235, 238; 无政府主义 194, 196—98; 反犹太主义 202; 军队 195, 201—3, 238; 共产党人 194; 1923年政变 195—96; 1936年选举 200; 将军们的叛乱 201; 政府的弱点 195, 196, 200, 234; 人民阵线政府 200—1; 社会冲突 194, 195; 社会党人 194, 199; 工团主义分子 194, 197; 工会 194; 工人阶级运动 194, 198, 199
- Spartacus Rising, Berlin 1^o19, 1919年柏林斯巴达克起义 86, 87
- Spearhead, 《先锋》 254—56
- S.S., 党卫队 124, 12^o, 141, 147, 153, 154, 240, 247; 清洗冲锋队 158
- Stahlberg, K.J., 施塔尔贝格, K.J. 164, 166
- Stahlhelm*, “钢盔” 135, 143, 152—53
- Starhemberg, Prince Ernst Rüdiger von, 施塔伦贝格亲王, 恩斯特·吕迪格尔·冯 226, 227, 228
- Steidle, Dr Richard, 施泰德勒博士, 里夏德 224, 225, 226
- Stennes, Captain Walther, 施滕纳斯上尉, 瓦尔特 141, 142
- Stepney, Fascist success in, 斯特普尼, 法西斯分子在该地取得胜利 221
- Stem, Fritz, *Politics of Cultural Despair*, 施特恩, 弗里茨:《文化绝望的政策》 261

Stoecker, Adolf, 施特克, 阿道夫 23—28, 35
Strasbourg, 施特拉斯堡 97
Strasser, Gregor, 施特拉塞尔, 格雷戈尔 100, 122, 124—27, 129, 137, 141, 149—50; 被任命为北德意志领袖 124; 被杀害 158; 纲领 124—25
Strasser, Dr Otto, 施特拉塞尔博士, 奥托 8, 124, 137, 141, 197; 他的“德意志社会主义” 124, 137, 245
Streicher, Julius, 施特赖歇尔, 尤利乌斯 28注. 15, 100, 101, 103, 105, 122, 127; 他的反犹太主义 101, 106, 136; 和希特勒联合 105
Stresemann, Dr Gustave, 施特雷泽曼博士, 古斯塔夫 109, 110—11, 121, 133, 134
Sturm-Abteilung, 参见 S.A.
Stürmer, Der, 《冲锋队员》 136
Sturzo, Don, 斯图尔索, 唐 68
Styria, 施蒂里亚 223, 226, 227, 228
Suchenwirth, Richard, 祖亨维尔特, 里夏德 129
Sudeten, Germans, 苏台德 德意志人 125, 236, 247
Sunday Express, 《星期日快报》 137
Suvich, Fulvio, 苏维奇, 富尔维奥 228
Svinhufvud, P.E., 斯温胡弗武德, P.E. 166, 167
“Swabians”, “斯瓦比亚人” 171, 172
Swastika, 卐标志 28, 87, 88, 95, 96, 112, 114, 174, 183, 218, 231, 251—3
Switzerland, 瑞士 13
Syndicalists (France), 工团主义者(法国) 16
Syndicalists(Spain), 工团主义者(西班牙) 194
Szálasi, Ferencz, 斯扎拉西, 费伦涅兹 160, 173, 176—81, 被监禁 178
Szeged, 塞格德 170, 178
“Szeged Committee”, “塞格德委员

会” 170
Talmud, 塔尔穆德 24
Tannenbaum. E.R., *The Action Française*, 坦南鲍姆: 《法兰西行动党》 239
Teleki, Count Pál, 泰莱基伯爵, 帕尔 175, 178, 179
Teutoburg Forest, battle of, 托伊托堡森林战役 37
Teutonic Order, 条顿军团 119
Thadden, Adolf von, 塔登, 阿道夫·冯 248—50
Thomas, Hugh, *The Spanish Civil War*, 托马斯: 《西班牙内战》 262
Thuringia, 图林根左翼政府, 112, 145, 80, 109—10
Thyssen, Fritz, 蒂森, 弗里茨 135, 143
Tigré, 提格雷 19
Tilby, General, 蒂尔比将军 62
Tillessen, Carl, 蒂勒森, 卡尔 99
Tillessen, Heinrich, 蒂勒森, 海因里希 88, 99
Torre, 托雷 58
Tory Party, 托利党 218—19
Transylvania, 特兰西瓦尼亚 112, 171, 178—79, 181, 189
Traunstein, 特劳恩施泰因 122
Trautenau, 特劳滕瑙 38
Treitschke, Heinrich von, 特赖奇克, 海因里希·冯 25, 29
Trento, 特兰托 18, 48
Tresckow, Lieutenant Henning von, 特雷斯科, 亨宁·冯 138
Trianon, Treaty of, 特里亚农条约 171, 174, 178, 181
Trieste, 的里雅斯特 18, 48, 51, 56, 58
Triple Alliance (1882), 三国同盟 18, 46
Trotsky, L.D., 托洛茨基, L.D., 91
Tsarism, 沙皇专制政治 41, 42
Tunisia, 突尼斯 20
Turanians, 都兰人 175, 231
Turati, Filippo, 图拉蒂, 菲利波 21,

53, 65
 Turin, 都灵 53, 65
 Turkey, 土耳其 20
Turnerschaft, 体操协会 33
 Tuscany, 托斯卡纳 71
 Tyndall, John, 廷德尔, 约翰 252—54, 256—57
 Tyrol, 蒂罗尔 37, 223, 224, 228; 南方, 18, 224, 225, 236

 Udine, 乌迪内 58
 Ukrainians, 乌克兰人 178, 181
 Ulm, 乌尔姆 138
 Union of the Russian People, 俄罗斯人民联盟 41—43
Union Patriotica (Spain), 爱国主义者联盟(西班牙) 195
 "United Hungarian National Socialist Movement", "统一匈牙利民族社会主义运动" 177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利坚合众国 195, 248, 251, 254
Unverfälschte Deutsche Worte, 《纯洁德语》 34, 35
 Upper Austria, 上奥地利 228
 Upper Silesia, 上西利西亚 22, 84, 104

 Vacaresti, 弗克雷什蒂 184
 Valence, Louise Navaez Duchesse de, 瓦朗斯公爵夫人, 路易丝·纳瓦耶兹 214 注 ②; 《德格雷尔和我的谈话》 239
 Valladolid, 巴利阿多里德 197, 200; 巴利阿多里德大学 196
 Valois, Georges, 瓦卢瓦, 乔治 79
 Vareschi, 瓦雷什基 53
 Varus, Quintilius, 瓦卢斯, 昆蒂柳斯 37
 Vatican, 梵蒂冈 68, 77—78
 Vaugois, Henri, 沃热瓦, 亨利 12
 Veesenmayer, Dr Edmund, 费森迈尔博士, 埃德蒙德 180
 Venezia, 委内瑞拉 58
 Venezia Giulia, 威尼西亚朱利亚 56

Venice, 威尼斯 48, 59
 Verbond van Dietsche Nationaal-Solidaristen, 尼德兰全国社会连带主义者联盟 207—11, 260; 民兵, 208
 Versailles, Treaty of, 凡尔赛条约 89, 90, 96, 107, 120, 125, 133, 134, 135, 159, 171, 234—235, 247
 Vicenza, 维琴察 58
 Victor Emmanuel III, King of Italy, 意大利国王维克多·埃曼努埃尔三世 64
 Vienna, 维也纳 32—36, 38, 40, 44, 82, 129, 223, 229; 第二次审判 179, 189; 市参议会 36; 该地犹太人 32, 36, 97; 司法官被烧毁 224; 红色堡垒 223, 224, 225; 社会主义者大罢工 224; 维也纳大学 32
 Vlaamsch Nationaal Verbond, 佛兰德人民族联盟 209—11, 215, 217
Vlaamsche Front, 弗拉芒人阵线 206
Vlaamsche Volk, Het, 《弗拉芒人民报》 209
 Vlan, 《弗莱》 213
 Volkisch, "民族的" 31, 36, 39, 82, 84, 92, 95—96, 100, 103, 106—7, 111, 118, 121—23, 124, 130—31, 175, 223, 235
Völkischer Beobachter, 《民族观察家》 98, 107, 110
Völkischer Block, "人民集团" 115
 Volksunie, in Flanders and Holland, 佛兰德与荷兰的"人民组织" 238

 Waffen S.S., 武装党卫军 162, 238, 247
 Wallenius, Major-General, 瓦伦纽斯少将 166
 Walloon Legion, 瓦隆军团 217
 Walloons, 瓦隆人 204, 205, 210—12, 215, 238
 Warnemunde, 瓦尔内明德 88
 Warren, John C.P., *Political Career*

- and Influence of Georg Ritter von Schonerer*, 沃伦, 约翰, 《格奥尔格·里特尔·冯·舍纳勒的政治生涯与影响》 260
- Weber, Eugen, 韦伯, 欧根 185 注. 23
《法兰西行动党》 260; 《欧洲的右派》 259
- Weimar, National Socialist Conference at (1924), 魏玛, 民社党在该地举行的会议(1924年) 122
- Weimar Republic, 魏玛共和国 133, 134, 146, 153, 159, 234, 235, 245, 249, 251
- Wels, Otto, 韦尔斯, 奥托 155
- Werkgemeinschaft Augsburg des Abendlandischen Bundes*, 西方联盟奥格斯堡社团 103
- Werth, General von, 韦特将军, 冯 179
- Wessel, Horst, 韦塞尔, 霍斯特 232 注. ①
- West Africa, 西非 29
- West Indians, 西印度群岛人, 255
- Westarp, Count Kuno, 韦斯塔普伯爵, 库诺 89
- Whiteside, Andrew G., *Austrian, National, Socialism before*, 1918, 怀特赛德: 《1918年前的奥地利民族社会主义运动》 259
- Wiessee, 维塞 158
- Wiking*, 威金自由军团 130
- Wilhelmina, Queen of Holland, 荷兰女皇威廉娜 211
- Wilhelmshaven 威廉港, 102; 海军兵变, 85
- Willemssen, A.W., *Het Vlaams-nationalisme*, 维莱姆森, A.W., 《弗拉芒民族主义》 206 注②, 260
- William II, Kaiser, 德皇威廉二世 85, 163, 221—22
- William, Crown Prince of Germany, 德国太子威廉 147
- Wittelsbach dynasty, 维特尔斯巴赫王朝 126, 172
- Wolf, Karl Hermann, 沃尔夫, 卡尔·赫尔曼 37
- Wotan, 沃坦 175
- Wulle, Reinhold, 武尔, 赖恩霍尔德 106, 116
- Wuorinen, J.H., *Nationalism in Modern Finland*, 沃林南, J.H., 《现代芬兰的民族主义》 239
- Wurttemberg, 符腾堡 145
- Wurzburg, 维尔茨堡 136
- “Yellow Shirts” (Russia), “黄衫”党 (俄国) 42
- Yiddish, 依地语 181
- Yoke and Arrow, 轭与箭 197, 231
- Young Plan, 杨氏计划 134, 138, 159
公民投票反对 135
- Yugoslavia, 南斯拉夫 48, 52, 84, 172, 179, 188, 223
- Zamboni, General Anteo, 扎姆本尼将军, 安泰奥 62
- Zeeland, Paul van, 齐兰, 保罗·范 217
- Zeitz, 蔡茨 101, 102, 103, 104
- Zeller, 策勒 109—10
- Zionism, Zionists, 犹太复国主义, 犹太复国主义者 249, 254
- Zola, Emile, 左拉, 埃米尔 12 《我控诉》, 12
- Zuechi, 祖埃基 58